房伟

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房伟

革命星空下的「坏孩子」：王小波传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第一章见证荒诞-作家之死

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心气总是很高的，最后总要向现实投降，我刚刚过了四十四岁生日，在这个年龄上给自己做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但我总觉得，我这一生绝不会向虚无投降-我会一直战斗到死。

——王小波《有与无》

佛山陵园位于北京昌平区，处于风景秀丽的佛山脚下。佛山与明十三陵所在的天寿山一脉相承，峰顶宋代曾建有上方寺，香火极旺，钟声绕谷，鸟兽驻足，因而得名“佛山"o1993年，昌平市政局开始建造佛山陵园。陵园依山而建，园中林木葳蕤，清幽寂静。如果在秋色深沉的季节，你顺着陵园右首的“新八区”铺满金黄落叶的小径上行，就会在山顶看到一块天然巨石，上有一行青色大字:“王小波之墓：1952—1997”。巨石呈赤红色，若燃烧之火墙，中下部掏空成一石匣，以放置骨灰，作家王小波即长眠于此。

1997年，王小波去世后，其妻社会学家李银河，数次为其选择墓地.都因墓制过于呆板而作罢。李银河想给王小波选一个“独特别

致”、“充满艺术气息”的安眠之地，而不愿遵从那些整齐划一、横平竖直的严肃布局。李银河最终选择了刚开放没几年的佛山陵园，花了六T-元购置了这块墓地.精心设计了与众不同的墓碑，并请一位书法家朋友写了“王小波之墓”字样，每年4月11日，王小波的祭日，李银河与王小波的家人都要来此祭奠。这里也常会有王小波的崇敬者前来祭拜c其实.只要你在陵园入口，向卖鲜花和祭品的小贩打听“新八区”，他们多会说：“您是来看王小波的吧？”巨石下的青石板上，有很多纪念留言，有的则在石头上贴上纸.写着诸如“谢谢你，让这世界变得更美好”之类的话。还有一些二锅头酒瓶，以亲切的方式表达着对逝者的怀念。站在王小波的墓前，俯身鸟瞰，青山旷野.松涛如咽。

1

1997年4月10H,正是春寒料峭的时节，北京郊区顺义王小波居住的小区，夜深人静之时，突然传来了凄厉的叫声。很多邻居都被惊动了，却无人出来查证。没有人注意到，一颗闪亮的星星即将坠落……作家王小波，悄悄地告别了人间，也震惊了文坛。现在已很少有人知道，曾经有位作家王小波，在此度过了最后的生命时刻。对王小波的死亡，母亲宋华有详细描述：

> 原来小波10日下午去了他的住处，3点还去房管科交了费，6点钟时，有人看见他在楼下散步，10点钟的时候，邻居看见他的屋内还亮着灯。约11点半钟的时候，楼下的邻居听到他喊了两声，是非常痛苦的惨叫。11日早晨，邻居们互相交谈着小波的惨叫，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年轻

的大汉.会在家里突遭不幸又过了7个小时，到了下午3点左右，邻居们不见小波出来，意识到可能出了什么事。他们上楼去，推开门，看见小波已经倒在地上。他面顶南墙，身体弓着，已死去多时了。他走得太突然，后来经公安法医验定：心脏病发猝死-我知道了小波的噩耗，当时虽然很冷静，但心如撕裂，万分悲痛！'

这是一场猝不及防的“偷袭”。很多人认为，如果抢救及时应能避免但王小波去世后，曾有一个详细尸检，才发现他已患严重的心脏病：“左心室内膜增厚（超过正常内膜厚度10倍）.左心腔扩张”，结论是“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患者“因心力衰竭死亡”。多年以后，我还依稀汜得，最初读到王小波的小说《绿毛水怪》时的感觉。灵动，清澈.深情，却又高傲无比，骨头里深藏着对秩序和权威的不屑一顾。可是，这样强悍的头脑.却有一颗“脆弱”的“心”。王小波以“面顶南墙，身体弓着”的躺卧姿态，离开了这个让他爱恨交织的世界。没有鲜花和掌声，“冰冷的南墙”是最后的隐喻：斗室已成身体的监狱，他只有独自面对死神的苍白面孔。

王小波的死讯传来时，李银河正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那几天，她一直感觉心发慌匸李银河的姐姐.给她打了越洋电话，说.你快回来吧，出事了：李银河的心猛地揪做一团，急忙问什么事，姐姐却并没有言明，第二天.她乘坐飞机赶回北京.路上有位中国社科院的同事说，小波真是一个诗人，连走了也这么诗意。她一下子就猜到是小

1宋华，《母亲的忆念》.《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艾晓明、李银河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107页。以下引文凡出自同一本书（或报刊）的.重复征引时只列文章名、书名和页码信息。

波出事了！泪水顿时充盈了眼眶……

青年评论家李静，是王小波的朋友，也是欣赏王小波的一位文学编辑。她这样描述王小波之死——事情已过去了十几年，但她讲述时，眼圈依然红红的：

> 事情过去好几天，我才知道。当时，一位同事告诉我，王小波去世了，我的脑袋感觉"轰”地一下，像炸开了似的，在办公室里失声痛哭。那是真正的嚎啕大哭。我一直把小波当作“精神导师”。我当时就找到领导，要求做一个王小波纪念专版。领导微微沉吟了一下，我知道，他是在掂量王小波的文学分量。我那时才二十六岁，情绪激动地对领导说，您放心，这个专版的效果一定会非常好！文学史会记住王小波的！我当时还很年轻，想也没想就把这个意思表达了出来。[1]

其实，去世前的一段日子，王小波已显露出了一些病状。这些病状甚至一直伴随着他。他从小就嘴唇发紫，他也猜测自己患有心脏闭锁不全的问题，但从未到医院检查。他还常向朋友抱怨，说屋子里的暖气太热，让人喘不过气来。

根据报道，王小波的最后一篇稿子给了《南方周末》。此前，他一直用传真向《南方周末》编辑部传稿，但那一次，编辑何保胜收到的传真一片空白，第二次同样如此。“这事儿太诡异了。”他给王小波打电话，第三次收传真，何保胜才终于看到了稿子。不久，他听到了

1据2012年10月23日对李静的采访,

王小波去世的消息。

逝世前，王小波的作品在文坛的影响越来越大，病魔似乎成了挡在他面前最大的敌人一曾采访过王小波的黄集伟惋惜地说:“太可惜了，当时曙光就在前面虽然他的小说发表阻力依然很大，但杂文很受读者欢迎。

2

王小波之死，引起了剧烈的社会反响，王小波去世后的一个多月.共有一百四十多家海内外媒体发布了有关报道、评论和悼念文章.互联网上有人制作了王小波专页。王小波的某些话像格言一般被流传，如“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等等。王小波去世前，他的“时代三部曲”几经曲折才由花城出版社接手决定出版.出版社本来还为书的销路担忧，但是，随着王小波的死亡，情况旋即出现突转：“出版社每天收到来自五湖四海的问询，购书单雪片似的飞来。”一时间洛阳纸贵，“时代三部曲”登上各地排行榜:一位资深记者说：“多年来，没有哪一部严肃小说受到这样广泛的关注，它几乎是家喻户晓了。”‘

然而，逝者已矣，静静地睡在太平间的王小波，永远无法聆听这“山呼海啸”般的反应了。4月16日前后，王小波的死讯刚传开时，他的家人，如哥哥王小平、弟弟王晨光、大姐王小芹、二姐王征都在美国，妻子李银河远在英国，北京只有老迈年高的母亲宋华。此时.王小波的好友胡贝、赵宁等人，主动出来帮着主持治丧事宜。胡贝说：

1钟洁玲，《三见王小波》，《后王小波时代（下）:中国非主流散文精选》，杜鸿、朴素、啸傲子主编.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304页，

“小波没单位，也没加入作协，他的事得由我们来办了。”于是他们就在教育部宿舍（王小波母亲家）大院里借了一间房子，拉了两根电话线，接上一部传真机，作为“王小波治丧办公室”。此后每天二十四小时“热线服务”，接收全国各地的吊唁电话和传真。因为伤心和忙碌，儿天的工夫.胡贝只吃了几袋方便面.有一次甚至昏倒在楼梯上，还是宋华找来医生给他挂了吊瓶

1997年4月26日上午，八宝山一号大厅，三百多名各界人士赶来送王小波最后一程。除王小波的亲友，还有很多自发的吊唁者，他们大多来自传媒界、学术界、文学界.还有一些素昧平生的读者。根据李静的回忆，那天八宝山几个摊点的鲜花，都被人们抢购一空这些手持鲜花的送葬者，用沉默与花朵，表达了对王小波的敬意。其中，不乏一些文化名人，如著名电影导演张元，知名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家辉，著名学者秦晖、丁东、i射泳等。追悼大厅前方的舞台上，是湖水蓝的幕布，下面用黑布巾结成了蝴蝶结，黑色的横匾上悬挂着几个大字：安息吧.小波。下面是王小波青年时的照片。王小波遗容安详.但他遗体的额头却有一块褐色伤痕。由于心脏病发作引发的剧烈疼痛，王小波可能曾用头抵墙，甚至用牙齿刮咬墙壁。因为他临终前寓所的墙上有牙齿划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

现场的气氛很悲伤.可是，一些敏感的朋友，还是发现了异样。花城出版社的编辑钟洁玲就为此而发出质疑：“奇怪的是，当中没有作家协会的人员，也没有一个小说家。要知道，王小波首先将自己看成是一位小说家，但是，在他死的时候，他的作品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之内，直到今天……仍然没有……王小波没有单位，也没有加入作协，生前他说过：’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他是一个局外人，但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的自由撰稿人。”'这种质疑之声，既凸显了文坛与王小波的隔膜，也将这种隔膜置

于大众视野中，成为批判中国主流文学体制的信号。这种对立情绪，是否正确合理.还有待时间检验为避免节外生枝，治丧委员会的几个朋友.撤去了所有前来吊唁的人们送的挽联，只保留作家刘心武（当时却未能赶到）的挽词“愿小波先生在天堂快乐逍遥”也许，“快乐”二字，既包含了王小波创作的特质，也蕴含了亲友们对他生前状态的理解——这个把快乐带给大家的作家，其实很少真正快乐过，或者用小波生前的一句话说：“我一生都活在抑郁之中。”

上午10点左右.追悼会开始，大家排成两行，鱼贯进入大厅.向王小波遗体告别。大厅里放着的不是哀乐，而是贝多芬的奏鸣曲，据说这是王小波爱听的乐曲。王小波去世的时候，“时代三部曲”尚未印好，出版社特意赶制了三本书的封面。钟洁玲和胡贝等人，将书的封面依次摊开，摆放在覆盖王小波的白色床单上

突然，胡贝发现，在大厅走廊里，还站着三四十人，看样子也是来送小波的，他们是一群面带悲伤的男人，手捧鲜花，神情却有几分怪异，他们有的肃立，有的蹲在地上，但没有一个人说话：

胡贝走过去，对中间看似领头的一个男子说：“既然来了，就请到大厅一起去送小波吧。”

那个男子却哽咽着说:“不用了，我们能站在外面送小波先生一程，就很满足了。”

胡贝有些发蒙，还是客气地把这些人往里让。那男子只是推辞。

这时，那男子惨笑了一声，大声喊道：“小波先生是个好人，他把我们当人！”

1钟洁玲.《三见E小波》.《后王小波时代（卜）：中国非主流散文精选》.300页。

这时候，胡贝才突然醒悟，他们是王小波和李银河做同性恋调查中的受访者，在当时尚属保守的社会氛围中，王小波给予了他们平等的尊重。这绝不只是挂在嘴边说说的宏大门面，而是王小波默默遵从的精神原则。[1]

追悼会结束后，大约下午3点，李银河、王晨光与胡贝、赵宁.抬起王小波的遗体，将他送入焚尸间眼看从此阴阳两隔，众人早已泣不成声。按照八宝山的规矩，胡贝将两瓶二锅头和两条金箭烟轻轻地放在了火化工桌上。为让小波走得安心，亲友们特别申请了当时最先进的电子控制火化炉，该炉是从日本引进的，号称“远东第一炉”。

然而，火化过程中出了点问题。当火化工缓缓按下按钮时，机器居然没有如期运转。那位师傅用低低的声音说，这位先生，您的东西，我不能要了，还请您帮个忙。胡贝忙问要干什么。师傅请胡贝在机器启动时，用胳膊顶住安放尸体的钢架，将小波送入炉火中。胡贝看了一眼那个钢架。王小波的个子大，躺在那里，脚还露在外面不少.机器再次启动了，胡贝和王晨光顶住钢架，轻轻地移动着，一点点将小波送入炉中，眼泪却禁不住又一次流了下来。多年以后.在人民大学西门的一个茶吧，当胡贝先生向笔者讲述那一幕，依然是泪流满面。他坚持认为，那是小波舍不得走：他境界髙远的事业才刚刚起步，他对美和爱的执着追求，才刚刚为世人所了解.却因意外撒手人寰，这怎不令人痛断肝肠，惋惜不已炉火熊熊，斯人已去，文风浩浩，却已成绝响！

其实，王小波的朋友圈子里，大家对他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幽默感。他们既将他看作作家，也将他看作一个善良、义气、低调，同

1据2012年11月20日对胡贝的采访°

时又才华横溢、幽默的好朋友。他出现在朋友身边，总能带来泼辣机智

的笑话和轻松善意的关怀。每年4月11日王小波祭日那天，王小波的朋友们，无论是“发小”，还是在云南一起下乡的“插友”，或大学同学，都会自发组织起来，去他的墓地看望。大家在小波墓前，也不会太过凝重.而是亲切地唠着家常.好像他还活着：“小波，今天云南插队的舍友都来看你了，你在那边好吗？”“在那边你又在写什么呢？又是哪个时代呀？”……仿佛在天上的王小波也能听到朋友们的善意调侃……

远在加拿大的作家、王小波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胡威先生，在王小波去世时，于当地华人报纸《华夏文摘》上发表了一首小诗，颇能道出大家的缅怀情绪，特引于此。其中，“水怪”指的是王小波的小说《绿毛水怪》，而“山牛”则寓指王小波小时候的绰号“大野牛”：

纪念王小波

日日红尘上陌头

忽闻人去不能留

微言玉屑因情笃

海口银珠是才修

独记幽怀怜水怪

偏生倔骨傲山牛应知豪气流传远踏过黄泉啸未休

1997年5月

3

王小波想到过死亡，思考过死亡，但死亡的到来却猝不及防生前接受意大利独立纪录片导演安德烈的采访时.王小波笑着声称，目前还没考虑死亡的事。然而事实是，虽然只有四十多岁，但他的作品和生平言行，却好像总在进行“人生冲刺”。他对人声称，四十岁之前的生活值得过，而过了四十岁，就是被生活慢慢阉割的过程，这是一种清晰的死亡意识。或者说，王小波的写作和价值观，总是有一种“青春气质”，他惧怕衰老，惧怕死亡对存在感的剥夺，惧怕一切“貌似”老成持重的东西。他不是“向死而生”，而是“以生抗死”。王小波的早期小说《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曾谈到死亡对青春气质的否定：

> 我久久地凝视着黑夜。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死。到我死时，一切感觉都会停止。我会消失在一片混沌之中。我害怕毫无感觉，宁愿有一种感觉会永久存在，哪怕它是疼。[1]

多年后，人到中年的王小波，又在《三十而立》中，戏谑地写过自己的死亡：

> 事实上，我要做个正经人，无非是挣死后塞入直肠的那块棉花。

1王小波，《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王小波全集》8卷,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83页。以下凡王小波著文字，均出门此版全集（但未收入全集的除外），不再一一标示卷册名和页码。

> 我根本用不着这么做.我也用不着那块棉花，就算它真这么必要，我可以趁着还有一口气，自己把它塞好，然后静待死亡。自己料理自己的事，是多么大的幸福！

在王小波看来，所谓“死后哀荣”，如果抽去话语光环，无非是给自己挣一块“塞入直肠的棉花”。死亡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它为生命赋予永恒的终止的尊严；死亡又是不公平的，它让死者在历史中留下了大大小小、深浅不一的痕迹，在这篇小说中，王小波还写道：

> 在这种夜里，人不能不想到死，想到永恒。死的气筑逼人，就如无穷的黑暗要把人吞噬。我很渺小，无论做了什么，都是同样的渺小。但是只要我还在走动，就超越了死亡。现在我是诗人。虽然没发表过一行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更伟大。我就像那些行吟诗人，在马上为自己吟诗，度过那些漫漫的寒夜，

自由和浪漫的敌人，除了专制之外，就是死亡的永恒力量°死亡不是一个目的，而是一个过程，一个缓慢绝望的过程；死亡又是一个目的.而不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个微小的死亡的突然性绝望爆发。德国浪漫派待人热衷探讨死亡。在他们看来，死亡是终极力量，也是最终和最高的理性。而在日本文艺思想中，死亡却是一种积极实践，是甜蜜而短暂的睡眠，在对死亡的超越中，人真正获得了永生C而这种超越，有时就会是情爱。井原西鹤的《好色一代男》，也有不少王小波小说那些坦诚热烈.又真挚强悍的性爱小说开篇即写道：“樱花飘零，成为文人感叹的题目，月亮普照大地，很快又沉没于山脊.

唯有人类的情欲绵绵无有绝期。”小说结尾，主人公世之介，带着几百名家臣，连同无数金银财宝和巨船“好色丸号”，消失在寻找传说的极乐世界——迟女岛的茫茫海雾中。这也让我们想到了《黄金时代》的结局，重温旧梦的陈清扬和王二，再次体验了性爱的美好，就此分离，天涯茫茫，老死不再相见。他们将最美好、最青春的激情.留给了回忆，留给了云南旱热的风。他们拒绝世俗伦理和道德是非，将自己留在了尘世中备受摧残，直至死亡。

王小波试图成为一个精神上“强悍”的作家，在浪漫的云南热风中，在革命时期惊世骇俗的爱情里，在唐传奇高蹈不羁的流氓英雄狂想里，王小波以文艺复兴式的巨人姿态，复古地追述了最光彩流溢的反抗者的故事。他骄傲、粗鄙、欢乐，内心充满了顽童的恶作剧与愤世的讽刺与狂言。然而，他也是脆弱的，或者说，他的悲观和忧郁,让他喜欢沉溺于想象世界。他将挫折诉之于沉默，将反抗形成纸上的帝国。他的悲观联系着他的敏感，而他的喜剧精神，却联系着他对虚伪的嘲讽，无情的揶揄，以及刻薄的巧骂。他不断别扭地试图走入公众世俗空间，然而代价却是不断退入内心。他顽强地表达自己的骄傲.却不能将敏感的心变得坚硬粗暴。

如果说，一个作家总有自己最辉煌的时刻，那么，王小波最辉煌的一刻，却是孤独的死亡之后。很多人将王小波和海子之死联系在一起，作为1990年代商业背景下文化英雄最后的悲壮悼词。他们都是生前声名不彰，死后声名大噪。恰好，他们也都在“残忍的春天”离开人世。然而，海子是在阳春三月山海关的野花中，主动献祭了肉身，以血肉横飞的惨烈，极致化地反衬了最后的诗意牧歌。而王小波却死于乍暖还寒的四月，一次疾病无耻的“偷袭”。他的一生都处于“未完成”的前进状态，却突然被强行拗断。他的辉煌是以“空缺”为前提的——没人知道他活着，还能为中国文坛写出什么。

这也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光彩夺目”地亮相在中国文坛。他的形象被定义为那个“面顶南墙，身体弓着”死去的高大而抑郁的男人。与这个形象相联系，则是一系列的想象与塑造，例如，混不下去要去开卡车的作家，经常收到漫骂性退稿信的作家，以性写作知名的作家等。然而，这一切都被牵连入了作家的死亡。也许，无论是王小波，还是海子，都是1990年代中国文学生产的“漫不经心”、却又含义深刻的“隐喻”。在文化英雄远去、资本英雄凸显的1990年代，人们需要缅怀的“偶像”.人们不需要他们活着，只需要他们以亡灵的姿态活在纸面上，成为哀悼我们内心诗意理想的凭证。这样，我们才能心安理得地扑向资本诱人却肤浅的怀抱。那些家喻户晓、具有魅力的经典意义的大作家，已不再成为现实中文学生产的目标。我们需要文学生产出“死亡”，在死亡中，意义被变相、扭曲地复制，成为我们心灵狂欢的发泄口。

可以说，王小波之死，既是1990年代的标志性文化事件，也是王小波被接受的一个巨大形象坐标。对“去历史化”的1990年代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正是王小波之死，造成了接受场域的话语争夺——媒体、官方、文化工业、知识精英、文学圈，都围绕着这一话题进行激烈交锋。期间也有各式各样的涂抹、矫饰和故弄玄虚。这也使王小波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定位，变得迷雾重重c他时而被看作意识形态的抵抗者和异见分子，被某些人推崇着，被另外某些人封杀着;又时而被看作性写作先驱和自由主义文学代言人。正是在死亡的一刻，真实的王小波逐渐退隐，而符号的王小波开始不断浮现在公众眼前。众多严肃的学术研究，媒体持之以恒的报道，成千上万王小波的粉丝们的推崇，正在让王小波研究变成一门“显学”。而伴随王小波的走红.其争议性也一直存在。那么，王小波到底是谁呢？他为什么能在中国文学界掀起惊涛巨浪，并保持持久的影响？这个有时沉静内敛、有时却锋芒毕现的北京作家.这个在文章中“毒汁四溅”、“肆意妄为”，生活中却低调悲观的北京“坏孩子”，

究竟是如何成为一名惊世骇俗的作家的？他的成长经历如何？他的作品魅力在哪里？

第二章顽童时代-孤独的“坏孩子”

你能告诉我这只猫的意义吗？还有那墙头上的花饰？从一团杂乱中，一个轮廓慢慢走出来。然后我要找出一些响亮的句子，像月光一样干净……

——王小波《三十而立》

1

任何作家的成长都离不开地理空间维度的经典化塑造，正如绍兴之于鲁迅，湘西之于沈从文。传统的文学地理学认为，时代、环境、种族、宗教、语言等主题对文学施加近乎决定性的影响，而这一切似乎可以归之于“自然地理空间”和“文化地理空间”的双重影响赫尔德、泰纳等文学理论家，都持有类似看法。而在当代文学批评家看来，“文学地理”的概念.还应包括深刻影响作家创作的地理空间的“意识形态意味”。如果认真考察王小波的创作轨迹，我们会发现有两个文学地理空间浸润并支撑起了王小波的文学创作的价值观、文学观、表现形态，即“革命北京”与“后革命北京”。“北京”指其地域性，而“革命与后革命”则主要指的文化时间上的特殊规定性。王小波的父母，是建国后的“进城”革命干部。在将“旧帝都”改造为“红色首都”，直至变为“第三世界发展之都”的过程中，作为革命后代的王小波，见证了革命宏大叙事的高潮与落幕，并以自己顽强的文学创作，表达了一代人的思考。

具体而言，王小波的成长空间，是一种革命北京的“大院文化”。这种大院文化，既有别于王朔、姜文式的“部队大院文化”，也有别于传统的“市民胡同文化”。它属于革命北京时空中，国家事业单位、高校团体的独特空间。它既是革命北京的“体制内产物”，又有一定的知识分子气息，对“军事化的大院”有一定的疏离与反思。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从一个体制内红色知识分子家庭诞生的王小波，最终形成了对“革命北京”的深切反思。

北京曾是中原王朝抵御外侮的军事重镇，也曾是游牧的草原民族南下掠夺、觊觎繁花似锦的中原腹地的桥头堡。这里就是边境和中国的塞外，春短秋长，冬季肃杀，北风呼啸，犹如刺骨冰刀，常年金戈铁马、

杀声震天，无数热血战士的森森白骨，在凄凄荒草中化为点点萤火，想念春闺里温柔之梦。

据考古发现，北京建城已有数千年的沧桑历史。它最早叫“蓟”，为周初封国，《礼记》记载：“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后来，蓟国被附近另一个诸侯国——燕国所灭。燕国迁都于蓟城。隋以蓟城为涿郡治所所在，唐朝统称幽州。草原民族兴起后，辽代以蓟都为陪都，又叫燕京，金代名为中都，元朝又在中都郊外创建新城，叫大都。明朝始称北京。北京真正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心始于元朝。志费尼在《世界征服者史》中这样形容元朝那些勇悍的侵略者：“他们视枪刺如情人的亲吻，箭矢穿过甲衣，犹如晨风吹过花瓣。”马可波罗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则满怀激情地歌颂了元朝帝都的雄浑博大与精致华美。到了清末与民国，作为衰败的帝都，北京成为封建腐朽没落的代名词，成为伟大但已凋落的精致文化的象征符号。在文学家老舍的“文学北京”想象地理中，无论是戏剧《茶馆》，还是小说《四世同堂》，北京已失落了世界中心的地位，表现出的是传统市民社会朴素善良的东方伦理观。《茶馆潴篇，三个老人为自己送葬的一幕.深深印在了很多中国人心中。

1949年10月1日，北京被赋予了新文化意义。在天安门，爱国诗人胡风，激情地写下了《时间开始了》的诗篇。其实，真正“红色中国”的时间纬度.不仅应以开国大典作为表征，也应以威武的入城式作为“前点”。正是伟大帝都的臣服，暗示了全新时间的开始。电影《建国大业》曾描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与北平城的亲密接触：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胜利者的脚步是如此激情，以至于当他们冲到高大巍峨的城墙，才在照明弹的映射之下发现，他们已在不知不觉中来到了北京 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城。2月3日，于正阳门举行盛大入城阅兵式。包括装甲部队、摩托步兵、炮

兵、坦克部队、骑兵、步兵在内的三万余人参加了盛大典礼。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四十一军，缓缓通过正阳门。北大、清华的大学生们爬上坦克表达胜利的喜悦之情。一些学生甚至爬上装甲车，并在炮筒写上“庆祝北平解放！”“欢迎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等标语。当天《人民日报（北平版）》发表了《我军雄伟行列进入古都，北平人民热烈欢迎》的报道：“他们的手里都执着三角小旗，高喊着欢迎口号……当高挂着毛主席画像的宣传卡车通过时，人们都狂欢地挥掷着帽子，鼓着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这是胜利者的征服仪式。而激荡了中国半个世纪的革命风暴，似乎以“建国神话”的仪式，达到了它辉煌的顶点，也走向了它的终结。对很多民族国家而言，建国即是革命的终结。宪法最终以秩序的面孔.以布莱克顿所谓“建构革命”的方式“终结了革命”。然而，正如革命领袖所言，“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对于长期处于世界格局边缘的中国而言，革命的胜利不仅是结束，更是一个新开端，或者说，是持续不断被强化的、后发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超越仪式”。古老的帝都北京，不仅以仪式的方式呼应了伟大民族的新生，更以胜利者的姿态在这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将革命进行到底。不是人民,也不是公意.而是革命本身成为了一切“法”的源泉。中国对革命超越性的道德迷恋，使胜利者的征服仪式，变成了持续制造革命对象，再制造革命的幻觉。

开端的神话，很快就变成了深深的忧虑。当革命变为常态，不可忍受的是官僚主义管理科层，及平庸的日常生活空间对革命的“侵蚀”。“我们不是李自成，可以摆脱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形象地把共产党进城比喻成举子们进京“赶考”。他告诫各级干部要熟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然而，在革命领袖发出保持革命意志的号召时，一个世俗化革命现代时空开始在北京城建立。这首先来自北京市人口构成的变化01270年北京作为元朝都城时，人口约四十万；明清时期，北京人口在七十万

左右；1948年北京的常住人口也不过两百万。新中国建立后，北京成为首都，行政区域从七百零七平方公里迅速扩大到一万六千八百零七点八平方公里，政权建设、科学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需要大量劳动力和各种专门人才。1949—1960年，全市人口净迁入总量高达一百三十七点三万人，占当时常住人口总量七百三十二点一万人的百分之十八点八。'在迁入的“专门人才”中，革命化知

1参见冯晓英.《北京地区流动人口的演变及其特征》，《北京党史X1999年1期。

识分子与担任各级管理职务的革命者，占据了相当大比重。他们深刻改变了北京的人口结构。他们将一种“世俗的革命文化”带给了帝都北京：他们热衷于苏联式物质生活，公园、电影院与周末的茶话会、舞会，以及布拉吉裙和俄语他们也唱革命歌曲，看革命戏剧，参加各种政治运动，但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憧憬与对现代的想象,显然与初衷相去甚远,这些进城的革命者，特别是国家事业单位里，那些体制内的红色知识分子，及那些在革命的名义下被召唤的知识者，并没有意识到，数年之后，他们会再次成为更为激进的革命者的革命造反对象，并验证了举世瞩目的“继续革命”的伟大狂欢、

2

进北京的革命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对革命夫妻：男的来自四川渠县，叫王方名，聪慧睿智，风流潇洒，狂傲狷介，是一位投身革命多年的文化干部；女的叫宋华，来自山东牟平革命老区，为人豪爽正直，朴素端方。王方名出身地主家庭，自幼倔强聪明，在川北嘉陵读高中时期，就由于发表同情苏区和中共的言论，被学校开除。然而，王方名并没有因此消沉，而是很快因人介绍，去了当时革命气息浓厚的川东师范，并认识了终生的挚友李新。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在《艺术的内丹》一文中，曾追忆过其父系家族的传奇历史。王小平称其父王方名为“没有城府、不修边幅的率性之人……正像许多早年投身革命的读书人一样，有一种性格躁动、不安于室的倾向”，“有一种川人的刚烈之性”。这种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性格，有着王氏家族血脉与基因的鲜明印记。据说，王小波的祖父王渊儒.出身低微，是村里的一个放牛娃，一个偶然的机会.放牛娃跑到了邻村的学堂，躲起来，偷偷地听老师讲课。经过一番机缘巧合，老师发现此子聪颖非凡，就说服其父供其读书。谁知，祖父不声不响地听了几年，却说读书没什么意思，太过简单，竟弃学经商。适逢军阀混战，祖父眼光敏锐，发觉山中果壳乃制造火药的必备之物，遂倾其所有，收购农民手中的果壳，因此发了大财,每天点收银钱，都要一直到三更。他的运气也极好，居然和夫人王闫氏生了八个儿子。这在当地，也是了不起的大事。同时，还有传闻说，这个放牛娃出身的富豪，还涉及江湖事宜，成为宜商宜黑的帮会人物。清末民初，四川一地会党势力甚大，从保路运动到推翻清政府、军阀割据，四川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中，处处都有会党的影子。因此，王小波的祖父涉及袍哥等会党势力，也就不足为奇。考察王小波的家族史，我们会不自觉地在其祖

父、父亲和王小波之间，发现某些性格的共通之处，例如，聪明大胆，做事不循常规，敢于破除成见，性格刚强，豪爽大气，有江湖气，重视友谊，却秀内慧中，眼界甚高，不愿随波逐流等。1

正是川人这种醇厚刚烈又聪慧开放的性格，遇合了来自王小波母系家族的齐鲁大地的朴实宽厚的传统，才造就了王小波独特的“艺术气质”。

王方名在川东师范依然是“活跃分子"o1935年春，李新组织了读书会性质的青年社团“众志学会”，并推出壁报“众志”，王方名担任编辑，也经常自己撰稿。他的文章，文采过人，观点犀利，在川师引发了轰动。后来，由于得罪了训育主任，壁报被取消，但学生们又很快自发组织了“众志球队”，借体育运动来暗中推动革命工作。王

1据王小波的二姐王征回忆，王方名也喜爱文学，这一点他们姐妹几个都受父亲影响。王方名年轻时所写的长诗《过摩天岭》，表达了李白《蜀道难》式的豪情壮志。他一生写过很多诗，直到晚年一直对文学情深不渝，离休后他还曾写过《正气歌》故事片文学剧本、《相思树》文学剧本、《楚辞》研究教学计划等等。见王征，《时光中的事——关于王小波和亲友们的那些事儿》，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35-38页。

方名主持宣传工作.并为1936年的重庆学生运动做出了贡献，

在此期间，那个曾离经叛道的祖父，却变成了高老太爷式的封建家长，勒令王方名回家完婚。王方名奋起反抗，却被断绝了经济支持。性格倔强的王方名，硬是在同学们的支持下，坚持到了毕业。毕业时,由于他思想叛逆，言论大胆，遭到通缉。'在抗战烽火燃烧之际，他毅然北上出川，去延安投奔革命。他和李新等人，先在四川万县的民众教育馆办民众学校，后由抗战后援团出面，组成“华北川军慰问团”，一边沿途演出自编的短剧《两兄弟》，一边寻找机会去延安。这是一次危险的征途，也是一次刺激的朝圣之旅。红色延安在他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壮

大，一切外在物质因素，似乎都变得不再重要。当时，全国还有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奔赴圣地。去延安的路上，王方名还和一位成姓女士发生了浪漫爱情。最终，成女士要照顾寡母，不能一同去延安，便留在四川进行抗战宣传。不久，成女士积劳成疾，撒手红尘，只留下痴情的热血书生，深情地吟诵着“莫提起，提起时，泪洒江河”的感人诗句。这种浪漫的“革命＋恋爱”的故事，曾屡屡出现在茅盾、洪灵菲等作家笔下，却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革命青年的情感体验，

终于，王方名来到了著名的陕北公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旬邑

1关于王方名个性的狷介坂逆.王小波的二姐回忆说，父亲曾面对校长的呵斥，满不在乎地玩弄大脚拇指，以表示轻蔑。见王征，《时光中的事》，35页。然而，在李新的回忆录中.王方名的这种坂逆，其实还有传统“名士••意味：在叛逆外表之下，有守正不阿、恪守原则的保守性格。例如，李新回忆.王方名在川师闹退婚的时候，有一次和同学们讨论吴芳吉的长诗《婉容词》。该诗主要写了留学英美的洋学生，抛弃槽糠之妻的故事。一个“新派女生”吴梅秀认为.该诗的题材太古老，陈旧得发斑。而王方名却站起来，替该诗辩护.认为婉容值得同情，对“世间的女子任你爱，世界的男子随你求”大加批判。见李新.《流逝的岁月一新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142—143页。

县陕北公学分校。1939年，他随大部队去晋东南和山东建立抗大分校，先是在晋东南的抗大一分校担任指导员，后任胶东抗大（时为抗大一分校的支校）政教组长、胶东公学副校长等职，并成功躲过了残酷的“整风运动”。在胶东抗大，王方名认识了宋华，两人由于共同志趣走到了一起。后来，王方名还曾短暂担任山东教育督导员，相当于教育厅副厅级干部。王方名个性突出，不善处理人际关系。解放初，他在山东教育厅过得并不如意。很快，不知出于他人运作，还是机缘巧合，当时的教育部将王方名调入'，任命为政治教育专员，王方名成了一名“入京干部”。不久，宋华也从当时的山东行政学院入京，先在人民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的统计学，后被分配至教育部计划司工作。应该说，王方名一家在刚刚入京的时候，心情愉快，工作顺利。这时，夫妻两人已有了三个孩子。然而，兴高采烈的王方名一家当时并不知道，一场飞来横祸正在等待着这个“革命家庭”，而王小波恰在此时出生了。

还是因为家族。那个似乎被人遗忘的“祖父”，乂像幽灵一般出现在了革命者的家庭。1952年，“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

义）爆发，这是共产党人进城之后的第一次大规模“自省行为”，乂被称为“打老虎运动”。时任天津市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和地区专员张子善，因为腐化堕落,贪污国家财产，被判死刑。共产党人清教徒般的纯洁的社会改造理想，与城市代表的现代文明之间，发生了第一次激烈的碰撞。物质欲望如没有制度约束，就像出栏的猛虎一般，凶猛无比，而以道德理想国为基础的红色革命，无法找到恰当体制性约束力量制止官僚腐败行为，便只能依靠暴力。然而，充满悖论的是,

1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决定.从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分设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后教育部与高教部又经历了数次分合.并伴有名称的变更，为了叙述方便.下文将统一用“教育部”一词指称.不另作区分。

王方名并不是这场运动的打击对象，他既没有贪污，也没有浪费.更不属官僚主义——却恰是因为反对官僚主义，遭到了官僚体制以“革命名义”的迫害

可以说.王方名是这场“三反运动”的“附属”牺牲品。其所以说是“附属”，是因为他并不是这场风暴要打击的对象。而他的悲剧在于，他真诚地认为.忠言劝谏是一个党人的本分。当时他在基层调研，调查“三反”问题，听到了很多基层教师对高教部的意见，他觉得教姉们说得有道理，就帮着他们给领导提意见。而在中国社会，“给领导提意见”，无论任何时代，都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假如这件事情.还是出于“真诚”，那更是格外地凶险，不幸，王方名的劝谏就是这样的一次危险行为，它引起了教育部党组书记钱俊瑞等领导的极度不满。恰在此时，那个潜伏在家族内部的危险信号，便成了引发危机的导火索，那个叛逆张扬的“火药原料商”已老去，早年的袍哥风采与富豪霸气，在强大的红色政权面前，也成了过眼烟右他的财产和声望，都成了遭人唾弃的东西，并成了贻害子孙的祸根他不甘心。他桀瞀不驯的性格，让他绝不屈服：多少个日夜，他

绝望地瞪着双眼,孤独地躺在他用毕生心血打造的豪华空旷的大屋里，他浓重的鼻息，在初春的寒风中，变成起伏不定的终结预言'他并不能预测到，让他又爱乂恨的三子王方名，最终成了一名学术权威，他更无法预料，多年以后，他的孙子王小波，以流星般耀眼的光辉，划过中国文坛.成为当代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他已在历史之外.但他要用生命的残余力量,抵抗历史的侵蚀他拒不交出财产，也曾想跳墙逃走，但老迈的身躯,已不能再次支持这样的冒险逃亡，他摔伤了.并卧床不起，八个生龙活虎的儿子，都不能挽救他走向死亡的步伐，两个星期后，挣扎着不想死去的、曾经精力旺盛的祖父，终于熬到了生命的尽头。

很难想象，对于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光，远在北京的王方名作何感想。像《家》中的觉慧一样，王方名曾如此痛恨这个腐朽的封建大家庭，并用叛逆的出走与之决裂但当想象中的革命胜利后，他却发现.那条斩不断的神秘血脉，其实并没有真正离开他的身体。早已脱离了热血青春的他，冷眼旁观，除了不满意和牢骚，对父辈的苦衷也有了一些“今时不同往日”的理解。当四川渠县的土地改革正如火如荼时，王方名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今天，我们已无法看到这封信的原貌，根据介绍，这封信的内容是劝诫父亲交出土地，不要抵抗政府。王方名的家乡解放之初，父亲还被选为人民代表，1951年初土改的时候便成了斗争对象。父亲写信给王方名，说农民群众对他的揭发有许多不符合事实，而且不讲政策，连丁.商业财产也一律没收了，违背了法令，问王方名可否向上级告状。王方名不了解抗战期间父亲已买进许多土地成为地主，还认为他只是烟商，因此回信说:政府是保护工商业的，如果群众不讲政策，违背法令，可以据理依法力争。这封信被群众查抄到手，不仅对父亲没有好处，反而使他遭到更残酷的斗争。王方名低估了父亲抵抗政府的决心，也低估了当地土改运动的激烈程度。这封信让当地农会领导气愤不已，他们认为王方名这封信，不是劝其父交出土地，而是利用自己京城官员

的身份给当地政府施加压力。于是，他们给高教部的领导写信，反映王方名包庇地主，破坏土地改革，并附带上交了王方名的原信。高教部领导收到这封控诉信，真是如获至宝，不分青红皂白，就将王方名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并开除党籍、按照党章，开除党员需要党支部表决，但适逢“三反”时期，全部程序都已简化。由高教部的党组书记钱俊瑞呈报，“三反”运动小组副组长刘景范批准，再送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批准，这件案子便被办成了“铁案”，也成了王家“气运”的转折点：不但王方名本人此后仕途无望，被下放到了人民大学附属的工农速成中学，成了一名普通教员，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了宋华在教育部的晋升。

对此，很多好友都深为王方名鸣不平，李新就撰文说：“钱俊瑞完全是感情用事，他不仅不按手续，甚至连王方名的档案也没有查阅。因为王方名的履历表上，有许多地方都填写了我是证明人，而我和钱俊瑞共事多年，关系也很好，如果他看一看档案，何至那样轻率地就把王方名开除党籍呢？”'这件事对王方名的打击极大，以至于1953年夏，在人大附中“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讨会后，他见到李新.谈起受到的折磨.竟全然不顾其他在场的人，委屈得大哭起来。尽管他还是那么潇洒健谈，但往日的豪迈自信，已不复存在。这件事甚至影响到了宋华和王方名的夫妻关系，家庭在持续的政治重压下，有不堪重负的迹象，无尽的夫妻争吵，同事们的冷眼，都让宋华终日以泪洗面。据说，他们甚至一度商量:离婚，但此时，宋华又怀孕了，他们的小家庭，在惊涛骇浪过后，终于顽强地挺了过来，夫妻达成了谅解，而王方名经过认真思索后，决心放弃仕途，发奋读书，立足现有岗位做出一番事业。于是，三十多岁的王方名，以半路出家的老八路的身份，勇敢地挤进了学术界，

3

1952年5月13日凌晨，在北京复兴门成方街附近的一家医院，王小波呱呱落地了。宋华没想到，这个在泪水中浸泡的、先天不足的婴儿，居然顽强地活了下来。他就是王方名和宋华的次子——王小波。“小波”这个名字，是宋华取的。据宋华介绍，主要的意思有三：一

1李新.《追思逻辑学家王方名》，《炎黄春秋》，1992年3期

是记录王方名和全家含冤受屈的事件；二是寄托信心与希望，希望能够在将来，还给王家一个清白；三是励志，鼓励自己和全家都要坚强，希望能够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将之化解为小波折。可以说，这个名字，寄托着王方名和宋华对生活的新希望。长大后，看惯了“文革”冤案的后辈们，自然不会再将父亲的这件事作为“特别惨痛”的事件。然而，王小波这个在风浪中出生的孩子，却继承了在风浪中前行的勇气和韧性。

成方街位于北京市复兴门内北侧，现属于西城区统辖，东起闹市口，西至复兴门北顺城街，与南兴盛胡同、金融大街相交。这里原有元朝至元三年兴建的城隍庙，热闹非凡，明代以此命名为城隍街，现在城隍庙的遗址尚存，但街名已在民国初因谐音改为成方街。王小波曾深情地回忆过成方街的幼年生活场景：“我小时候住在成方街，离北京的城墙很近。就在这条街的尽头，城墙塌了一个口子，沿着一道陡坡.躲开密密麻麻的酸枣刺，就可以上到城上。城墙上面是宽阔的大道，漫地的方砖中间长满了荒草。”（《北京风情》）这里所说的城墙，就是复兴门的北京老城墙，建国后，成方街的几处大四合院.成为教育部进京人口安置地。四合院是北京文化的缩微景观.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有专门对四合院的描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四合院正代表了团圆、和谐的意思，也暗合阴阳五行的聚气原理；而“帝都”北京的四合院，则更有端庄、方正的气象。但是，对入城革命者而言，四合院首先不是一个传统观念中

的空间意象，而更像部队集体生活的某种延续。但也更有人情味和空间混杂性。住在同一个四合院中的人们，从属于一个国家单位，有不同政治级别，然而他们却来自五湖四海，带着各自的乡音和风俗，在这个革命的名义时空中，朝夕相处让他们彼此熟悉.柴米油盐的日常化生活，最终会抵消军事管理的刻板严肃,成为这类四合院的底色他们之间的“等级差异”并不明显，甚至上下级之间也亲热如同家人，经常串门、一起吃饭，官僚制度尚未将他们从革命的理想状态中整合成一个固定秩序四合院里没有隐私和私密空间，每个人都心安理得地把自己置身于邻居的关怀和监督之下.生活热闹自得一每天充斥着杂乱的声音，包括父母的训斥和孩子的哭泣，及不同打击乐的杂乱配合：儿童也是这类四合院不可缺少的角色他们扮演着革命胜利“果实”的角色。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的“家乡”观念很淡漠。北京的四合院就是他们的“家乡”他们已不会说家乡话，却能说上一口流利的“京片子”：最终，他们不会再去体捡革命的艰辛.却尽情享受着父母的官职和待遇带给他们的优越感，享受着“帝都”给他们带来的荣耀王方名和宋华，带着王小芹、王征、王小平、王小波.还有王小波的姥姥、大舅和小姨，都住在西房两间大屋里，倒是非常热闹

童年的王小波一点点地长大了。他长得不好看，远远说不上英俊：黑黑瘦瘦.有两片厚厚的嘴唇.像两条小肥香肠，蒜头鼻，小招风耳，单眼皮，只有宽宽的前额，灵动的眼神，在昭示着他的聪明与智慧，如果在街上走着，这样的K相，大多会被大家归于“朴实忠厚”的类型。王小波送给李银河的儿时照片中.有一张清秀可爱，目光炯炯，这张照片也是王小波自认最“英俊”的一张。“长相”对一个作家的“艺术内涵”，有时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司汤达长得丑陋，但在作品中自卑情结便化为艺术动力，他笔下的于连，就是个苍白瘦削的美男子形象.很得女人们青睐而同样的丑陋.也使安徒生的童话，充满了唯美的艺术感伤。当然，这里

面的情况非常复杂，有的英俊作家,则表现出狂暴的浪漫自信或道德守成的保守主义。比如王尔德与华兹华斯。在王小波的小说中，容貌俊美性感的女孩与邋遢但个性张扬的丑男之间惊世骇俗的爱情，总是经常出现的意象，如《黄金时代》中的王二与陈清扬，《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的小个子王二与X海鹰，《我的阴阳两界》中的小神经与小孙护士，《三十而立》中王二与线条等。更有意思的是，在王小波两极化的艺术世界里，想象的古代世界，男主人公总是英俊潇洒，而现实中的男主人公则困顿猥琐，如《万寿寺》中的薛嵩与现实中失去记忆的王二研究员，《红拂夜奔》中的李靖与现实中的王二。我们可以揣测，那些或美或丑、或古代或现代的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既是王小波对美和想象力的推崇，也暗含其生理特征对艺术品质的某种潜在影响。

这个在苦难里出生的孩子，一出生就先天性缺钙，因此造成身体的佝偻和发育时的“桶状胸”。他还有扁平足，远行之后容易疲劳。如果太劳累了，嘴唇就会发紫，这属于心脏瓣膜闭锁不全导致的问题，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这也是他英年早逝的重要原因。王小波小时候体弱多病,时常发烧呕吐。而一家人因为父亲的缘故，也整天愁眉苦脸。王方名和宋华的工作也很繁忙，对王小波照顾不上。两岁那年，王小波突发热毒肿疮，痛得双手抽搐。三岁体检的时候，又查出肋骨外翻，严重缺钙。王家的五个孩子，其他几个都长得比较结实，唯有王小波身体比较弱，后来虽然吃了很多钙片，长成了一米八五的大汉，但身体一直不是特别健壮。

他在家里的外号叫“傻波子”，一开始是姥姥和母亲这样叫，后来，大家都渐渐地习惯了这样的称呼。宋华在接受笔者采访的时候，提到小波小时候的样子，露出会心的微笑。她说：“小波经常会盯着某一个地方发呆，一看好半天。”在她的己忆里，有一次，天下起了小雨，小波呆呆地蹲在水洼边，足足地盯了半个多小时，连小雨打湿了衣服都不知道。

山东胶东方言称这样的状态叫“木吱吱”，大多形容一个人不够精神，容易走神发呆，反应不快。然而，王小波平时和其他孩子无异，而且，他的智力也很好，没有自闭症倾向。这种发呆的情况，被王小平归于一种“冥想”。这正是一个孩子独特的心灵特质的呈现。他习惯于沉浸在自我的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精心建构属于自己的心灵奇幻，安置那些属于自己的紫色牵牛花、芬芳的小草和各种稀奇古怪的机械装置。

4

1955年，王小波三岁，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首先，小弟王晨光出生了。好像“晨光”这个名字能带来好运一般，王方名一家人迁居人民大学的家属宿舍——铁狮子胡同一号。铁帅子胡同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与成方街相比，它神秘而庞大，真正代表了帝都政治文化的精华匸阴谋与阳谋，斗争与联合，铁血与恐怖，都曾在这里上演。明末崇祯朝，田贵妃的父亲田腕在此建府邸，号称“天春园”。这位国丈声色犬马，夜夜笙歌，还兼职“做媒人”，相传吴三桂和陈圆圆就是在此相识相恋的。天春园门前有两个大铁狮子，铁狮子胡同因此而得名r此后，数百年风雨中，铁狮子胡同还迎来了很多著名历史人物，例如，康熙帝的九贝子允糖，康熙年间的靖逆侯张勇，雍正年间的和亲王弘昼，道光年间的富豪竹溪等等。到了近代，铁狮子胡同更为显赫，伟人孙中山、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戏剧家欧阳予倩都曾居住于此。铁狮子胡同一号，更是民国政治风云的重要空间。八国联军侵华后,铁狮子胡同大部分毁于战火，慈禧太后便在“铁一号”废墟上，建设了一组既具有欧式风格，又有中式特色的楼宇，供海军部和陆军部使用。北洋政府期间，这里是最高政治机关，段祖瑞执政府所在地:1926年3月18日，这里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三一八惨案”，刘和珍等四十余名热血青年，血洒执政府大门。后来，这里先后做过北平卫戍司令部与二十九军军部。日据期间，这里还是华北日军首脑机关和特务机关所在地，地下的水牢至今能看到痕迹。1950年10月，被中共中央拨给人民大学作为校舍。

如今，铁狮子胡同已改为“张自忠路”，“铁一号”里依然有很多事业单位，例如，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心就坐落在里面，而中国社科院的很多研究所，也在里面办公。至今，这里仍有很多人民大学的住户。走

近“铁一号”，迎面而来的是一个宽阔的朱红大门，门口早已没有了铁狮子，倒是有两只石头狮子，或可一显昔日的威严。旁边是刻有“三一八惨案发生地”与“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的石碑n经过一个向上斜坡，进到院子里面.正中央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座带钟楼的主办公楼，附带两个欧式建筑风格的副楼，整个外形呈品字内环式排开。这里原来是主要的办公场所。该楼的主体是灰砖石结构，楼面上镶着很多花纹和浮雕，样式繁多，对称而华美，有花和叶子，也有类似中国古典传说中的夔龙等形象的图案c主楼的大门是木质拱形黑木门，显得非常大气；副楼则有很多拱形回廊，绿色的立柱，以及造型欧化的路灯。如果仔细观察，这座楼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精细之处，例如，每扇窗的把手和扶柄上，以及走廊的立柱上，都有复杂的花纹图案，上下对称的花叶、草竹之类。房顶却是平的，有波浪形的瓦片。在这组建筑群后面，则是

以“灰”和“红”命名的一组组居民楼，如“灰一”、“红二”等。红楼比灰楼更加精致一些，都是简洁的欧式风格.门窗很多。这些居民楼大多有四五层高，也有两层的，有木质结构，也有砖石结构，风格非常统一，都被涂成红色或灰色（有的叫灰楼，其实也是红色的，比如灰四号楼）。王小波一家，当年就住在红楼上。在这些房屋两侧，还有一些斜尖顶的平房。整体而言，最为显著的，还是带有钟楼的那个主办公楼群这组建筑群的奇特之处.不仅在于它的造型华美，还在于它内在结构的复杂。主楼和副楼相通.门窗和出入口很多，办公楼下还有很多地下室，这些地下室，四通八达，“曲径通幽”，给人以阴森神秘的感觉，据说当年的日伪特务机关，在此还设有水牢。王小平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这里的水牢和王小波小说的“钟楼情结〉

相比较红色北京的革命化空间，“铁一号”是“暧昧”的空间设置一作为革命者的后代，王小波及其同代人在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同时，所受生活环境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和成方街不同，“铁一号”是知识分子聚集的

地方.少了一点杂乱和粗鄙的快乐，多了几分厚重的文化气息。更特别的是，作为中国历史的重要政治空间，“铁一号”对儿童的成长心理而言.却更多体现为“神秘”的艺术气息.曾经的辉煌，现实的衰败，两相对比，生发出一种历史“幽灵”般的神秘主义力量：在革命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中.新兴的政治空间是修茸一新的天安门广场，是庄严的中南海，而不是“铁一号”。同时，“铁一号”又不同于故宫。故宫被革命文化“定义为”腐朽而奢侈,相比之下，作为近现代标志性建筑，建国后成为革命者的研究机构所在地的“铁一号”却不负载太多历史沉重的传统符号，因此恰成为一种“暧昧”的存在。它的样式造型、内涵意义，都是“非革命的”，然而，它也并不全是革命的“对立空间”。在它被中性化的外表下，展现出来的却恰是“革命之外”的中国近现代史的丰富和复杂性。

正是这种“暧昧”使儿童王小波在玩闹和嬉戏中，感受到了历史和文化的神秘气息.而整个1950年代前期的北京生活.基本是乐观、朝气蓬勃的.充满了生活的理想与诗意，革命的火与血的狞厉，都化为了胜利之初的喜悦和憧憬。周末的时候，在“铁一号”的大院子里，经常举办各种舞会、茶话会和联欢会、京戏专场等活动，儿童王小波尽情嬉闹着，感受着时代氛围，并在“铁一号”的环境中，培养着对世界的最初感受力。和其他淘气的孩子一样，他喜欢在联欢会的桌子底下钻来钻去，不停地捣乱，看演员和观众们出丑。他也热衷于捅马蜂窝、捉弄小朋友，然后在马蜂愤怒的追逐中，逃之夭夭。马蜂高高在上的气质，有毒的针刺，以及追逐的刺激.都让儿童王小波.及协同作战的“革命小战友”，感到深深的恐惧和乐趣:在捅马蜂窝的游戏之余，他也热衷于在哥哥和其他大孩子的带领下，去那些古老而神秘的楼群中去探索未知的秘密。在兄弟姐妹中，王小波和哥哥王小平在童年时候交往最多。他们出动的时候往往形影不离他喜欢听哥哥讲各种神秘的故事，跟随着哥哥的脚步，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弟弟王晨光，也是他们探险的忠实伙伴。这群在“新北京”长大的革命者后代，小心翼翼地穿行在回廊，感受钟楼的恐怖；在高高的房顶，享受鸟儿般的自由；在落日的余晖里，寻找传说中的地下室水牢；在磨损而破败的木质地板上奔跑；在某个幽暗的角落捉迷藏他们怀着恐惧和神秘的刺激，寻找着隐秘的历史气息。他们仿佛在这里接触.并融入到了“革命历史”之外的另一层时空。谁知道，多年以前，段祺瑞是否在夕阳西下之时.独自拍遍栏杆，对“三一八惨案”悔恨交加，并决定离开中国政坛？谁又知道，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是否就是在那间精致的小办公室，密谋策划日军侵华的策略？历史已成为幽灵，却还阴魂不散，它回绕在儿童王小波的心灵里。

铁狮子胡同一号的影子，存在于王小波的一些小说里，最显而易见的，首推《三十而立》。小说里，大学教师王二.因为打扫厕所时加了一些幽默标语，受到了校长批评。他感到了世界的无趣和假正经。他徜徉在校园中，感受到了一股神秘的气息，并产生了古怪的想象：

> 我忽然觉得恶心，到校园里走走。我们的校舍是旧教堂改成。校园里有杂草丛生的花坛，铸铁的栏杆。教学楼有高高的铁皮房顶。我记不清楼里有多少黑暗的走廊，全靠屋顶一块明瓦照亮；有多少阁楼，从窗户直通房顶。古旧的房子老是引发我的遐想.走着走着身边空无一人。这是一个故事，一个谜，要慢慢参透。
>
> 首先，房顶上不是生锈的铁皮，是灰色厚重的铅。有几个阉人，脸色苍白，身披黑袍，从角落里钻出来。校长长着长长的鹰钩鼻子，到处窥探，要保持人们心灵的纯洁。铸铁的栏杆是土耳其刑桩，还有血腥的气味，与此同时，有人在房顶上做爱。我见过的那只猫，皮毛如月光一样皎洁，在房顶上走过。

这个段落里，我们能看到“铁一号”对王小波创作思维的影响，它为

我们提供了“谜一样”的神秘化空间，这个空间还联接着古怪的想象这种想象很明显和文艺作品的中世纪修道院或神学院有共同之处阉人、土耳其刑桩、鹰钩鼻的校长，和房顶上做爱的人，还有神秘的猫，共同构成了狂欢化神秘想象空间，并与现实时空中高校教师王二的平庸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其实，王小波的小说一方面有飞扬灵动的想象；另一方面.乂非常写实，很多作品有自叙传的影子。这些神秘的空间映像，正是他寻找艺术灵感的触媒，在接下来的一段.更能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

> 你能告诉我这只猫的意义吗？还有那墙头上的花饰？从一团杂乱中，一个轮廓慢慢走出来。然后我要找出一些响亮
>
> 的句子，像月光一样干净

“月光”是王小波的小说中常出现的意象，也是他创作初期重要的艺术灵感触媒'它既是浪漫的，神秘的，也是童年化的，纯洁的。“月光”和王小波笔下那些成人化的性行为画面，共同构成了极端化的艺术探索。月光下的神秘旧房子，成为批评现实世界无趣和虚伪的有力手段。

“铁一号”的形象，还出现在他的早期小说《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里。这篇“古今并置”的小说中的立新街甲一号，明显有“铁一号”的影子。它们都是历史曾经的辉煌之地，现在却都破败下来，成为某种神秘历史的见证。王小波这样描述道：

> 我住在立新街甲一号的破楼里。庚子年间，有一帮洋主子在此据守，招来了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大叔，把它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搬来红衣炮、黑衣炮、大将军、过江龙、三眼铳、榆木喷、大抬杆儿、满天星、一声雷、一窝蜂、麻雷子、二踢脚、老头冒花一百

星，铁炮铜炮烟花炮，鸟枪土枪滋水枪，装上烟花药、炮仗药、开山药、鸟枪药、耗子药、狗皮膏药，填以榴弹、霰弹、燃烧弹、葡萄弹、臭鸡蛋、犁头砂、铅子儿砂，对准它排头燃放、打了它一身窟窿，可它还是挺着不倒。直到八十多年后，它还摇晃着地站着，我还得住在里面。

根据心理学研究，儿童在成长时期,都会有一个迷恋“神秘”的时期，而这种神秘感，是一种来自日常生活，却超越其上的艺术感受。有的作家，特别是那些依赖童年经验的作家，会将这种神秘感，化为艺术创造的力量.而使其创作带有“诗性特质”。有时候，这种神秘感由阅读引发，比如，阅读魔幻童话，当代儿童对“哈利•波特”形象的接受即属于这类情况。有的时候，这类神秘感的产生则是由于成长环境使然。出身乡村的儿童.容易对旷野、荒坟、植物和动物产生神秘感如在小说家张炜的创作中，海滨生涯的影响非常明显：对莫言而言.红高粱、旷野，则是重要的经验来源。而在沈从文的湘西文学世界.吊脚楼、白河、龙舟赛，都是他神秘性心理体验的重要依据，而出身城市的儿童，则容易对某一个特定空间产生神秘感，这个特定空间，一定是超脱于普通日常生活的。铁狮子胡同一号，恰符合这样的特点，它是王小波童年经验里的重要一环，并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上联成方街，下联人民大学的林园楼、教育部大木仓胡同宿舍两个时空点，成为王小波艺术生涯的原发性时空。

然而，安静祥和的氛围并没持续多久。随着“反右”运动临近,社会空气越来越紧张，铁狮子胡同一号里也搭起了很多席棚，一些花花绿绿的大字报开始出现但儿童王小波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却对此并没有在意.他们只是将之当作了一个盛大游戏。他们奇怪于大人们为什么喜欢在席棚周围打转.却并不在意那些大字报上又批判了谁，他们兴高采烈地在历史的日常细部游走：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57年夏.王小波一家搬往人

民大学校园内的林园楼，就在这一年，王小波一家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闭门苦读的王方名终于引起了革命领袖毛泽东的注意，并由此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生存环境;这一改变.对王小波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让王方名一家避开了“文革”期间残酷血腥的肉体迫害，也使少年王小波能以更超然的角度，观察革命年代的荒谬，反思革命对人性的压抑。因此,王小波“反思”“文革”的小说，既没有浓重的伤感气息，也不同于王朔式“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带一定商业色彩的青春叙事，而是在一个智慧、爱、有趣的范畴内.探讨革命与人性的关系1956年春，王方名在李新等好友的帮助下，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逻辑学教研室工作:李新曾参与组建中国人民大学，当时担任党委副书记一职.分管人大附属工农速成中学作为老战友，他对王方名非常同情，但因王此时已没有了党籍.而平反显然还不到时候，所以搞哲学这种意识形态非常强的学科显然不合适，逻辑学相对理科化一些，因此就让王进了逻辑学教研室。没有想到，王方名非常用功.很快在逻辑学研究领域崭露头角，

5

1957年I月至5月间，王方名在人民大学学报《教学与研究》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有关形式逻辑的研究文章；6月，他又写成了《有关形式逻辑质疑的初步探讨》，发表在《教学与研究》的6月号上，引起了广泛反响这几篇文章分别对形式逻辑研究的几个流行观点提出了质疑，而其焦点则在于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之间以谁为主、形式逻辑有无阶级性等敏感问题。在阶级论逐渐统治学界，全中国向苏联学习，贬低形式逻辑而过分抬高辩证法的背景下，王方名的这一组文章，显得格外不合时宜。它们由于呼应了周谷城的文章《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载于1956年2月号的《新建设》），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强烈反驳。其中声势最大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马特教授o1958年4月15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发表了马特的文章《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8月15日和12月10日的《哲学研究》上又分别发表了马特的《论形式逻辑作为方法的职能》和《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理论，还是资产阶级的唯心的逻辑理论？》两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王方名对形式逻辑的推崇，其实质是资产阶级唯心论，是对辩证法的污蔑。

这些文章引发了王方名家庭的恐慌，宋华苦口婆心地多次劝王方名要注意影响.然而，这一切却没有让这个狷介的书生屈服，他坚持认为“我看追求真理不是打架，用不着组织什么集团或队伍”，并认为辩证法和形式逻辑并无高下之别，都是科学，形式逻辑的一大好处，就是让人实事求是，尊重真理,能在思维程序层面，将科学方法论引入日常生活在他和马特的论战文章《当前我国逻辑争论的特征》、《反对宣传形而上学——驳马特先生关于逻辑的文章的基本问题》，我们可一窥其当年的犀利文风。以今天的学术研究标准来看，王方名的学术语言也许不够

规范严谨，但他的学术论战文章，却一方面有强大的逻辑思辨力量；另一方面.生动泼辣.讽刺有力，能在俯仰之间准确洞见事物的荒诞本质，并用嬉笑怒骂的口气，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来.颇有鲁迅和毛泽东的杂文风采：这是后来领袖赞同其学术观点的重要原因：

> 马特先生可能会大吃一惊。我觉得大可不必。我感觉你是一位只会抄写词句的还没有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的学者。这并无恶意，因为究竟你抄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就应当鼓励。不过还要向着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前进一步，而不要以此自满，并且拿着词句作武器到处乱我斗争对象，那不会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名誉，而只会损害你自己的。至于马特先生认定我是唯心主义者.资产阶级逻辑思想的代表人物，我实在受之有愧。,

1王方名.《当前我国逻辑争论的特征》.《教学与研究》,1959年1期

这些文章不久就引起了“热爱革命辩证法”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注意。是时，正值学界以周谷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反思苏联的逻辑学观点，而大的社会背景，却是中国和苏联的关系已现裂缝.及“双百方针”出现「'在这个背景之下，1957年4月1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邀集一批学者讨论逻辑和哲学问题毛泽东指示康生找到了时任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的胡锡奎，通知王方名和人大的另一位教授黄顺基去中南海,同时赴会的还有周谷城、金岳霧、冯友兰、贺麟、费孝通等人：聚会在周谷城和王方名之间，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这次谈话,除论及各人的专业经历、研究成果和一些逻辑问题之外，毛泽东还以自己的革命实践为话题.说到领导革命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毛泽东这番话，对周谷城、

王方名等当时的“少数派”来说，无疑是个巨大鼓舞2更巧合的是，4月11日，既是王家命运的转折点.也是王小波去世的忌日。这是否在冥冥之中昭示着某种宿命的联系？光明与苦难.对于一个革命者的家庭而言，是否有某种反讽般的荒谬？

这次谈话的内容很多，时间也较长，从早上10点持续到下午1点,中间毛主席请在座的各位专家吃饭，气氛非常热烈.多年后，王方名的回忆文章中，对这段辉煌的荣耀，还记忆犹新，充满自豪:“文革”后期，宋华的老家山东牟平水道镇青虎山村的青年支书张玉敏来王家做客，王方名还特别向他谈起了这件事，并声称“主席请我吃四菜一

1陈晋、王均伟.《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前后》，《北京青年报）.2003年】2月22日。

2张树德,《“此学问之爭.庸何伤”——毛泽东支持章I：钊重版〈逻辑指要〉的前前后后〉,《知情者说第2辑（2）•历史留给后人的情件真相》.中国后年出版社1999年版,233页。

汤，有豆腐和鱼”'。谈话中，毛泽东询问了王方名的学历和求学经过，王方名一人占据了毛泽东和大家会面的大部分时间。尽管毛泽东带有浓浓的湖南口音，但王方名听起来却没多大障碍.因为“在延安的陕北公学，曾多次听到他的演讲”。然而，很显然.伟大领袖毛泽东的这次接见，不仅是探讨逻辑和哲学问题，也是在借“实事求是，独立思考”这个逻辑命题，向外界传达出若干微妙的政治信息：

> 他首先说，中国革命开始时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煮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一个又一个的失败。
>
> 直到一九四九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

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

主席接着说：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

最后，主席概括地说：可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胜利。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素，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都盲目地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

……千万不能把自己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对老师不

1据2012年10月11日对张玉敏的采访。

要迷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可见，这次接见对于中国探索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摆脱苏联的干扰和控制，都是一个明显信号;当然，对这段“学界公案”是否属于政治性接见，学术界一直有争论，比如，有人民大学的学者撰文指出，此次接见纯粹属于毛泽东关心逻辑学科的健康发展，“如果说毛泽东一生有无数的政治谈话或政治接见的话.那么，唯独这一次是学术性的，而不是政治性的”2。我们姑且揣测，毛泽东的这次接见.以学术问题为主，并有推动逻辑学科发展的客观作用，但借力打力，借题发挥，也是领袖一贯的政治韬略.实在无法完全区分。相比较国家大事而言，这次谈话显然改善了王方名一家的处境。很快,王方名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的事情，就传遍了

人民大学校园，王方名因此得到副校长胡锡奎的重视，并一度担任中国人民大学逻辑教研室主任：后来，王方名根据自己的几篇论文，整理出版了一本七万字的小册子《论形式逻辑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他在书的前言中，自信乂有几分神秘地说：“本年4月，中央一位领导同志接见我们并希望我把当时已经发表的短文印个小册子。”据很多后人回忆，当天王方名回到学校，先没回家，而是兴奋地去找他在人大最好的朋友李新在好友家中，王方名又恢复了高谈阔论的神采，李新的夫人于川，专门炖了一条大鱼，庆祝这次接见，“整整一条大鱼，大部分都被王

1王方名.《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一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在这篇文章中.王方名提及毛泽东对苏联F涉中国解放的批评，见《人民日报〉.1979年1月2日。

2苏越.《学术性还是政治性？一从毛泽东接见王方名等学者谈起》，《贺州学院学报》.2012年1期。

方名给吃了”，可见其兴奋和喜悦之情。这次最高领袖的接见，让王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在“文革”的惨烈斗争中.王方名虽没受到重用.但却因此得以保全。

如前所述.王方名以“事实求是，独立思考”受到了毛的赏识,而这种“独立”却并非仅仅针对逻辑学，而有一个巨大的政治背景:，’而其后王方名一生的学术，也以此为参照点，成了一个宏大革命叙事逻辑立论的过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现象。比如，他写于1950年代后期的文章《学逻辑》.讲到逻辑的确定性时，就以“反右”作为例子：“右派分子在对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都声称是’帮助党整风’……这当然又是指东说西：今天看来.这些漏洞百出的论证，以政治斗争的现实为普通逻辑

的事实依据的荒谬做法，都似乎不可理喻但在当时.这乂是不得不遵守的“游戏规则”与非常严酷的“学术规定”——“学术必须服务于政治”。王方名所谓的“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学术原则依然不能摆脱宏大叙事的规范。在王方名的一系列理论文章中，尽管他小心翼翼地避开意识形态雷区，将“形式逻辑”定位在“实用科学”范畴，并一再声称“形式逻辑不是认识论和世界观，而是一门科学，不能讲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对立，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也不能用唯物和唯心的对立观点去形而上学地阐释形式逻辑”，尽管他坚持认为“形式逻辑可以为人民服务，为现实生活的实践服务”，但他无法解决的是，当辩证法变成了僵化而肤浅的、一分为二的方法论时，形式逻辑本身所包含的科学理性的认识论元素，就成了专制制度欲盖弥彰的漏洞所在他甚至认为：“人类思维的发展是从形象思

1王方名.《要实車求是.独立思考一回忆毛主席一九五七年的一次亲切谈话＞，《人民口报）.1979年1月2日。
2王方名.《学逻辑》，《新闻战线X1958年2期。

维到抽象思维，形象思维是抽象思维产生的基础.抽象思维是形象思维一分为二的必然结果。”'这在当时很有争议。当王方名晚年将一生的学术经历告诉王小波时，王小波说就好像在看一部恐怖电影，并用充满揶揄的口吻讲到父亲的学问：“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思维的乐趣》）

王方名悲剧性的学术历程，“革命化”的学术立场，都是王小波思考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原点。而王方名的学术探讨本身，他的学术兴趣，他对形象思维的认识，对想象的逻辑性的考察，也对王小波产生了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方名的学术兴趣，逐渐从早期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关系，转移到了研究文学艺术和逻辑的关系，并提出了要建立所谓“形象逻辑”学科的问题。谈到形象思维和逻辑的关系时，王方名从人类学和修辞学、语言学、逻辑学等学科综合的角度出

发，认为形象和抽象是同等重要的认识方式，而形象思维也可用逻辑的方法进行研究。2王方名既擅长逻辑思辨和抽象分析，又有很好的文学功底，因此，这个“形象逻辑”的提法相当有创意。然而，对此学界也有很多不同看法.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形式逻辑本身是科学发展的产物，而不仅是语言表达的工具。3但王方名在有生之年，却无法完成这个系统而宏大的科学工程了。在小说和杂文中，王小波常以诡谲瑰丽的想象和批判的理性主义相结合，即闪烁着乃父的智慧。•'而王小波对三段论式逻辑归

1王方名、张帆，《从人类思维实际看形象思维》，《文艺研究 > .1979年4期。
2王方名，《论文学艺术的形象思维过程》.《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2期
3张燕京，《王方名逻辑思想散论》，《河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4期。
4李大兴，《回忆早年的王小波》.《北京青年报》.2006年4月11日。

谬法的运用，则成为一种融合细节形象性和理性批判于一体的独特情节装置，无论是“破鞋的讨论”，还是“母狗的辩诬”，那种形象性与逻辑性融为一体的作法，都有王方名的影响。可以说，王方名旧学功底深厚，文笔很好，且富逻辑思辨的能力，分析事物准确犀利、一针见血.这些优秀质素都影响着王小波，为他日后在小说和杂文中洋溢的“逻辑化细节”和“批判理性精神”，打下了潜意识的、家学方面的基础。

王小波一家搬到林园楼后.虽说是从旧政府官邸搬出了，但当时的人大在北京西郊，还非常荒凉，四周有很多荒地和坟茔，也有一些农田，坐车要很长时间才能到达北京市里。人民大学作为有革命传统的院校.当时非常受重视，在建校之初.甚至有段时间，只收推荐的基层干部，不收应届高考生。说起来，王方名一家和人民大学的渊源很深。人大的前身，是1937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抗日烽火中成立的陕北公学，后先后改名为华北联合大学、北方大学、华北大学。1950年10月.在原华北大学基础上，中国人民大学正式成立。王方名出身于陕北公学，所以，他回到人大犹如回到母校。人大校园内的家属区，从一开始到随后扩大，共包括林园楼、静园楼和宜园楼三处社区。其中，林园楼十二栋，王小波一家人.居住于二号楼。在人大林园楼，童年王小波见证了大跃进、大炼钢铁，以及饥饿年代的到来。

如果说，成方街是革命者进京初期的集中地，将北京市民生活气息与革命者进城的欢乐融为一体，铁狮子胡同一号是将旧官邸的历史文化气息与革命理想主义气质相结合，那么，林园楼因联系着人民大学这样一所革命传统深厚的高校，则是一处更具革命气息、并带有旧式大学的宽容学术氛围的建筑，人民大学草创阶段，气氛还比较宽松“首任校长吴玉章本身是“中共五老”之一，红色学问家出身，几个主要负责人如胡锡奎、李新也大多身兼革命党人与学者双重身份：因此，当时的人民大学有一种乐观向上、朝气蓬勃的理想主义气氛，又不乏较自由的学术氛围。作为人民大学的首批家属楼，林园楼是按照当时最时髦的苏式单元楼模板设计的，但名字却很有中国古典风韵。它们整齐如一的规划、漂亮而厚实的外貌，相比较于成方街的大杂院与“铁一号”来说，都是全新

的而刚成立不久的人大，地处北京郊区，在空间上也较轻松自由。郊区的野外使得孩子们比之铁一号，获得了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并能大量接触大自然，远远不像今天的人民大学，地处中关村和万泉庄等北京核心地段，繁华热闹，房价贵得惊人。各种各样奇妙的昆虫与不知名的草木.共同构成了王小波自由心灵的荒野狂想曲，在空气清新的郊外，兄弟姐妹几个，外加他们的小姨，捉蝴蝶、捕虫子，自制弹弓打鸟，抓可怜的小刺猬。王小波还和兄弟们偷偷地用火烤刺猬吃，以致身上长了很多疹子。他们还用泥土堆砌出各种堡垒、城墙、战争工事.体验着那个时代孩子们特有的模拟战争的乐趣：，

搬入林园楼后，王方名的身份危机有所缓解.但毛泽东的接见，却并未能使得王方名彻底翻身.取得政治上的信任。他虽在吴玉章、李新的关怀下，从附中调入人大本部，并一度担任逻辑教研室主任，但他在学科中依然不能树立权威，对他的学术观点，很多同行并不赞同，而被开除党籍这件事，也成了他很大的心病。

自从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并开除党籍后，王方名一直没有停止申诉，但每每石沉大海，了无音信。后来，在李新的指点下，他向学校党委提出报告，进行了沉痛的自我批评，并申请恢复党籍其时的人大党委由吴玉章主政，他对王方名是比较同情的，但王方名的罪名是在当时的教育部定下的.又处于“三反”运动时期.定案的钱俊瑞、刘景范、安子文都是位髙权重的当权者，所以恢复党籍的事困难重重。尽管人民大学校党委几次复查王方名的情况，并作出具体调查报告，上书中监部，要求恢复王方名的党籍，但都被退回，不予处理这对看重党人身份的王方名来说，自然是郁郁不能开怀，他的为人处世表面上更加低i周了，实际上却更孤独，除了几个信重的好友外，一般不和别人交往。

但这时候的王方名，生活上则日渐安定，从惶惶不可终日，又开始恢复他早期的才子派关。从今天的角度看来，王方名很具有新旧转换时

期的知识分子特质，比如，豪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主义风格，张扬不羁的性格，对人事斗争的天真幼稚，对党派的忠诚度非常高等。生活中的王方名脾气并不好，具有川人火爆倔强的性格，王小波惹得他火起，不是打屁股，就是拎耳朵。但他也很疼爱孩子，虽然在孩子面前，总绷着父道尊严的面孔.但对孩子们的生活却很在意，常带着孩子去颐和园游玩。有时候，还在孩子们面前，暴露出他的天真可爱、情感热烈的一面。他曾一度热衷于收藏，也热爱发明小物件，还喜欢写诗，甚至有很多缠绵的情诗。他还是一个美食家，对口味多变、风格多样的川菜情有独钟。他的学术思维也有大开大合的“野路子”风格，富于创造性和叛逆性。比较而言，王小波继承了父亲叛逆创新的激情，却没有父亲张扬不羁的外在表现，而来自母亲家族的宽容厚道、内敛沉静的特质，也成为王小波性格的重要侧面。

7

时代的车轮滚滚前进.革命的步伐并未因建国而终止.反而变得更加狂热:建国初期理想主义与日常生活的和谐共处在一点点消退，社会充满了非理性的狂想与盲目乐观的氛围。1958年，毛泽东视察农村.对人民公社的做法大加赞扬.而在工业领域，毛也提出了“技术革命与技术革新”、“超英赶美”、“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口号，掀起了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成了“三面红旗”。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中，迈斯纳曾不无悲悯地谈到：“如果说中国缺乏马克思主义为共产主义社会所规定的物质前提.那么正是在努力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目标的进程中人们能够创造出这些客观的物质条件.而这一进程在此时此地要求实行不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提出大跃进的社会的经济目标时，寄希望于历史的’主观’因素，即他所说的人民群众的’无限创造力’和’极大的社会主义热情'

这种环境中，连儿童也受到了熏染，投身到光怪陆离的蛊惑之中°儿童王小波的生活空间.也就从人大墙外的荒野.林园楼的日常生活，进入到了一种共同空间记忆之中。这是一种集体共同记忆，却经常被遗忘与遮蔽，儿童王小波见证了北京文化空间发生的历史大事记。儿童的时空应属于家庭这样的伦理性时空，或旷野之类个人化的、神秘化的时空。然而，在全民大狂欢中，已没有了个体私密空间的余地.或者说，那些正在广场发生的宏大历史，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所有的人：由此，革命北京的标志性空间，也是当时所有革命时期城市的标志性空间——广场.就取代了各种私人化空间.成为空间的主流象征。尽管，儿童的狂想与时代的荒谬.形成了某种怪异契合，但儿童王小波

1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杜.蒲、李玉玲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2版，269页，

兴奋地拥抱了这一切。魔幻与现实的距离已模糊.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陷入了狂热状态，

全民大赛诗、各种违反自然规律的发明、劣质小高炉、深耕密植的高产神话、各地频繁出现的“生产卫星”、道德鼓舞下的频繁加班与体力透支.这都是中国从未有过的“历史奇观”：它以道德激情与民粹主义理想结合，创造了20世纪工业时代后发现代化国家“自我超越”的工业革命模式。它要求无限忠诚，要求所有人在战斗的亢奋中走入同一个集体旗帜下。而这种模式，实行半军事化集中管理，以最大限度的对人的体力的压榨，及对科学技术的巫术式借用，让所有人感到瞠冃结舌。中国仿佛被历史这匹狂飙突进的野马.甩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速时空轨道。如果说，17世纪的西方工业革命，是以“羊吃人”的传统道德的毁灭.对诗意牧歌家园神话的破坏，带来了泰罗式冷冰冰的工业理性思维，那么，20世纪下半叶，红色中国的大跃进革命，则是将自20世纪初开始的启蒙与救亡的“浪漫混乱”推向了历史实验的荒诞高潮,.所有的工业进步，不是在科技和理性进步的基础上实现的，而是基于道德狂热的殉身精神:技术难题和条件限制.都不再是“生产力”的问题，而是“想象力”的问题，

那是一个到处是诗人的年代，大发明的年代，更是“革命魔幻主义”的年代。郭沫若和周扬合编了红极一时的大跃进诗歌集《红旗谣》，那些诗句诸如“敢问河西英雄汉，小麦何时上五千”、“一个萝卜有多重，十个后生抬不动，用刀砍回一半来，足够全村吃三顿”等，今天读来，犹如进入了一个魔幻王国。当时文艺界的口号是：“中国人多诗人多，一人一首比星多。”山西省甚至提出一年要生产出三十万个“李有才”，三十万个“郭兰英”，村村要有李有才，县县都有郭沫若。诗歌在全国飞舞，田

间地头、大学校园、车间、靶场，到处都有赛诗会，“要问民歌有几何，挤到高山填满河”，全国被称为作家、诗人的，由1957年的不足一千人，发展到了1958年的二十万人，翻了二百倍。'

儿童王小波对大跃进的理解，首先来自哥哥王小平的诗歌作品。当时，人民大学的任务是，每月作诗三万首。作为一名三年级的小学生，王小平对火红的时代也颇有感触.写了几首大跃进诗歌，其中有一首：“共产主义，来之不易，要想早来，大家努力。”结果，王小波毫不犹豫地用哥哥冥思苦想的诗歌做了擦屁股的手纸。王小波的文章里.对这件趣事做了认真记录，可王小平在回忆录里，却否认了这种说法。他自认为不错的诗歌，是四首十六字令，有“革命烽火赤”的字样，结果被老师冤枉是抄袭。他半带戏谑地说：“这使我有一点忿忿不平的感觉，因为我的诗再不好，也没差到那个程度:再说当时朝野的诗人满坑满谷，无非也就是我的水平，凭什么他们的诗就可以登在报纸上，从收音机里放出来.而我的诗就只能填进茅坑？”2今天看来，大跃进诗歌的危害在于，它们在艺术上很粗糙，破坏了诗歌的审美性，更重要的是，这种浮夸的浪漫，也破坏了文学的真实性，它们有很强的现实政治所指，且不容置疑，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其结果是浪漫主义变成了“瞎浪漫”，而现实主义变成了“虚伪的现实颂歌”。

除了全民大作诗歌外，“大发明”也让人感觉到当时中国天天都在过“愚人节”。王小波多次在杂文中，不无调侃，却也不无苦涩地提到“超声波发热”：

1凤凰卫视，《腾飞中国》节目，2012年4月20日。
2王小平.《我的兄弟王小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45页。

当时的成年人都在忙着做一种叫做“超声波"的东西C比我年长的人一定记得更清楚：用一根铁管砸出个扁口来，再在扁口的尖上装上刀片。据说冷水从扁口里冲出来，射在刀片上，就能产生振荡.发出超声波来，而超声波不仅能蒸馒头，更能使冷水变热……那时公共澡堂的浴池里到处埋伏着这种东西，去洗澡时可要小心，一不留神就会把屁股割破，水会因此变红，但也没因此变热……（《写给新的一年（1997年）》）

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稀奇古怪的东西科学理性的薄弱，常让人们将巫术与科学等同，不断发明各种古怪的“玩意儿”，一阵风后，又将这些东西遗忘，接着发明更无聊的东西做替代一这种“遗忘”的精神恶习，恰是缺乏科林伍德所说的“历史反思精神”所致。如果一个民族处于这样恶劣的遗忘循环，则民族精神的健全状况堪忧。王小波认为，那些所谓“发明”，其实不过是一些凭空臆想的“诀窍”，而诀窍和知识的区别在于，知识不仅要知其然.还有知其所以然.不仅要知道事情如何做，还要知道为了什么目的而做，能使人变聪明的诀窍是没有的。这样的感慨其实早在鲁迅那里就有阐释°鲁迅曾多次喟叹，中国缺乏埋头苦干的人，而多有投机取巧之辈。在《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一文中，他还讽刺了所谓颇懂人情世故的“聪明人”。令人沉思的是，从鲁迅的时代到王小波的时代，一直到今天，对所谓“聪明人”的概念，中国人还大多从人际关系的角度去理解，而并非智力，更非人生大智慧。

大跃进的破坏性还在于，在革命的外衣下，人们失去了对科学和实事求是精神的尊重，变成了一群吃语的“梦游者”。学校的老师.带领着王小平等一帮学生种起了试验田，儿童王小波，看到哥哥们挥汗如雨，战天斗地，自然羡慕不已.因为哥哥声称，他们的麦苗能很快长出来，并能

收获大量白面。然而，每次他们去看试验田，却总失望而归。当时流行深耕密植法.学生们在一分地上，挖了一丈深大坑，囤积了很多粪肥，还下了足足两百斤种子，结果，由于施肥太多，而坑又过深，挖出了生土.到了秋天自然颗粒无收。所谓的科学种田，乂一次以对科学的不尊重而受到了大自然的惩罚°王小波在杂文中记载了有关亩产的神话。朴实的姥姥，听到一亩地的产量达到了二十万斤的时候，忍不住跺着小脚说："打死俺也不信！"那时候，王小波的姥姥，已从山东牟平来到北京，并负责全家人的伙食。她对大跃进的亩产神话表示怀疑。在老太太看来，如果把二十万斤粮食堆在一亩地上，也要足足的三四十公分呀！一家人都反对姥姥在大跃进中的保守态度，难道报纸上宣传的事情会是假的？小脚老太太的见识比领导们都强？但事实的发展是，姥姥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也不会作诗，但姥姥的预言却成了真实。大跃进的神话破灭了。就在神话破灭不久，大饥饿来临了。

对北京市民而言，饥饿虽没有达到骇人听闻的地步，但也是相当刻骨铭心的，有人甚至因为偷东西吃被撑死。王小波兄妹几个正在长身体的时候，饥饿感却一直伴随着他们，学校为节省学生的体力.连体育课也给免了。饥饿也让知识分子阶层斯文扫地，大家不再顾及什么脸面，没事就向郊外跑.捡麦穗、挖野菜、剥树皮、刨红薯须子，捡回家做成吃食。王小波在杂文中，曾回忆过那段生活。当时，王小波已是一个小学生了，但饥饿让他上课经常走神，并迷恋上了吃铅笔。王小波不无苦涩地说："饥饿可以把小孩子变成白蚁。"报纸上也天天介绍顶饱的办法，比如，米饭的双蒸法，开发小球藻等。小球藻的开发很有意思.但它给人们带来的只是幻灭。据说，只要有足够充足的日照时间，水里的那些藻类植物就能疯狂生K,并缓解粮食的不足饿得发昏的人们.在人民大学的操场上，摆起了数百个大大小小的水缸，晚上扯了十几条电线，布置了无

数的电灯。夜幕降临，操场上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倒是有几分热闹景象。大家都眼巴巴地期盼着那些魔幻植物，在召唤咒语中长成绿色面包，但浪費了大量:宝贵的电能后，他们却只收获了一缸缸的臭水-王方名和宋华也在家里养了一些小球藻，甚至用小晨光的尿来催促生长，过了很长时间，当餐桌上端来带着童子尿的“营养品”，小波和小平多拒绝食用：“若要吃小球藻，毋宁死！”

显然，这些办法，都不能让大家填饱肚子。为了让孩子们吃饱饭，宋华和王小波的姥姥.千方百计，从自己的粮食里节省。不久，姥姥就得了严重的浮肿病，手上和腿［二肿得发亮，--撼下去，都是一个个的小坑。为了开源节流，大家还发动智慧，在人大校园里，搞起了自留地：在楼房与楼房的间隙，有大大小小被开出的土地.各家根据人口承包一小块，拉上界桩和绳子，各自划定活命的“势力范围”:王家人口多.姥姥根据在乡下的经验，提议种产量大的红薯：孩子们没事就挎着小篮子,在街上捡马粪做肥料。红薯长成了，可数量还是太少，没办法，姥姥又把红薯藤和红薯叶剁碎了，和上杂面给大家吃。这些东西，就是在农村，也是当作猪饲料用的，而为了应对饥饿的威胁，全家人也只能将就了。为了让孩子们的碗里见一点荤服.全家人还齐心协力在家里饲养家畜家禽：洗澡间里养着兔子，阳台上喂着鸡每天早上，鸡鸣不已，省下了买钟表的钱，而乖巧温顺的小兔子，则让孩子们在淋浴的时候，能和小动物们“赤诚相见”，培养了对动物的爱心。只不过作为高等学府的家属楼.家家户户都飘荡着鸡粪、鸭屎、兔子粪蛋的味道，耳边则是一片鸡鸣鸭叫，做学问的心情未免大打折扣.但为填饱肚子，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了。养着这些可爱的小动物.日久生情.舍不得祭了五脏庙，孩子们总要在“肚子”和“爱心”之间，做一个残忍的选择。经过一两年时间，饥荒缓解了，否则，谁也不能想象，美丽的大学校园和单元房过道里，会不会出现成群结队的山羊、家猪和菜牛。如果真出现这些情况，倒是20世

纪大学教育的奇迹了。

其实，为了吃饱饭.饿慌了的王氏兄弟也曾组成过“小偷两人组”，专门在月黑风高、夜深人静的时候，算计校园里的枣树.偷取他人自留地里的萝卜。王小波那时已长成为一个精瘦、鬼机灵的小顽童，他们偷吃食从来是手到擒来，没有被抓获过。他们将饥饿感和好运气化作了战斗时的沉着冷静，并总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成功地战胜饥饿。后来，饥饿情况缓解后，王方名用稿费为孩子们买了一点肉食，偷偷地放在每个孩子的碗底。小弟王晨光.看到了腊肉，忍不住打开窗户.喜悦地大喊：“我们家吃大鱼大肉啦！”直到被父亲拉出来打了一顿才作罢，尽管大家都不再饿得要死，但低调总还是要的。

8

王小波的童年经验，是中国“大跃进”运动，直至“三年自然灾害”历史的缩影。1957年的大跃进运动,给中国历史留下的2忆创伤是永恒的。对于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而言，大跃进运动其实就是一场“预演”。正是由于大跃进运动的有关“物”的浪漫幻想的失败，有关革命的超越焦虑才变为“人的斗争”。对王小波而言，大跃进运动成为其树立文学内涵和美学原则的一个出发点。正是大跃进运动，让王小波看到了理性缺失的荒涎。有趣的是，尽管王小波在杂文中.不厌其烦地以大跃进为例，讲解科学理性对中国人思维的重要性，但小说中有关大跃进的印象，却成了一些更为悖论化的美学形象，所有那些荒诞景观，都以“儿童狂想”的美学形式出现。狂想之中，儿童对生命的好奇和对奇观场景的探究,都在历史的荒诞之中，显现出了宿命般的美学魅力。一方面，历史的荒诞成为理性缺失的反证，革命因违背常识付出沉重代价；另一方面，荒诞的历史，又成为某种独特的现代美学景观，并被儿童视角赋予了“奇幻”的生命激情

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小波写到了“大炼钢铁”给儿童心灵带来的震撼，这正来自他真实的童年感受。1958年的人民大学的操场，昼夜不息地工作着无数个小高炉和炒钢炉。整个北京也陷入了“大炼钢铁”的狂欢。这样的天空，在儿童王小波的眼中，变成了“紫色的天空”。童年的王小波，曾热衷于“除四害”的闹剧，疯死地驱赶麻雀，捕捉苍蝇，在老师的表扬中，满足小小的虚荣心。但他最喜欢的，还是跟着王小平，去别人的家里收铁锅.丢下一毛钱，就将别人吃饭的家伙抄走，然后集中在操场上，如痴如醉地看着操场上到处上演的、仿佛童话寓言故事中才会有的“奇观”：

我顺着那些砖墙.走到了学校的东操场，这里有好多巨人来来去去，头上戴着盔帽，手里拿着长枪。我还记得天是紫色的，有一个声音老从天上下来，要把耳膜撕裂，所以我时时站下来，捂住耳朵，把声音堵在外面。我还记得好几次有人对我说，小孩子回家去，这儿危险。一般来说，我的胆子很小，听说危险，就会躲起来，但是也有例外，那就是在梦里没有一回做梦我不杀几个人的。当时我就认定了眼前是个有趣的梦境，所以我欢笑着前进，走进那个奇妙的世界。

头盔，长枪，巨人，这是典型的童话式意象，也有着堂吉诃德式的夸张与滑稽，而紫色的天空，则成了梦境的代表:今天，我们已很难知道，王小波第一次看到大炼钢铁的具体时间。但据王小波的朋友回忆，应是1958年8月中旬的某一天。'这一天，成了王小波生命中的重要日子，

五八年我走到了操场上，走到一些奇怪的建筑之间，那些建筑顶上有好多奇形怪状的黄烟筒，冒出紫色的烟雾。那些烟雾升入天空，就和天空的紫色混为一体。这给了我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想法，就是天空是从烟筒里冒出来的。但我不是达利，不能把烟筒里冒出的天空画在画布上。除此之外，周围还有一种神秘的嗡嗡声，仿佛我置身于成千上万飞翔的屎壳郎中间。后来我再到这个广场上去，这些怪诞的景象就不见了，只剩下平坦的广场，这种现象叫我欣喜若狂，觉得这是我的梦境，为我独有，因此除了我，谁也没有听见过那种从天上下来撕裂耳膜的声音。随着那个声音一声怪叫，我和好多人一起涌到一个怪房子前面，别人用长枪在墙上扎了-个窟窿，从里面挑出一团通红的怪东西来，那东西的模样有几分像萨其马，

又有几分像牛粪，离它老远，就觉得脸上发烫，所有的人围着它欣喜若狂——这情景很像一种原始的

1据2012年12月5日对胡贝的采访一。

祭典。现在我知道，那是大炼钢铁炼出的钢，是生铁锅的碎片组成的。

萨其马、屎壳郎与牛粪,在两极化表述中，儿童对于粗鄙事物的好奇和对食物的向往被表露无遗。弗雷泽的著作《金枝》中，有关于巫术庆典的记载。该书指出，巫术的特质在于，利用非理性的联系，如接触律，建立神秘启示，进而将之落实为物质现实。一群筋疲力尽的革命者，围着违背科学原理的土高炉狂欢呐喊，在儿童王小波的眼中，无异于紫色天空下的神秘祭典，20世纪中国人的革命狂欢，与原始人的巫术愿望.形成了对比式的反讽

接着，王小波又写道：

我小的时候从家里跑出去，看到了一片紫红色的天空和种种奇怪的情景。后来有一阵子这些景象都不见了，——不知它是飞上天了，还是沉到地下去了。没有了这些景象，就感到很悲伤。

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处理方式，它有效避免了生硬的说教和概念植入，将理性精神与美学超越结合一体，也避免了新时期以来形成的文学规范在意识形态和美学特征上的制囿。这个独特的意象，也可以用另一个关键词——“广场”——加以说明。“广场”是革命狂欢意象的代表性空间，也可以看作是儿童王小波从个体化时空进入集体化时空的“成人仪

式”，它来得如此突然，如此奇幻如美妙“梦境”。经历了成方街的惜懂.铁狮子胡同一号的神秘启蒙.儿童王小波终于以林园楼为根据点，在人民大学的广场上，找到了他生命中第一次的狂欢高潮。广场巫术意象，开启了儿童幻想的髙潮，也终结了这种幻想。这种终结是因为“创伤经验”的出现。正如马斯洛所说：“我们只是在心理的创伤中，被迫进入了成熟。”王小波在小说中这样描述“儿童狂欢”后的失败感：

> 五八年我独自从家里跑出去，在"钢”堆边摔了一跤，把手臂割破了。等我爬了起来，正好看到自己的前臂裂了一个大口子，里面露出一些白滑滑亮晶晶的东西来。过了好一会才被血淹没。作为一个六岁的孩子，当然不可能明白这是些什么，所以后来我一直以为自己体内长满白滑滑粘糊糊像湿棉絮似的东西……

危险的儿童出游，以受到伤害而告终，梦境已醒，预示了一个无趣的成人社会的游戏规则的侵犯。“钢”对“我”的伤害，是身体性的，更是精神性的。它以恐惧的I己忆，成为历史幽暗角落里的“原罪”。大跃进结束后，那些废弃的高炉，炉渣，金属构件，都被遗弃在了人大附中南墙的角落"这里也成了王小波兄弟最喜欢光顾的地方。铁狮子胡同一号阴森恐怖的地牢已潜伏到了记忆深处，而废弃的高炉遗址，成为王小波有关成长记忆的隐秘圣地，这里有童年的幻想，也有隐秘的伤害，这里有紫色的天空，巨人，长枪，钢铁。
而这些东西，像流星一般出现在历史，又很快被遗弃与遗忘，成为历史的幽灵。

进一步思考，“大跃进意象”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来说，也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新时期以来的伤痕和反思文学，其实是一个被规定的、没有完成的文学类型。在政党推动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策略下，伤痕和反思文学

以“对文革的断裂”作为新时期发轫的标志。文化大革命被想象为“封建性遗毒”[1]，进步历史拒绝承认循环论，而隔绝了对“文革”与中国革命史之间的联系，大跃进历史，也被作为“左倾狂热错误”悬置起来了一直到19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才开始慢慢梳理并清算激进主义。但是.1990年代文学表述中，对革命历史的反思，一直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出现，并和后现代主义纠缠在一起，在解构历史的同时，陷入了历史的空洞化。王小波的表述是聪明的，也非常有冲击力。他从儿童的视角出发，以个体的尊严、爱与自由，形成了对革命叙事的颠覆性反讽。

在大跃进运动发动之前，“反右”运动已于1957年开始，人民大学是当时的重灾区，全校一共划了三百七十八个右派，占教职工的百分之十四点三，其中还包括全国闻名的“大右派”：葛佩琦、林希翎:1959年“反右倾运动”，副校长邹鲁风殉难,I960年，人民大学还发动“反修防修大审查”，空气一天比一天紧张。[2]据统计，1957年后的几年间，全国共划定了三百一十七万八千四百七十名右派，另划了一百四十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二名“中右”（另有三百多万右倾机会分子，不在此数字之内）。[3]

1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X1997年5期。
2陆伟国，《风霜雨雪忆年华》.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28页。
3郭道晖，《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炎黄春秋》，2009年2期

第三章少年时代-血与火的革命狂想

革命是人民群众最盛大的节日。

——列宁

1

I960年秋，饥饿日趋严重，王小波进入人民大学附属幼儿园，没过多久，又转入人民大学附属小学。1962年，三年灾害基本结束，王小波又转至二龙路中学附属的大木仓小学。多种类型的王小波年谱都将王小波的小学经历写为“二龙路小学”，但据王小波的小学同学艾建平介绍，并没有“二龙路小学”。当时的二龙路中学，作为教育部直属子弟学校，兼教育部实验学校，学制和教育方法都很特别。它有附属小学，就是当时的大木仓小学，而不叫二龙路小学。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街道简史》' [己载，1958年大跃进时期，二龙路地区十七所小学下放街道管理，但1960年，各个小学又重新上交给西城区教育局管理。当时的大木仓小学，有五年和六年两种学制，因为联

1该书由龙路樱花印刷厂于1996年11月印刷，内部发行。

系着中学，实际上形成了小学加中学的“九年一贯制”和“十年一贯制”两种学制。小学二年级时的王小波从人民大学附小转到了大木仓小学后，读的是六年制的班级。

那时候的王小波，是一个标准的顽童，比起小时候.他长得更高了，也更黑瘦了，由于缺钙.显得有些“头角峥峰”，嘴唇挺厚，发紫.乍一看“挺忠厚”的,但实际他坐没有坐相.站没有站相，还喜欢捉弄老师.给班主任慈老师起了“瓷尿盆”的外号，并经常把女老师气得直哭。由于骨质软，他还经常表演肢体魔术，将手和脚搭在一起，把脚扳过脖子，能吓人一跳.好像现在的柔术表演，他自己颇觉得计。放学回到家，他就跟着一群孩子在院里疯跑、打闹。一次，他和朋友们打赌，在五层高的红星楼屋檐上行走，比谁胆子大。楼顶的屋檐坑坑洼洼，上面有不少青苔.瘦

弱的王小波.摇晃着大脑袋，惊心动魄地、一摇一晃地踏在上面.发出刺耳的声音，把下面看着的二姐王征吓得脸色苍白。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还和朋友们追赶邻居饲养的母鸡，他用力挥舞一根棍子，砸到鸡的身上，那只可怜的母鸡一声惨叫.颤抖着母性的翅膀，下出一个鸡蛋，就倒在顽童王小波的“屠棍”之下，“英勇就义”了。王小波自知犯了大错。生活困难的时候，一只下蛋的母鸡，对一家人来说至关重要。当时.他还跟着哥哥、父亲住在北京西郊的人民大学，而姐姐和妈妈则住在大木仓胡同的教育部宿舍。他鼓起勇气，走了四十多里的夜路，从晚上7点多一直走到11点多.只为逃脱父亲的责骂，去母亲和姐姐那里寻求庇护。家人找不到他，都急得犹如热锅上的蚂蚁，等到他出现了，也不好意思揍他了，只是哭笑不得。

谈到小学时候的王小波，艾建平的印象就是“作文好”：出手快,思路清晰，而且下笔就能成章，文字老练，语言丰富，看起来简直不像一个小学生写的东西。那时候，每逢周末，老师都要布置周I己，大多是“记一次春游”、“你最喜欢的书籍”这类题目，同学们都想着周末出去玩玩，谁也没心思写作文，而王小波总能乂快又好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他的作文常成为班级范文贴在壁报上。小学五年级时，王小波的班主任换成了一位李姓老师。这位女老师很喜欢小波的作文。有一次，王小波写了一篇关于刺猬的小作文,语言生动活泼，幽默风趣.被学校的广播站当作范文播了出来。'别看他平常不喜欢说话，但讲起故事来，滔滔不绝，绘声绘色，颇能吸引人的注意。平时，他身边总围着一群嚷着听故事的同学和小伙伴们。小弟晨光就是王小波的“铁杆粉丝”之一，平时打架的时候，兄弟俩一起冲锋陷阵，被人戏称为“大野牛”和“小野牛"o1963年左右，北京的交通还不是很发达，人民大学地处西郊比较偏远，而王家

的孩子又多，所以，宋华就在教育部院内申请了一间房，带着几个上学的孩子住在那里。到了周末的时候.再去西郊人大院内合家团聚。宋华每次给每个孩子三毛钱坐公交汽车。但孩子们都偷偷地把钱省下来。小波和小平、小芹、王征拿钱买书，晨光年龄小，就把钱留着买零食吃。没了车票钱.兄弟姐妹们就只有走着回去，偶然也“蹭票”，小波的走路功夫就是那时候锻炼出来的，虽然天生是扁平足，但后来也能“大步流星”，常常走几十里地也不觉得累。路上为了解闷，大家就轮流讲故事，但最后总是小波讲得最多.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忘记了疲劳。小波是一个“故事筐”，五花八门的故事，书上看来的，从别处听来的，天文地理,历史故事，无所不包，他都能凭着记忆讲出来。有意思的是，小波还擅长编故事，特别擅长编童话故事，他的故事总是从邪恶与善良的对

1据2012年11月20口对艾建平的采访。

抗开始，森林里的小兔子、小羊、小鹿、小松鼠们，善良可爱，而大灰狼和豺狗，则凶狠霸道。于是，战争开始了，双方都开动脑筋，奇思妙想层出不穷，从挖陷阱、砍竹矛到堑壕战、阵地战，一直发展到飞机、大炮、坦克车、军舰等海陆空一体的大兵团作战.真是花样百出。1大家听到最精彩的地方，不禁欢呼喝彩.但如果追问故事结局，小波却像一个狡猾的老北京说书人一样，摊开两手，貌似无辜地说,下面嘛.下面就没有了°这不禁让大家抓狂不已，纷纷逼迫他说出结果。而结果是，在说说笑笑之中，不知不觉地就到了人民大学.故事的结局只有留在梦中.让大家自己猜测了。

但是，说起来，小学时代的王小波，按照世俗的标准，根本不是一个“优秀学生”，更算不上“天才少年”。中国的教育体制，从来都是鼓励培养听话的好孩子，也就是所谓“品学兼优”的学生，而不注重孩子们个性和创造力的培育，体制内的好学生，就是“尖子生”，应符合几个标准：（I）听话，听老师的话，进而广之，听父母的话.听党和政府的话，要在各级学生组织中担任职务，从课代表到班长、红领巾大队长等°（2）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包括五花八门的知识竞赛、演讲比赛、文艺宣传活动等，这是所谓“多才多艺”。（3）能够熟读课本，全面领会课本知识，各类考试都能考近满分的成绩。据这几条标准来看，王小波一条也不符合。首先，王小波并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据儿时的朋友回忆，王小波从未当过班干部，最大的官就是管着扫地的小组长，对他看不上眼的老师,他干脆不予理会。这对于当时的教育环境来说,可以说有点惊世骇俗。他在杂文中自嘲说，自己很早就不是好孩子了。仅是因为揪了女孩子的小辫，就被老师当作了“坏孩子”。后来，他因此喜欢上了马克•吐温的“好孩子和坏孩子”的故事，“好孩子”雅各布的蠢人悲剧，与“坏孩子”吉姆的传奇经历，都让王小波开心不已。“坏孩

子”和“好孩子”的悲剧，都是僵化的教育环境逼迫的王小波经常上课发呆，其实是对老师讲的东西，已经了解了，所以不再感兴趣，神游物外，心鹜八极，要不就是看其他的书。但老师们大多受不了这样的学生，通常会有一个尖锐而严肃的声音斥责他：“王小波，这个问题你来回答一下！”

而小波通常直通通地站起来，也不解释，反而继续发呆，简直要把老师气得鼻子冒烟，

“坐下吧！”老师和小波比赛定力，最后大多以老师妥协为主。然而，因为上课老发呆，老师们给王小波的分数都很低。当时的小学成绩是五分制，而王小波单是因为站起来拒绝回答问题，就吃了很多一分。有的时候，王小波拿回家的成绩册.还会有一些零分。相比较而言，哥哥王小平和大姐王小芹，都出了名地优秀，成绩名列前茅,在教育部家属院里很有名气。

但发呆并不代表王小波的智力有问题。有一次，全校数学竞赛，王小波不声不响地拿了一个一等奖，让父母和老师们大吃一惊。王小波生性沉静，但性格叛逆，不喜欢乱哄哄的场合，尤其不喜欢参加学校令人眼花缭乱的活动。他的作文好是大家公认的，但他很少参加作文竞赛。他不太在意分数。多年以后，在小说《绿毛水怪》中，他还对教育制度大加讽刺。小说写了两个坏孩子“妖妖”和“陈辉”，他们联手•捉弄了虚伪的刘老师和教务处刘主任，而老师对厌妖妖和陈辉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太复杂”：

我经常把老师最宠爱的学生心里那些不好见人的小小的虚荣、嫉妒统统揭发出来，弄得他们求死不得，因此老师们很恨我。就是老师们的念头也常常被我发现，可是我蠢得很，从不给他们留面子，都告诉了别人，可是别人就把我出卖了，所以老师们都说我“复杂"，这真是可怕的形容

词！

王小波特别讨厌教育的虚伪，说一套，做一套，假模假式，不是鼓励孩子们培养学习兴趣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是将愚昧的服从意识和僵化死板的知识灌输给他们，学校教育既然令人失望，王小波就另辟蹊径，寻找“野路子”——自学和广泛的阅读c他从小就是一个“杂家”。王家的藏书很多，但王方名却不让孩子们看，王小波喜欢偷偷溜到父亲的书房，和王小平一起分享读书的喜悦。在《我的精神家园》中，他曾描述过和哥哥一起“偷书读”，虽“挨揍而不悔”的乐趣：

> 那时候政治气氛紧张，他把所有不宜摆在外面的书都锁了起来，在那个柜子里，有奥维德的《变形记》，朱生豪译的莎翁戏剧，甚至还有《十日谈》。柜子是锁着的，但我哥哥有捅开它的方法。他还有说服我去火中取栗的办法：你小，身体也单薄，我看爸爸不好意思揍你。但实际上，在揍我这个问题上，我爸爸显得不够绅士派，我的手脚也不太灵活，总给他这种机会。总而言之，偷出书来两人看，挨揍则是我一人挨，就这样看了一些书。虽然很吃亏，但我也不后悔。

放学之后，他也喜欢去西单的旧书摊“蹭书看”，七七八八地看了不少杂书。王小波读书非常快，记忆力超群。小学二三年级，就开始看《水浒传》、简本《聊斋志异》、《世界童话故事》等。姐姐王征还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王小波就能大段大段地背诵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而当他读了《十万个为什么》，就成了家里的“生活顾问”，上至天文地理，下至生活小知识，家里人都来问他。哥哥王小平则在向忆录中写到.有一次，他和王小波比谁看书快，结果，一直以捷才而自负的小平却

败给了弟弟，小波一个小时最多能看一百三十页书。[1]王小波也特别喜欢马克•吐温的小说。长大后,他保持了对幽默作家的喜爱，后来乂喜欢上萧伯纳，他特别喜欢那种“佛头着粪”式的讽刺与狂欢.

正是这种“杂家”教育，培养了王小波的文学口味，在王小波的姐夫姚锐戈先生的帮助下，笔者曾进入过小波生前居住的一间宿舍。此宿舍在教育部院内，是宋华单位分配的，就在宋华居住的单元楼旁边。它是王小波生前活动的重要场所。自从哥哥和姐姐出国后，他平时就在这间小屋里读书写作，以方便照顾年迈的母亲。在这间宿舍里，保存着王小波的大量藏书。文学类的书籍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西方文学名著，包括具有先锋性的西方当代小说；另一类就是中国传奇演义、民间故事。其实，还在孩童时代时，王小波就在逐渐培养这种阅读口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经典的西方文学，特别是西方的幽默文学，充满了童话趣味的、有想象力的作品，和充满了野性活力的民间故事，成为王小波反思现实社会，进而形成独立思考能力的阅读经验来源。他终生保持了对《十日谈》、《变形记》、《巨人传》等书的喜爱，经常在杂文和小说中提到。

王小波的阅读喜好，不仅疏离于当时的革命主流文艺，且和后来同辈作家的文学积淀.也有很大差别王小波同辈的作家，阅读西方

1王小平,《我的兄弟王小波 > .134页。

经典名著，大多偏重哲理性和历史厚重感，喜欢诸如杰克•伦敦、雨果、巴尔扎克等作家的作品。俄罗斯文学对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影响也非常显著，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等的创作，曾深刻影响了梁晓声、张承志、张炜等一大批中国最优秀的1950年代作家。王小波接受的苏联和俄罗斯文学有限，经常提到的仅有普希金和马雅可夫斯基。他喜欢的大多是属于西方经典文学的“支流”.甚至有“思想异端”的叛逆色彩的作家作品，从奥维德、拉伯雷、博马舍到近现代的萧伯纳、

马克•吐温、杜拉斯、奥威尔、卡尔维诺、梅内耶克、伯尔甚至虐恋小说家萨德、波林•瑞芝等。1996年，他在和朋友张卫民喝酒聊天时，还言之凿凿地说：诺贝尔文学奖至今只发对了两个人，一个是罗素，一个是伯尔。这种不同的文学思维谱系，不能说是最好的，但绝对是独特的。

小学时代的王小波，还曾以一篇大字报，惊动当时整个教育部：一天早上，教育部操场的木板上，出现了一张题为《牛头•马面•判官•小鬼》的大字报，上面画着一个狰狞的牛头，一个滑稽的马面.飒刺当时教育部的派系斗争。大字报文字是用半文言的方式写成的，文笔老辣，妙语连珠，讽刺意味十足。大家看了议论纷纷，都以为是哪个老先生按捺不住，偷偷写了如此犀利的文章。大字报在教育部引起了轰动，当时宋华也挤在人群中看到了。部里的造反派看了羞愤不已，为此追查了好几天，但没什么结果。多年以后的一天，一家人正在家里吃饭，宋华突然想起了那张大字报，就把它当笑话讲了。谁知.王小波扑哧一下笑了。宋华很奇怪，就问他笑什么。王小波这才承认,这张大字报出自他的手笔。大家都很吃惊，既惊讶小波年幼就有那样

1据2012年12月12日对张卫民的采访。

的文采，又为他庆幸。要知道，当年如果让人知道是他写的大字报，还真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那一年，王小波才上小学六年级，就如此胆大包天。

2

1966年,王小波十四岁，进入二龙路中学初一（三）班学习。当时,按照教育改革的精神.一班和二班是实验班，主要招收小学五年制的优等生，以教育部干部子弟为主，外语语种为俄语；三班和四班是普通班，招收小学六年制的学生，外语语种是英语。王小波虽在小学曾获数学竞赛一等奖，但学习成绩并不好，也不属于老师喜欢的孩子.因此就被分配到了普通班。北京二龙路中学，虽不如当时清华附中、北京四中、101中学那么声名显赫，但也是很不错的学校。它始建于1922年，原名弘达中学，为东北爱国志士筹办。原中央军委委员李硕勋、东北抗联一路军副司令员魏拯民、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民政部长崔乃夫等都是弘达中学校友。1952年，弘达中学曾更名为北京三十七中，1960年，又更名为二龙路学校，是教育部直属实验学校，实验的重点是学制、教材和教法，为当时全国普教改革做出了特殊贡献°1966年，根据中央精神，部属学校撤编.学校更名为北京二龙路中学.但仍为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直接联系和指导的学校严格说起来，王小波在二龙路中学，仅仅待了一年，就因停课回到了家里，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1963年，毛泽东发动四清运动（又称“社教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社会气氛已非常紧张，而1965年，四清运动的指导思想发生转变，即“二十三条”出现后，“以阶级斗争为纲”、“清除党内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的火药味就更足了。“七千人大会”后，当时中央内部，毛泽东和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已出现很大差异°一些父母在党内当领导干部的学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裂痕。清华附中开始酝酿激进的学生组织——“红卫兵”。1966年7月，北京各校红卫兵组织在海淀区举行联合成立大会，8月5日，毛泽东的《炮

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公开支持北京高校和中学的红卫兵，并反对刘少奇向各大高校派驻工作组.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文革”的第一道风景线是批量出现的“大字报”，各种稀奇古怪的言论，各级领导“真真假假”的隐私和花边新闻，都被暴露在了公众的面前。那时候，少年王小波放学之后，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和同学们一起挤到大字报的前面，一边看.一边兴高采烈地品头论足。当时人民大学校园内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不管教师，还是学生，都陷入到了一种革命的节日狂欢氛围，但校领导对此很忧虑，各级领导都传达了指示：“心要热，头要冷。”有的院系领导更忧心忡忡地说：“同学们，要牢记五七年的教训呀！”这些言论和做法，后来都成了他们反对“文革”的一大罪状。

很快，“文革”就进入了“大串联”的高潮,领袖毛泽东在短短半年间，先后八次接见了一千一百万人次红卫兵，成为了世界史上的一个奇观。这其中.最著名的是所谓“八一八”，即8月18日的接见。彼时的天安门广场，红旗翻卷.军装涌动，语录歌此起彼伏，锣鼓声和人们高呼“万岁”的呼喊声，惊天彻地.和建国初期的入城式不同，这已不再是“胜利”的仪式，而是“革命”的再次加冕仪式，一种消除一切差别、进入幻觉乌托邦的“极度精神亢进”。“革命”的北京，不再是鱼龙混杂的破败帝都，也不再是封建和资本主义腐朽的文化中心.而是现代民族国家“人间天国”的空间象征。然而，大串联却搅动九州风云，浪费了大量国家资财，制造了无数拥堵，也催生了疯狂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和“清除四类分子”的活动（后扩大到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无数红卫兵走上街头,就连穿紧身裤的妇女，都要接受“墨水瓶测试”：“如果墨水瓶从裤腰放进去不能痛痛快快地落到地上，就要把裤子割成碎条。”'大量书籍被焚烧,大量文物被破坏，远在山东的孔庙也不能幸免，无数家庭被抄家，无数人被游街、批斗，红色恐怖伴随狂欢，一起在神州大地tl演。

其实，早在见到大规模迫害运动之前，王小波在校园早已感受到了“文革”的血腥暴力。“文革”前夕，师道尊严已渐渐不为学生们放在眼里，很多学生都公开在课堂上顶撞老师°甚至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中，也有一些令人尴尬的说法，比如,“学生上课不愿听讲，可以打瞌睡”，“课程可以砍掉一半”，“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等。1964年7月，毛泽东接见毛远新的时候，甚至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呢”。2二龙路中学，作为当时的教育部子弟学校，也是打老师较厉害的北京学校之一。多年以后，搜集整理“文革”中被批斗迫害致死的教育工作者名单的王友琴女士，还曾采访过王小波，询问当年打死老师的情形。据她的文章的转述，她是在1996年联系的王小波，主要询问了1966年“红八月”里，被打成重伤、后含冤自杀的教师张放的情况，王友琴写道：

第一次听到张放的名字，是在和已故作家王小波通电话

1（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俞金尧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145页。
2刘冰.《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版.7—8页。

的时候。那是1996年，“文革"发动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当时还没有读过什么王小波的作品.打电话原来也是为了找他的妻子而不是为了找他。多年以来，为了记载"文革"历史，我和很多“文革"的经历者和见证者谈话，我注重了解的是“文革”事实，是“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被迫害的遭遇。不巧，那天王小波的妻子不在家，他接了电话。我简单说明来意之后，他立即就理解了我在做什么或者我要什么。他说，你调查过二龙路中学吗？二龙路中学有个老师叫张放，在“文革"中自杀了……王小波说，张放是个女老师，是物理老师（误记）o1966年夏天，“红八月”的时候，和邻近的中学一样，二龙路中学的红卫兵打人打得很厉害。学校领导人和一批老师都被抄家并遭到毒打。教导主任的父亲母亲，据说

是“资本家”，被毒打后，上吊自杀了。张放也被打了，被严重打伤了。但是她在1966年没有死，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她再次被整，她自杀了。，

散文《拒绝恭维》中，王小波也谈到了发生在二龙路中学的一次“间接致死”的事件：“在我们学校里，小将们不光打了老师，把老师的爹妈都打了。这对老夫妇不胜羞辱.就上吊自杀了。打老师的事与我无关，但我以为这是极可耻的事。干过这些事的同学后来也同意我的看法，但就是搞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像吃了蜜蜂屎一样，一味地轻狂。”和二龙路中学只有一街之隔的，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1966年8月5日，副校长卞仲耘被学生当场活活打死，开启了“文革”

1王友琴,《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二十一世纪》1995年8月。

打死人的先河。教育部门是当时红卫兵冲击的重点之一，北京中古友谊小学的小学生们，竟然在该校女校长的头上钉满了图钉.血流如注，惨不忍睹。革命的北京，仿佛沸腾的熔炉，在血与火的喧闹中，熔化一切不属于革命的杂质。革命的风暴扫过一切，所有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甚至包括私人化的空间，都要放在革命的砧板上被融化、锻打、挤压。

王小波没有参与暴力行动。虽然他当时只是惜懂少年，但本能地对暴力、专制和夸张的浪漫抱有怀疑和反感。他是一个外表木讷内向、内心却顽皮搞怪的孩子。少年王小波，常为自己无法像别人一样.“极限地”表达对主流秩序的情感而感到羞愧。在政治统治一切的年代，孩子们天然地受到濡染，很多孩子，年龄很小，就热爱革命口号、革命故事和政治辩论c但王小波从小就是一个对“宏大话语”有距离的孩子。他只是觉得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可思议。他曾目睹人民大学的学生，因为大辩论，一口咬掉了对方的半个耳朵。1968年国庆，大家都涌向金水桥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很多小伙伴都热泪盈眶.但王小波怎么也哭不出来，更无法像某些人一样——直接晕倒过去，以表达对领袖的热爱。整个“文革”时

期，他都是一个“逍遥派”。随着年龄增长和视野的开阔，他不再将“文革”的种种光怪陆离的事件当作“幻想美梦”，他只是远远地观望着，思考着，虽然很多事情，他也是浑浑噩噩，不明所以。

王小波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并不大，王方名仅被批斗了一次，且是陪斗，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笔者曾翻阅哈佛大学图书馆馆藏的“人大三红”和“新人大公社”的战报和油印刊物，在各类批斗会通告上，没有发现王方名的名字。“文革”前后，人大哲学系的情况很复杂，斗争也激烈。很多教师都有深厚的政治背景，有的与北京市委有联系，有的与中宣部有联系，有的拥有解放区的背景。“文革”前，哲学系的部分教师，还参与了“九评”的写作，自认为在政治上前途无量，但这些却成为被攻击的靶子。王方名属于人大建校后调动而至.但在历史上和人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主要背景性领导、原人民大学党委副书［己李新，已于1962年调入中国社科院近现代史研究所专事学问，而王方名在人大行事低调，韬光养晦，与其他校领导并无深交，也素不参与派系之间的活动，加之毛泽东曾接见过他，因此并未被彻底打倒°不像一些有政治背景的教师，如统计系教师、王稼祥的儿子王命先，就因其父亲的缘故，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不堪受辱，投河自尽。然而，少年王小波直接目睹了“父亲被批斗”的一幕。当时，年少的他，还无法理解置身其中的父亲的委屈和惶恐，他只是凭着顽童的本能发现了那些游街批斗的奇观场景背后的荒谬。后来，他反复在散文和小说提到这一幕，对其间的“辛酸”和“荒诞”难以释怀：

> 六六年的盛夏时节，当时“文化革命"刚闹起来。我在校园里遛弯时，看到我爸爸被一伙大学生押着游街。他大概算个反动学术权威吧。他身上穿了一件旧中山服，头上戴了一顶纸糊的高帽子——那帽子一眼就能看出是以小号字纸篓为胎糊的；

手里拿着根棍子，敲着一个铁簸箕；当时游街的是一队人，他既不是走在第一个，也不是走在最后一个；时间大概是下午三点钟；天气是薄云遮日。总而言之，我见到他以后，就朝他笑了笑。回家以后他就把我狠揍了一顿，练拳击的打沙袋也没那么狠。（《革命时期的爱情》）

王小波和哥哥还亲眼目睹了父亲烧书的一幕。那是一个深夜，王小平醒来的时候，突然发现爸爸的卧室里有火光，好奇的他就和弟弟小波一起，偷偷下床，从门缝里观望。他们发现父亲把自己多年来的逻辑学专题研究笔记，一页一页放进燃烧的炉火中。那一摞摞厚厚的纸张，是父亲十几年的心血所在。火光熊熊，照亮了父亲绝望而沉重的脸庞。当时，他们并不理解书籍为什么会变成毒草，父亲为何要烧掉学术成果。

学校里，王小波也受到了“狗崽子”式的盘问，这一幕也深深烙在他的心里。那是1966年9月的一天早上，王小波来到学校，发觉氛围有些古怪：校门口有几个男同学，有高年级的，也有低年级的，脑袋都清一色地刮得青青的，腰间束着大皮带，耀武扬威，不可一世，正嚷嚷着盘问每一个进校的同学。还有几个女同学，也在帮忙。王小波疑惑地走过来，一个矮个子男同学伸手拦住了他，问道：

“喂，你是什么出身？”

“出身？”王小波愣了一下。

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按理说，王家属于革命干部，是所谓“红五类”，但是，王方名曾在1952年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并被开除党籍,属于犯过错误的人，但又不属于“地富反坏右”的行列，因此难以定论。王小波把实情向矮个子男同学说了，他想了一会儿，似乎也想不出什么对策，就和几个同学商量了一下，让王小波过去了。王小波不明所以，后来，又看了几个过来的同学，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盘问自己的同学，都属于“高贵”的“革命血统”出身，而被骂

为“狗崽子”的同学，则出身不好。那些“红二代”鄙夷的眼神，趾高气扬的气焰，和那些“狗崽子”悲伤、绝望的眼神，都深深刺痛了少年王小波的心灵。一夜之间.为什么亲密的同学就变成了彼此仇恨的对立面？所谓“高贵”的一方，非要把“低贱”的另一方踩在脚下才罢休？其实，当时二龙路中学发生的这一幕，在很多学校中，情况更惨烈。有的学校，凡属“黑五类”子女的,在食堂吃饭之前，必须先要低头认罪，连续喊“我是狗崽子”十几遍，才被允许端起饭碗多年之后，经过痛苦的理性思索，王小波再次强化了一个信念，即对强制性的“权威话语”，要抱有怀疑和警惕——沉默的大多数.才是无法表达的真实：“话语教给我们很多，但善恶还是可以自明。话语想要教给我们，人与人生来就不平等。在人间，尊卑有序是永恒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听。”（《沉默的大多数》）而当多年以后，中山大学的艾晓明教授请王小波为她的小说《血统》写序言时，王小波还专门提到了那些终身难忘的少年经历。

3

大串联和抄家批斗之后，“文革”继续升级。1967年1月5日，上海“一月风暴”发动，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组织篡夺了上海党政大权自此，在全国各地、各单位内部，以夺权造反为目标的派系武斗又开始了。1968年4月22日，清华大学内部“团派”（即“井冈山造反兵团总部”，是由蒯大富领导的“造反派”）和“四派”（即“井冈山造反兵团四一四总部”，是由沈如槐领导的“保守派”）之间的“百日大武斗”，揭开了北京教育界武斗的序幕，教育部是最早成立红卫兵组织的机构之一。据胡贝介绍.如果按照发起的时间.教育部红卫兵，甚至要早于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由卜大华、骆小海、张承志等发起的“红卫兵”。“文革”期间，教育部作为意识形态部门，也是全北京闹得最凶的几个单位之一。人民大学的红卫兵组织——“人大三红”与“新人大公社”之间的武斗，也非常激烈。1966年“停课闹革命”后，王小波从学校回到人大的林园楼。在人民大学，他亲眼看到大学生们披甲上阵，手持自制钢矛，或简易燃烧瓶、生石灰瓶.像“中世纪武士”一般生死相搏。

“文革”的大武斗发动时，王小波才十四岁，没资格参加大学生们真刀真枪的斗争。但对十三四岁的少年来说，那些想象的森林里小兔子、小松鼠和大灰狼、大狗熊之间的“童话战争”，却终于在现实中出现了，无比真实刺激.却又无比惨烈恐怖一事情过后，那些血淋淋的场景，又在引发王小波思考：为什么一个个平时要好的同学，变成了生死相搏的敌人？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小波虚构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叫“拿起笔来做刀枪”，还虚构了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情节：少年王二帮助这个红卫兵组织，做好了大投石器，打死了很多人，他还和一个叫“颜色”的女大学生，从地道里出生入死’给武斗的学生买早点。其实，当时王小波作为

红卫兵外围成员，在人民大学并没有参加什么派系组织，他只是帮着贴大字报，看个热闹。然而，武斗的惨烈场面，却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以至于很多年之后，当他留学匹兹堡，在课堂上向老师和同学们讲述当时的场景时，大家都以为他在开“愚人节”的玩笑。

由哈佛大学图书馆馆藏红卫兵史料可以看出，“文革”初期，人民大学的形势非常复杂。当时主要领导校长吴玉章年事已高，实际工作由党委书记郭影秋主持。郭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很多人大师生出于义愤.跑去北京市委和康生的家中质问，引发了著名的“郭影秋事件”。副校长胡锡奎，被列入“六十一人投降集团”，被当作“刘少奇路线”在人民大学的代理人.遭到了无情清洗o1970年，胡锡奎病死于监狱之中.死前还不停地呼唤自己的名字。'副校长孙泱，因撰写《朱德传》,被江青指使红卫兵殴打批斗致死。1966年8月8日，人民大学高干子弟朱xx（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朱xx之子）等十几人，成立了人民大学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人大红卫兵”，但大多是“保守派”（指支持原校党委的红卫兵组织，他们的父母大多是领导层）。随着“文革”的发展，毛泽东将批斗对象转移到了共产党内部的高级干部，“联动”等保守派红卫兵失势.人民大学内部的“人大红卫兵”、“八一八红卫兵”等保守派红卫兵组织也逐渐没落。这时，人民大学的学生赵桂林、肖前等，从湖北造反归来.在“八一八红卫兵”的基础上成立“新人大公社”，而另一些红卫兵组织则迅速走向联合，在孔宪龙等激进学生的领导下，成立了“人大三红”（即东方红公社、人大红卫兵、人大红卫队）。2两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武斗。

1967年9月到12月，虽然中央已发出“复课闹革命”的最高指示，但人大校园依然混乱，11月1日，“新人大公社”和“人大三红”之间的武斗开始，当天就有十几人受伤。12日，“新人大公社”抓捕王昆顺等“人大三红”的同学。16日，针对教工宿舍红一楼的争夺，两派又大打出手，双方有二百多人受伤，很多人被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有的人

被殴打致死，大量财物遭哄抢。原“孙泱之死”调查组组长谭立清被“新人大公社”抓走，殴打数天，昏迷不醒，奄奄一息。据战地勤务员统计，声明推翻“新人大公社”的造反组织就有十一支：斗肖联络站（9.12）、“红十月”战斗队（10.17）、“秋收暴动”战斗队（10.22）、"造反到底”战斗队（11.24）、"狂飙”战斗队（12.1）、“五

1梁柏肯•整理，《胡锡奎》.《孝感市文史资料》3辑.1986年10月出版，110页。2陆伟国，《风霜雨雪忆年华＞.126页.

尺枪”战斗队（11.26）、“造反有理”战斗队（10.14）、“立新功”战斗队（10.20）、“十月革命”战斗队（11.23）、“从头越”战斗队（11.25）、“反戈一击”战斗队（11.27）（后面的时间是宣布造反的日期）,还有原“新人大公社”的成员，如哲学系的唐有伯、戴贵庚、孙育海等宣布“造反”，投入“人大三红”。王小波在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里曾写到的造反派组织“拿起笔做刀枪”.其原型可能是王方名所在的哲学系“五尺枪”战斗队，或晚一点成立的、文学系的“文学兵团”——“长缨”战斗队。正是“人大三红”造反派组织，设计了所谓“书甲”，这些小造反组织虽属“人大三红”，但人数较少，也符合书中描述，而据占领林园楼的情况来看，也有“新人大公社”造反派的影子。

1967年12月后，随着北京军区介入，特别是军训团进驻人大校园，局势一度好转。但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军训团撤走，“清理阶级队伍”的大运动开始，“中央文革”再次鼓动“反右倾”，人大的形势乂紧张起来。5月10日，“新人大公社”占领了王小波一家居住的林园楼.先是驱赶“人大三红”的教工，后来，他们乂把居民从宿舍楼赶到车棚，红一楼等建筑也陷入了两派的争夺。武斗双方拉起电网，筑好堡垒，将居民楼变成坚固的战地工事。他们将宿舍楼的内部打通，一楼不住人，窗户用砖头木板封死.二楼以上，窗户只留半扇，另半扇做成掩体，用木板挡上钉死，楼梯道也都用木板防护起来。为了武装起来，每个红卫兵

小将都发了一根长矛，随身携带那些长矛，大多是从自来水管、暖气管拆下来，截成两米的长棍，一端磨得锋利。捕人的时候.血从管子里流出来，相当于一个大血槽.以方便迅速拔出。（变成工事的还有原人大图书馆楼，由“新人大公社”的支持者占领。那些工事被称为“战略村”，而占据学校公共建筑，集中搞武斗的做法当时也叫“移民并村”。）

两帮造反派也各自组织了专业队伍，如专门武斗的“敢死队”，负责抓捕和审讯的“刑讯队”，还有负责宣传的“文宣队”。“人大三红”为提高战斗力，专门组织了五十余人的武斗队：每个人全副武装，头戴柳条帽，手执特制钢管矛，帽檐下面全用铁丝网罩住，可以防止弓箭。他们还做出了前文所提到过的所谓“书甲”.这种王小波在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中曾描述过的防御工具，做法是用铁皮剪成一片片铠甲，罩在全身和四肢，在铁皮底下，衬上厚厚的书本进行缓冲，效果很好。五十多个铁甲武士，齐刷刷地站在一起，令人恍若回到了中世纪欧洲战场。有的红卫兵组织还从武汉调运了武斗器械他们把门框玻璃拆了，在门框上钉上大木架子，再弄上两条自行车轮胎做弹弓筋，用网兜装上石头或钢珠瓶，就做成了简陋的“超级大弹弓”。据说,打得准的时候，一弹就能将对方打成重伤人民大学由于是文科院校，学生们的战争发明有限，而有的理工科院校，如北京工学院，还专门去西藏学了如何用皮绳做简易抛石器，最后从“冷兵器时代”进入了“热兵器时代”，发展到制造简易枪炮。清华大学还出现了用拖拉机改装的“土坦克”。每个工事都必备高音喇叭，天天播放“敦促杜聿明投降书”之类毛泽东语录。说累了.红卫兵们就“嗷嗷”叫着冲出来，真刀真枪地干一场。有了伤亡，就各自退回阵地，男小将就地休息，吃饭喝水，女小将们帮着包扎伤口，看管俘虏，继续向对方发动心理战。

1966年到1969年初.人民大学陆续发生了十多起武斗，有三次规模较大的，直接导致死亡。据笔者对六二级人大统计系毕业生陆伟国先生

的采访，第一场大武斗，由“人大三红”攻打红楼（人大单身职工宿舍楼）。另一次大武斗，起因于争夺机械加工厂。当时是黑夜，中文系王锡中不幸身亡。而最大一场大武斗发生在1968年夏天，死人最多，影响也最大。这次是面对面的搏杀战，地点在如今人民大学新图书馆西南操场。双方都打出了气势，短短几分钟，就有二十几个人倒下，三人丧命，财政贸易系的廖金妹、杨达志，同时遇难。而统计系属于“新人大公社”的陈荣祖.被扎了十几个窟窿，当场惨死。[1]据胡贝说，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里，有一段非常写实地描述他们曾亲眼目睹的、发生在图书馆的大武斗，那个身体中矛的人物的原型，很有可能就是陈荣祖：

> 别人经过时，只是问一声：小孩，那边的人在哪里？我就手搭凉棚到处看看，然后说：图书馆那边好像藏了一疙瘩……
>
> 当时打仗的人都穿着蓝色的工作服，头上戴了藤帽，还像摩托车驾驶员一样戴着风镜——这是因为投掷石灰包是一种常用战术……大家都穿标准铠甲：刺杀护具包铁皮，手持锋利长枪。乒乒乓乓响了一阵后，就听一声怪叫，有人被扎穿了。一丈长的矛枪有四五尺扎进了身子，起码有四尺多从身后冒了出来。这说明捅枪的人使了不少劲，也说明甲太不结实。没被扎穿的人怪叫一声，逃到一箭之地以外去了。
>
> 只剩下那个倒霉蛋扔下枪在地上旋转，还有我被困在树上。他就那么一圈圈地转着，嘴里“呃呃"地叫唤，大夏天的，我觉得冷起来了，心里爱莫能助地想着：瞧着吧，已经只会发元音，不会发辅音了。

1陆伟国.《风霜雨雪忆年华》，164页

4

大武斗之后，人民大学的宿舍楼一片断壁残垣，王小波一家只好住进了二龙路大木仓胡同的教育部宿舍。二龙路地区在清朝被称为“二龙坑”，地势低洼，污水排放很成问题。1911年后，填坑建路，但遇到大雨，仍可水面泛舟，直到建国后，经过整修才改变了面貌。二龙路东头的教育部大木仓宿舍，原是清代的郑王府，聚集了北京传统文化理念。它原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府邸民国期间，曾一度被第十七代郑亲王抵押给西什库天主教堂。1925年，它又被租给了中国大学作校址，它浑厚神秘，却又典雅大气，将皇权的威严和古代建筑的精细历史感结合在一起。正殿和东配楼、西配楼尚存，中部有园名“惠园”，玲珑雅致，别有洞天。而沿着中轴线，以“二宫门”（指王府的内门）为分界，当时的教育部职工宿舍被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王小波一家先是住在东边的“红顶楼”，后来又搬到二宫门东北角的几间平房内。王府的后寝殿则被中国大学改为“逸仙堂”，以怀念中山先生，并做集会之地,1995年，原教育部干部子弟组织了同学会.常于此地聚会，王小波也参加过两次。教育部子弟联谊会，也常常会说起王小波。胡贝戏言说,教育部子弟出了两个“大作家”，一个是王小波，一个是汪国真。小波是50后，汪国真是60后。1990年代初，胡贝等人还常看到两个“教育部出身的大作家”一前一后出来买早点。不同的是，王小波异常邋遢，而汪国真衣冠楚楚'王小波曾在散文《北京风情》中怀念大木仓宿舍的独特风情：“那地方是原来的郑王府，在很长时间里保持了王府的旧貌，屋檐下住满了燕子。傍晚时分，燕子在那里表演着令人惊讶的飞行术：它以闪电般的速度俯冲下来，猛地一抬头，收起翅膀.不差毫厘地钻进椽子中间一个小洞里。一二百年前，郑王府里的一位宫女也能看到这种景象……

能见到古人所见，感到古人所感，这种感觉就是历史感。”

但是，1968年，少年王小波并不喜欢那里的氛围。人民大学虽然武斗得厉害，但总有些书卷气，就是疯疯傻傻也有股“青春热血”，可教育部则充斥着机关作风和小市民气息。干部们很庸俗，不关心国家大事，也不读书思考，一天到晚都是混日子，忙自己的私事。由于老是有政治运动，大家彼此之间也很戒备，见了面，也就打声招呼，干巴巴地寒暄一下，就各自缩到小天地里。王小波管这些干部叫“烫面饺子干部”，言下之意是庸俗不堪。经历“文革”初期的大武斗，回到教育部，王小波和一些原二龙路中学的教育部子弟，如胡贝、艾建平、赵和平等，成立了一个十几人的小红卫兵组织——“八一八”战斗队。说起来，这个“八一八”是一个逍遥派，不参加教育部的派系斗争，不欺负人，但也不怕事，院内很多工人的造反组织和其他红卫兵战斗队，也不敢轻易找他们的麻烦。这群小伙伴整日在一起嬉闹，也和别的孩子打群架。据胡贝和艾建平回忆，有一次，他们捉弄了组织里的一个男同学，王小波把他们找过来，郑重其事地说：“不要看不起人，不要欺负人，这样不好！”这让胡贝和艾建平触动很大，小波虽也只是一个孩子，也爱打架、看热闹，但他懂得尊重人、关心人，他们的小红卫兵组织更多是为了自保。这和那些动辄宣读语录，行为暴虐的红卫兵们，有很大差别有的时候，他们也帮着大人们贴大字报，扯扯条幅，跑跑腿，日子倒也过得惬意。教育部有一座灰色办公楼，当时常有巨型条幅从上面垂下来，传达各种运动信息。王小波就趴在办公楼前的一棵大槐树下，态度超然地看着这一幕。在家里晃荡了两年多的王小波，早已厌倦了乱哄哄的生活，想要早点回学校去。可虽然北京市早发布了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上课却迟迟不能恢复。

一天，小波发现教育部食堂的木板上，贴着一张大字报。一位教育部的年轻干部.正站在一群人中间指指点点地说着些什么。小波挤进去，

只见那人一手拿红宝书.一手捂着裆部，模样古怪之极。他正愤怒地向大家喊着口号：

“毛主席教导我们，反动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反动派凤某，不闭门思过，反思自己的反动言行，反而向革命群众发动猖狂进攻，踢伤本人.并致使’龟头血肿’，是可忍，孰不可忍？”

小波愣住了。后来一想，不禁偷偷笑起来，并将这件事告诉了小伙伴们。原来，那位青年干部下身被踢伤了，向上级逐级反映，声称被人打伤致“龟头血肿”他还向围观的群众出示了医院的诊断证明打人的据说是教育部司机班的造反派，大家都很严肃地听着那个干部慷慨激昂的演讲，但王小波却总觉得气氛有些暧昧。[1]“龟头血肿”乃是个人隐私，将个人之隐私堂而皇之地暴露于公众，且以“革命”的名义，这岂非荒唐滑稽？教育部的红卫兵组织，大约成立于1966年6月4日，当时又分为几大派系，如“延安公社”、“五七公社”等、该青年干部就是其中“延安公社”造反组织的成员◦2在小说《似水流年》中.王小波把这件事用在了“龟头血肿”的李先生身上。据王小平的《我的兄弟王小波》介绍，教育部还发生了好几起“滑稽暧昧”的“文革”事件。教育部的革命干部们，甚至利用抓奸羞辱敌对派系,而被抓的一方，竟然将被指女生的检验报告——“兹证明某某某系女性未婚外阴”——贴得满世界都是，以此来辩诬。

柳湿之死，是少年王小波在“文革”经历的最惨痛事件，它以“死亡”

1据2012年12月5日对胡贝的采访
2据2012年10月28日对赵宁的采访

终结了王小波的顽童梦。于是，那些仿佛中世纪武士一般的武斗场景，便不再是少年英雄梦，也不再是超现实主义景观，而是活生生的、狞厉残酷的现实。柳湜是教育部副部长，资历很老的老党员，也是郭沫若的

妻子于立群的妹妹——于立修的丈夫。1921年，他在湖南自修大学补习学校教书，结识了毛泽东和李维汉等老一辈革命家，积极投身革命，多年来一直在文化和教育部门工作，曾担任《人民教育》主编，是一位颇具儒雅气质的老牌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

王小波当时住在大木仓胡同一栋叫“小红楼”的职工家属楼。宿舍区还有红星楼、红顶楼、灰楼等办公楼和宿舍单元楼。在红星楼和灰楼之间，有一条窄窄的过道。1968年4月22日上午，柳淀从三层高的楼顶一跃而下，摔在这条过道里，脑浆迸裂而死，情形极为惨烈（也有•-种说法，柳渥是被人推下来摔死的）。柳渥的罪名是“叛徒”。1958年，他就被康生打成了“右派”、“教育部反党集团的头子”。而直接置他于死地的，还是因为1928年到1934年，柳渥曾被党派往安徽秘书处工作，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六年里，柳渥坚持狱中斗争，并未暴露身份。然而，正是这几年的牢狱之灾，让他多年之后依然受到牵连。死后，人们在他的棉被里发现了一小页纸，写着他留在人间的最后几个字：“政治迫害，毒打取供。我非叛徒，为我伸冤。”柳渥逝世时六十五岁。

“四月是残忍的季节"，1968年4月22日，少年王小波和他的朋友胡贝目睹了这惊人的一幕。当时.王小波和朋友胡贝相约去学校看看。胡贝走在小波前面，在胡贝前面，还有一个买早点的中年妇女。他们经过红星楼的过道时.胡贝突然发现，楼顶之上，蹲着一个满头乱发的中年人。他穿着青色棉布中山装，浑身血迹和污渍，衣服上还有一些被扯破的口子，狼狈不堪。就在此时，胡贝和小波都听到了尖叫声，只见中年人猛地一跃而下，由于求死意志太旺盛，他几乎是头朝下扑了下来他的身体先是担在巷道里某家人搭建的棚子的石棉瓦顶子上，他的腰马上断了,折成了两段，再摔到地上，脑浆迸裂，飞溅得四处都是。

少年们的眼前仿佛“轰”的一声，有无数星星乱飞。不一会儿，已有很多人在围观。由于摔得太狠，折成两段的中年人脸部朝下，被衣服盖住了，好像是一包被血浸泡的什么东西，完全看不出人的样亍。大家都

在议论纷纷，但没有人凑上前。一会儿，当地派出所的公安民警来到现场，进行实地勘察:死者的头已被挤压到了胸腔里。民警小心翼翼地提着头发，把死者的脑袋拎起来，大声问围观的王小波和胡贝，你们认认，这到底是什么人？柳淀！两个少年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尽管，这是一张扭曲的脸，眼眶都已被摔空了.一只眼球还挂在眼边’柳渥对王小波一家“有恩”。王方名在教育部犯了错误，当时有的领导想把他发配新鐳.还是柳混说了好话，王方名才留了下来。后来，王小波在小说《似水流年》中写到了这一幕，基本是按事实来描述的，柳渥就是小说中“贺先生”的原型：

贺先生从楼上跳下时，许由正好从楼下经过。贺先生还和许由说了几句话。所以他不是一下子就跳下来的。后来我盘问了许由不下十次，问贺先生说了什么，怎么说的等等。许由这笨蛋只记得贺先生说了："小孩，走开！”

“然后呢？"

“然后就是砰的一下，好像摔了个西瓜！”

1据2012年12月5口对胡贝的采访。

贺先生死后好久，他坠楼的地方还留下了一摊摊的污迹。原来人脑中有大量的油脂贺先生是个算无遗策的人（我和他下过棋，对此深有体会），他一定料到了死后会出这样的事。一个人宁可叫自己思想的器官混入别人鞋底的微尘，这种气魄实出我想象之外。

王小波的描述非常沉痛。王小波对“柳渥之死”的感触是，一个有思

想的高级红色知识分子，竟能如此决绝地“将脑浆混入别人鞋底的微尘”，其间的痛苦与绝望，令人动容。这不仅是渴望通过死亡解脱肉体的痛苦，更是渴望以死亡解脱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理想幻灭。

过了很久.家属才赶过来。一家人围着柳混的尸体痛哭起来。公安开始验尸，洒消毒水，又将柳渥洒在地上的脑浆，用白石灰画了圈。晚上的时候，尸体被拉走了，只有柳渥的儿子柳建（后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并留校教书），在地上点着一排蜡烛，蹲在一旁.为父亲守灵。他的脸因极大的痛苦变得平静.据说他下午在家里将一把锋利的“军人魂”军刀磨得雪亮，要去找造反派红卫兵算账，后来被家人劝住了。王小波在小说中是这样描述的：

只见地上星星点点，点了几十支蜡烛。蜡烛光摇摇晃晃，照着几十个粉笔圈，粉笔圈里是那些脑子，也摇摇晃晃的，好像要跑出来。在烛光一侧，蹲着一个巨大的身影，这整个场面好像是有人在行巫术，要把贺先生救活，后来别人说王二胆子大，都是二三十岁以后的事“十七岁时胆力未坚，遭这一吓，差点转身就跑。

我之所以没有跑掉，是因为听见有人说：小同学，你要过路吗？过来吧。小心一点，别踩了。我仔细一看，蜡烛光摇晃，是风吹的；对面的人影大，是烛光从底下照的。粉笔圈是白天警察照相时画的。贺先生的脑子一点也没动。

柳渥的悲剧，代表了旧时代革命理想主义的破灭。在这些旧时代的革命理想主义者看来.“建国”就是最大的革命理想，而建国之后的社会发展.应按照建国前的蓝图来实现。但对“继续革命”者来说，“建国”不过是第一步，更激进的革命在于建立一个全国化，甚至全球化的“红色革命世

界”——“地上的天国”。那些旧式知识分子的迂腐、人情味、来自旧社会的生活习惯和惯性思维，都在“疾风暴雨”的扫荡之列、据资料披露，1950年代中后期，柳渥与冯友兰曾因“为学术而学术”的观点，有过几次争论。1950年8月，哲学家冯友兰发表《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育思想进展的体会》，随即受到时任教育部师范司司长、《人民教育》总编的柳渥的批评。柳渥的矛头直指冯文所说的“为学术而学术”。冯友兰将近现代中国教育归纳成“为作官”、“为学术而学术”和“为人民服务”三个阶段，“为人民服务”是最高音部。然而，冯友兰却对“为学术而学术”有非常浪漫的阐释：“主张为学术而学术的人，以为研究学术需要一种无所为而为的精神。他们认为研究学术是社会上最清高的事业。他们的理想人物.是一个人，照着他的性之所近，或兴趣之所在，研究他所喜欢研究的东西。他好像是古代的高人隐士。不过他不隐于山林，而隐于实验室或图书室。”[1]柳渥之所以对此提出批评.并不止于一句话或一种学风，他要剥夺的

1冯友兰，《对于中国近五十年教苜思想进展的体会》，《人民教育》.I卷4期（1950）

是“资产阶级学者”、被国家高教委批示要“好好反省反动言行”的冯友兰对中国现代历史的占有权和解释权。他反感冯对左翼知识分子、革命学生和革命者的忽视。'但历史的黑色幽默在于，仅过了十几年，“革命者”与“被改造者”的身份，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柳渥被打成“右派”，并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而“反动学术权威”冯友兰却参加了“梁效”2写作组，成为红得发紫的“红色学者”。

考察王小波的“文革叙事”，我们会发现，王小波与新时期文学有某种承继关系：对“文革”的批判，是伤痕和反思文学的重要主题。然而，这种反思并没有进入更深层次，而仅停留在对“文革”进行“政治上的断裂"o1980年代后期，《古船》等一批力作将这种批判引入了更广阔的历史层面。进入1990年代，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强制性的断裂再次

出现，规避了1980年代启蒙主题，虽反思了激进主义弊端，但对于理性与自由的精神、个体的人的尊严的表述，其实一直都是尚未完成的任务。王小波恰在这个层面上继承了1980年代启蒙主题。柳混之死，在王小波笔下，既是悲剧化的.又是喜剧化的，他以儿童的目光去观察“文革”的死亡狂•欢.乂以肆意的性意味，解构了悲苦和沉重（例如，《似水流年》中，王小波甚至写了贺先生死亡后尸检的性器官）。

1尤小立.《冯友兰、柳渥关于“为学术而学术”的论争》.《南方都市报》.2011年12月18日。

2“梁效”写作组，是“文革”期间的“御用”写作班子.成立T-1973年，主要成员有范达人，汤一介等.顾问有冯友兰等，很多极左的批判文章，都出自这个写作组。这些文章以“梁效”为笔名°“梁效”即为“两校”的谐音，指的是北大与清华。

第四章插队云南-热风瘴雾里的“野牛”

我十七岁到南方去插队。旱季里，那儿的天空是蓝湛湛的，站在小竹楼里往四下看，四外的竹林翠绿而又苗条。天上的云彩又洁白又丰腴，缓缓地浮过，我觉得应该去试一试。

——王小波《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

1

1968年秋，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两年多，疯狂过后，不但不见收场，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而国际形势也是波诡云滴。珍宝岛冲突甚至直接导致中苏边境对峙，而美国也深陷越战泥潭，欧洲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致使戴高乐下台，并引发了法国知识分子的“六月革命”。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后，北京各学校的学生虽回到了课堂，但师道尊严丧尽，学生们也都非常调皮，谁也不愿意好好听课然而,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1967年底的一个事件改变了那个时代北京青年的命运，也改变了王小波的命运

1967年11月27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北京东城区中学红代会的红卫兵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下了立志下乡的誓言。总理休息时，他们把志愿书呈了上去，并声称:“我们要求到云南边疆去！”当周询问他们情况时，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我们是首都中学红卫兵，为建设边疆，发展祖国，自愿要求去云南当农垦战士！”周恩来很高兴，立刻做了批示。

1968年2月8日，来自北京二十多所中学的红卫兵.共五十五人，开赴云南.并于2月21日到达西双版纳东风农场。3月20日，首都红卫兵机关报《红卫兵报》以《西双版纳来信了》为题报道了他们的消息，并向北京红卫兵发出倡议信o1968年12月，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毛主席发表“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号召。北京市委下令，全市老三届学生1969年春节前必须到陕北、山西、内蒙山区插队或到东北、云南等地的建设兵团去。自此，大规模北京知青开赴云南的运动开始了。从1968年开始.先后有八千三百七十二名北京知青来到云南农场，其中西双版纳一师有四千一百五十三人，

德宏三师有一千四百七十二人，红河四师有一千二百五十二人，勧海水利团有一千四百九十五人。'

教育部红卫兵赴云南的行动稍晚，大约在1968年底到1969年初:1969年3月，云南农垦局负责招募知识青年的负责人，在教育部礼堂做了一场报告，那个负责人口才非常好，他描绘的“魅力云南”、“彩云之南”的美好景象，深深吸引了那些涉世未深的孩子们。谈到当年听报告的场景，艾建平半是苦涩半是玩笑地说：“那真是天花乱坠，唾沫星子乱飞，说是到了云南，头顶菠萝，脚踏甘蔗，摔一跤伸手就是一大把拇指粗的花生.还有美丽的少数民族风情！大家听得如痴如

1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知识肖年上山卜,乡运动》，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160页。

狂。”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历史功过毁誉参半，但说到宣传手法.除了革命的庄严神圣许诺，还有丰富的物质刺激幻想，这和中世纪煽动人们参加十字军东征的传教士们，倒有异曲同工之妙

听完报告，很多二龙路中学的孩子都要求去云南，王小波也是态度坚决的一位。然而.大人们是知道利害的,一天吃晚饭时，小波轻轻地说：“和大家说个事儿，我想去云南L

一语出口，大家都沉默了。宋华的手微微有些颤抖，王方名则目光严肃c许久，王方名才缓缓问道：“你要求进步，这是好事情，我们不阻拦，但你一定要想清楚，此去云南，迁了户口，想要再回京，可不容易了。”

“到哪里不是干革命宋华小心翼翼地说，“小波能不能和我一起去干校？”

王小波咬着嘴唇，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当时按照政策，父母一

方在干校，可带一个孩子去干校。但是，王小波还是要求去云南。大家甚至猜测，王小波是为“某个女孩子”才下此决心的。因为那时一起商量去云南的，还有好几个教育部的女孩。但是，王小波后来的行动表明，似乎这也只是猜测，当时在郊区插队的大姐王小芹，曾因此请假回去，劝他三思而后行，但小波去意已决，甚至写下了“青山处处埋忠骨”的悲壮诗句.可见其决心之坚定。'而王小平则认为，小波天生有英雄主义浪漫情结：“对于小波的浪漫情绪，我觉得很能理解，这好像是一种纯粹精神的追求，一种灵魂深处的奇妙涌动。这各种浪漫激情包含着极其美丽的幻想成分.为一代青年人所共享。它首先表现为一种道德上的洁癖……其次是一种视前人为粪土的高傲态

1王小芹.《吾弟小波一王小芹致李银河信》.《浪漫骑上》.117页.

度和对于未来的万丈雄心……”'人在少年之时，总有一些虚无缥缈、却美丽珍贵的理想.闯荡世界"也是其中之一。赵和平则认为.当时小波和他们一样，都不想在父母身边呆着，觉得没出息，都想着出去闯荡一下。

忙碌紧张的准备之后，二龙路中学“老初一”的几个同学，共同商定，争取分在一起下乡.也好有个照应。最后，和王小波一起到达云南德宏陇川农场弄巴分场的学生共有八个，三男五女，分别是赵红旗、赵和平、艾建平、沈芬、那佳、朱萍华、岳薇和艾建英。其中.艾建英是艾建平的姐姐.赵红旗是赵和平的哥哥。赵红旗到达弄巴农场不久，就被借调到了勐海水利团：和他们一起去云南的教育部子弟还有很多，比如，在瑞丽的赵东江和肖林。

2

1969年5月15日，这是王小波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后来，在每次的教育部知青联谊会上，大家都要念叨一下这个日子。人的一生总有几个“关键日”。这个日子，对那些云南知青而言，不仅意味着曾有过的理想主义，也意味着青春

早上，天刚蒙蒙亮，这些充满激动和好奇心的少男少女就出现在了北京火车站。他们有的激情昂扬，有的平静如水，有的则显得心事重重。但大家都还勉强欢笑着，在锣鼓喧天的欢送乐曲中，一路向前.随身的很多大木箱子，装着各种物品。这些稚气未脱的小红卫兵们慢慢走上火车，他们中的大多数可能不会想到，他们将在艰苦的环境中接受磨难，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要等到1978年知青大返城后，才

1壬小平，《我的兄弟王小波》，146页。

能回到北京，而某些人甚至就此和北京永远分离了！

汽笛声猛地响起，好似突如其来的惨烈告别，小红卫兵们和他们的送行者都愣了一下子，时间仿佛凝固了。喧闹的锣鼓和雄壮的革命歌曲不见了，天地也仿佛停下来，悲悯地看着这群即将生离死别的人们。“哇”的一声，有人哭了出来，接着，就是哭声一片，特别是女孩子们，一些女性家长甚至哭昏了过去。“哀莫哀兮生别离”，多年之后，作家阿城在小说《棋王》中，还曾追忆过类似场景。王小波当时没哭他只是目光忧郁地望着泪眼婆娑的亲人们.想要说些什么，却欲言又止。同去的赵和平和艾建平也没哭，只不过沮丧之情也溢于言表，王小波半开玩笑地开解说：“怎么着，建平，你也伤感啦？”

“谁难受了？”艾建平挺了挺胸脯，揉了揉发红的眼，“我就是不愿看

这样的场面。”

王小波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就别撑着了，不过，人就像一滴滴在桌布上的墨水，到了哪里都可以向四周慢慢扩散，也不用太难过c”

很快，这些孩子们，就摆脱了沉闷的氛围，沉浸在第一次出远门的新奇中，下棋、打扑克、唱歌、聊天，不亦乐乎。但时间一长，漫长的旅途，让大家变得疲惫不堪，北京始发的火车到湖南就转道入广西，他们经桂林换乘汽车到达昆明。此后一千多公里行程.他们大部分走在滇缅公路上.需穿过中国最坚硬的山区，跨越中国最湍急的河流，翻越高黎贡山，跨过澜沧江，过大理，经保山，由潞西向西一百五十公里，陇川方在眼前。

北京知青们先到云南楚雄集中，经过一次分流，剩下的人到达保山，暂住保山师范学院，将分陇川、盈江和瑞丽三个方向.进行再次分流。然而，就在保山，凡个在京就结下仇的知青，相互看着不顺眼，打起了群架，甚至动了刀子，一个知青被扎伤了。所有知青都停下来整顿，又分流了一批人。到保山时，他们还有九百人左右，经过分流后，人减少许多。最后，从保山再到陇川，到达弄巴农场后，经过简单训话，王小波们还需再走大半天尘土飞扬的土路，转乘牛车才能到达十四队，这时，北京知青只有二十余人了。'路上，王小波度过了他十七岁的生日。可以说，这是王小波的十七岁“第一次出门远行”。

经历十一天，长途跋涉，一个炎热的下午，二十二名北京知青最后到达弄巴农场景罕十四队，也就是后来的云南建设兵团三师十团三营二连（弄巴农场所属的陇川农场，原来都是安置转业军人的农场，但大规模知青支边之后，大约1970年前后，改成了兵团建制）。全连一百二十多人，管着附近一千多亩水田，各地知青来之前，大约有三十多个老职工，大部分是各地的转业军人，也有本地工人，成分比较复杂。北京、四川、上海等地的知青来到后，农场才变得热闹起来。王小波他们

乘坐的是一辆大卡车，只把知青拉到山上的十五队，再由对面山下十四队副队长田家应，也就是队长王永贵的爱人带人上山去接。知青们的箱箱柜柜,用牛车拉了两三趟。王小波的行装是一个大木箱，全是换洗衣服和被褥一

刚到农场，大家看什么都新鲜，云南的天是那么蓝.大朵的油菜花盛开在田野，有的知青忍不住要唱起歌。然而，农场革委会主任的训话，让这些对神秘云南充满好奇心的知青娃们，心情一下变得沉重了起来。那位农场领导表情严肃，劈头盖脸地来了一个下马威：“你们这些知青，来到这里，没有一个不是家里有问题的！你们要认真劳动，不许偷懒，扎根边疆，争取早日成为毛主席的合格的战士！”大

1据2012年11月5日对艾建平及2012年10月29日对赵和平的采访。

家预计的热烈欢迎场面并没有出现。这些教训像一盆凉水.浇得知青们有些迷惘[1]

当天晚上，大家都暂住在了队上的粮仓，一堵矮墙将男女生隔开。晚上躺在蚊帐里，看着一只只大耗子在屋顶嗖嗖窜来窜去，男生瞅着新鲜.女生则吓得尖叫。还有内地见不到的大蜘蛛，个头都大得吓人，必须用鞋底猛打，才能杀死。艾建平幽默地说.云南也真奇怪，凡是动物和植物，都长得高大，只有人乂瘦又黑乂矮。不一会儿，疲累的男孩子们就鼾声如雷，女生们想起了万里之外的北京，有人不禁嘤嘤地哭起来，男生们愤怒地敲了敲墙.哭声才止住了。两个月后，队里把知青住的平房修好了,安排四人住一间，王小波和赵红旗、赵和平兄弟，还有杨树龙是同屋。

3

接着，就是每天千篇一律的劳动。王小波到达弄巴农场时，正赶上农场插秧每个知青每天的工作量是三分地左右。一般人插秧苗，都是弯着腰，支着身子，左手拿秧苗，右手三根手指先要从左手分出一撮秧苗.然后捏住秧苗，把它栽入泥里：王小波个子大.弯着腰，显得很吃力。他的手也大，像小蒲扇似的，因为不太灵敏.只能用大拇指和食指夹住秧苗，向地里德每次搀一下，水田都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当地的人就笑：“野牛栽秧厉害呀，像蛤蟆放屁。”王小波不仅插秧不行，割稻也做得不太好，个子太高.动作不协调。但他打谷子做得好，一百二十多斤的大麻袋，一个人能从及膝的水田里掂出来那时大家都想好好表现，争取进步，因此小波和同学们抢着插

1据2012年10月29日对赵和平的采访

秧，特别是艾建平，建平个子矮，但身手灵活，干活利索，小波把他当成竞争对手。小波弯腰时比较费力，但也有优势，他的胳膊长，手里拿着秧苗，一下子可以插好多行。很多年后，弄巴农场的职工们还记得王小波插秧的样子，张牙舞爪，像半截黑柱子戳在田里，又像超级大黑蜘蛛。

然而，农场职工们并不叫王小波“大蜘蛛”，而是叫他“野牛”。王小波在初中时期就有这个外号，当时叫“大野牛”，王晨光则被称为“小野牛”。兄弟俩是公认的教育部子弟中的两个“大高个儿”。在弄巴农场，当地人对“野牛”这个外号也颇认同。云南多牛，野牛是公认的厉害角色，而王小波一米八五的身高，在云南也比较罕见。野牛不太爱说话，走起路来松松垮垮、歪歪斜斜的，经常是一头乱发，沉默寡言，遢里遍遢。

野牛同志的一大特色正是邂逼。王小波在弄巴农场的遡遢.还真是不一般，颇有古代圣人颜回的风范，又似印度苦修教派的污衣教徒匚小波

的避遢在二龙路中学就很有名，沈芬对王小波的印象是“总是一根裤腿长、一根裤腿短，走起路来吊着膀子、弓着腰，一晃一晃的”，“乱匕八糟的头发从来不梳，白色的背心穿成黄色的，然后再穿成黑色的”。而在云南，王小波的衣服，常是一身干净的穿脏了，也不洗，就挂在屋外面，这样一件件积累下去，等没有新的了，再从挂在外面的脏衣服中找一身看着较干净的穿上。五六件衣服，总要穿上好几轮，直到它们全都变得面目全非。农场上下都对王小波的遗遢之风目瞪口呆，小波安之若素，依然穿着脏衣服看书、吃饭，不管别人的目光。后来，还是一个队上的大嫂段炳芹实在看不下去了，主动提出帮助野牛洗衣服。野牛的床也颇像“牛棚”，从不见收拾过，如果你胆敢把手伸到野牛的被褥，总能发现扳手、钳子、螺丝刀这类小工具。野牛热爱修理事业，但小小的农场.实在没什么让他修的东西，而且野牛的手艺，的确不像他炫耀的那样精湛，常把好东西修坏.再修好，再拆卸，再弄坏，野牛就在这样的修理循环中得到乐趣.全不顾东西所有者“如丧考妣”的惨状.只为满足自己的修理癖，所以.野牛就常把工具放在被窝里，

除此之外，王小波的性情也颇像野牛.就是打架够狠。王小波很少主动挑战别人，也不欺负人：但他为人义气，只要看到有人受欺负，特别是北京知青，总是义无返顾地冲上去，无论能否胜利，都是一样地骁勇善战。他那沉默的表情、高大的个子，还真能唬人，对身材矮小的云南本土知青、四川知青，特别有震慑力。为了防止被打，野牛和赵红旗都弄了一把阿昌族的“户撒刀”。那是一种水牛角把的、匕首类的小刀，带在身上非常神气C小说《黄金时代》曾写到王二带着户撒刀和一把从公社买的猎枪，领着陈清扬逃到了山里，过起了性爱乌托邦的生活。据赵红旗回忆，当时公社供销社，的确可以买到上海的猎枪，但猎枪不是什么人都能买的，必须要介绍信，倒是他们生产队长有一把猎枪，队上还有两把土枪和一些制式步枪。小波曾玩过气枪，他常拿它装上豆子，在

仓库里打老鼠。

王小波讲义气，很多人愿意和他交往C当时.在弄巴的北京知青也分两帮，一群是二龙路中学过来的教育部子弟，另一帮是太平桥中学的普通市民子弟。两帮人时分时合。艾建平说，唯有王小波和太平桥中学的学生能说上话.不为别的，就因为太平桥帮那边有个家伙也很幽默，爱侃故事，小波觉得那人有意思，就跟他慢慢搭上了话。小波和两帮人关系都不错，大家都愿听他的

赵东江至今对王小波的友谊念念不忘。刚分到瑞丽卡朗农场.他的小腿就被蚊子叮咬感染了。这是一种常见的地方病，知青们因为水土不服，格外难以忍受。王小波得知消息，一定要去看望赵东江。从弄巴到瑞丽，要翻越一座山，还要走上一些路，总有七十多里地。但在家里早就练出一副飞毛腿的王小波并没把困难放在眼里。9点吹了熄灯号，王小波悄悄地对赵和平说，我要去看看东江。大家都困得不行了，就没在意，和平迷迷糊糊答应一声就睡过去了。凌晨3点，王小波拿上一条武装带——当时红卫兵们最流行的武器，打着手电筒就上了路。傍晚时分，疲惫不堪的小波才到达卡朗农场知青点，正在忍受病痛折磨的赵东江，看着一个黑壮的身影，从渐起的雾气中钻出来，迎面朝他的屋子走来，正在疑惑，就听见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说:“东江，来看你了，我是小波。”

赵东江喜出望外，赶紧把小波叫进屋子。小波低下头，看看赵东江的腿，也没什么安慰的话，只是说：“云南的蚊子也欺生呀。”

赵东江咧了咧嘴，说:“小波，谢谢你，腿上用了药，不久就会好啦。你不用担心。”

小波笑着说：“我不光看你，在路上我还打了一头野猪，可惜个头太大了，要不就扛回来给你补补身子。”

赵东江只当小波开玩笑，也不说话，只是笑着，眼睛却有些湿润

了。小波又端详了一会儿东江的小腿，仿佛要研究那些小脓包的数量。一会儿，困意上来了，倒头就睡。第二天天亮，他又告别赵东江，走一天山路回到弄巴。

4

弄巴农场接近缅甸，处于北回归线附近，基本属于南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没有常见的芭蕉和橡胶树林，却有很多水田。一年除了旱季就是雨季，雨季高温潮湿，旱季干燥偏冷，没有四季之分。弄巴附近是水流湍急的陇川江，远一点，还有一条南宛河。知青们到了农场，很多人都因水土不服生病，有的被蚊子叮咬得了疟疾，有的则莫名其妙地得了烂腿病，腿上都是小坑，一撼下去就流脓。农场的伙食也很“枯燥”。前几年一些记者在采访报道中说，王小波队里的伙食不错，有白菜萝卜，一两周还能杀一头猪吃。每个知青每月能分配到三两花生油、三十八斤大米（七十六张饭票）o其实这不是很准确、据赵和平、艾建平回忆，他们在弄巴农场，米饭倒是有的，不像云南山区和当地少数民族住在一起的知青，连粮食也吃不上。然而，菜却很少，产量也低.既有气候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因素。王小波他们最常吃的，是盐水泡饭，好的伙食就是红糖水泡饭。泡饭吃多了，就会感觉自己是一团发起来的东西，一走动胃就翻腾，人也轻飘飘的。韭菜就是不错的菜了，王小波在杂文中，回忆过自己在韭菜中吃出卫生纸的故事。肉则很难见到，平均一个月也杀不上一头猪。最好的伙食,属红糖包子.但要走几十里路，到公社开的食堂去买。红糖包子也不是天天都有，要买的话，必须早早赶过去排队。卖包子的是一位“风韵犹存”的大嫂，她的丈夫是原景颇族的生产队长，因为生活作风不好，“搞破鞋”，被撤了职务，也搬到弄巴农场居住，和王小波他们正好住对门。这位大嫂人长得秀丽，说话声音也好听，很多知青去买包子，有的为解馋，有的也是为一睹大嫂的芳容。

其实，当地少数民族的饭食，品种也颇多样，但在革命年代，生产不仅没有发展，反而有下滑趋势，吃的东西常常青黄不接。王小波他们曾断过两次粮食，没办法只有吃粗粮饲料。当地景颇族有一句俗语:“绿

的就是菜，动的就是肉。”山上水果很多，有菠萝、甘蔗、槟榔、鼻涕果、枇杷果、老缅桃，还有号称“水果之王”的牛肚子果，又酸又涩但又解渴乂解乏。《黄金时代》里，知青王二就是拿枇杷果贿赂了司务长，才跑出去找陈清扬.

闲暇的时候，知青们常出去参加傣族或景颇族的“赶街”，类似我们的赶集。刚开始时，大家看什么都觉得新奇，对景颇族和傣族人嚼槟榔的样子大惊小怪——槟榔嚼在嘴里，鲜红一片，知道的觉得“好似祖国江山”，不知道的还以为口吐鲜血。知青们买水果，当地人知道他们有钱，要的价钱比较高，知青知道了内幕，往往丢下钱，拿着东西就走，有心眼坏的，丢下一点钱就跑了。而老乡们抓知青，喊的口号也很有意思：“不好啦，思想啦！”大概当地农民，看到政府经常开会，“批斗思想”，就把“思想”当成是很不好的东西，吓唬人的“物件”。

不少女知青还自告奋勇，尝试穿筒裙。正确的说法应是“筒裾”，阿昌语为“姆支”。该服装收紧腹部贴身紧裹，裙子呈筒状下垂，更能显出妇女的窈窕身段。阿昌族的抠花筒裙，有“阿波花”、“细脚花”、“叉子花”、“香炉花”、“梨翁花”、“节子花”等花纹图案。《黄金时代》里，陈清扬就喜欢穿筒裙，“筒裙就像个布筒子，下口只有一尺宽。会穿的人在里面可以干各种事，包括在大街上撒尿，不用蹲下来”；而王二扛着陈清扬，打了陈清扬的筒裙一巴掌，让陈清扬“差一点”爱上了王二。

景颇族做饭，也有炸、腌、煮、烤、剁等诸多讲究，而景颇族的干豆豉、鬼鸡、竹筒煮活鱼、炸沙虫，都是不错的小吃。但当地人不吃蛇，认为蛇是不洁净之物，吃了会生病。知青来了后，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习俗，他们也开始尝试蛇肉。王小波没少出去捕蛇，都是没毒的菜花蛇。小波和赵和平等几个朋友，犁地的时候，常翻出地里的蛇。有的时候,他们下工后，一起悄悄来到小溪旁的丛林,也能找到蛇,,打死蛇后，剥了皮，洗干净了，再悄悄拿回来，用瓦罐饷着吃。大家有的贡献盐

巴，有的拿出较珍贵的酱油膏，一般都是家里寄的，油则是分肉时用肥肉炼的。不一会儿，瓦罐就“咕嘟咕嘟”地冒出诱人肉香，惹得一屋人都流口水，屋外都能听到肚子“咕咕”叫的声音。小波还精通“扉鱼”，这在小说《黄金时代》中也有描写。“庶鱼”是利用小溪水位的高低，在上游打泥坝，然后缓缓地将水放干，鱼就自然落入了绑在两根木棍中间的小网里。

日子很枯燥。很快，王小波和同伴们就厌倦了插秧。按当时工作安排.早上七点半，队长敲着铁片，喊大家开工，中午十一点半结束。下午两点半再开始，一直到六点半太阳下山。对于一个大个子来说，在田里弯腰干上八个小时农活实在吃不消野牛同志先后送过秧苗，养过猪，后来,因为生病，还被队上委派协助做饭。他在杂文中记录了协助司务长做“忆苦饭”的经历：

> 说实在的，把饭弄好吃的本领他没有，弄难吃的本领却是有的，再教教就更坏了。就说芭蕉树心吧，本该剥出中间白色细细一段，但他叫我砍了一棵芭蕉树来，斩碎了整个煮进了锅里。那锅水马上变得黄里透绿，冒起泡来，像锅肥皂水，散发着令人恶心的苦味……（《体验生活》）

十四队老司务长吕平科负责全队伙食.忆苦饭是他做的，总共没有两次，都是用芭蕉树的根和叶，加上南瓜藤、红薯藤，辅以米糠，投到一口大行军锅里。大家在会场一字排开,一边煮一边虔诚地合唱：“天上布满星，地上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那忆苦饭，又麻又涩.拉得喉咙生疼.大家吃了以后，都感觉不消化,大半夜一起跑出来.在大月亮地里拉野屎，也算是奇观了。

虽然王小波不是一个好厨师，却是一个好饲养员，对牲畜颇有同情心。他曾喂过一只猪，后来被记入了散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那是一只精瘦的肉猪，聪明强悍，会模仿各种声音，从不安于圈中，它最后在人们的围追堵截中跑掉，成了一只“自由派”野猪。王小波写道：“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据艾建平等人回忆，队里的确有一头凶悍的家猪，但没王小波写得那么夸张。

5

理想主义逐渐褪色，生活流露出它的残忍无情。王小波的“惫懒相”也露出了苗头。当年没有双休日，连周日都没有，农忙时节，半个月才休息一天。但野牛同志三天两头闹病，不是头痛感冒，就是腰疼，算下来一个月也能休息七八天。闲暇的时候，他就躺在屋里看书。14队老队长冯有建，每次见到野牛不干活，就大声吼叫：“鸡巴！你干吗不下地干活，又想偷懒！”遇到这样以势压人的领导，小波干脆不理，而当时管他们生产小组的王文杨则较会做思想工作，常对小波问寒问暖。这样一来，小波反而不好意思了，主动要求干活儿。除了物质生活贫乏，精神生活也单调，报纸永远只能看到三天前的，写封信在路上也要走很长时间°但大家对王小波讲故事的天赋有了新认识。王小波和生人没什么话，只要熟悉了，他才放胆子说，常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农场职工们休息的时候，最喜欢听野牛讲故事。无论《三国》，还是《水浒》，他都讲得绘声绘色，听众们也都听得津津有味。王小波最擅长讲《一千零一夜》和《十日谈》的故事。《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可以给老乡们讲着玩，云南的老乡们，听着几万里之遥的阿拉伯神灯的故事，居然也有很多共鸣。但《十日谈》就不相宜了，小波只在晚上熄灯后，给宿舍的人讲，大家听到“荤段子”时，总发出阵阵怪笑。

插秧、犁地、放牛、养猪都是工作的主要内容。而下棋、看电影、抽烟、打扑克、打篮球、游泳.则是知青们的业余活动。王小波曾在杂文《思维的乐趣》中半开玩笑地说，他一生一大半的棋都是在知青时代下的,但他却从一个不错的业余选手下成了“臭棋篓子”。这里，他说的是，当时知青生活贫乏，下棋作为消遣，最后简直变成了打发时间。阿城的小说《棋王》也写知青下棋，但他笔下的下棋既是传统老庄文化的寄

托，也是知青生活的“精神转喻”。这个转喻的合法性被王小波消解了。王小波拒绝赋予知青生活任何正面意义——除了反抗的意义。看电影也是当时不多的娱乐之一。旱季的时候,每隔半个月.电影放映队就来农场放电影。是时，建国以来的大部分电影都成了毒草，能放的只有“三战一哈”等少数几部电影，即《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和西哈努克亲王的宣传片,还有就是黑白《新闻简报》。王小波负责接送放映员，一来二去也就混熟了，几部片子大家颠三倒四地看，虽然厌烦，但聊胜于无。小波游泳水平也很高，他身材瘦长，在云南的小河，一个猛子扎下来，能潜出去很远。而说到抽烟，当时每个知青每月发二十四元，其中有两元边疆补助，这让很多老职工们很羡慕，因为他们也就挣这么多钱。而知青们没有家室拖累，花钱也更大方，当地物产贫瘠.有钱也买不到东西。除了吃饭，知青们很多钱都用在了买烟上，王小波的烟瘾，就是那时养成的。青春年少，大家好胜心强，抽烟也是比着抽，结果上半个月还能抽得起两毛一包的春城和金沙江，到了下半月，就只能抽八分一包的钢花了。小波个头大,嘴巴也大，嘴里常是一排摆开十支烟，一起点起来抽，加上手舞足蹈，乍一看，颇像一个印第安老酋长叼着大麻叶，在煞有其事地做祭祀。

当然，王小波最喜欢的还是看书。王小波不仅吃饭的时候看书，睡觉前看书，下工回来，脚也不洗往床上一坐，拿被子往身上一披，就开始看书。干了一天农活儿，回到宿舍，精力旺盛的孩子们，还要打扑克、下象棋。但是，过了十二点，大家都睡着了，小波也要看一会儿书，有时还做几道几何题。舍友都觉得点灯太亮，影响睡眼，他就偷偷地走出来。弄巴农场处于海拔两千四百米的北回归线，月亮像一个大银盆，把四下照得通亮，王小波就坐在宿舍前的石头上看书，看着看着就入了迷，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直到后半夜或凌晨，天空渐渐升起浓浓白雾，月亮退去，他才会回去。赵和平兄弟俩来云南的时候，带了几本

古希腊的历史书，小波曾反复研读，而他自己带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奥维德的《变形记》则看了无数遍，《变形记》先是被看成了海带形状，后来生生地被看没了。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里提到过没书读的痛苦，有时竟连《赤脚医生手册》都翻得稀烂。1970年代初的弄巳农场，不仅闭塞，且缺少书籍，对于知识的渴望，让王小波非常苦恼。军代表连知青看书都管着："假如我们看书被他们看到了，就是一场灾难，甚至'著迅鲁'的书也不成。"（《思维的乐趣》）

"斗破鞋"是"文革"时期流行的一种"半风俗性质"的政治行为，也是老百姓和知青的一项娱乐活动。"破鞋"一同据说源于北京八大胡同。那些没有字号的窑姐，在大门外，挂上一只绣花鞋，作为幌子。日久天长，风吹日晒，绣花鞋就成了"破鞋"。"破鞋"于是成为"不正常男女关系"的代称。"文革"期间，人人忙于搞政治这种苦闷危险的事情，但也有人放弃搞政治而专搞男女关系，人们喜欢把搞男女关系的人抓起来，游街，斗争，勒令交代细节，以填满精神生活的空虚无聊。对"破鞋"们的羞辱除了戴髙帽，挂破鞋,敲铜锣.搞批斗.繁重的体力劳动也必不可少，谢晋导演的电影《芙蓉镇》中，刘晓庆扮演的胡玉音就有一段"挂破鞋"经历。云南乡野的"斗破鞋"活动，反映了乡村民俗和政治斗争的结合，如果按弗洛伊德的说法，也带有"性羞辱"的窥视意味。王小波身边的女知青中并没有"破鞋"，据艾建平、赵和平等人回忆，弄巴农场曾在农闲时，组织过一两次"斗破鞋"活动,有时政治运动来了，"破鞋"们也跟着陪斗，都是当地农村妇女。王小波的小说《黄金时代》中的"破鞋理论"，其灵感大概源于此匚

当时，随着年龄增长，情窦初开的知青男女们，也开始有了一些微妙变化。刚来弄巴农场时.北京知青的男女之间是不说话的一慢慢地，先是太平桥中学的男生和女生开始搭腔，后来，二龙路中学的学生，也开始男女交流。可惜的是，十四队的二龙路和太平桥中学内部，都没有谈

成对象的。反而是其他地方的知青.有不少谈成的。王小波虽然通遢，人有几分放荡不羁.但却吸引了一些女生的注意。据很多当事人回忆，那佳对王小波颇有好感'那佳是一个高挑秀丽的姑娘，她对王小波特立独行的派头，有几分欣赏。那佳从北京探亲回来后，带来很多北京挂面，这虽是不值钱的东西.但在当地却还是稀罕物件。那佳给二龙路中学来的知青每人分了一点挂面.那些馋嘴的男孩子很快就吃完了。每次，大家都撺掇着王小波去向那佳要挂面——别人还真没那么大面子。农场老职工私下爱给知青“配对”，大致按照外表和性格议论哪两个人比较合适，他们总爱把那佳和小波配到一起。但这段可能出现的情感却没结果。那佳认为，小波心高气傲，肯定是想找有思想、能和他精神上交流的人，用小波的话说就是,他抛出一个球,对方得能接得住。曾有寻访者追索《黄金时代》里陈清扬的原型。据他们查访，十四队太平桥中学女知青韩玉林.长得苗条白皙，比王小波大一点，符合陈清扬的外形，只是和王小波没有交往，也没做过医生.更没因作风问题被批斗过。而据赵和平回忆，陈清扬和王二的原型，应另有其人：他们都是北京知青，因生活作风问题，两人从山上十五队，被“发配”到十四队看守水泵房。当时也没人来批斗他们。但那女人的确长得漂亮，而男人则比较彪悍，符合王二的形象。'他们到十四队后，王小波和赵和平、艾建平他们，都曾去看过，王小波应对他们的事比较了解因此，所谓陈清扬的原型，应是几个女孩形象的捏合。

偷鸡和打架，也是知青们生活的主要内容。偷鸡是知青的“必修课”。偷鸡大多有两种原因：一是嘴馋，要打牙祭；二是私人恩怨。知青主要和农场老职工这个群体有矛盾，和少数民族群众，却大多处得不错o1969年，王小波和其他知青一样，在初抵农场后变得消沉，消极怠工，躲避劳动，爱说反动怪话，跟着就是各方“帮教”。他是属于“被教育”的部分。十四队一组组长王文杨告诉他，要好好劳动，总有一天，知

青会有机会返回家乡。知青们从心底里愿意相信王文杨的说法，于是换来了"表面和平"。和平不是没有代价——有谁骂知青，过两天家里养的鸡就没了。知青们偷老职工的鸡，农场职工也偷知青养的鸡及鸡下的蛋。知青点为补助生活，也允许知青养鸡。经常是鸡要下蛋了，听到母鸡"咯咯哒"、"咯咯哒"地叫个不停，等知青到了鸡窝，却只能和母鸡大眼瞪小眼，母鸡眼中是被偷走鸡蛋的羞愤.而知青们只能在鸡窝里，找到带母鸡体温的茅草，或一摊可

1据2012年10月29日对赵和平的采访.

爱的鸡粪，鸡蛋却化作了燥热的空气，像孙猴子一样，变得无影无踪。知青找职工们讨要鸡蛋，职工们则显露出无辜的朴实面孔。好几次，连知青都相信了老职工们的确无辜.直到一次有个老职工偷鸡蛋被知青们抓了正着。

这样，知青和老职工们的矛盾就公开化了。王小波他们甚至还偷了队长家的狗。有关这只狗，在小说《黄金时代》中也有记载。它印证着王小波著名的"辩诬逻辑"。队长的狗的左眼被人打瞎了，队长怀疑是王二，原因有三：一是王二有手，能拿气枪；二是王二有把气枪；三是王二和队长有隙，还曾拿气枪打东西。因此，队长就给王二小鞋穿.而王二的办法是，打瞎狗的右眼，让它彻底走失。队长认定王二有罪，是从王二可能是罪犯的前提出发的，王二必须证明自己无罪.才能摆脱嫌疑。而王二的做法是直接取消逻辑前提，即不启动辩瓯程序，而是让逻辑辩诬的整个形式不成立。不能小看这只狗，因为它颠覆了新时期伤痕文学的一个潜在逻辑，即"辩座"。例如，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古华的《芙蓉镇》等，这些"文革"反思小说，都存在着"忠奸对立"的内在文化逻辑.即"四人帮"是奸臣，而老干部是忠臣，老干部虽受尽冤屈，却痴心不悔。《黄金时代》中的这条狗,包括陈

清扬的“破鞋”辩诬方式（即拒绝权力窥视程序，干脆做一个真正的破鞋）,彻底颠覆并嘲弄了“文革”逻辑.彰显出一种强悍的个人主义气质。

6

日子枯燥乏味，却也不是全无波澜。一个突发事件差点改变了王小波的命运。

天气炎热，太阳直直晒着人们的头脸，亚热带的热风吹在人身上，使人像是披了一件湿牛皮.浑身不舒服。农闲的时候.必须及早把牛撒出去，让它们洗澡、吃草，它们才有力气干活。由于缺乏机械，牛是当地主要劳动力，简直比人还金贵农场在牛出工的时候，都给它们喂红糖稀饭，以保持体力当地青年职工龙闷儿，负责赶牛车，王小波负责放牛。小波虽然较邋遢，却对牲口很好.经常给手底下的大水牛加料，而这几位家养的牛兄，对野牛同志也颇亲近，从不给他找麻烦。那天，龙闷儿不知为了什么，心里不痛快，手里的鞭子像把细刀子，专门抽牛耳朵，小波不高兴了.就说了龙闷儿一句:“有啥事儿，别对着牲口使劲.牲口整天给咱干活，可不欠咱们的打。”

龙闷儿是个黝黑的矮个青年，脾气暴躁.就跳下牛车，叉着腰，用当地土话骂道：“鸡巴！野牛，我放我的牛，关你屎事！”

当地农场职工很粗俗，开口总要先带上一句“鸡巴”才说话，小波对此早有领教。《黄金时代》里的景颇族小孩，就这样说话匸别看小波平时蔫蔫的，不太讲话，可也有几分性格，一听龙闷儿的话，也有些绷不住劲了，就把拳头凑近龙闷儿，利索地用北京话回骂：“你会说人话吗？我看你还不如牛，牛也不会乱踢人，牲口让你使唤坏了，到时候我也跟着受连累！”

龙闷儿一听，火气更大了，也不搭话，扑上来就要打小波。他哪是小波的对手，小波个子大，胳膊长，龙闷儿还没碰到小波，就被横着丢在了水田，像一块板结的牛粪。很快，周围就聚集了一大群知青和当地职工，大家都给打架的双方呐喊助威。只有无辜的牛们，纷纷瞪着大眼.

疑惑地注视着人之间的战争。

不一会儿，胜负分了出来。龙闷儿被小波打了一个乌眼青，小波脸上也被挠了几道口子，衣服扣子也被扯下几个。拉架的把两人劝开，龙闷儿哭哭咧咧地跑回家去了。虽然这次打架事件很快平息了，但还是被农场领导知道了，十四队“野牛”王小波能打架的“名声”也传了出来，有的职工甚至拿王小波吓唬孩子，颇有点“止小儿夜啼”的效果。没过多久，一个北京知青慰问团来云南，王小波打架的事情，不知怎的，慰问团也知道了。营指导员很生气，非要批斗王小波。

王小波的小说《地久天长》中，写了王二与“军代表”之间的矛盾。军代表还真有原型。据赵和平讲.此人是三营王指导员，长得白白净净，毕业于通县炮兵学校，也算是小知识分子，但为人死板，教条主义，且对北京知青颇有微同，有些偏见C'正是此人，让王小波接连被批斗三天。但是，王指导员并没有小说中所写的男女作风问题。他一度颇欣赏赵红旗和赵和平c赵红旗被借调入水利团，不但提干入党，还被推荐为团里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但因他探亲后再也没回来，军代表为此恨透了北京知青.后来在赵和平调回北京拿档案的问题上，也是百般刁难〉王小波在杂文《我为什么要写作》里写道：“插队的时候，我遇12一个很坏的家伙（他还是我们的领导，属于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少数坏干部之列），我就编了一个故事.描写他从尾骨开始一寸寸变成了一头驴，并且把它写了出来，以泄心头之愤这个军代表变成驴的故事到底如何，我们现在已不得而知，但王小波后来以牟平水道联中为背景的小说《这是真的》，的确写了一个仗势欺人的赵助理，整日借着身份欺负教师，后来他喝醉了酒，变成了一条驴。这个故事中应该有王指导员的影子。

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生活很苦，比如弄巴农场，缺粮少菜，还要养活一大堆知青。比弄巴农场艰苦的地方还有很多，尽管大家都在唱“献身边疆”的高调，如当时的一首知青诗歌《我爱第二故乡》，就很

1据2012年10月29日对赵和平的采访

具“文革”话语气息：“从边鰓的风，/我们能辨出阶级斗争的动向；/从边疆的雨./我们能估计出又可增产多少胶树乳浆……/呵！喝一口边疆的水呵，/甜到了心上;/望一眼边疆的山呵，/豪情满胸膛！”'而关良的《这也是战斗》，则代表了当时将艰苦劳作进行审美浪漫化的倾向：“粗壮的手臂，/树起钢的林，织成铁的网；/震动山岳的吼声，/倾吐出爱的波，恨的浪！〃激烈的战斗，/在新生活的前沿打响；/战斗的激情呵,/在这创业的日子里奔放！”2

但当浪漫变成了“瞎浪漫”，空虚无聊的心只能越来越消沉。

同时，兵团对知青的关怀也不够，有的甚至还故意虐待。这种情况四师比较严重。很多知青已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却连对象都没有,谈恋爱的知青也没有几个打算在云南成家，生怕一结婚就永远不能回城。另一个方面，知青中未婚同居的现象又非常普遍，由此引起的怀孕堕胎、未婚生育的情况时有发生。一些农场知青连住房问题也没解决，几个人挤在破烂的茅草房。有的农场干部动不动就对犯错误的知青捆绑吊打，个别干部还利用职权奸污女知青，这些问题日积月累，长期得不到解决。[3]1973年7月4日，新华社《国内动态》第241号刊登《云南建设兵团四师十八团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情况》，震惊了全国。《情况》披露.1969年到1974年7月，云南建设兵团共发生破坏上山下乡案件四百一十一件，奸污二百零七件，捆打九十八件，凶杀二件.逼婚三件，打击报复五件，煽动外逃一件，死因未明三件，猥亵八十三件，强奸未遂九件；犯罪分子中包括现役军人一百六十六人，

1云南农垦局编，《边陲花正红一云南农垦知识肯年诗歌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189页。

2同上，18页。

3杨全，《1979：云南支边知背大返城》，《龙门阵》.2005年11期。

师级四人，团级九人，营级三十一人，连级一百零五人。1

据沈芬回忆，王小波还写过小字报，促使农场领导在处理知青问题上更多考虑知青利益。随后，知青们逐渐“挑起了连队大梁”，司务长、文书、会计、记工员、教师、卫生员、炊事员、拖拉机手、宣传队员等，需要文化的工作全由知青承担。2

王小波他们所在的农三师，虐待知青的事情较少，如果说有批斗的情况，王小波、赵和平、杨树龙三人算是一个案例。挨批斗的心理感受，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写得非常逼真：

> 我在人保组，罗小四来看我，趴窗户一看，我被捆得像粽子一样。他以为案情严重，我会被枪毙掉，把一盒烟从窗里扔进来，说道：二哥，哥们儿一点意思。然后哭了。罗小四感情丰富，很容易哭。我让他点着了烟从窗口递进来，他照办了，差点肩关节脱臼才递到我嘴上。然后他问我还有什么事要办，我说没有。我还说，你别招一大群人来看我。他也照办了。他走后，又有一帮孩子爬上窗台看，正看见我被烟熏得睁一眼闭一眼，样子非常难看。打头的一个不禁说道：耍流氓。我说，你爸你妈才耍流氓，他们不流氓能有你？那孩子抓了些泥巴扔我。等把我放开，我就去找他爸，说道：今天我在人保组，被人像捆猪一样捆上。令郎人小志大，趁那时朝我扔泥巴。那人一听，揪住他儿子就揍。我在一边看完了才走。陈清扬听说这事，就有这种评价：王二，你是个混蛋。

1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68页。
2据艾建平提供的沈芬与艾建平往来的电子邮件。

其实，王小波受群众批判，并没有被捆起来。当时娱乐生活匮乏，晚上点起煤油灯搞批判也是娱乐活动和王小波他们同时受批判的，还有“破鞋”和其他“坏分子”。赵和平、杨树龙和王小波，是作为打架斗殴、破坏知青和当地职工关系，好吃懒做的典型被揪了出来的。当时虽没对他们吊打，但滋味肯定不好受，小波开始还辩白几句，当听到很多其他知青的事情，也都安到了他头上，也就懒得张嘴了。这样的大批判，持续了三四天。每天晚饭后.三人都会被叫到农场托儿所，蹲在不到一米长的婴儿床里，接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小波个子大，蹲在婴儿床里，难受得要命，别人看着也揪心，活像闯入鹅群的一只大海豹。

后来，赵和平被发配到场院晒粮食.杨树龙被罚打扫厕所，而王小波却被勒令到打谷场上扛两百斤重的大麻袋。队里把所有坏事都加到他们头上：偷鸡摸狗、蒙混老乡、偷工偷懒、打架斗殴，他们成了名副其实的“坏分子”。《黄金时代》中提到的“人保组”作为当时集公检法于一身的专政机构.实际上是处理农场和知青内部法律事务的最高裁决机构'，对知青们有生杀大权。王小波他们的“错误”，实际上还没到人保组的层次，只是在队上批评教育.然而，这种人身羞辱，却使王小波难以忍受。他甚至想到了外逃缅甸。

1“文革”中.公检法全部被砸烂，司法职能全都由“革委会”中的“人民保卫组”承担‘当年的“人保组”是如何工作的？以其级为例，今天的政权机构除了政府、人大、政协、法院、检院这,'五大班子”夕卜.还有一个县委系统；除了党政这两大系统，还有工、片.妇.团等等各种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而“文革”的县“革委会”所有机构全部加起来总共只有四个组：政工蛆、生产指挥组、人保蛆和办事组。政工组囊括了原县委的职能，生产指挥组囊括了原县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办掌组管“革委会”大院里的吃喝拉撒睡，而一个人保蛆就完成了今天的公、检、法、司和国安局、政法委六个机构的职能,

王小波变得忧郁苦闷，心事重重。被批斗的第三个晚上，三个垂头丧气的小伙子聚在一起,商量对策，计划逃离弄巴农场可计划了半天，又

觉得每条路线的守卫都很森严，想要逃走还真不容易。陇川江水流十分湍急，江上的大桥有解放军把守，有的知青实在想家，想泅渡过去，却淹死在江里。逃离背后，他们还有另一种幻想和冲动,那就是像真正的英雄一样.去参加缅甸革命。当时大量逃缅中国知青,都是抱着纯洁的心去参加革命的，然而，缅甸的环境更恶劣，缅共对知青军人也很提防孟古河是中缅边境两山间夹着的一条小河，宽不过十米，却得脱鞋卷着裤腿涉水而过，凡是投身缅共的中国志愿者都要在此偷偷渡河，因此逃缅知青乂被称为',辨脚兵”。据曾进入缅共上层的知青李书明回忆，仅1969年到1970年出境参加缅甸人民军的知青，昆明就有三千余人，此外还有保山的，德宏的，北京的，上海的，四川的，重庆的……总数万人以上。王小波的同学，在瑞丽卡朗农场的肖林，就曾去过缅甸，后乂回到国内。（笔者曾对肖林进行过采访，但她却对这段经历讳莫如深。据说他们那批去过缅甸的热血青年，回国后遇到很多麻烦。好在肖林最终解决了户口、工龄等问题，在一家出版社做了编辑。）

王小波蹲在屋子外面，抽了两包烟，理智最终战胜了革命狂想，没有逃走。自作多情和一厢情愿，总不能拿来当真。事实证明，在缅共打通南线的腊戌战役失败后，中国知青死伤很多，世界革命的梦想破灭了，很多知青跑回来，继续在云南农场当农民。[1]

后来，赵红旗找到了弄巴农场的老场长于云生，于场长当时正受批判.在连队里劳动，和赵红旗关系不错。于云生虽不当领导了，但

1文晔,《老知青的缅甸丛林记》,《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1期

还有很多人脉，就找了一些老关系，做了一点说服工作，把这件事压下去了。后来，于又回到农场，重新当了领导，王小波曾向他提议建沼气池。于云生是厦门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对王小波的建议大加赞赏。王小波找来书，照着书上的图在宿舍前面的空地上挖沼气池，那佳还常过来当

帮手。沼气池快要完工的时候，王小波却因生病住院了，这项计划最终流产，但提到王小波，于云生竖起大拇指夸他是“队里最聪明、最有内涵的人”。

“经历了云南的知青生涯，我失去了天真和善良。”王小波后来曾这样感叹。批斗事件过去了，但王小波却性格大变，他开始感受现实社会的残酷，并逐渐思考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源。他在《黄金时代》中写道：“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这时候，仿佛神启一般，王小波开始了真正意义的文学实验，他不止一次在文章中提到那种神秘体验：

> 开始时候像初恋一样神秘，我想避开别人来试试我自己。午夜时分，我从床上溜下来，听着别人的鼻息，悄悄地走到窗前去，在皎洁的月光下坐着想。似乎有一些感受、一些模糊不清的字句，不知写下来是什么样的。在月光下，我用自来水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写出的字句幼稚得可怕。我涂了又写，写了又涂，直到把镜子涂成暗蓝色，把手指和手掌全涂成蓝色才罢手。回到床上，我哭了。这好像是一个更可怕的噩梦。（《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

今天，我们已无法看到这些“镜子写作”的内容了，但他要表达的，不仅是青春的感伤、隐秘的欢乐和激情，更是一个青年真诚的反思和质疑，是对人生痛苦和无奈的反抗，如果说，王小波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浪漫气质，那么，这种气质在云南的暗夜之下，在那面被涂成蓝色的镜子里，也许就已显现了。每个作家其实都有一个灵魂主题，这个主题决定着他的创作境界、格局和气度。海明威的主题是男人的尊严.托尔斯泰

思考的是人性的救赎，狄更斯侧重观察社会与人心，马克•吐温关心的是金钱和权势对人性的伤害，莫言则追寻着野性的自由与不羁的想象，而王小波的主题是激情反抗庸俗，真诚反抗虚伪。这种反抗，联系着一种坦诚的，却也是夸张的想象。蓝色、镜子、眼梦.都是我们理解它的重要元素。“镜子”关乎自恋和成长。按照拉康的学说，从镜像阶段开始.婴儿确立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对立。换句话说，婴儿只有通过镜子认识到“他人是谁”，才能意识到“我是谁”。很多文学青年，都有过类似的、神秘的创作冲动，大多用笔记本记录凌乱幼稚的想法，而王小波却将之写在镜子上，且是一个反复涂改的过程。王小波对“镜子式写作”的迷恋.既与当时创作环境有关（“文革”期间，很少有人敢将日记等私人文字公开示人，因为那有可能成为政治攻击的把柄）,且与王小波的写作特质有关，即一种儿童式的纯真浪漫。伴随着王小波精神和文字的成长，这种“纯真”发展成为一种与现实的反讽关系。

知青们的思乡情绪越来越严重。有的北京知青，甚至冒着生命危险.偷渡陇川江。他们开始想办法探亲回家。14队第一个请探亲假回去的是那佳，她前后走了一个月。这次探亲，对北京知青影响很大。大家既羡慕又伤感。那佳回来后，赵和平又请假离开了。当时大家都知道赵和平不想回来，但都悄悄瞒着队上。赵和平回去后，在安徽干校和父母度过了春节。后来，他在北京又呆了一阵，就碰到了小波。小波是请病假回去的。而赵家的亲戚大多在部队任职，当时他们想，如果能离开农场，就有机会参军。但这些秘密赵家两兄弟只跟小波偶尔谈及，没有跟其他人说过。

要离开农场，当时有几种方式，探亲是最易被批准的方式。到农场满一年后就可报名，连队到知青中调查摸底，要其他知青推举才有资格，名额有限，大家需轮流回去。另外，办理“困退”或“病退”，也是经常被运用的方式。

当时流传一种说法，叫“北京知青靠父母，昆明知青靠大夫”,说的是北京和云南知青回原籍的办法。昆明知青多找大夫帮忙，开假病历，办理病退，而北京知青，则多是办“困退”或“家照”。云南省革委会1970年曾出台《关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患有严重疾病和残疾问题的处理办法》的文件，又在1975年出台《关于批转省知青办公室〈关于处理下乡知识青年病残和家庭特殊困难问题的请示报告〉》,都对知青回城做了严格规定：如办理病退必须与接受和动员地区县团级以上单位协商解决，单方退回，则不予落户；而对困退要求更高，必须是独生子女，或父母已丧，弟妹年幼，或父母病重不能自理，或其他严重病残，还要经动员城市的知青办审查，及地、州、市知青办与农垦局的联合审查'。1970年，赵和平先以探亲名义离开云南，到

1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54页。

安徽「校去和父母会合，然后再打一封父母病危的电报回去，让赵红旗也有机会离开。王小波不符合困退条件，但他得过肝炎，可能因病退回城1971年8月，云南东川退回五十五人.就有六人是因得肝炎"但即使病退，名额也非常少，很难得到批准，而探亲假相对容易。1970年底，王小波因病回京探亲:假期满了后，他准时回队，给大伙带了几条“大前□”香烟，还给常照顾他的班长带了四条肥皂。

大家看到小波回来，又惊又喜，但又有一点惋惜，艾建平跟他开玩笑：“人家走了就不回来，你怎么还自己上赶着往回跑？真热爱美丽的边疆呀。”

王小波淡淡地说：“不回来能去哪里？”

在“文革”时期的举国计划体制下，如果知青偷跑回来，首先就没有户口。没有户口，就意味着没有一切：没工作，没身份，没粮食关系。1971年5月，王小波再次请假回家，队上觉得小波上次归队及时，就爽快答应了。队上的领导对王小波也很同情，连续两次准假，主要是因为

王小波是一个“病号”。

从1970年夏天开始，王小波就觉得胃疼，不爱吃饭，但没当回事。没多久，赵红旗发现王小波眼白发黄.吃不进饭11月，王小波高烧不退，大家最初以为是感冒.可小波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滴水不进，吐了胆汁.大家才意识到病情严重，于是连夜找来担架，抬着他赶到八里地外的农场医院。“幸亏那天晚上把小波送到医院，要不然命都难保尸他的朋友们后来说。王小波在文章里还专门写了赵和平送他去医院的事情。而进医院之后的情景，则颇具喜剧色彩，王小波调侃说:“我年轻时，有一回得了病，住进了医院……我入院第一天，大夫来

1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55页。

查房，看过我的化验单，又拿听诊器把我上下听了一遍，最后还是开口来问：你得了什么病。原来那张化验单他没看懂。其实不用化验单也能看出我的病来：我浑身上下像隔夜的茶水一样的颜色，正在闹黄疸。我告诉他，据我自己的估计，大概是得了肝炎。”（《肚子里的战争》）王小波患的是黄疸型肝炎，属于烈性传染病，医生不让陪床照顾，王小波一个人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出院的时候人瘦了一大圈，一脱衣服全是清晰可见的肋骨”。当时治疗肝炎没什么好办法，医生就让多吃糖。出院后，王小波被分到糖厂待了几天，“搬起砖头大的糖块就啃”。王小波向农场请假回家探亲，前段时间农场刚因肝炎死了一个北京知青，领导很谨慎，于是顺利准了假。“在这里继续待下去，我身体就彻底毁了”，王小波有一次对朋友说。两年后，政策有所松动，知青可办理病退，只需当地医院开证明，回到北京以后再做复查即可。1972年，患胃病的艾建平就以病退的方式离开了云南。而1971年的这次回京，实际上意味着王小波云南知青生涯的终结。

9

1970年前后，国内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林彪事件”让文化大革命的神话骤然破灭。政治运动还是一波接一波，从“批林批孔”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然而，噩梦中醒来的人们，对革命神话已开始产生怀疑。王小波在散文《积极的结论》中，记载了“林彪事件”发生时的心灵撼动。一天，军代表把所有知青集合起来，一顿训斥：“你们这些人，口口声声要保卫毛主席，现在却是毛主席保卫了你们！”正是在那一刻，王小波发现，原来大家都生活在表面“积极乐观”、事实上却“毫无理性”的生活中，而如果按理性轨迹理解问题，则会将生活看得过于悲观:“理性就像贞操，失去了就不会再有。”

云南知青生活虽很短暂，却是王小波一生的转折点。如果说，“革命北京”是王小波的文学想象凝聚的核心空间，那么，“边陲云南”则相当于一个“觉醒的时空”。正是经历了云南的苦难磨砺，王小波才从一个精灵古怪的少年，褪去理想的浪漫情调，认真思考生活，并对革命宏大叙事产生了深深怀疑。那些小时候孕育的思想，也生根发芽，并走向成熟。当时知识青年有一些出人头地的机会，比如说，积极参加各种文艺宣传活动，就有希望通过文艺才能，引起“上层”注意，从而摆脱底层命运o1950年代出生的知青作家，很多都是这样走上文学道路的，比如，著名作家陆天明。赵和平也曾因会拉乐器，被抽调到团里的文艺宣传队，过了几天不用下大力的日子。当然，文艺活动也有犯错误的危险。还有一种是通过“政治活动”改善生存。例如，那个时期流行的“积代会讲用”活动，即“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讲心得体会”。这些主流话语活动.王小波都自愿放弃了。多年以后，他是这样解释的：“话语即权力，权力又是个好意思，所以的确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

打进话语的圈子，甚至在争夺’话语权'。我说我是自愿放弃的，有人会不信——好在还有不少人会相信。主要的原因是进了那个圈子就要说那种话，甚至要以那种话来思索，我觉得不够有意思。据我所知，那个圈子里常常犯着贫乏症°”（《沉默的大多数》）当然，王小波对话语圈的疏离，本身并不是政治式的，而是文化式的，黑色幽默式的。王小波说：“假如要我举出一生最善良的时刻，那我就要举出刚当知青时，当时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类，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同时我也要承认，当时我愚蠢得很，所以不仅没干成什么事情，反而染上了一身病，丢盔卸甲地逃回城里。现在我认为，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思维的乐趣》）正是在这种反思基础上，他坚定了要做“智慧精英”，而不是“政治精英”的信念，以此反思整个20世纪以来中国激进主义狂潮”

青春期的经历，总能深刻地影响一个人。多年之后，接受了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王小波，在谈到知青生活时，已没有了当初的情绪性，反而多了一份“平常心”。首先,他否认“无悔青春”的说法:不能因为年轻的时候，在云南吃过苦，就说吃这样的苦是应该的，是美好的。他说：“上山下乡是件大坏事，对我们全体老三届来说，它还是一场飞来的横祸……坏事就是坏事，好事就是好事……至于坏事可不可以变成好事，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同时,老三届的痛苦经历,并不是因此变得特殊起来了，特殊地好，或特殊地坏，而应以“平常心”看待上山下乡，并以平常人的心态来看待上山下乡的经历：“'老三届’的遭遇是特别，但我看他们也是些寻常人。对黑人、少数民族、女人,都该做如是观。罗素先生曾说,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同等看待。

我以为这个原则是说，当语及他人时，首先该把他当个寻常人，然后再论他的善恶是非。这不是尊重他，而是尊重’那人’……”（《我看“老三

届”》）他还说：“不幸的是，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乱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趣味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活需要改进。”在王小波看来，沉溺于过去的痛苦生活，进而把它特殊化，甚至是美化，进而达到美化自身的目的,是懦夫行为，也是“理性的逃避”。正是这样的平常心，让王小波能保持冷静的距离以关照生活.他的知青题材小说，尽管没有豪迈悲壮的誓言，醇厚的乡土热恋，却有一份超越其外的理性思维。

王小波第一篇发表的小说《地久天长》，大致创作于1980年前后,不是他最早的习作，却是他最早发表的作品。在这篇作品中，王小波已开始确立他云南知青叙事的基本元素和调子。当然，这篇作品中，浪漫主义还未与反抗强权的现实所指进行很好结合。因此，这篇小说还表现出一些时代共有的伤感气息:.

该小说发表于1982年7期《丑小鸭》杂志。该年度被称为“知青文学年”，很多重要知青作家.都在这一年发表了代表作，如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北方文学》1982年8期）.孔捷生的《南方的岸》（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王安忆也发表了成名作《本次列车终点》并获得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一年也是“知青大返城”接近高潮的时候，这些知青小说正是对那个时代青年共同心声的表达o1982年的知青小说有其显著特点：一方面，它规避了很多“敏感点”，例如，文化大革命与革命传统之间的隐秘联系；另一方面，叙事时又以青春理想激情、战天斗地的英雄主义情怀，显现了十七年文学中理想主义元素的影响。尽管革命作为社会符号，已丧失了权威地位，但是，知青英雄在“无悔青春”的边娜开垦中，在征服大自然的“野蛮与文明的碰撞”中，怪异地呼应了新时期小说的启蒙色彩。同时.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也开始出现在知青文学中，艰苦的乡村磨砺，被赋予了俄罗斯民粹主义般的热情，而城市成为知青在现实中无所适从的“隐喻”。这在《本次列车终

点》与《南方的岸》中都有描述。回城知青陈信，在上海繁华的马路上，无法找到心灵的归宿；而易杰和暮珍毅然放弃了城市的繁华生活，重新投身于瘴疠迷漫的海南孤岛。

相比而言，在王小波的这部稚嫩的小说中，英雄、历史、国家现代化等“宏大语汇”很少出现，而小说凸显的品质，明显地集中于两点：一是反抗权力压迫.二是爱情,1980年代初的小说，对权力关系的反思是不够的，直到1987年老鬼的小说《血色黄昏》出版，那些非人性的压迫，才真正浮出遮遮掩掩的文字水面.不再依托于反“四人帮”之类的托词，拥有了批判的锋芒和力度°此外，爱情描写，在1980年代初的知青文学中，也多表现为崇高战友情、纯真初恋情结，而较少具性意味的突破。

《地久天长》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下乡知青大许、小王和邢红三个人，在下乡过程中，产生了深厚友谊。而指导员是个蛮横、愚昧的权力狂，他多次利用耕牛事件、割领袖像事件整治三人。然而，三人同甘苦、共患难，最终让指导员无计可施。最后，邢红生病住院，含情而逝。

这个故事中，指导员褪去了政治的魅力光环.呈现出极强的权力控制欲，既不懂耕田事务，还强迫大许服从他。对于这个人物形象，王小波的写作姿态是，一开始就没有将他看作左倾流毒影响者，而是用戏谑的口吻,进行讽刺与解构。除了指导员，小说中最令我们关注的，是邢红这个人物形象。从她身上，已可看出王小波以后很多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一些基本特征（如《黄金时代》中的陈清扬、《似水流年》中的线条）。邢红没有当时知青小说中女性牺牲的符号象征意义（如（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的张指导员，《南方的岸》中的暮珍），也没有女性压抑的痕迹（如王安忆后来的“三恋”系列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或是对女性的乡土品质的赞美（如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而是一个热情奔

放的女性形象她身体健美，容貌秀丽，性格热情豪爽，非常有智慧，令人难忘。但邢红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则是她对爱情和权力的态度。对于革命的意识形态，邢红并不放在心上，甚至以戏谑的态度对待它，充满了自信和智慧，有时更能直接看穿权力控制背后的阴暗心理：

她吃惊地挑起眉毛来："怎么啦？教导员有什么了不起，我看他不能把咱们怎么办。当然了，也不能和他顶僵了，这个检查还是要写。可我还真不会写这玩意呢，你写的检查让我参考参考好不好？"

听了这种话，我感到沉重。不管怎么说，我们在向组织隐瞒一个重大问题，这是不可宽恕的。可是邢红说："你多笨哪！明摆着教导员要整你，你还要自己送上门去。"

在对待爱情上，邢红的态度也惊世骇俗。她同时喜欢大许和小王。1980年代初期的知青小说，对于女性爱情，很少做这样极端浪漫化的处理。即使小说中女性处于两难选择之间，作者一般也要凸显女主人公的道德负罪感和在情感、理性与现实之间的挣扎。对邢红而言，这样的选择根本没有道德羁绊，她和大许、小王，沉溺于类似童话般的情感世界：

她笑了。她在草地上笑好看极了。她说："你们两个好像互相牵制呢。不管谁和我好都要回头看看另一个跟上来没有。是不是怕我会跟谁特别好，疏远另一个呢？"

我辩白："没有。"其实是有这么回事的。

她一本正经地说："你们别这样了。我不会喜欢这一个就忘了

另一个的。你们两个我都喜欢。你们都来爱我吧，我要人爱。"

我也很高兴。她又说："将来咱们都不结婚，永远生活

在一起。”

我也像应声虫一样地说："不结婚，永远在一起。"

在这些抒情的文字中，我们看到的邢红形象,与当时流行的知青女性形象有很大差异。当然，那一时期王小波的小说，还比较稚嫩，这也体现在对人物的把握上。结尾，邢红之死.又回到了感伤的路上，显得有些俗套。

值得注意的是，这期刊物还配有一篇评论：《心灵向美敞开》。作者是陈静严格意义上讲，这是第一篇王小波的研究文章。该评论开篇就说：“作者匠心独运地把笔触细腻地伸向青年人的心灵，描写了在那个特殊的年月中，珍贵的友情给知青的生活带来无穷尽的欢乐和美的享受。小说情节简单，格调明丽.犹如一条清澈的小溪。”评论将《地久天K》定位于描写知青“珍贵的友情”，对教导员的形象，则评论为“心术不正、思想僵化”。而知青生活也被划分为“浪漫却艰苦”的与“受迫害”的两种一通过这样的二分法，评论者将王小波暗含的越轨笔致加以悬置，忽视了这篇小说的内在价值。

第五章青虎山-“绿毛水怪”的魔幻家园

妖妖抬起头，仔细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哽”的一声跃入海里。等到我把脸上的水抹掉，它已经游出很远了。我看到它迎着波涛冲去，黑色的身躯两侧泛起白色的浪花。它朝着广阔无垠的大海——无穷无尽的波涛，昏暗无光之下的一片黑色的、广袤浩瀚的大海游去了。

——王小波《绿毛水怪》

1

王小波在牟平插队的时间，目前有一定争议，存在1971—1972年说，1971-1974年说，1973-1974年说几种。而比较流行的看法,王小波待在牟平的时间大致是1971-1972年。'王小波自己则在文章

I比如，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王小波全集》，认可了“1971-1972”这一时间段，李银河与艾晓明合编的《浪漫骑士》，也认可了这一时间.而王小平的《我的兄弟王小波》，虽认可这一说法，但具体章节中.却有矛盾出入，如《青虎山》一章中，出现了“这样过了几年”，"一晃又过了两三年”的字样.而前面章节写到王小波从云南回到北京，是在1971年.

中讲述，他是1973年去山东牟平插队的。'然后，1974年底，他离开牟平，回到北京，在一家街道办小厂工作，直到1978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据牟平青虎山村老支书张玉敏回忆，王小波来牟平的时间大约是1971年春。牟平“王小波故居”认可的王小波居住时间是1971-1974年。2可据其他当事人，如王小波在村子里居住时的房东张玉浩和妻子刘月花回忆，大约是1973年秋。3在笔者的采访中，据王小波的大姐王小芹回忆，1971年秋，她回过一次牟平。1972年秋冬之际，她陪母亲宋华，一起为姥姥奔丧，也回过牟平，算是为小波插队的事打了前站，而王小波最后确定去牟平的时间，应是1973年春天，而离开应是1974年底到1975年初。

据笔者考证，以上说法中争议最大的1971—1972年，实则为王小波“蛰居”京城及另寻出路的空档期。大概因1971年王小波从云南回京后，一直闲居养病。其间，还曾短暂在安徽干校和四川尝试插队。但安徽干校不久解散，而四川的环境，王小波同样难以适应。王小波作为没户口的“黑户”，随时面临着各级部门的检查和监督。按照当时的知青政策，他可以选择再次集体下乡，去新掘、内蒙古等地的建设兵团，也可选择回原籍，以“回乡知青”的方式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据《二龙路街

道简史》记载，二龙路街道办曾大规模动员社会青年和无业人员，共五百七十八人到农村落户。其中，七十二名社会青年被安置陕西、东北、山东等地插队。[4]王小波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1王小波在《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一文中指出：“1973年，我到山东老家去插队。"“
2据笔者2012年10月15日在山东牟平水道镇等地的采访。
3孙布滔、王洪涛，《王小波插队牟平青虎山》,《烟台晚报》，2010年4月27日。
4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街道简史》。

二次插队去了山东。

因此，据笔者推断，1973年春到1974年底.应是王小波在山东牟平的较可靠的时间段。王小波在牟平生活和工作期间，既是他对过去云南插队生活经验的总结、沉淀、提升和概括的时期，也直接孕育了《战福》、《这辈子》、《这是真的》、《绿毛水怪》、《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等早期小说作品。更重要的是，牟平的插队生活，使他对于中国农村、中国农民，进而对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环境，具有了第一手鲜活经验.并进而产生了深刻反思后来，王小波的很多著名杂文，如《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等，都是从这些早年生活经验出发的智慧火花。

山东牟平，地处胶东半岛，《辞源》说：“县名，属山东省。汉置，属东莱郡。以在牟山之阳，其地平坦，故曰牟平。”另据传说.牟平起源于牟子国，《风俗志》载：“牟子国，祝融后。”公元前206年，西汉设东牟县，属东莱郡，素有“南山北海”之称，南依“胶东屋脊”昆嵛山，属崂山山脉，传说中的海上仙山蓬莱、瀛洲、方丈即由昆嵛山衍生出来，道教分支“全真教”也发祥于此；北濒黄海，有发达的海洋文化。牟平是有名的“文化之乡”，也是有名的“作家之乡”。新中国成立后，牟平相继走出冯德英、邓刚、李延国、尤凤伟等知名作家，而王小波作为牟平的“短暂过客”，也成了这个名单上的一员。

牟平水道镇青虎山村，坐落在昆嵛山支脉、金牛山山脉中，因村前有一片山，颇像“青色卧虎”而得名。如今，村前的青虎山石，已因修建水库被炸掉，只剩下光秃秃的洼地。这里地势不平坦，耕地主要在村周围高低不平的山上，种植、施肥和收获，都颇为不易。除了番薯、水稻、小麦等作物外，村里也有果园。烟台等胶东地区，水土适宜，苹果、梨等水果颇为有名。1970年代，青虎山村大约有一百多户人家，

均生活艰苦。据王小波回忆，1950年代的青虎山，只有几十户人家，家家户户养驴°“文革”中，人口翻了一倍多，驴等畜力却利用得越来越少，驴大多被杀了，于是人力代替了畜力。这里一年四季以白薯干为主食，很难见到白面馒头，但胶东气候良好，村民朴实善良，亲属和朋友对王小波也都很照顾，

水道镇是牟平交通枢纽之一，也出产黄金等矿产。1938年，日军侵入烟台.曾在此驻扎一个小队和大量伪军（原址在今水道镇政府驻地）o1943年后，该地区是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重点控制区o1970年代，水道镇（公社）有一个知青点，一所小学和中学的联合学校——水道联中（包含小学全部年级和初中三个年级），知青点靠近公社政府，聚集着水道大部分知青，有一百多人，大多为烟台本地人。知青点分建男女宿舍。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知青生活很苦，但伙食比当地百姓还是要强很多，常吃棒子面窝头，有时也可吃上白面馒头，不像村里农民以薯干为主食。王小波是来自北京的知青，加之个性内向，很少和本地知青打交道。和王小波一起来青虎山插队的，还有一个叫秦芹的北京女知青，但两人交往很少。水道联中虽然不大，但历史久远，是清末八国联军侵华、日本人在昆嵛山挖矿时所建。该校后转移校址，1986年更名为水道镇第一初级中学。当年教书时，王小波主要负责数学和物理，

沧海桑田，几十年光阴不过转瞬须臾，当年的水道联中，其址现如今已变为水道幼儿园:学校整体面积不大，这些年的整体布局变化也不大。院子里有不少柳树，据王小波当年的学生、现任职水道镇政府的初乐永介绍，东头的两棵是1970年代种的，其他都是后来栽的匚学校的大门已换了，教室前的地面铺了水泥，房顶换了新瓦，王小波教课的旧教室.已卖给了村民，原有的一个过道门已被水泥封死，而他当年住过的宿舍则改成了仓库，教室外的砖墙仍保留着最初模样，白色的墙皮虽脱落，但原先的大字依然清晰可辨。笔者采访的时候.好奇的当地孩子们，

围着我们，天真地笑着，前前后后地打量着。他们可知道，多年前.有一个叫王小波的知青，曾在这里教书育人？当下课的铃声响起，身穿大号蓝色中山装的王小波，面色忧郁地走出教室，他抬头看看蓝色的天空，又回头看看成群嬉闹而过的孩子们，他在想些什么？

2

1972年秋，牟平县水道公社青虎山村前书记张同亮，收到王小波的母亲宋华的一封来信，信中透露出想把小波落户青虎山的想法。老书记年龄已高，已不担任青虎山村书记。他来到自己的大儿子、时任水道公社党委委员兼青虎山村党支部书记的张玉敏家中张玉敏听了父亲的诉说，立刻拍板说:“咱村出去的娃，别人不要，咱要，来吧，不就是添口人嘛，有我们吃的就有他吃的！”朴实的张家父子，为王小波的插队，做了很多工作。很快，第二年春天，王小波就来到青虎山村插队落户:

老书汜张同亮在当地很有名气：他是小波一家的“恩人如果不是他介绍宋华入党，并将她送入八路军，王家的历史可能就此改写。而没有他的仗义慷慨.和儿子张玉敏、张玉浩一起收留王小波，照当时在北京处境堪忧的情形，王小波具有怎样的未来走向，也不得而知，可以说，张家两代人，都有恩惠于王家。老书记最让人敬佩之处在于，敢于实事求是，从不违背良心，对“假大空”的东西坚决抵制。1950年代末，张书记就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当时村村虚报粮食产量，“卫星”一颗比一颗“夺目”，可秋后政府来收粮，百姓就遭了秧，连口粮和种子都保不住，上面还要派人来查，通常都是鸡飞狗跳。某年冬天，寒冬腊月，牟平地区大雪纷飞，很多人家砸锅卖铁，村里的树都被砍没了，连生火取暖的东西都没有。缺吃少穿，严峻形势下，有的人家全家被饿死或冻死在炕头上。可是，青虎山却没饿死人，有的牲口甚至也活了下来，原因在于，老书记张同亮，这名老共产党员，出于朴素的本能，及正义感的驱动，偷偷地召集村民开会，当场拍板将村里的粮食分掉，各家各户都各自找地方埋好藏好，谁也不能告密。张同亮悲壮地宣布，如果上级追查.他就去顶罪。为给村民一条活路，他豁上了。而村民也纷纷表态，如

果有人告密，就把他打死。可见，张一弓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讲述的事情，在那个特殊年代并不罕见。这些冒着死罪、“以下犯上”的基层农村干部，文化水平不高，心中并没有太多大道理，可朴素的正义感和责任感，却让他们选择了一条抗争之路。

宋华就是在老书记张同亮的培养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宋华原名杜翠云。青虎山村以张姓为主，杜姓是小姓，只有十几户。现在青虎山还有宋华父母的老宅。据《牟平游子》记载，宋华生于1923年，1940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本乡妇女抗日救国会会长。1941年春于抗大分校学习，任民运小队长、干事。1943年春，调任东栖二区分运委任组织委员。1944年秋，于胶东建国学校学习。1946年秋调任烟台胶东公学及东山中学任职员。1949年春，调山东行政学院任辅导员。1950年，调入中央教育（高教）部工作，历任统计处处长、机关党委委员。1983年离休。

据张玉敏回忆，宋华年轻的时候，聪敏好学，性格刚毅。1938年，日军进犯烟台，全民抗战热情高涨，宋华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县崖子地下抗大，即原牟平县国防教育委员会。据《中共胶东区党史大事记(1937-1949)》记载：牟平县国防教育委员会.是“三军”西进驻防于牟平县县崖子一带时，牟平县共产党员李国屏和于克恭，为团结知识分子共同抗日成立的.1938年8月，中共胶东特委决定在原牟平县国防教育委员会基础上成立“胶东国防教育委员会”，李国屏任主任。当时国防教育委员会主要任务是：(1)宣传国防教育，组织中小学教师救国会;(2)编写中小学抗日课本;(3)开办中小学教师训练班。国防教育委员会成立后，领导蓬、黄、掖三县举办了多期培训班,培训革命青年和教师一千余人。县崖子与青虎山只有一山之隔：同月底，胶东特委设立妇女部，以发挥妇女在抗战中的作用，对外称“胶东妇女抗日救国联合委员会筹备委员会”。'

宋华担任了胶东“妇救会”的下属机构、青虎山妇救会的会长。与宋华同时参加革命的还有张同芝-张同芝后来在新疆建设兵团做妇女工作。1941年3月初，经中共东海地委组织部的介绍，宋华决心入胶东抗大学习。老书记张同亮，不仅介绍宋华入党,且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封锁线.将她秘密送往集结点——通海。为秘密抗战的需要，杜翠云在老书记的建议下，将名字改为“宋华”，取母姓“宋”，又谐音“歌颂中华”。宋华在《在抗大学习的点滴回忆》2中，曾追忆过自己在胶东的革命经历。

1941年3月中旬，宋华来到胶东抗大第三期二营八连学习。后在抗大政治处民运股工作，并担任抗日游击队牙山大队政治指导员，领导三十多人。当时，队长姓陈，宋华担任指导员.战士大部分是扩

1中共烟台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胶东区党史大中id(1937-194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71、74贞，

2抗大一分校校史研究会烟台联络组、中共烟台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烟台党史资料丛书•胶东抗大》.烟台师范学院印刷厂1993年12月印刷

军动员来的新兵: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宋华凛然不惧，颇有巾帼英雄风范，常带着战士们搞军事训练，还对敌伪进行袭扰破坏。他们到敌人的炮楼喊话，瓦解伪军斗志，还到敌人据点外围割电话线。有一次，他们足足割了一大捆电话线，在全区群众面前展览。他们还带领群众去破坏公路1942年，宋华调校部直属宣传队。1943年，任校参谋处图书干事，几个人一起负责近千册各类图书的保存、借阅。1943年秋季备战，宋华因疏散书籍，差点被惊马摔死，这一时期，尚是学生的宋华认识了时任抗大政教组长的王方名。宋华对王方名的刻苦工作精神非常景仰，王曾因工作而咳血，但从不叫苦叫累。两人随后结成终生伴侣。宋华参加革命的经历，在村里颇有一些故事流传。而据王小波的好友赵宁讲，宋华也写了回忆录，不过并不想公开发表，其中有很多当年参加革命的逸事，比如，如何在本村和外村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怎么翻墙越瓦躲避日伪搜捕等。[1]

3

在老书记安排下，王小波来到牟平水道公社青虎山村插队。牟平市作协主席焦红军，对王小波来牟平的情形进行了想象：

从牟平县城通往水道公社的乡村土路上，风尘仆仆地走来了一老一少。老的浑身粗壮，一副紫铜色的脸膛，是水道公社青虎山村的大队书记，姓张。少的年约十八九岁，长得-米八几的高个，一身蓝色布褂套身，显得又高、又黑、又瘦，姓王。在迎接这一老一少的农村人群中，谁也不会想到，

1据2012年10月26日对赵宁的采访'

若干年后，这位少年会成为“生前文坛无人问，死后成名天下知"、轰动中国文坛的王小波。'

这是一个类似“十七年”经典小说开头的出场，乂仿佛充满了神奇寓言,朴实的老农、忧邯落魄的城市少年、乡野的土路，都在牟平的青山绿海之间，形成了神秘的童话氛围，暗合了“于连•索黑尔式”的青年成长的挫折主题,这个高大的少年.在牟平的岁月里，时常奔波在这样的“土路”上。从水道镇到青虎山村，约半个小时车程，几十里地，走路需要一个多小时。在水道联中教书时，逢周六或周日，王小波就告别学校，独自踏上回村的道路:王小波当年的房东，张玉敏的二弟张玉浩说，当年他常开拖拉机接送王小波:然而，据张玉敏回忆，王小波不好意思总麻烦二舅（王小波分别管张玉敏和张玉浩叫大舅、二舅），经常一个人走着回来31970年代初，水道镇和青虎山村之间有很多引水沟渠，沟很深，路

上又没路灯，完全靠月色才能判断大致方位.1974年秋天的某天，王小波独自从镇上回青虎山村，竟然迷了路，在沟里整整走了一夜，才摸到村里：，多年后，当笔者走在这条小路上，脑海中不禁闪现出这样的画面：“胶东半岛的初秋之夜已有些凉了，夜露在月亮下闪烁着晶莹的光，沟渠、群山、花朵.躲在树影后的月亮，都被记忆的伤口平铺成了奇异的风景：那条寂静的土路上，风也睡在枝头，飞尘也早已没有了白日的嚣张。而那个心中充满神秘的少年,在暗蓝夜空下，拖着高瘦的身影，显得孤单又倔强,他一身天蓝中山装.乱发挡住了额头。他沉默如金，奔走如风.把影子留给旷野，把压抑和忧伤，化为漫天的星……”

1隹红军.《王小波牟平插队往事》.《烟台日报・卜字街周刊》,2012年9月3日。

当然，这只是笔者身临其境时的一种想象，但却可使我们想到王小平对童年时代王小波走路功夫的描述。王小平说，王小波虽是天生平足，却酷爱行走。步行的妙处在于，可以以一种不疾不徐的自由方式在万物中穿行，或者说，以一种任意控制、行止随心的方式扫描这个世界。'行走荒野的意象，对于王小波来说，既非常典型，又极具独特性。这个意象在鲁迅笔下曾被赋予了知识分子启蒙的悲剧意味.如《过客》、《这样的战士》，荒野的行走，是从无路的荆棘中寻找出路的悲壮，也是孤独寂寞的强者命运使然。然而，王小波将儿童、少年时期的这些有关“旷野奔走”的生命体验，外化为喷薄而出的反抗性意象。这种旷野的奔走，就被赋予了强烈的生命探索意味和童话气质，充满了华丽的狂想、奔放的生命自由意志。如《黄金时代》中，王小波对陈清扬在云南荒山中奔走的描述：“树林里飞舞着金蝇。风从所有的方向吹来，穿过衣襟，爬到身上。我待的那个地方可算是空山无人。炎热的阳光好像细碎的云母片，从天顶落下来。”小说《三十而立》中，也有一段在旷野奔走的文字：“好多年前，我在京郊插队时，常常在秋天走路回家，路长得走不完。我心里紧绷绷，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走完了路以后干什么。路边全是高高的杨树，风过处无数落叶就如一场黄金雨从天顶飘落。风声呼啸，时紧时松。风把道沟里的落叶吹出来，像金色的潮水涌过路面：我一个人走着，前后不见一个人。忽然之间，我的心里开始松动。走着走着，觉得要头朝下坠入蓝天，两边纷纷的落叶好像天国金色的大门。”这里提到了回家，很明显这一景象不可能发生在云南农场，而那些有关杨树、道沟的描述，也颇有牟平水道镇的感觉。又如，《红拂夜奔》中对李靖和红拂出逃、《万寿寺》中对唐代节度使薛嵩赤身裸体在湘西红土地奔走的描写，都充满了神奇想象力。

1王小平，《我的兄弟王小波》，139-140页。

4

1970年代的胶东农村，住房卫生条件差，张玉敏把王小波安置到住房条件稍好、结婚刚一年的二弟张玉浩的家里。张玉浩与媳妇刘月花就着小波来的喜事儿，给刚出生的女儿起名“毛京”.即毛主席的北京之意。他们拾掇出正房向阳的最东间，约有八九平米的屋子给王小波住。张玉浩一家五口人，就分散挤在其他两间房匸到了晚上，为了让王小波有条件学习，张玉浩一家就将煤油省下来，供王小波看书。干了一天农活，只有在读书的时候，王小波才能忘记无聊和苦闷，忘记艰苦劳动带来的身心疲惫。今天，王小波居住的东屋还被完整地保留着，有一块土炕和一张小木桌，一盏小煤油灯。农村的炕头短，小波个子高，只好斜躺着，看书也是斜躺着。在王小波的回忆中，居住的这间屋子条件却十分艰苦：窗口对着猪圈，到了夏天，还有蛆向屋里爬：虽然张家对王小波比较照顾，但王小波显然对农村生活缺乏准备。

村民们把这个北京知青当作了“落熾大家公子”，对他充满好奇，又充满了同情和怜悯。时隔多年，刘月花仍清晰地记得王小波初来时的样子：“一米八五的大高个子，又黑又瘦，有点敛敛肩，穿一件很大的蓝布褂子，说话语速很慢.从不抢话，但有时蹦出一句来，让农村人能琢磨大半天。”小波刚来时有点腼腆，一段日子后，就和身边的人熟了一他与生俱来的幽默诙谐感，也表现出来，一次饭后，小波帮刘月花看孩子，刚把六个月大的小毛京放到炕上，小毛京便尿炕了。小波用手一点小毛京的嘴说：“小丫头片子，自来水说放就放。”[1]

当然.老乡们并不看好王小波干农活的能力。与王小波年龄相仿、当年在村里和他一起拉过电线的刘仁成回忆说，小波的农活干得不好，对电的知识却特别多，他们一起拉电线时，小波给他讲了很多“电线理

论”。

村里的居民以张姓居多，杜姓和万姓也有一些。但由于多年的联姻，村民们很多都沾亲带故。因此，小波总能得到很多人的照顾，张玉敏一家人自不必说，杜家的本家、亲戚，如王小波姥爷的兄弟（宋华的兄弟姐妹都在外地，王小波的姥爷已不在世），对王小波也较关照。据牟平作协、博物馆等机构的考察，现年九十七岁的杜树荣老人是王小波的亲叔伯姥爷，也是青虎山村与王小波亲戚关系最近的村民。“小波来插队那年他姥爷就去世了，他姥姥在北京生活，所以全村跟他最亲近的就是我。”杜树荣说。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外孙的样子：“比我高一头，走路敛着肩膀，黑黑瘦瘦的，梳着分头，不爱说话。”杜树荣很快就跟王小波“混熟”了，村里安排王小波在果园里洗苹果、拔草时，王小波有空就来找杜树荣聊天。“就是唠唠家常,我跟他讲一些他母亲小时候的事，他挺乐意听，但不作评价c”2七十五岁的万庆美，也是当年与王小波有过交往的村民。说起来，王小波要喊她舅妈。家里当时穷得揭不开锅，但万庆美还是把王小波叫到家里吃了一顿饱饭。她给王小波做的是一盆而豆汤，外加一碟苦菜豆磨（豆磨为一种当地食物），王小波吃得大汗淋漓。王小波可能不知道，这在当时的万庆美家里，已是最好的招待客人的饮食了。至今，万庆美家中，还保留

1参见焦红军.《沿着王小波走过的道路》，《昆布》，2013年I期。
2刘向南，《牟平王小波故居昨挂牌记者探访深藏的知青往事》.《蓝色快报》.2012年9月9日。

着王小波当年给她照的相片。据说，王小波下乡时.带着一台照相机.这在当时也是稀罕事。王小平在回忆录里，曾提及家中有过一台德国蔡斯120照相机.但是否就是这台照相机，还有待查证。万庆美回忆说，王小波给她拍了照片.又洗了出来，亲手送给她的。画面上一共站着三个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中间的就是万庆美。这张照片的构图也很有意思，镜头

偏高，画面上，人物比例要小于背景白杨树，很有创意；张扬舒展的树枝.和健康朴实的农村妇女.相映成趣

地里的劳作很繁重，特别是青虎山的耕地大多在山上，每天推车送粪上山，让王小波的一双新布鞋，很快就变得惨不忍睹,裂开了很多口子。张玉敏看王小波吃不消，就将他调到果园技术队。王小波在果园的工作较轻松，多为跟着一些老人和妇女，做些剪枝和浇灌工作。当时大家常在果树上抓一种虫子烤着吃.大伙儿吃得津津有味，王小波却不敢随同，只是眨着眼睛说，虫子不敢吃，要是有条蛇倒是不错——云南的插队生活，王小波没少吃蛇。王小波虽然和村人交往不多，却很慷慨，母亲常从北京给他寄的巧克力等稀罕食品，他从来都是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也让村民们能“打打牙祭”。

1974年初，张玉敏找到时任水道公社书记的周佩奇、教育助理姜玉山.介绍了王小波的情况，称赞“这个孩子一肚子文化水”，极力推荐王小波担任水道联中代课教师经过公社同意，张玉敏又找到水道联中的罗福喜校长，经过一番努力，王小波终于摆脱了农业活儿,吃上了教师这碗饭'这在当时也是很大的照顾，一般知青都在地里

1据王征回忆，在王小波当民办教师及从农村出来这些事上，她的丈夫衣秀东也做出了很多努力：“秀东还想办法认识了水道公社的公社书记，想尽早把小波活动出来几个月以后.小波到水道当了民办教师。”而当民办教师这件改善生活的事情的办成.颇费了些周折：大队将名额给了小波，公文盖章时.公礼管文教的「小（转下页注）

劳动，只有少数幸运儿，或表现突出的，才有机会当代课教师，或进入当地工厂当工人。据王小波的学生初乐永介绍，当时代课教师能挣九或十个工分，相当于地里一个整劳力，工作却相对轻松。水道公社当时虽比较简陋，但驻地有信用社、邮局、派出所、供销社、饭店等公家单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地方政治、文化、信息传播中心，这对王小波的处境和心情的改善，都有一定的作用。

牟平生活期间，王小波依然是一个“逍遥派”和“边缘人”。对于王小

波常在灯下看书写作的事情，村支书张玉敏、学校的领导和老师们都知道，但王小波从没有宣扬过他的文学才能，更没有用这些才能去改变自己的处境。照王小波一家和牟平当地的渊源，如果王小波“积极”一点，搞到一个推荐上大学的名额，也不是没可能的事情。然而，王小波以自己的“消极”，展现出他对尊严的维护和对政治的厌恶。他对很多歌颂农村苦难生活的作品嗤之以鼻。在王小波看来，这些作品的虚伪在于不承认“苦难”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不肯定通过努力，改善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而是通过歌颂苦难，获得道德优越感和精神虚幻的满足感。多年后，他在杂文中调侃道：“在老家时，我和乡亲们相比，显得更加勤劳朴实、更加少心计。当年我想的是：我得装出很能吃苦的样子，让村里的贫下中农觉得我是个好人，推荐我去上大学……当年我在老家插队时,

（接上页注）就是不给盖，找出种种理由推脱。在老书记张同亮的点拨下，给这位干事送去了两条烟，才痛快地办成了事。后来.王小波的户口迁回北京时，也受到刁难，还是衣秀东通过牟平县委书记，才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见王征，《时光中的事》,57页。这些世俗社会的“关系学”，止王小波尝到了更多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但这些东西，不但没有让王小波屈服，反而增长了他对“平庸生活的狂怒”。以牟平水道联中为背景的小说《这是真的》所讲述的仗势欺人的赵助理，一点点变成驴的讽刺故事，从现在的资料来看,显然有非常写实的所指。

共有两种选择：一种朴实的想法是在村里苦挨下去，将来成为一位可敬的父老乡亲；一种狡猾的想法就是从村里混出去，自己不当父老乡亲，反过来歌颂父老乡亲。这种歌颂虽然动听，但多少有些虚伪……”（《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

王小波待人谦和.态度低调，不爱与人争执，极少对人发表意见，很少参与公众事务，对当时的乡镇政治也保持着相当距离。他也很少参与知青群体活动，更多的时间耗在读书、思考上。和在云南插队时一样，下棋和抽烟，仍是他不多的爱好。教书的日子里，尽管备课、上课占据了他许多时间,但他嗜书依旧如故。据王小波当年的同事曲延刚回忆，王小波走路也要读书，工资发下来就去买书，外国的、古典的，都在办公桌抽屉里收着。王小波烟瘾很大，一天差不多要抽两至三盒，且是两角

六分的青岛香烟。而下棋——在当时的生活圈子里，他可以被称为“高手”：当时全学校能下棋的老师都和他较量过，但没人是他的对手，甚至连校长和公社书记也慕名而来，仍是他手下败将。王小波常坐在乒乓球台上，用粉笔画上格子当棋盘，一个课间能下一局棋。据张玉敏回忆，一天下班后，下着小雨，张玉敏领着小波到公社办事，正好碰上公社书记与公社兽医站站长下象棋。小波站立一旁观战，但观棋不语。一会儿，公社书记无可奈何地说:“我输了！”王小波在一旁说了一句：“不，你赢了！”众目睽睽之下，书记按小波指点的棋招走下来，杀得对方完败。自此，“水道有个象棋好手王小波”的消息，在公社不胫而走，找王小波下象棋的“臭棋篓子”排成了队，让王小波应接不暇。

其实，下棋不仅是消遣，也关乎世界观。王小波的知青下棋经历，淬炼的是他的对智慧的热爱。他看不起纯粹为“打发时间”的下棋据王小平回忆，当时王家藏有两本棋谱，一本是《橘中秘》，一本是《梅花谱》，王小波和哥哥王小平，都曾对象棋神魂颠倒，学会了很多规矩和章法，例如，《似水流年》中杀得刘先生大败的“大列手炮”，就是王小波从《橘中秘》得到的开局妙法。王小平进而由象棋阐发至图灵机思想，指出象棋的好处在于，它是一个足以触发因果直觉的简单而清晰的模型象棋从逻辑推演出发，清斷明了，却蕴含着种种可能性。这种对智力的考验，也许是让王小波兄弟着迷的地方吧。而从下棋入手.进而引发对逻辑思维的酷爱，则有着王小波的家学渊源

王小波在水道联中教课的状态如何？据王小波当年的学生曲延霞、初乐永介绍，他依然是一副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派头！他总是不修边幅，“失魂落魄”。上课铃一响，他一言•不发，快步冲进教室，能把调皮的孩子吓一跳:他有一件大号蓝色中山装，是他的招牌“行头”，总是敞开怀穿着，很少严谨地系上扣子，中山装也不干净，上面的粉笔灰和油渍混杂在一起，斑斑点点的（这件蓝色的大号中山装，依然保留在老支书

张玉敏的家中，是王小波留给他们的纪念如今，它成为王小波在青虎山生活过的痕迹证明。由于号太大.中山装一直无法给别人穿，就放在衣服箱子里）。他的物理书，从来都是卷成一个卷.像海带一般.插在大衣口袋，好像携带一件特殊武器.再配合满头乱发、黝黑的皮肤和高大的身材，足让孩子们目瞪口呆。他从不看课本，讲起课来，兴之所至,旁征博引.令学生们叹为观止：他的语调低沉，语速缓慢，波澜不惊.却时不时地冒出几句幽默的话。当然，也有学生反映，王小波上课.不太讲课堂效果，常是信马由缰，基础好的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基础不好的学生，就有些跟不上趟而且.王小波从来不维持课堂纪律,脾气好得出奇，学生们也都不怕他。

更令学生们痴迷的，是他带有京城味道的普通话。当时的老师,大多使用牟平方言上课，王小波的普通话，让学生们新奇不已，还有些老师跑过来旁听，想学学真正的“京腔”。当然，新鲜劲过了，很多捣蛋的孩子，就不再认真听，但王小波很少呵斥他们，总是很宽容地笑笑

当时，数学和物理老师，在一个办公室，大家交流挺多，王小波较沉默，但一开口就知识'渊博，让大家很佩服。《战福》中“恬不知耻”被供销社的售货员小苏念成“刮不知耻”的笑话，大概就是这样在交流中产生的。

在水道联中的日子，王小波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起床很早.天刚蒙蒙亮，他就赶到教室生炉子，四点多钟开始备课他对学生也非常照顾，周末有时带学生上山去玩，还一起聊天。那时水道联中的食堂饭菜简单.但比起村里，已经好很多，有白菜、菠菜汤，也有馒头，虽不是纯粹的白面馒头，但也不错。王小波睡觉的时候，在集体宿舍里的大炕这对王小波的确也是考验，大家都认为城里的孩子，睡在这里，肯定不适应，但在云南插过队、受过很多苦的王小波，却并没有提出抱怨，也没有和学校闹什么矛盾到了周末，张玉浩开手扶拖拉机来接他回村，有

时他也走回去C王小波在烟台的二姐夫衣秀东，也常来看他,并把他带到烟台去玩。他对大海的体验，大概也多出于此。

谈到当时牟平的手扶拖拉机等农用车，还有一件趣事。王小波曾在文章中谈到1970年代烟台插队时的一种原始农用车“宁死不屈”：“它是大车改制的，大车已经有两个轮子，在车辕部位装上个转盘.安上抽水磨面的柴油机.下面装上第三个轮子，用三角皮带带动，驾驶员坐在辕上，转弯时推动转盘，连柴油机带底下的轮子一块转。”（《环境问题》）如果转弯太急，它就会把驾驶员甩下来，然后头在后，屁股在前，一路猛冲，一直撞到某坚实的物体才会停下来。这种古怪好玩的农用车，对环境污染很大，不久就被取缔了，不知道，王小波的二舅张玉浩是否也曾开着这种“宁死不屈”去学校接过王小波呢？遥想当年的乡村土路上，黑壮高大的知青王小波，穿着蓝色的中山装，在车上东摇西晃，张牙舞爪，而短小精悍的胶东农民张玉浩，手忙脚乱地驾驶着“宁死不屈”，还真是很好玩。

当然，这段民办教师的经历，也留在王小波的文字之中，这在小说《这是真的》中最明显。这部受到奥维德《变形记》影响的小说，表现了王小波的幽默气质和想象力.以及对现实的批判。小说开头写到的校园傍晚的静谧景致，显然就是水道联中操场的真实还原，而民办教师可怜的处境，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共同的问题。小说中，水道公社管教育的赵助理.平时欺男霸女，还经常索要贿赂。一次醉酒之后，赵助理居然变成了驴子。小说的精妙之处在于，逼真地描述了赵助理变成驴子后的一系列举动和内心活动。例如，小说写到赵助理变成驴后对奔跑的感受：“赵助理员在野外胡撞了好几天，到底是几天就不清楚了。因为他被人踢了一脚朝村外狂奔的时候，开始感到很奇怪：自己居然那么善于奔驰，跑得两肋生风，风儿在耳朵里呼啸，当时居然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豪。后来突然领悟到自己现状的可悲，不由得急火攻心，胡冲乱撞，乱泡蹶

子，弄得尘土飞扬，好像一阵旋风。然后就陷入狂乱状态，失去了时间的概念。”

讽刺不正之风，在“文革”后期，及至新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但是，王小波的这篇小说，最大的特点，不在于他讽刺了农村教育的不良习气，而在于他的讽刺是彻底的，即这种讽刺，并没有停留在批判不正之风、进而引出对正确路线和政策的拥护上，而是在彻底狂欢之中，超越意识形态，直指人性深处的丑陋。小说充满了拉伯雷式狂野，甚至粗鄙的笑声，也有奥维德式的机智幽默。更有意思的是，小说出现了具“性意味”的描写，展现“文革”地下文学（该小说创作于1974年到1980年之间）的另一面风采。比如，小说中变成了驴的赵助理，依然对民办教师小于色心不死，结果被骗掉了，小说煞有其事地写道：“后来，老赵总是心情恍惚，脑子好像是死了一部分。他发现，原来他的脑子有下面四个部分，管吹拍的，管作威作福的，管图吃喝的，管图那个的。现在脑子空了四分之三，剩下的四分之一也不管事了。”

5

牟平时期的生活，对王小波的影响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农村艰苦的生活，引发了王小波对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中国文化中对物质的消极态度等问题的思考，并进而成为他反对1990年代泛滥的伪科学思潮的重要基点。一方面，王小波同情苦难者，对受苦的人们，有深深的怜悯；另一方面，王小波对以贫穷为美的反智行为，或借贫穷之名、行个人私利的虚伪行径，则更为警惕，面对苦难.敏感甚至有几分尖刻的王小波，绝不会照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那样去歌颂乡土道德.也不会像张承志的《黑骏马》，赋予苦难雄浑浪漫的气息，更不会像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般青春无悔。他甚至采取了尖锐讽刺的“玩世不恭”的态度。这恐怕要让希望在他的小说中寻找“乡土眷恋”的人士失望了。

《马但丁》发表在1998年6期的《北京文学》，责任编辑是李静,这篇小说是现在我们所知的、王小波的最早习作。该小说创作于1974年左右，比《绿毛水怪》还要早。在这篇带有自传色彩的幼稚习作中，我们能看到王小波对当时环境的极度不满。而这种不满.既有物质匮乏，也有精神压抑。这篇小说中，我们还能看到少年王小波跳脱顽皮的心性，和生活对他的折磨扭曲。小说中，尽管乡亲们对马但丁不错，但马但丁却对村民们勤劳憨厚的生活态度不以为然。他故意整治说他坏话的李长友，他喜欢懒散的生活：“其实但丁装成这个样子百分之八十是为了好玩：他有满满的一肚子的坏水。有谁去注意别人的功架呢。就是懒散一点也没有什么。但丁自己也常常在人前不很在意露出懒散的样子来，也没有人说他什么。所以他装出这个样子也就含有百分之八十的不善良的讽刺。”而恶劣的生活条件,更让他难以忍受。小说中，陈老太太，他的

太姥姥，叫他去家里吃饭。请客的羊肉，是病死的瘟羊，喝的酒是六十五度的地瓜烧。马但丁吃完饭，走到村口，就吐了出来。小说结尾，王小波写道：“马但丁找了个借口溜出大门，直跑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张开大嘴准备大笑一通，可是根本笑不出来，反而想哭。像这种恶毒的酸辣汤是消不掉心中的苦味的！”[1]

这种态度和价值选择，还表现在他的一些杂文中。例如，《对中国文化的布罗代尔式考证》就对艰苦生活进行了回忆与反思：“在所有的任务里，最繁重的是要往地里送粪——其实那种粪里土的成分很大　车粪大概有三百多斤到四百斤的样子，而地往往在比村子高出二三百米的地方。这就是说，要把二百公斤左右的东西送到八十层楼上，而且早上天刚亮到吃早饭之间就要往返十趟。说实在话，我对这任务的艰巨性估计不足。我以为自己长得人高马大，在此之前又插过三年队.别人能干的事，我也该能干，结果才推了几趟，我就满嘴是胆汁的味道。推了两天，我从城里带来的两双布鞋的后跟都被豁开了，而且小腿上的肌肉总在一刻不停的震颤之中。”这篇文章中，王

1王小波.《马但丁》，《北京文学》，1998年6期.

小波以他的统计学和数学才能，将人和畜类在运粪土上山这件事上的投入和产出进行比较，并得出结论，用驴来拉粪远比人来运送节省得多，而且人总吃嘗干，容易得胃溃疡。在另一篇杂文《荷兰牧场与父老乡亲》中，王小波谈到了在欧洲参观荷兰的感受：为什么荷兰的能工巧匠，能利用风能、水能建设洼地，将艰难之地变成了易于生存的美丽家园，而我们的农民，在有利的自然条件下.却将日子过得苦不堪言？究其原因，还是缺乏知识的介入：在大量的诗词歌赋和官场心计中，知识分子浪费了才华和青春，而在对科学和人类的幸福贡献上，却令人怀疑，这些思想和观点，直接导致了王小波对1990年代后国学热的怀疑态度，以及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批判，

小说《这辈子》，也展现了对当时农村艰苦生活、特别是“推粪”的

感受。无聊的小马.梦中看到了自己的上辈子，是一名叫“陈得魁”的胶东农民，有一个“鬼”一样憔悴的婆娘.还有一个瘦胳膊瘦腿、却有大肚子的小女儿——小芳。陈得魁“身上穿着一件带着臭气的褂子，破烂的裤子挽到膝盖小腿乂短又细，腿肚盘满了弯弯曲曲的筋络。他像第一次看清自己的身躯：肚子又小乂鼓.好像脖子在不自然地朝前伸着，’脊梁被压弯了。’……”小说中，小马的视角和马得魁的视角，不断形成“互文”，小马在畜牧书中看到的有关养猪的知识，不断和苦难生活相对比.趣味盎然，又充满苦涩和同情，这篇小说写于王小波回北京后，算是对他艰苦农民生活的体验和总结。小说开头有发牢骚的议论，结尾，作家更借老陈的口说:“我们活着是为了谁？为了儿孙吗？要是过得和我一样，要他干什么？为了自己吗，是为了吃还是为了穿？只是为了将来还有希望。可是希望在哪儿呢？都把我们忘了。从农村出去的人也把我们忘了。我们要吃饱，我们想不要干这么使人的活。我们希望我们的老婆不要弄得像鬼一样我们也要住在有卫生间的房子里头，我们也要一天有几个小时能听听音乐，看看小说。”小说寄托着王小波对农村和城市巨大差距的思考。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从建国到“文革”结束期间的革命清教徒式的教育，让人们很少希望通过科技改善和智慧探索解决生存问题.而是盲目夸大精神力量，进而以自虐式的精神优越感，掩盖贫穷无知的愚昧，放弃正常的人类改造自然、造福自身的能力。王小波认为，这是一种“古怪”的竞争——和风力、水力比赛推动磨盘，和牲口比赛运输一一且是比赛一种“负面”能力，比赛谁更不知劳苦，更不安逸。这种盲目夸大精神力量、相信精神改造能带动“肉身成神”、产生不可思议神话的想法，是整个东亚百年来现代化过程中的通病：从念着咒语、涂满经血、杀向洋人的义和团，到绑着白布条、嘴里念叨“天皇万岁，神道永存”的日本神风敢死队员，再到打着革命名义，以精神狂热制造幻觉的“大跃

进”和“文革”，无不显现着后发现代化的东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焦躁失衡的心态，及缺乏现代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病灶。

第二方面，艰苦的生活，也引发了王小波对弱者的同情，及对生命创伤和童真丧失的思考。《猫》是一篇寓言性很强的小说。主人公常在阳台上看到一只被挖去双眼的猫，这种对生命的戕害，让主人公寝食难安。然而，大家对此都十分冷漠，都认为是孩子胡闹，但主人公绝不承认孩子会干出这样残忍变态的事情，而认定这是来自大人的丑行，然而，他得到的回应只是冷漠：“我也曾经是个孩子，可我从来也没起过这种念头。在单位里我把这件事对大家说，他们听了以后也那么说。只有我觉得这件事分外的可怕。于是我就经常和别人说起这件事，他们渐渐地听腻了。有人对我说：’你这个人真没味儿。'”生命的残酷受损与消逝，在时间的磋磨中，甚至丧失了成为庸人谈资的资格。鲜血过后，是人们更残忍的遗忘。

《战福》也是小波以牟平插队为背景写的一篇小说。这篇小说的主题是冷漠对人的伤害。小说中的傻子战福，因为嫂嫂的虐待，一直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一天，供销社的售货员小苏，拿战福开玩笑，战福却信以为真,以为小苏对他有意思，他打石头、盖新屋，准备迎接新生活。但小苏的恶骂，让他的梦破灭了。最终，战福孤独地死去了。早期王小波的小说，有很强的童话气质，更有着明显的创伤性情感体對。他的小说丝毫不带有当时流行的宏大话语的特征，如《波动》、《第二次握手》中的民族国家忧患意识。《战福》的故事中，王小波的关注点是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的战福的悲惨遭遇。这篇小说中，有很多牟平的痕迹，如，小说中对于山峦和大海的描述，符合牟平的地理特征。乂如，主人公战福姓“初”，初姓是水道镇的大姓。而那三十几米长的供销社房屋据说仍竖立在水道街头。文章中的“石沟”村也并非虚构，它就坐落在水道镇通往牟平的路上。而小说开头的赶集场景，正是水道镇一周一次

的“水道大集”的真实写照。另外，小说还多处运用了烟台方言，如，小苏对战福说，你理一下发，还是很“飒利”的〉飒利，就是当地方言.形容人很精神、漂亮。小说另外的地方用到的“胡毗乱冒”一词，则意为胡乱讲话、吹牛皮。

第三个方面，胶东半岛特殊的海洋文化，特别是齐文化，对王小波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小波插队的牟平县，离大海很近，而插队期间他也常去烟台的二姐家做客，更多地接触到了大海。可以说，“大海”的意象，使王小波的早期小说有了重要的想象性空间。它所起到的空间化塑形作用，可与云南的“热带雨林”相提并论。王小波对大海的赞美和喜爱，既来自天性中对浪漫和自由的向往，更是他对早期情感经历的纪念。而由此引发的，苦难和浪漫并存，是贯穿王小波创作的主题性风格“《绿毛水怪》中，王小波写道：“我所爱的只是那个大海。我在海边一个公社当广播员兼电工。生活空虚透了，真像爱略特的小说！唯一的安慰是在海边上！海是一个永远不讨厌的朋友！你懂吗？也许是气势磅礴地朝岸边涌，好像要把整个陆地吞下去！也许不尽不止朝沙滩发出白浪，也许是死一样的静，连一丝波纹也兴不起来。但是浩瀚无际……我甚至微微有一点高兴，妖妖倒是找到了一个不错的葬身之所！”

这里的大海体验，很明显来自烟台地区的黄海海域，王小波在小说中所虚构的“山东海阳县葫芦公社地瓜蛋子大队”，更有区域性痕迹c山东海阳县是海滨城市，即今天的山东烟台海阳市，地处青岛、烟台和威海之间，靠近胶东半岛南部，和牟平的距离不远。王小波很有可能闲暇的时候，去过该地。而“葫芦公社”和“地瓜蛋子大队”则是对水道公社和青虎山大队的“戏仿”，因为“地瓜蛋子”是青虎山的主食的缘故。而小说中那些神奇的海洋国绿种人，神秘的环形湖和珊瑚礁，既带有北欧童话的浪漫色彩，乂有来自齐鲁海洋文化的璀璨夺目的神奇想象力。更神奇的是王小波对绿种人生活状态的描述，那是一个欢乐自由的乌托邦：既有

丰富的物产、美丽的自然景观，也有众多学者、诗人和艺术家，人与人之间都相互关爱,又彼此尊重。这是强者的国度，又是文明的国度。1970年代，像王小波的这种惊世骇俗的文学想象，已严重脱离了当时的文学规范。

《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也是一篇明显带有海洋意象的半自传体短篇小说。小说虚构了两位在山东海边插队的城市知青。他们相亲相爱，互相扶持走出难关、小说男主人公先在云南插队、后来山东插队的经历，与王小波自身颇为相似而男主人公课余带学生到沙滩挖牡蛎，以补贴学校收入，大概是当时水道联中劳动教育课的内容之一。女主人公从海军炮校的游泳场搞到救生艇，到荒岛营救男主人公的情节也与烟台的地理、建筑有紧密美联烟台的海军航空学院（前身为冰心之父谢葆璋在清末建立的海军学校）.其游泳场正是现在烟台第一海水浴场.1970年代初.还未对一般平民开放。而烟台港东炮台一带沿海处，也有非常多的无人岛礁，符合王小波对无人小岛的想象

王小波的早期小说中，爱情往往带有浪漫和理想化成分.也有感伤色彩。王小波的不凡之处在于，他能以雄健有力的个性化话语，摆脱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展现出一种个人化风格，被困荒岛的男主人公，就像屹立于天地之间的巨人，一个在大自然前显示征服勇气和浪漫意志的“东方鲁滨逊”，当死里逃生的男主人公,终于登上荒岛，他充满了英雄豪情：“我感到自豪，因为我取得了第一个胜利，我毫不怀疑胜利是会接踵而至的我能够战胜命运，把自己随心所欲地改变，所以我是英雄主人公的内心宣言，同样也可以看作王小波在逆境中坚持自我、力图塑造“文化英雄”的初步尝试，这种尝试，最终在《黄金时代》中走向了成熟，而在《白银时代》、《黑铁时代》中，王小波则写了这类英雄的衰老和挫败。

这篇小说中，海洋的伟力，使一直想做诗人的男主人公，第一次写

下了满意的诗句，并将之刻在石头上。男主人公被困海岛的虚构情节，具有强烈象征意义。它象征着主人公精神的困境和救赎的奇怪纠结：小说开篇，就以一种极为恢宏而华丽的笔触，描述了太阳飞升的黎明前夕壮丽的海洋奇观：

> 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太阳初升时，忽然有十万支金喇叭齐鸣。阳光穿过透明的空气，在暗蓝色的天空飞过。在黑暗尚未退去的海面上燃烧着十万支蜡烛。我听见天地之间钟声响了，然后十万支金喇叭又一次齐鸣。我忽然泪下如雨

这里的喇叭，既可以说是中国民间的一种管乐器——唢呐，音色明亮，音量大，也可以想象为西洋铜管乐器中的小喇叭，西洋喇叭常负责高亢旋律的演奏。而对太阳和海洋的崇拜，也与胶东一带的东夷文化有关。与海相生相伴的生活和浩渺大海的神秘莫测，使得东夷人形成了朦胧而独具特色的海神崇拜。在胶东先民传说中，海神是黄帝的后代，人面鸟身。《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虢。”海上日出的胜景也使太阳成为东夷人的偶像。'这种对大海和太阳的向往，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感染和熏陶了王小波的小说品相。

大海还与王小波小说“特立独行”的女性形象谱系相联系。比如,《绿毛水怪》中的妖妖——杨素瑶。妖妖是一个精灵般的女性形象，王小波逝世后，该小说被《花城》（1998年第1期）刊发出来，著名批评家何向阳在长文《12个：1998年的孩子》中，深情地写道：“至此，王小波写的已经不是一个有关孩子的故事了。但是这故事的主人公妖妖——这个敏感深情的女孩子却永远将自己定型为孩子，在那个自由无忧的海底世界游弋着，没有人再能伤害得了她。’还不如永远不长大呢’，妖妖实

现了自己的意愿，在深邃浩淼的太平洋海底。”2妖妖最后离开了尘世，回到海洋之国，将无限的美丽和遐想留给了世界。类似的早期王小波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还有《地久天长》中的邢红，和《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中的“她这些女性形象.都有一些共同特

1王孟子,《论先秦时期胶东文化的海洋特质》,《神州民俗》,2008年5期。
2何向阳.《12个：1998年的孩子》，《青年文学》.2000年5期。

点，比如都有过知青经历，但又是大城市出来的女孩子，她们都聪明活泼，善良浪漫，个性强悍，蔑视权力和专制，有着反叛体制的激情。
王小波早期小说中这些美丽却叛逆的女性形象，和同时代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有很大区别，如路遥的《青松与小红花》中的吴月琴。王小波的早期小说，大多写作于1974年返回北京、直至考上大学的阶段、路遥的这篇小说也发表于1970年代末。从某种角度而言，吴月琴也是一个敢于挑战生活常规的特立独行者。她第一个在村子里穿喇叭裤。她喜欢英文，对庸俗的公社助理不屑一顾她敢恨敢爱，喜欢村里的朴实青年运生。小说描写道：“你看她吧，走路抬头挺胸的，眼睛总是敏锐地扫视前面的世界。嘴里时不时哼着一些叫人听不懂的外国歌，有时还像男孩子一样吹口哨哩。在别人对当前那些时髦的政治话题喋喋不休地谈论的时候，她总是一言不发，一双淡漠的黑眼睛瞪着，或者干脆把这双眼睛闭起来，总之，她和眼前的社会很不搭调'小说为吴月琴设计了一个对立面：老公社书记。虽然.在老书记看来，“这女孩子身上缺点太多，浑身有一股’资产阶级味’；而且行为又那么放浪，根本不懂人情世故”，但是，通过误会的冰释，老书记发现，吴月琴是个纯真善良的好姑娘.而吴也发现，老书记身上有那么多高贵可敬的品质，于是，一个反映恶劣环境中的女性生存问题的主题，被“转喻为”反对左倾政治、实现民族国家新生的政治主题和伦理主题。小说结尾，吴月琴考上了大学，老书记也官复原职。“青松”和“小花”的寓意，成了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对现代性话语的乂一次缝合。这篇小说里，吴月琴在某些方面，和王小波的《绿毛水怪》中的杨素瑶有些相像，但是，二者的结果却有天壤之别，一个回归到现实政治秩序，另一个却天马行空、成了想象的海洋国的绿种人这值得我们深思。

1路遥，《背松与小花》,《路遥文集》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259—260页。

6

在青虎山村,有关王小波的故事还有很多——尽管王小波可能“并不喜欢”这种“艰苦”的生活。一棵老棘子树的故事.广为人知，算是当地群众对北京知青王小波的一种乡土化的接受想象吧-棘子树，就是野枣树，属于灌木类植物.但青虎山村的这棵野枣树，却有很多传奇。它现在还屹立在王小波故居的房后，据说已有六七百年的历史，也有的说接近千年。一般的野枣树，都比较矮小，但这棵.却高达数米，这是非常罕见的。每隔两年，树上都会结出甘甜的野枣，据说人吃了能够长寿，消灾增福。村里人都把这棵树叫作“棘子神”。刘月花回忆说，当年王小波经常在这棵老树下看书，他也很喜欢这棵神树，曾开玩笑说：“这棵树早晚能成道行。”这棵神树也是历经磨难.日伪时期.日本人曾对这棵树产生兴趣，但终因交通不便而作罢；三年灾害之际，野枣树也差点毁于饥饿的人群；1990年代中后期，很多山外商人还曾打过神树的主意.他们找来工人，锯断了野枣树上非常大的枝桠，这个巨大而触目惊心的伤口，今天我们还能看到:据说锯树的两个工人.回家后就生了重病，吓得商人们再也没敢动坏心眼历史的尘埃掩埋无数鲜活的生命，却无法熄灭文学精神世界迸发的一束束独特迷人的光芒。当年——但那“当年”已成为我们的想象——落寞的王小波，坐在野枣树下，认真地看着书,思考，间或徘徊，叹息'天瓦蓝瓦蓝的，远处的群山挂满绿意.微风送来阵阵清凉，枣花的香气宜人，野蜂在枝头跳着芭蕾舞.温暖和煦的阳光从头顶倾泻下来，如同数不清的、碎成玉屑的云母……饱经岁月沧桑的棘子树呵，你可曾记得树下的那个读书的顽皮北京知青？

王小波去世多年后，有当地好事者，为纪念他，也为纪念这棵庇佑青虎山的神树.曾以仿古口吻撰文一篇。这也能看出民间乡野是如何认识

王小波的：

棘子树下的王小波

青虎山有棵棘子树，寿逾近千年，盖自建村时即已有之。此种树木，多纤细若小指，而此树却既粗且高。相传此树极神，犯之者无不遭报.故村人皆敬畏之。

村人敬之，亦爱之。昔日村民横石条于树下，夏日于此避暑，晚间于此闲话桑麻，亦可解劳作之苦，生老之忧。老树无言，却力阻风雨烈日之扰，如勇士，如慈母，村人颇得其庇佑。

某年月日，京师大乱。时有才子曰王小波者，避乱离京，徙于青虎山村。王固好学.躬耕劳作之余，每秉烛夜读，苦学作文，其勤奋大异于常人，偶与村人避暑于棘树之下，亦阅读不止，时人钦之。

老树其后名满天下,王小波亦特立独行，领一时风骚一尝闻王小波曾叹老树之古，称其必扬名于天下，斯言已验，未扣老树知之否？然老树既神，当亦知王小波后来之成就矣，其虽无言，然其垂青之意或可忖度之。

昔有佛祖于菩提树下悟道成佛，今王小波氏成就卓著，其亦于棘树之下颇有参得乎？

（作者：杨明政）

1974年春节，受王小波父母的邀请，张玉敏和王小波一起到北京教育部宿舍、王小波的家中过年。当走进王小波的个人房间时，张玉敏愣住了：“那个不大的屋子里，满满一面墙的书架上，除了书，还是书。”1974年年底，知青返城政策有所松动，小波终于等到了回城的转机时刻。于是，王小波办理了病退手续，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北京。

第六章青年时代-从“后进青年“到“大学生”

人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再是愚昧的了。肉麻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赞美了。人们没有一点深沉的智慧无论如何也不成了。你相信吗？什么样的灵魂就要什么样的养料……没有像样的精神生活就没有一代英俊的新人。

人真应该是巨人……人不可以是寄生虫，不可以是无赖。

——王小波致李银河信

1

1975年，王小波二十三岁，虽然生活有所好转，却依然苦闷。1970年代的北京，特别是林彪事件后，革命狂潮的盛大节日气息在衰减，神圣的红色革命逐渐褪去理想主义的光芒，日益显露出颓败、令人压抑的灰色氛围。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依然保持着强大压力，却只能造成人心的恐怖，而不是激情了。“革命北京”的时空场域在煎熬中迎来了衰败的味道。由于大量年轻人被发配到各地当知青.偌大的北京城，空空荡荡，缺少生机和活力，令人窒息。王小波在散文中，曾汜述过1974年春返京探亲时遇到的场景。那是一个黎明，王小波赶头一班电车回家，刚走到大木仓胡同口.即受到了意外的惊吓朦胧的曙光中，他发现胡同口的小医院门前，有一长串的人在排队，人人手里都挎着篮子，篮子里装着一只雄赳赳的大公鸡。原来，这些人都是来“打鸡血”的，据说往人的血管里打过鸡血之后，人会变得精神百倍，返老还童“（《写给新的一年（1997年）》）青年王小波无比震惊于眼前的一幕,并将之牢记在心。在高调革命但物质贫乏的年代，鸡I/1L却成了人们灰暗的生活的荒诞亮色——从“革命北京”到“鸡血北京”，荒谬的一幕再次以喜剧的方式上演。

王小波的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中，曾描述过“文革”末期北京一家街道办豆腐厂里的生活，可以算作是对那个“鸡血时代”的一种写照。这种描述与新时期文学的“启蒙神话”有很大差异。新时期文学中，“文革”末期“新时期”初期是“坚冰乍破、春潮涌动”的岁月，是改革派战胜“四人帮”和保守派获得胜利的时刻与之相联系的“新时期”“工厂文学”有着特定的意识形态所指,比如，《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等，都是以“现代化”名义，重新找到民族国家叙事合法性的作

品。而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小波则以复杂的心态，写到了历史的衰败与革命消退后的灰暗：“王二年轻时在北京一家豆腐厂里当过工人。那地方是个大杂院，人家说过去是某省的会馆。这就是说，当北京城是一座灰砖围起的城池时，有一批某个省的官商人等凑了一些钱，盖了这个院子，给进京考试的举人们住……原来大概有过高高的门楼，门前有过下马石拴马桩一类的东西，后来没有了，只有一座水泥门桩的铁栅栏门，门里面有条短短的马路，供运豆腐的汽车出入。”这种历史悠久辉煌，但现已衰败、或被挪为他用的空间景观，标志着北京的一大空间文化特色，王小波曾住过的“铁一号”是这样，教育部大木仓胡同宿舍也是这样。而王小波在该小说中所说的这种会馆，在北京为数不少。五四初期，鲁迅就是暂住在北京绍兴会馆，在那个据说吊死过人的、会闹鬼的宅子里，抄写古碑，看一小片蓝天，并发明了属于现代中国的典型化空间隐喻——“铁屋子”。王小波在探察这座革命的豆腐厂时，则将目光盯在了一个在传统文学看来低俗粗鄙、丝毫不具现实表征性的空间——“厕所”：《革命时期的爱情》,正是从“厕所淫画”开始，介入了革命末期“新时期”伊始，欲望对权力系统合法性的破坏的主题：“棚子的尽头有个红砖砌的小房子，不论春夏秋冬里面气味恶劣，不论黑夜白天里面点着长明灯.那里是个厕所:有一段时间有人在里面的墙上画裸体画，人家说是王二画的。”

该小说所透露出的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信息，不属于宏大的现代化的“阳世界”，却属于被历史忽视甚至遗忘的“阴世界”王小波在小说中提到了“青年学习班”、“帮教活动”与“强化社会治安运动”。这三项措施.都是针对转型期人心失控的举措。青年学习班和帮教活动，用于国企内部对“不良青年”的改造与驯化强化社会治安运动，则联系着1981年5月，彭真在北京、上海等地治安座谈会上提出嗣后被中央推行的“严打”政策，这三项措施，都表现出革命专政措施的某种延续性。《赤橙黄

绿青蓝紫》中，也有一个团支书解净与“后进青年”刘思佳之间的“帮教故事”。解净作为受左倾蛊惑的青年，主动要求辞去宣传科副科长职务，担任运输队副队长，而“后进青年”刘思佳却是一个有才华.但桀謷不驯的小伙子°最后，小说将刘思佳对解净的爱情，转化为两人齐心协力“搞四化”，成为典型的改革叙事匚然而，《革命时期的爱情》中，团支书x海鹰与后进青年王二之间的“帮教”，却从严肃的政治活动，变成了具“性虐意味”的暧昧调情。无论是革命叙事还是改革叙事，都不在王小波的叙事逻辑之内。他以不可遏制的“性本能”嘲弄了宏大叙事的庄严。小说结尾，王小波再次在自由意志与后革命北京的无聊无趣之间，进行了暗示性联系。他看到的是二者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延续性和并发性:“我仿佛已经很老了，又好像很年轻。革命时期好像是过去了，又仿佛还没开始。爱情仿佛结束了，又好像还没有到来。我仿佛中过了头彩，又好像还没到开彩的日子。这一切好像是结束了，又仿佛是刚刚开始。”

2

我们叙述王小波回北京后的生活，不能忽视1971年到1973年，王小波在北京的滞留时期。这段时间，王小波在物质上要好于云南时期,但精神上非常苦闷。笔者采访过程中，对这段生活，宋华和王小芹，都有详细的回忆。王小波从云南回到北京后，档案揣在自己兜里，关系却落不到北京。按照当时北京的规定，虽然小波以病退原因从云南回京，但这种情况均须病好后“二次插队”，或安置在北京以外的地区，北京市原则上不接收回京知青的档案关系。本来，宋华在安徽干校和军代表说好了，将小波的关系落在干校，但档案拿过来，军代表又拒绝了。宋华进退两难，只好让小波暂时滞留北京，成了一个“黑户”。

1970年代初，一个人如果没有档案关系，即意味着你的生活寸步难行。没有档案关系，就不能领到按月发放的布票、粮票、油票等生活必需票证，就是早上吃早点，买一根油条，也需要粮票，有钱也买不到。因此，回到家中，虽受到了很多家庭照顾，但王小波的屈辱和郁闷的心情,却更加严重了。他常呆在家里，不愿外出，也不愿见人，只是沉浸在书籍里。有时他靠做数学题打发时间，一本《几何学大辞典》几乎让他翻烂了。据赵宁回忆，1973年初，他曾碰到过王小波。他向王小波打招呼，小波的表情颓废落寞，原来调皮捣蛋、灵动飞扬的劲头不见了。赵宁笑着说，你是傻子呀，怎么不说话了。小波这才缓过神来，半开玩笑地说，你才傻，我好着呢。也是从那时候起，王小波开始构思小说。他常在笔记本上写下一些凌乱的想法。好在很多同学也陆续回京，大家聚在一起，也能聊解愁闷。胡贝从延安回来了，赵东江、赵和平、赵红旗、那佳等人，也通过各种途径回到了北京。王小波常去找朋友们聊天.互相借书看。赵东江还曾和王小波进行过一次“煮酒论混蛋”的神

侃.两人一边喝酒.一边数算本姓家族历史上的混蛋人物-最后，赵东江败下阵来，因为王小波搬出了王家历史上的头号混蛋——秦桧的老婆王氏。'

那时候，赶上末班车、考入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专业的大姐王小芹，毕业之后留校。哥哥王小平在京西木城涧煤矿当矿工。小弟王晨光因年幼且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先是上学，几年后在北京一家烟厂就业。这在当时已是很不错的安排了。而王小波却显得有些迷惘。但这期间他进行的“自救”尝试：读书、习作、学英语等，为他以后所走的道路做了铺垫。

1974年底至1975年初，王小波到北京，因一时找不到工作，他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在街道办工厂从业的经历。工厂名称，据李银河在多种王小波著作中提供的信息，是牛街仪器厂和西城区半导体厂，但据《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的查访，似应为西城区无线电元件厂。2大体位置在今天的锦什坊街或笔者曾于2012年底去锦什坊街采访，由于城区改造.原有工厂和住户，都已不在了。听该街唯一的一户老居

1王鸿谅、魏一平.《王小波在大院的日子》.《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14期,
2葛维樱，《被淹没的王小波匚厂生涯》,《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14期

民介绍，原有住户都已迁往别处居住，原锦什坊街的档案，业已归入现金融街街道办管理。笔者嗣后去该街道办及西城区档案馆查访，依然了无音信。后来,笔者又曾委托朋友再次查访，最终证实了《三联生活周刊》的调查.估计存在李银河误记的情况，也有可能与当时北京街道办小厂多不规范、没有档案或档案不齐全有关。笔者还曾查阅《二龙路街道简史》，据其记载，二龙路的无线电元件厂成立于1970年初，1970年底上交西城区，改名为“西城区无线电元件厂”。因此，说是街道办工厂.实际上只是沿袭旧称。而据王小平的回忆，当时锦什坊街的那个工厂，主要生产“可控硅”，旁边还有卖“豆芽炒疙瘩”的小饭铺.应大致就是这个厂子。王小波也曾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写过x海鹰止王二买炒疙瘩的情节。

关于工厂生活的信息，只散见于王小波的散文和与朋友的通信。从中我们可以对那个时期王小波的生活状态，有一鳞半爪的印象。王小波提到最多的，就是和他搭班的刘师傅。刘师傅以民间朴素的、甚至粗鄙的自嘲和幽默，为王小波汲取底层生活智慧打开了一扇窗户。王小波最喜欢刘师傅的口头禅："子曰.完蛋操也。"一下就把庄严大义的东西给解构掉了：后来考入大学，王小波还和同学们津津乐道刘师傅的"神语"。刘师傅说话有点阴阳怪气，也喜欢偷沿水、泡病号、占公家小便宜，十足是"坏师傅"然而，这个"坏师傅"却和"坏徒弟"颇投缘：他为人很诚恳仗义，从不说场面的官话，语言搞怪幽默：王小波这样描述他：他泡病号的时候，声称"看天是蓝色，看地是土色，蹲在厕所里任什么都不想吃"该师傅还喜欢以自嘲的口吻编各类滑稽儿歌.令人捧腹。（《弗洛伊德和受虐狂》）

但是."后进青年"王小波显然不开心，解脱的方法只有读书写作。然而，仍如插队时一样，他拒绝通过写作向主流靠拢。曾有一个老先生，是母亲宋华的老朋友，听说小波会写小说，就约他写胶东抗战的故事，老先生有很多素材，但王小波拒绝了，并表示不屑。他在给李银河的信中谈到这件事："我会爱写这个？我会爱上吊。"他还是一副边缘人的冷面孔，对一切主旋律的东西，抱有深深的警惕和怀疑："前天办工业三十条学习班，我中午喝得大醉，被头当场点名，我厚着脸皮不在乎这些信息，让人联想到刘心武写于198()年代初期的小说《醒来吧.弟弟》。在这篇小说中，刘心武为我们描画了一个虚无偏激的"后进青年"形象，他对美好的生活和祖国的未来持怀疑态度。这颇有些像彼时的王小波。那时的王小波，在正派人士眼中，就是一个站没站相、坐没坐相、邋遢懒散、说话阴阳怪气的"堕落青年"。"文革"末期，教育部有的家庭已有了电视，有一次大家凑在一起看演出，有一个节目是器乐家闵慧芬拉奏二胡。闵穿着江青设计的所谓"国服"出来表演，大家都品头论足。小波个

子大，站在人群后面，冷不丁地冒出一句：“可惜了，可惜了这双大脚！”大家知道他在讽刺所谓“国服”，都被逗得哈哈大笑。

王小波希望通过学习来改变命运。他那时候读书，简直如痴如狂。从精神荒漠的年代走出来的青年人，有一种普遍的精神饥饿感，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大家都热衷于找各种书看，看到一张带字的纸，都舍不得丢。1971年初至1973年底，及1974年底至1975年初王小波回城后，他的读书和学习，主要靠“私塾式”讲授和个人自学两种方式。王小波滞留北京期间，王方名为让他学个一技之长，好将来政策松动时找一条出路，就安排王小波跟随黄仕奇老先生学英语。黄老先生外号叫“黄小辫儿”，还有个外号叫“八国联军”，在当时也算一个特立独行的“另类”、知识界的“奇葩”。黄老先生原在二机部任俄语翻译，是哈尔滨外国语学院毕业的高材生。他在语言方面的天赋非常高，精通数国语言，因此有“八国联军”之称，特别是对古西夏文和古突厥文，有很高造诣。当时，能读懂这两种文字的人非常少。建国初期稿费很高，黄先生的润笔费丰厚，又不愿受约束，就辞了职，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谁料想，“文革”一闹起来，稿费制度取消了，而在“文革”结束前的北京，失去了正式公家身份，也就等同于“社会闲杂人员”。屋漏偏逢连夜雨，黄太太不幸又得了癌症，一家人全靠一个月二十几元的劳保金，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顿，甚至一度到了稀粥充饥的地步。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张昭，是一位爱才的领导，听说了黄先生的事情，特意请他做编外翻译，也给不了多少钱，有时也用烟叶和茶叶顶，但有烟抽，有茶叶喝，黄先生已觉得很好了。后来，“文革”越闹越凶，张昭自身难保，也就难以庇护他了。虽然历经磨难，但黄老先生对自己的处境，倒颇能超然自得。他幽默诙谐，喜欢开玩笑，因为在东北学习的时候，认识了溥仪的最后一任妻子李淑贤，觉得模样气度不得了，从此就成了一个“后宫迷”，说话的时候，常带着口头语：“这事儿’李贵妃’说过……”“文革”的时候，也没改了

这个毛病。王小波那时正闲居在家，无所事事，黄老先生整日也是孤芳自赏，难得有人要学习他的学问，所以，就欣然应允了王方名的请求。师徒两人的性格也非常投契，都一样喜欢插科打挥，都对学问有很强的好奇心。师徒既教、学，又谈天，闲暇之时，便一起去海淀买废弃钢笔尖、劣质的茶砖，或快过期的便宜墨水。黄先生本是俄语科班出身，英语属自学成才，读写很棒，但听说就不行了。他教王小波也不是正常的路子，而是从背英语词典开始。结果，王小波把一本《英语大词典》翻得破烂不堪，不会拼读，就一遍遍地抄单词，以非凡的毅力和恒心，不断提高英语能力。结果，读写能力上去了，可听说还是不行，虽然能通顺流畅地阅读英文原典，但属于“痛腿英语”，以至于去了美国还常闹笑话——有一次，他在加油站加油，想给轮胎充点气，却把"Doyouhaveair?（你有气吗？）”说成了“Doyouhaveass?（你有屁股吗？）”，弄得人家好不尴尬。后来，小波上了大学，和黄老先生之间的走动才变得少了，但小说《我的阴阳两界》中，王小波写了一个酷爱西夏文的边缘学者李先生，显然是以黄仕奇为原型的。

除了拜老师，自修也是重要手段。“文革”中期，如前面已提到的，王小波和胡贝、赵东江等朋友即已常聚在一起读书。“文革”开始时的狂欢过后，孩子们都觉得精神空虚，有读书的需要，于是就千方百计找书看，他们的一个常用办法是跑到各个学校图书馆去“淘书”。那时候，所谓“淘书”就是“偷书”，因为书都被封存起来了。除了找书看，他们也听西方古典音乐，提高文化修养。那时候教育部管理很严，晚上保卫处纠察队还有人专门抽查。王小波、王小平、王晨光等人，充分发挥了动手能力（据说，王小平擅长修收音机.王晨光对照相机颇有研究），从旧货市场淘来留声机，修好了后，又搞了很多唱片，其中就有著名的《天鹅湖》。为防止泄密，他们就用被子蒙住窗户，偷偷地躲在屋子里听。保卫处的人来抽查，他们就说是在学习俄语，学习列宁讲话，唱片上都是

外文，保卫处的人也不懂，就让他们混了过去。为收集唱片，他们可费了很多心血。王小波比较邋遢，唱片有时随手乱放，常是被窝里一钻，“咔嚓”一下，压碎了一张老唱片；往凳子上一坐，“咔嚓”一声，又压碎一张，弄得大家很心疼。

回城后，王小波读书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广泛。那时，虽还是禁书时代，但开放思想的风潮已势不可挡，大家都在找书看。王小波家喜欢读书的人多，往往一本书拿到后，一家人不得不排队等着看。有一次，赵东江借到一套港台版的《基督山恩仇记》，晨光就用便宜胶卷拍下来，然后，用一台老式投影仪，在家中偷偷地投射在墙上看。每次放投影，院里的青年人都像看电影一样，挤在他家看“墙书”。窗外的天黑着，小屋里却明亮无比。投影一页一页地翻着，墙上的字有时清晰.有时模糊，但底下看书的青年人们，却鸦雀无声，聚精会神，没有一个人吵闹说话，只有投影仪轻轻转动的声音。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那么专注认真。这样的经历，后辈人很难体会其中滋味。

大家看完《基督山恩仇记》都称赞不错，但据说另有一套书，比这本书更好看，就是金庸的系列小说。于是，大家又满世界寻找。王小平先找到港版《碧血剑》,后来，才慢慢地把金庸的书找齐.几个兄弟，不眠不休地一气读完了。王小平说，小波看书如疯如魔，两眼都好像要放绿光。胡贝的父亲，当时有特殊证件，可以购买外文出版社出的内部资料。王小波有一阵子住在工厂宿舍，一个星期回来两三次，只要回来，就跑到胡贝那里讨书看。到了1970年代末，“文革”结束，文化进一步解禁，中国书店的旧书可凭介绍信购买，王家兄弟及小波朋友们的阅读热情，又进一步被点燃。他们没事就去逛书店，王小波学的是英文，喜欢英文原著，《莎士比亚全集》是他的最爱。他还阅读了大量翻译过来的西方名著。他的文学趣味和欣赏口味，在那个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强化.马克•吐温、欧•亨利、左拉、大仲马、拉伯雷、萧伯纳、雨果、霍桑、

惠特曼、巴尔扎克等西方大文豪的作品，王小波就是在这一时期有了广泛涉猎。

3

逐渐成熟的王小波，也遇到了人生的大问题，那就是爱情。王小波虽然表面木讷，内心却非常敏感。作为一个有成就的作家，他的爱情道路和心路历程鲜为人知，只是在他去世后，通过《爱你就像爱生命》、《浪漫骑士》等书，大众才了解了王小波和妻子李银河之间浪漫的故事但一个人的感情经历往往是复杂的，有很多隐私对作家爱情生活的勾勒和考察，有助于理解作家独特的文学形态和美学追求李银河并不是王小波第一个痴恋的女性.而王小波也并不是李银河的初恋作家心目中最美的女性.很有可能来自其早年生涯、特别是情绪浓烈的初恋时期，而非现实配偶——尽管.现实配偶可能是他的挚爱所在、这种情况在很多作家身上都有体现.如沈从文和张兆和、鲁迅和许广平。优秀的作家，往往擅长汲取原型人物的某一特质，加以丰富想象，形成更复杂的文学人物。例如，小说《似水流年》中，惊世骇俗的悍女“线条”，据说来自王小波的同学——身材高挑、容貌秀丽的肖林。肖林聪明倔强.自信坚强，和小波一起支边来到云南，就在弄巴农场不远的瑞丽农场。她曾一度入缅作战，在热带丛林出生入死。后来，她从缅甸回国，辗转回京后，在一家出版社工作至退休“她特立独行、自尊自强的女性风范，让王小波非常欣赏。所以，在小说中，王小波就以肖林的外号“线条”命名了这个人物一H实际上，据现有材料和笔者对肖林的采访，两人虽然熟悉，但并无“明确”的情感瓜葛'

那些写于1971—1978年之间的作品，尽管比较幼稚，但更能如自传体式地揭示作家早期的心路历程：这里有自卑自怜，也有不甘平庸的呐喊.有对童年的回忆.也有对未来的展望。小说《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中.主人公“我”是一个回城知青，因报不上户口，只能靠捡垃圾度

日，这里能看到王小波从云南回来、滞留于京时期的灰暗心情《绿毛水怪》中，主人公陈辉儿童时期反抗老师和学校的描写，也显然有王小波儿时的影子。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读.《歌仙》则更是一部男性“不平则鸣”的寓言之书。王小波身材高大，却谈不上英俊，197()年代的那些岁月，无论在家无所事事，还是当工人，他都在社会底层，心态自然郁郁难平。因此，这篇小说才会展现出特殊的“改写状态”，也表现出王小波对经典文本的颠覆策略，小说中，美丽的边疆风情，让我们想到王小波的云南经历。爱唱歌的小伙子阿牛，听到三姐的歌声，喜欢上了她.却被她丑陋的容貌吓疯了。整部小说，流露着浓浓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愤慨.也有知音不赏的落寞和酸楚。

同时，我们注意到，这些小说中总有一些“清秀可爱”、却又“精灵古怪”的女性。这些女性形象.或许暗示着王小波早期的某些情感经历。王小波不属于那种花言巧语、善于取得女性欢心的男人，也不是英俊帅哥，但自有一种洒脱率真的性格魅力。而且他知识渊博、视野宽广，也能给人精神上的开阔感O1975年，王小波曾经历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绿毛水怪》成书之前，正是王小波失恋之时。此时,王小波已回城，并通过朋友认识了一位姑娘,这位姑娘温柔可爱、落落大方，模样也挺漂亮。她的父母和小波父母也都认识，姑娘曾来过王家，大家都觉得比较满意。小波经常到姑娘家里，给她的几个弟弟讲故事.把几个小男孩迷得五迷三道的。有一次.小波缺钱，无意中和几个孩子说了，这几个孩子竟把自己扑满里的钱都取出来交给小波.让王小波感动不已:据采访，这个姑娘当时在二龙路中学附近的北师大女子附中教书，比王小波稍微小一点，但对他照顾有加。王小波对这个女孩也很钟情。然而，姑娘的母亲，对王小波似乎不满意。无论工作前途，还是个人条件，王小波当时似乎很难说服姑娘的母亲。于是，只能分手。据王小芹回忆，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应是在王家。当时，正是夏天的一个雨夜，姑娘来家里还

书，进了小波的屋子。两人相对无言。姑娘告辞出来，小波送出门，两个人在门口谈了很久。小波回来后，情绪低落，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摆脱，而离开王小波，对这

个女孩来说.也是一次痛彻心扉的经历。王小波逝世后暴得大名，很多他的朋友都接受采访，或写了回忆文章，但作为王小波重要的情感亲历者.这位女性保持了沉默此中滋味，大概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而另一段重要情感经历，大概在1971到1973年，王小波滞留北京期间王小波在青虎山插队期间的房东、张玉浩的妻子刘月花对此有过回忆：一天，王小波跟刘月花一同上山干活，刘月花看到小波双眼通红。小波告诉她，来牟平插队前.他曾与北京的一个女孩谈对象有一天，女孩早上醒来，突然不能说话了，经医生检查，才知是脑子里长了瘤子，便住进了医院。小波在城里时，常去医院看望她。两人

相约，等女孩病好后,
一块到青虎山插队下乡。没想到，小波下乡后不久，女孩就故去了。
小波得知消息后，因不能陪心爱的女孩走上最后一程，而深感自责。
由于感情的私密性，王小波的家人对这件事毫不知情王小平认为,
此事不一定是真的，很可能是王小波的单恋：

当时的小波，就像其他男青年一样，在男女情事上讳莫如深。表面上古井无波.骨子里敏感多情；青春的爱欲冲击着内心，脸上却做出-副勘破世情的样子。大概他只有到了青虎山这种地方.才敢向老嫂子这样的圈外人剖白自己的心事由此山东的纯朴乡亲们得出了结论:小波如此沉默寡言，原来有这样一段伤心事。”'而王小波的小说《地久天长》中，也有一个得“脑瘤”去世的女孩邢红。据很多当事人回忆，当时教育部的确有一个叫温彦的女孩，得脑瘤去世了，时间大致在1974年左右。她在二龙路中学上学时，比王小波高一级，和赵和平的姐姐是同学，是“老初二”的学生。其时，王小波住在教育部大

1王小平.《我的兄弟王小波》，166页。

木仓宿舍“二宫门”的东边，而温彦家住在“二宫门”的西边。据赵和平介绍，这个女孩性格活泼开朗，有些精灵古怪，敢于反抗不公平的事儿.也非常聪明，在学校的时候，就是文艺活跃分子，学习成绩非常好。温彦曾短暂插队山西，因病回京休养。她和王小波回城的缘由相似，两人也有很多认识渠道，极有可能相识。即使是单恋，能让王小波远在青虎山，为之伤心落泪，想必也是心仪已久的女孩。

然而，事情还有一种相反的猜测：所谓“落泪”，不过是王小波顽童式的“恶作剧”。王小波最早的习作《马但丁》中，曾写到为女友哭泣的胶东知青马但丁。不过，他哭的是自己，而不是“死去的女友”。他不过是用这种古怪的谎言方式，像孩子一样骗取别人同情，并满足恶作剧的讽刺感，进而表达对下乡绝望生活的反抗。小说中，马但丁和女孩小罗，是关系不错的邻居。但他虽心仪小罗，回城却遥遥无期，自然和小罗也就没有希望。而当他黯然神伤的时候，老乡们都来“关心”他，他就胡编道：“我的女朋友……死了！！”然后，伤心地大哭起来，尔后他又编了一套罗曼史，活灵活现，连他自己都惊叹自己的天才。当然，小说创作不能当作作者的生活真实，王小波此段故事的真实状况，也许更为复杂，这还有待于新资料的出现。

王小波的早期作品中，很可能存在着这两位女孩的影子。比如，《地久天长》中的女主人公邢红，与《绿毛水怪》中的女主人公杨素瑶之间，就存在某些内在的神秘联系，她们可能都以温彦为原型。邢红的

性格开朗活泼.情感丰富，不拘小节，敢于捉弄军代表，最后死于脑痛。而《绿毛水怪》中陈辉和杨素瑶在一起捉弄老师的学校经历，很有可能来自温彦和王小波在二龙路中学的感受；杨素瑶要和陈辉一起去的“山东海阳县葫芦公社地瓜蛋子大队”显然是对王小波插队的“山东牟平县水道公社青虎山大队”的戏仿，也符合王小波对刘月花的叙述，《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中，那个从垃圾堆里拯救了“我”、并和我一起插队的温柔可爱姑娘,也与女子附中女教师有很多相似之处，应该说，王小波早期文学作品，有两位女孩的影子。

4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小波的情感生活一片空白，直到李银河出现C李银河对王小波来说意义重大。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李银河帮助王小波实现了文学梦想，也正是李银河让王小波死后暴得大名。她是王小波的妻子，作品的推崇者和知音。虽然，李银河对王小波的推介.产生了很多争议，然而，不可否认，没有李银河，就没有王小波皇皇的文名。李银河生于1952年，和王小波同岁，兄弟姐妹四人，她是老小。北师大女子附中毕业后，李银河曾作为知青，短暂下乡内蒙古，后又到山西沁县插队1974年，李银河作为工农兵学员，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1977年被留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后转至光明日报社任编辑李银河的父母，都是出身老八路的知识分子，革命胜利后跟随部队进入北京。李银河说,自己是一个“外表平静、内心狂野”的人。可以说,她的大胆直言、率真执着的性格，与王小波有很多契合之处，但李银河显然比王小波更具“行动性”。她有个小名“三反”，并跟随母亲姓“李”，她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一个热爱探险的勘探队员。小学升初中时，她写了一篇内容为演唱《东方红》见到了毛主席的文章，被《中国少年报》刊登了，平生第一次把文字变成铅字。她也曾写血书要求去内蒙古当知青。然而，几年的知青生活，却打碎了她的革命理想。如同王小波一样，她痛苦地发现.“自己根本不能改变世界”，只有晚上默默背诵英语单词，才能缓解她内心的孤独。同北京后，她再次去山西插队，因一篇描写农村生活的文章，幸运地被推荐上了大学。

1977年，王小波与李银河之间，显然存在很多差异。李银河的母亲李克林父亲林韦，都曾参与《人民日报》的创办并在报社内担任重要职务（林韦曾先后担任理论部、农村部主任，李克林也曾担任过农村部

主任）。林韦虽因反映安徽农村饿死人的情况，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但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很快平反，并继续得以任职，后来调任国家建委政研室主任。而王小波的家庭，因为王方名被开除党籍，一直有历史包袱°李银河认识王小波的时候，他也只是街道工厂的普通工人。他们的结缘.是因为文学。

1977年秋，王方名四川老朋友的儿子北辰，带着一个姑娘，来到了王家。这个姑娘就是李银河。李银河原想拜访王方名，就几个学术问题加以请教，却恰巧遇到了小波，几个人就聊了起来。闲谈之间，北辰提到，王小波正在写小说，这勾起了李银河的好奇心。那时，王方名的案子还没有平反，一家七八口人，就住在大木仓教育部宿舍的几间平房内，光线不好，拥挤凌乱不堪。王小波的邋遢很出名，在他那间黑漆漆的凌乱小屋里，李银河看到了写在一个黑皮大笔记本上的《绿毛水怪》的原稿。之前，李银河已在他们共同的朋友那里看过这篇手抄本小说，她被里面的浪漫狂想故事深深吸引，并朦胧中有一种早晚要和小说作者发生点什么事情的预感。这本书成为他们的媒人。后来，两人逐渐走动起来。一开始，两人之间的交往，还限于谈谈人生理想、交流关于文学的心得体会。直到有一次，王小波去报社找李银河，主动问她，有没有男朋友，李银河愣了一下，说，现在还没有。王小波就单刀直入地说，你看我行不行？在当时还较保守的社会氛围中，这非常大胆，也坦率真诚,王小波虽并不是李银河的初恋对象'，

1李银河致王小波信，《王小波全集》9卷.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92页。

但王小波的气质，却打动了李银河，两人开始正式确立恋爱关系。李银河在很多文章中都写到,《绿毛水怪》这篇小说是他们的“姻缘书”。现在看来，这种浪漫的结合，很有1980年代启蒙理想主义的味道。1980年代的小说，无论是《南方的岸》，还是《古船》、《人生》，都有一种

文学青年的理想主义气质，总有一个条件优秀的好姑娘.喜欢和欣赏那些有才华却落魄的男青年。在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的今天，类似事情，也就近乎绝迹了。

围绕《绿毛水怪》，还发生过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绿毛水怪》写成后，李银河并不是第一个阅读者。这篇写于1976年左右的小说，首先在小波的家人中传播，后来就是小波周围的朋友传看。朋友圈第一个借出《绿毛水怪》的是胡贝。当时胡贝还在部队当兵，假期回来，没事就去找小波玩。他听王晨光说，小波写了一个“特别棒”的小说，就问小波，小波却只是笑，接着把那个笔记本递给了他。胡贝一看.就被里面的故事打动了，嚷着要拿回家仔细观摩。小波想了想.也就同意了。胡贝回家后，认真读了两遍，对里面的幽默细节忍俊不禁。在胡贝的宣传下，胡贝的哥哥、妹妹和父亲，也都读了《绿毛水怪》，大家都觉得很好。过了几天，王小波向胡贝要这本小说，胡贝却发觉笔记本不见了！小波非常不高兴，可也没说什么。胡贝非常内疚，回家翻箱倒柜地找.但始终没找到。又过了几天，才终于有了小说的下落。胡贝的父亲是人民大学的中层领导，原来是他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严连德去胡家串门，看到这本小说，给拿去了。有意思的是，严的父亲，也对这本小说青睐有加，而他的父亲，正是我国著名文学家、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严文井。严先生看了这篇小说，先是说好，又摇头叹息说：“可惜了，这么好的东西，我没办法出版。”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下，像《绿毛水怪》这样惊世骇俗的小说，的确很难出版，也很难入编辑法眼。事实证明，这篇小说在王小波生前，也一直未能发表——它迟至王小波去世后的1998年，才由《花城》刊出，一经刊出，就迅速引发了广泛关注。

对于他俩的结合，王方名一家也有点惊讶。那时，李银河不仅工作好，且在政坛也开始显露影响。她与林春合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要大大发扬民主与加强法制》（1978第3期）的长文章，呼吁中国的议员应该由公民直选，被《人民日报》转载，引起了广泛影响。这在

当时是政治前途光明的预兆，而王小波却近乎一文不名。关于他们的关系，李银河家里最初也不同意。李银河的母亲李克林，是主要的反对者。她曾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小波、银河刚谈恋爱时，我觉得这孩子傻大黑粗的，看去挺怪，心里有点嘀咕，虽然我并不喜欢’小白脸’，可总怕这人靠不住。”'王小波在给李银河的信中.也郁闷地提到：“你妈妈不喜欢我。”“咱们不要惹你妈妈生气，所以不能常常在外面待得太晚，总之，我只好等时间来解决问题。我猜老人家心里给你选了更好的人呢。不知道他是谁，不过他一定也是好人”

但从本身来说，他们恋爱关系的行进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2003年，接受《鲁豫有约》栏目的采访时.李银河曾透露出若干他们当年交往的细节。交往之初，他们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时光。印着光明日报社信笺的信件，在王小波的工厂里曾引起不小的轰动。一开始，大家都以为王小波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文章，有类似“范进中举”的羡慕，等得知王小波居然和《光明日报》的编辑谈恋爱，就只有“瞠目结舌”的份儿了。交往一段时间后，李银河对王小波产生了厌倦,直接原因是觉得他“长得不行”。接着.李银河提出分手，并说还可以是好朋友，并给了王小波两张电影票。但王小波把电影票寄了回来，并说：“你应该从信纸上闻到竹叶青、二锅头等很多酒的味道，因为何以浇愁，唯有杜康。”他还幽默地说：“你应该去动物园的爬虫馆里看看，是不是我比它们还难看，还有，就是你也不是那么好看嘛后来，王小波又写了好几封信，用幽默诙谐的语言，打消了她的顾虑，并增进了他们的感情。当王小波投考中央戏剧学院失败后，他也曾给李银河写信，宣布“你已经二十六七岁了。不能再和一个骆驼在一起。既然如此，干脆不要竹篮打水的好”。事后，两人经过反复思考，又和好如初了。

1李克林.《我的女婿王小波》，《浪漫骑士》，113页。

5

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情书（主要指从街道工厂到大学期间），是研究王小波的重要文献:从中我们大致可看到一个浪漫至极，但性情率真、聪明叛逆的文学青年的影子。王小波曾写下这样浪漫的句子：“以前骑士们在交战之前要呼喊自己的战号。我既然是愁容骑士，哪能没有战号呢。我就傻气地喊一声：’爱，爱呵。’”“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你是我的军旗”。现在读来，依然令人感动。从这一时期的通信，我们也可看出，王小波虽是一个具理想主义气质的作家，但他的理想主义却和他的讽刺精神以“悖论方式”结合在一起。他始终不是“好孩子二他借助民间的破坏力和野性自由，表达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和对宏大叙事的批判。他写道：“我从童年继承下来的东西只有一件，就是对平庸生活的狂怒，一种不甘没落的决心。小时候我简直宓妄，看到庸俗的一切，我把它默默地记下来，化成了沸腾的愤怒。”他借萧伯纳的戏剧《匹克梅梁》中的一句话，套在自己身上：“我承认我两样都有一点：除去坏蛋，就成了有一点善良的傻瓜；除去傻瓜，就成了愤世嫉俗、嘴皮子伤人的坏蛋。”他对虚伪道德的唾弃，及他对精神英雄气质的追求，都让他的内心具有了以喜剧形式呈现的悲剧性感受。因为深爱智慧和美，所以对现实的虚伪和庸俗的容忍度也随之降低。也因为爱人，所以恨人：

> 家兄告诉我，说我写的东西里，每一个人都长了一双魔鬼的眼睛。就像《肖像》里形容那一位画家给教堂画的画的评语一样的无情。我想了想，事情恐怕就是这样。我呀，坚信每一个人看到的世界都不该是眼前的世界。眼前的世界无非是些吃喝拉撒睡，难道这就够了吗？还有，我看见有人在制造一些污辱人们智慧的粗糙东西

就愤怒，看见人们在鼓吹动物性的狂欢就发狂……我总以为，有过雨果的博爱，萧伯纳的智慧，罗曼•罗兰又把什么是美说得那么清楚，人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再是愚昧的了。肉麻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赞美了。人们没有一点深沉的智慧无论如何也不成了。你相信吗？什么样的灵魂就要什么样的养料……没有像样的精神生活就没有一代英俊的新人。

这里的“新人”显然不是“社会主义新人”，而是具文艺复兴式伟大精神力的“新人”。这种人生态度显然和主流文学对“新时期”的描述有很大不同。“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历史，被认定为“春潮乍破坚冰”，左倾思想虽依然横行，但新的希望，特别是改革的希望，已让全中国处于凤凰涅槃的“新生”。这是一种新主流话语塑造的方式，与旧革命叙事有关联，但巧妙引入了“现代化”概念，以物质合法性“偷换了”革命合法性，并交杂启蒙理想主义激情。然而，这些主流的话语，在王小波那里并不存在。“文革”结束后的北京，已在革命的退却中，日益显出古都的衰败和第三世界国家恶劣的生存空间环境。那些被压抑的“阴”的世界，虽然粗鄙不堪，却生机勃勃——但是，这种“新人”理想显然也只是王小波理想主义气质的一种表征。1990年代，当他投身文坛，却发现“新人”的理想更遥远了，他只有冰冷的绝望和讽刺，及对古代中国世界的想象了。

从这些通信中，窥见李银河对王小波的“塑造”，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从李银河公开结集出版的《爱你就像爱生命》，不仅可看到王小波和李银河的爱情、王小波的为人处世和人生追求，也能看到结婚前，李银河对王小波的塑造。李银河的爽朗直率、善良单纯、对真理的热情追求，以及理想主义的激情，都深深感染了王小波。在李银河身上，王小波看到了自己的矛盾。他总称李银河是“坚定的战士”，两相对比，自己多的则是悲观的冷嘲，痛恨肉麻，对平庸生活的猥怒，虽然也想爱

人，无条件去奉献和牺牲，但却总是“既狂暴又怯懦”。

即使在那些热恋期间的通信中，我们也能看到“文革”结束前后，李银河与王小波之间的某种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是两人的生活背景、性格特征造成的，也来源于两人不同的美学趣味和价值准则。认识王小波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李银河还是一个标准的新时期主流知识分子。她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真诚地希望改造社会，相信政府和党的力量，对文学和艺术抱有热情，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有新时期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她的社会参与意识强，喜欢争个高低，也曾自嘲“虚荣心强”，有点偏执穽'。结婚前，她曾想按主流知识分子的标准塑造

1李银河曾说，1990年代，她在内地当教授，听说同事在香港当教师，工资是她的一百倍.就特别受刺激。见《李银河:我外表平静.内心狂野》,《凤凰网自由谈》58期,2012年4月19Ho王小波。比如，她讨厌王小波说粗话，认为这是不文明的表现，两人因此曾闹翻过。王小波解释说：“我是经常说粗话的，因为我周围的工人们都说，而且我也是一个工人。我们说的有时不堪入耳，但是心里只把它当些有趣的话哈哈大笑一场我多半是一个粗人……我有什么道理装模作样吗？”显然.王小波并不认为，工人就低人一等，也不认可知识分子对于语言的所谓文明规范。李银河也认为，王小波有的时候，有一些喜欢“封建社会的江湖气”。'又比如.李银河希望王小波不仅要考大学，且要入党，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但显然王小波对政治不感兴趣.多次加以幽默的推诿爱情是甜蜜的，有时会掩盖差异，但爱情也并不能完全遮蔽不同趣味，也不能掩饰恋爱过程中，因“地位”不同，内心的复杂微妙情绪。比如，王小波在1978年7月的两封信中，专门谈到了入党问题：

还有入党的问题，我恐怕入不了。要入就要做一些……事情。总之，在我们这个街道厂，党员不是五十几岁、解放脚的老大妈，就是咋咋呼呼的小女孩。我恐怕要做到哪一种都不容易，尤其改变性别恐怕根本办不到。这种说法虽近嬉皮，却千真万确。

还有你和我谈的对党的感情问题。你是个好女孩，可是你还不

懂男人呢。我怎么能没感情呢，不过要我用这个感情跳出个忠字舞，就是杀了我也跳不出……我们都认为，什么感情要是可以随时表演给人看的必定是肉麻的。你要问我它

1《王小波全集》9卷，27页

是什么样儿的，我哪知道它是什么样的。你们一定知道，因为你们情感细腻啊。你要问我，我都不知从何说起，只好瞪大眼睛傻乎乎地说："有哇，我担保，有。"

王小波生前未发表的小说遗稿中，有一篇《不成功的爱情》值得注意，从中也可看出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王小波对待“爱情”的某些微妙情绪。该小说文笔较粗糙，应是王小波早期习作。而就该习作透露出的内容看，却颇值得玩味。小说有一个自传式主人公“我”，而内容就是“我”和女友发生矛盾、最后分手的故事。小说开头介绍了“我”：十年前在农村修理地球，后来在城里街道工厂工作。每天下班后，“我”即到环城林荫道去。女朋友在那儿等“我”一起散步、谈文学、谈艺术、背诗词。小说中主人公的女友常拿一些知识考他C女友也要求他背各种知识，以使他看上去像“上等人”。这成为他们分手的原因。小说中提到的名人有马奈、萨特、张抗抗、费雯丽、陈冲、张洁、刘晓庆等，可见该小说的创作时间和背景。女友以知识为高人一等的资本，而看不到知识本身的乐趣、小说讽刺性地写了乡下两个自称狐仙附体的妇女的斗法。最后写了两个梦，一个是“我”变成了一头牛，女友则成了赶车的人，牛一走慢了，她就用小木根戳牛的阴囊；另一个是“我”去参观屠宰厂，流水线上的猪被杀的时候.都在大声喊“萨特！”：“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不足

识别周围是否是猪圈时，也只能徒然增加临死时尖叫的内容。”小说结尾，“我”把这两个梦讲给了女友：“她的眼神很奇特.说不上是怜悯还是轻蔑，后来她就走了。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唉，飞走了，我的小白鸽。”“我”对女友的爱、对分手的患得患失，以及对女友的不满.形成了微妙的情感矛盾。该作品和李银河有无联系，我们不得而知，但该小说至少隐秘地透露出

那一时期王小波对待爱情的态度

6

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让王家人备感振奋。王小平、王晨光和王征，同时备战高考。当时，几个人考得都不错,但只有晨光一人考上了北京钢铁学院，据说还是宋华托了一个同事的关系，才被录取；而王征因家庭问题被挡在大学门外；王小平据说是因体检查出了高血压。而王小波对当年高考能否凭借学习成绩考上，还心存疑虑，故此没有参加。这次失利，对兄妹的打击还是很大，对王方名的打击更大，家里一片愁云惨雾。

第二年，也就是1978年，在李银河的鼓励下，王小波报考了一次中央戏剧学院。考试前，李银河专门带着王小波去了舅舅家，让他给小波讲了一通考试注意事项，但小波显然对舅舅讲的革命文艺不太感兴趣。小波的同学赵宁也和他一起报考了，当时的考试较简单，就是两门课程：一门是文艺理论常识，大多是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文艺思想之类的题目；一门是作文，题目是《旅途中》。'初试小波通过得很顺利，赵宁却被刷了下来。复试一关，主考官问小波，最喜欢的剧作家是谁。他回答说是萧伯纳。结果，全场冷场了很长时间。当时，萧伯纳属于较冷僻的作家，远不如经典剧作家知名度高，很多考官也不熟悉°同时，萧伯纳也属于较另类的作家。于是，不久之后，王小波就知道自己被淘汰了。可以想见，如果王小波考上中央戏剧学院，进入文学体制，那么，他的为文经历和成就，也许就是另一番样子。

这次高考失利.对王小波和李银河的爱情，也是一次考验。它加

1据2012年11月20日对赵宁的采访。

深了李银河家对他的某些“看法”和“成见”，为此他和李银河还闹了别

扭。但王小波顶着压力，很快就转移了考试方向，不再考灵活度高的文科，而是听从了父母的话，改考理工科。好在1978年还有一次高考机会，主要针对老三届的学生。可以说，如果错过这次机会，将来再考可就难了。因为，当时王小波也已二十六岁，哥哥王小平则快三十岁了，都属于超龄老童生。王方名之所以赞成儿子学理工科,也是多年来对政治运动的警惕，总认为文科虽热闹，但也易出问题,想做真学问，牵扯到意识形态也很难做好，不如老老实实读一点技术类学科。王小波的学习异常刻苦。这段时间，他躲在北京郊区木城涧煤矿千军台坑八二。室、哥哥王小平的宿舍里发愤苦读，虽说不是头悬梁锥刺股，也熬得眼睛通红。他喜欢数学，却没受过完整教育，系统复习也已来不及了，只能凭感觉靠做习题来解决。而在艰苦的复习过程中，只有给李银河写信，才能让他苦闷的心情得以舒缓。最后，他终于鲤鱼跳龙门，考上了人民大学1978级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虽不是当时热门的文科生，但也是正经八百的名牌大学的学生了。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1978年全国高考六百一十万人报考，录取四十点二万人，录取比率不足十分之一，而王小波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儿。与此同时，王小平和王征也传来喜讯，两人也双双被大学录取。王小平还一鼓作气，直接考上了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的逻辑学专家沈有鼎的研究生。[1]

紧接着，王家的现实环境发生了重大转变，不仅因为几个孩子先后考上大学，也因王方名本人的冤案终于得到了平反。1970年代中

1当时，针对老三届等大龄考生，1977、1978年的高考，如成绩优秀，可直接申请报考研究生。

期.王方名曾中风过，一度不良于行。王小芹和丈夫姚锐戈的儿子姚勇出生后，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很多欢乐。幼年的姚勇，长得非常可爱，大家都喜欢他为方便姚勇学习走路，王方名总是担心地、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随时佑护之。慈祥之爱心，令人感动。在外孙姚勇的带动下，王方名竟奇迹般恢复了健康，行动坐卧，均如常人。1978年秋.王方名的案子有了转机，借纠正冤假错案的东风，经过李新等人多方奔走，钱俊瑞、安子文分别签字同意撤销当年的批示c1980年春，经中组部研究，终于顺利摘掉了当年“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并恢复党籍。但是，距1952年被错误开除党籍，已过去了二十八年，漫长岁月中积累下来的

学术笔记和资料，也都在“文革”中被抄没或付之一炬，一个人最好的时间，都被消耗在了恐怖而辛酸的岁月里。王方名有很多野心勃勃的学术计划，比如，他想写一本《人类思维史》.着重谈谈形象思维的形式问题，但精力和资料等客观条件都不能允许他再达到主观愿望。于是，他陷入了精神的矛盾和恐慌之中。助手和他闹翻了，王小平本同意父亲的很多观点.但最后也不支持他了。“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这是王方名晚年用以自况的伤感诗句。他晚年的行动变得难以捉摸，有时通宵写作，有时变得迟钝，有时心血来潮、随性情而动。一次，他甚至一声不响地去四川看望在当地大学教书的弟弟。'1985年9月3日，人民大会堂召开盛大的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活动，并向全国电视直播在家中，王方名靠着被子，在观看电视的时候，溘然长逝、当时家里没有其他人，孩子们都不在，宋华也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了，无人知晓王方名生命最后一刻的感受。是为青年热血抗战的往昔自豪？还是研究学术壮志未酬的遗憾？那个

1李浙，《追思逻辑学家王方名》.《炎黄春秋》，1992年3期

从四川渠县出走的热血青年、火药原料商的逆子，在梦中是否回到了那条坎坷却充满激情的出川之路？那些艰难险阻，那些欢歌笑语，只有飘荡在抗战胜利纪念日的隆隆礼乐之中，才能告慰一生的诸般滋味直到他去世八年后.他的学术著作《逻辑探索——王方名学术论文选》,才在各方人士帮助下.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早年投奔革命.中年入学术，晚年落寞，王方名的一生犹如一出热闹多彩的戏剧。一代学人，一生经历，足以让后辈品味、怀念和思索。

7

1978年9月，王小波进入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商品学专业学习。当时，人民大学刚处于恢复期（“文革”期间，人民大学曾一度停办）,很多校舍都被外单位占据,在入学教育中，系领导就指着被解放军二炮部队强占的教学楼“痛说家史”，学校南部也被外单位占领，被很多老师称为“南部四岛”。学校的伙食也不好，朋友来了，只有出去吃饭。当时，贸易经济系和经济信息系是人大仅有的两个理科专业O贸易经济系数理化和生物课都有，而经济信息系则开设了数学和计算机课程c1950年，为配合国家建设方针，人大有针对性地设置了八大系：经济系、经济计划系、财政信用系、工厂管理系、合作系、贸易系、法律系、外交系。商品学专业的前身，可以一直追溯到合作系.为其中的一个教研组。1978年.商品学“试招生”（一直延续到2004年这一专业被取消），只招理工科学生，毕业时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就当时的教学安排而言，商品学在人文社科气息弥漫的人大，显得十分“另类”。大三之后.再细分专业.王小波选择了食品商品学专业。七八级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有三十二人，中途有一人退学。除了两个湖南人，一个广东人，全都来自北京。当时全班有大约三分之一“老三届”的学生，另有一些低于“老三届”的插队知青，还有部分七八级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很多同学来自知识分子家庭。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平素過遢的王小波，居然在大学一年级当选为班里的生活委员，负责收集班里同学们的粮票和钱，再兑换成学校的饭票。

大学时期是王小波最平静、充实的岁月。他的爱情也终于开花结果。当时李银河住在阜外大街建委宿舍，王小波先是住在西单大木仓胡同教育部大院家里，上学后一直住校。两个人一般周末见面，常去郊区的公园散步、聊天。王小波刚上大学的时候，李银河家依然不同意她和

小波的关系。两家关系也很紧张，有一次，王小波甚至听说,李银河家里的人，要给他父母写信阻止两人的关系，他甚至想把这信抄写成大字报，请路人评理。'这些问题给王小波带来了很多困扰和痛苦，李银河歉意地说：“你是我的天堂，可我是你的地狱。”2

但爱情暂时战胜了一切。热恋中的王小波和李银河，一个星期不见面就感“如隔三秋”。他们之间的通信，更是缠绵俳恻'李银河对王小波寄以厚望，她坚信王小波能取得巨大成功,她坚信他能拿出无愧于人类智慧也无愧于自己的东西，因为王小波有一种十足可贵的品质，就是“真”。3李银河甚至在信中说：“我们不要大人，你的父母和我的父母，不论现在和将来，让我们把他们抛开，我们只是两个人，不是两家人，我们是两个在宇宙中游荡的灵魂，我们不愿孤独，走到一起来，别人与我们无关……”在李银河的坚持下，家里人也只有无奈妥协。李银河高兴地说：“家里似乎改变了什么方针，谁都不当面

1《王小波全集》9卷，91页

2同上，78页。

3同上，85页。

追问我去哪儿了，妈妈也不那么气急败坏的了。我们手拉着手，继续往前走吧！”'坚守的爱情终于就得了胜利和尊重。1980年1月11日二王小波和李银河领了结婚证。他们没举行婚礼，也没拍结婚照，只是两家人各自请了一桌饭，算是庆祝：双方的很多好友都不知这个事情，只是后来王小波在街道工厂时的同事们知道了，给他们送过礼物。王小波当时还是大二的学生，人民大学规定，大学期间不准结婚，所以他们的婚姻属秘密状态.连结婚证明，都是王小波找原来的街道工厂给开的。王小波为人简朴.很少给李银河买东西，只有一次花了五元钱买了顶纯毛帽子，算是生日礼物。

谈恋爱阶段，王小波和李银河的爱情，就显现了有别于常人的状态。一般中国人的爱情是为了结婚、生子，过日常的生活，而王小波和李银河，因为相互心智和气质的吸引走到一起，他们是情侣，也是心灵和事业相互沟通、共鸣和支持的知己。两人在恋爱的时候，就下决心献

身于各自的事业，过高贵的精神生活，决不为虚假的模式所束缚：“愿我们的生命力永远旺盛，愿这永恒的痛苦常常来到我们心中，永远燃烧我们.刺痛我们。”'李银河崇拜梭罗和伊壁鸠鲁，认为婚恋一是要保持身体舒适，二是要保持精神愉悦。当时，这种婚恋状态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也是很少的。李银河在给王小波的信中还说：“我很愿意和你在一起，但是自由地和你在一起，你也保留你的自由权利吧。我看报看参考，越来越感到海誓山盟的时代过去了。如果没有感情我

1《王小波全集》9卷，89.93页。

2根据《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一王小波画传》（大众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中刊登的王小波和李银河的结婚证，两人的结婚日期是1980年1月11H,而在各类采访中.李银河则称，21日是他们结婚的日子.据推测.21日大概是两家靖客、宣布结婚的时间。

3《王小波全集》9卷，77页

们就分离，我坚持这一点，不过我们可以约好互相安慰的义务……”'王小波也基本同意这种观点：“海誓山盟有什么用？我要的不就是我爱了人家人家也爱我吗？……你愿意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随你吧"两人婚后商议不要孩子。李银河讨厌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女性的角色定位比起日常家务、相夫教子.她更喜欢追求个性独立和精神世界的完整据王小平在回忆录中记载，结婚以后，他们的日常生活一团槽.但俩人自得其乐，不以为苦，李银河搞学术的时候.甚至一连好几天靠吃几块饼干度日’有一次，王小平到他们的家中，发现一个喝水的杯子，居然被黏在了茶几上，拿都拿不下来。2李银河说：“报上的那篇文章……说’媳妇’（我真恨透了这个词）如何爱下家务事，把一家大大小小、哥哥妹妹之类照顾得多么周到。我觉得真要命，真讨厌得要命。这真是亵渎。难道一切美好的诗一样的东西都非淹在这些粪便里面吗？”-李银河聪慧、倔强，却单纯热情，崇尚个性，有强烈学术进取心。王小波外表随意洒脱.沉默寡言，但内心敏感多情.善良正直，鄙视庸人生活.崇尚自由、宽容c李银河能给王小波勇气和自信，而王小波也能给李银河以爱和智慧的精神交流。两人的关系有些柏拉图意味.他们拒绝世俗生活——尽管，他们不可避免地身处

世俗之中。

8

王小波后来虽然成了作家，但他和很多大学时代好友一直关系密切。比如.老班长郑英良.是班上年龄最大的，他后来做了人民大学

1《王小波全集》9卷,89页。
2王小平.《我的兄弟王小波》 93页。
3《王小波全集》9卷.107页。

副校长，与王小波一直很亲密。而在加拿大的钟明、在日本的李奇志，当王小波去世后，也都写了悼念文章。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阎景明.毕业后去了美国。王小波去世一年后，弟弟王晨光在底特律被黑人刺死，阎景明天天开车来帮忙治丧、慰问。而说到关系最好的，还是和他一个班、一个宿舍的刘晓阳。“脸色黑黄，嘴唇发紫，上身颇长。坐在凳子上，比他身旁的班长高出一大截”，刘晓阳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王小波和刘晓阳的一位插队知青同名，所以，第一次点名的时候，刘晓阳就注意到了王小波,当时，刘晓阳坐最后一排.王小波和班长郑英良坐在中间课桌的倒数第二排。刘晓阳对王小波第一印象不好，总感觉有些“口里口外，刀子板带”的凶徒味道：下课后，两人一起抽了一次烟，刘晓阳这才发现，王小波在生人面前很腼腆。以后两人就彼此熟稔起来，两人都爱诙谐，爱读书，不多久，就混成了好友。散文《盛装舞步》中.王小波略带调侃地问忆了大学期间，他和刘晓阳的友谊两个“高大粗壮”的北京老爷们，手臂挽着手臂在校园里遛弯，还学马术比赛的样子跳踢踏舞，同时高谈阔论着哲学、文学、数学和物理等学问，旁若无人，又时不时爆发出欢笑，令无数行人侧目，还差点被承受力脆弱的同学们.误解为赶时髦的“好基友'

大学期间，王小波着迷于知识带给他的快乐，却依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王小波还是不修边幅：冬天总裹着一件褪色军大衣，夏天则赤脚蹚拉着拖鞋“他不太看重分数，除了上课，就喜欢聊天，看各类闲书。到了期末，才突击应付考试，却每每能有惊无险地过关。有一次，物理化学考试前一天,王小波拿傅献彩编的教科书《物理化学》回家去读，刘晓阳看那书还很新，就担心地问是否能来得及。谁知道，第二天，王小波就把书拿回来了，全都认真读完了，只是书被读得卷了起来，像黑黑的海带。王小波不喜欢商品专业，但这样的选择也无可奈

何。他最讨厌洗试管、烧杯，还有漏斗等瓶瓶罐罐-而当时实验课管理很严，洗不干净，实验做不成，就不能及格。王小波从小喜欢鼓捣东西，但动手能力不如哥哥和弟弟，然而他的鼻子很灵，一闻就知道食物的好坏。这样他们上“八大名酒”的品酒课程时，算对了他的路子。当时实验室在人大现在的西北门一带.是一间宽敞的平房，里面的设备以化学方面居多做毕业论文的萃取实验时.粗心大意的王小波竟“漏掉了五大瓶氯仿（麻醉剂）”，肺活量大的他浑然没事，只稍稍有点头晕，而搭档们却都受不了，就给了王小波一个“实验室人民公敌”的外号。其实，刚入校体检时，王小波就震惊了学校，由于小时候身体不好，他有扁平足，漏斗胸，但偏偏肺活量惊人，遥遥领先于同学们。'

正是在大学期间，王小波的阅读面不断变深、变广。他像一条贪婪的大鱼，任意而强悍地遨游在知识的海洋。在学科专门化、学者专家化的今天的大学校园，很少会遇到像王小波这样“兼通文理”的杂家了，而放眼整个新时期以来文学家的知识背景，也很少有像王小波这样脱离纯粹文学背景的。正是这种杂学旁收、文理兼顾的学养，不为功利、只为兴趣的读书取向，才使得王小波的小说，既深刻反映了时代，又有一种超越于时代之上的“文艺复兴式”的大气魄,他的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中有一段话，可以看作是对这段读书岁月的忆述:“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科学、艺术.甚至还有哲学，上大一时，读着微积分，看着大三的实变函数论，晚上在宿舍里和人讨论理论物理,同时还写小说。虽然哪样也谈不上精通，但我觉得研究这些问题很过瘾我觉得每种人类的事业都是我的事业，我要为每种事业而癫狂——

1参见黄平,《有关王小波鲜为人知的小》.《新民周刊〉,2008年16期'

这种想法不能说是正常的.但也不是前无古人。古希腊的人就是这么想问题。1978年9月入学后，王小波、刘晓阳、刘继杰、郑英良等六位同学，住在人大东风学生宿舍二号楼的二三五号房间（如今，该楼已拆除，原址建成商业会所），房间里几个大书架，满满地都放了书籍.几个人常抽烟、喝酒、彻夜讨论各种学问，过的可谓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高品位精神生活。王小波后来引以为经典的奥威尔的《1984》、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就是大学时期，王小波从刘晓阳买的外文出版社的内部资料中第一次看到的。文学方面，王小波阅读了大量当代西方文学家的作品，如麦尔维尔的《白鲸》、海明威的《老人与海》、聚斯金德的《香水》、杜拉斯的《情人》、图尼埃尔的《少女之死》、迪伦马特的《法官与刽子手》、卡尔维诺的《分成两半的子爵》等，这些作品成为王小波日后创作的重要思想和文学资源°科学家写的书.王小波也爱看。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过一套科学家杂谈，如马克斯•波恩的《我这一代的物理学》，冯•诺依曼的《计算机和人脑》、赖辛巴哈的《科学哲学的兴起》等，印数有限.非常难收集，刘晓阳曾费了很大心力搜集一套，王小波认真读完后，认为科学家写的人文哲学的书，非常难得且可贵。他还在《丑小鸭》杂志上，发表了小说《地久天长M1982年7期），并在《读书》上发表《老人与海》的书评（1981年1期），算是开始涉足文坛。1980年代日渐开放的风气，也让李银河兴奋不已。她高兴地对王小波说：“中国解放的步子终于迈起来了。你可以好好写、放开写了，再也不用去写那种像受了阉割一样的xxx式的东西了，不用担心碰壁了。我们所热爱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可以告诉人们了。”'尽管，这样乐观的预言显

1《王小波全集》9卷，83页

然为时尚早。

当然，这一时期的王小波，思想和艺术都谈不上成熟。大学期间，数学老师朱光贵先生.对王小波的影响也很大。王小波在《思维的乐趣》里，特意提到：“我在大学里遇到了把知识当作幸福来传播的数学教师，他使学习数学变成了一种乐趣我遇到了启迪我智慧的人一”这种单纯的对知识的热爱.是一种对知识本源的价值意义的尊重。这位老师就是朱光贵先生。朱先生毕业于北大物理系，却在空军航校教了半辈子的高等数

学。朱老师讲课.常常超出教学大纲的范畴，但他见识高远，讲解细致精妙而他对科学的热爱，更令人感动，虽然后来从事数学的教学和研究，搞不成物理学了，但朱老师抱着热爱的态度，还在《潜科学》上发表了与“相对论”相关的论文。朱老师这种不计利害、以“知识为乐趣”的精神，让王小波非常佩服

大学四年匆匆而过，王小波和同学们都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同学们也都喜欢“这个爱讲故事的大个子”。在人民大学，王小波进一步发扬了小时候讲故事的才能。钟明印象很深的是，在天津新港毕业实习的时候.每天晚上大伙会在招待所里一边煮螃蟹一边听王小波讲武侠故事。平常的王小波“老蔫似的”，“此时他判若两人，像说书人一样，先慢条斯理地拉开序幕，然后绘声绘色、口若悬河地讲起来”。实习二十多天，天天晚上如此，王小波就此成了班上最受欢迎的人。'临近毕业，一次聚会上，大家嚷着让王小波讲故事。那天王小波讲了一个刁蛮妇人把丈夫和儿子“都变成羊”的故事，故事结尾，丈夫的朋友要把羊牵走，妇人连忙大叫，留小羊，小羊是我儿！利用谐音捉弄

1黄平.《有关壬小波鲜为人知的事》，《新民周刊》,2008年16期。

了“刘晓阳”，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这个故事，虽说是王小波情急之中编的.但故事原型在安吉拉•卡特的《精怪故事集》和中国民间故事中都有，也反映了王小波对民间文学的热爱：'

1有关王小波的大学生活的部分，参考了刘晓阳先生的散文《地久天长》（载《浪漫骑士》，409—424页），谨此致谢。

第七章留学经历-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人生在世，就如一本打开的书，我们更希望这本书的主题始终如一，不希望它在中途改变题目——到外文化中生活，人生的主题就会改变。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生活更加真切，哪怕是变得平淡也罢，这就是我们回国的原因这是我们的选择，不见得对别人也适用。

——王小波《写给新的一年（1996年）》

1

198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出国热”。很多中国人都希望出国开眼界，体验新世界的生活，这股热潮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1983年，李银河参加了两个美国教授的短期培训班后，萌生了去国外读书的念头。很快，她得到了签证.赴美国匹兹堡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1984年，王小波也追随李银河，去了匹兹堡大学，而王小波的大哥王小平，姐姐王小芹、王征，弟弟王晨光也都先后去了美国。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留学条件也日益放松。1984—1985年左右，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提出“自费出国留学是培养人才的一条渠道，也是贯彻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国外智力的

一个方面。国家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在政治上与公费留学人员一视同仁"o1985年后的大陆留学指导方针，为“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很多人就是在这种“潮流性留学”情况下走出了国门，有些并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而为了生存，打工就成了无可奈何的辛酸选择。因此，这一代的留学生也被称为“洗盘子换读生”。一些人经过艰苦打拼，最终在国外站住了脚，《北京人在纽约》中的由画家变为成功商人的王起明，就是这类人的代表。

1982年，王小波从人民大学毕业，留在人大一分校教书。随着李银河出国，王小波和大学同学刘晓阳一样，成了“留守男士”。这段时间，除了读书、教书，王小波似乎对将来的生活并没有过多打算，用刘晓阳的话说：“小波上下班半路上拐个弯就能到我们厂，他常来我办公室聊天，有时还去厂里的澡堂洗个澡。我们毕业后对将来没什么打算，就是等国家改变留学生政策，以便我们也能走西口去会各自的老婆。那时我们受到两项政策的约束。其一是留学人员不许带家属，如果一人留学，则配偶不得出国。另一条是大学毕业必须服务两年，否则不得出国。”王小波的“业余写作”爱好还在坚持着，《三十而立》、《似水流年》等小说都能看到那段短暂的高校教师经历的影子。大学实验室的生活、出国的努力，也都能在这些小说中看到。也正是在这--时期,王小波开始酝酿日后的成名作《黄金时代》。但总体而言，一切方向性努力还不明朗:

整个1984年上半年.王小波都在忙着联系出国的事°他和刘晓阳互通讯息，终于等到了“福星”的光临，护照顺利拿到了，但签证两人心里都没谱。那时候，对王小波这样中国著名大学毕业的大学教师，签证还是较好办的，但拒签的情况也有。而且，根据规定，如连续被拒签，就要在护照上做标记，很长时间不能再申请，而如多次被拒，也有可能丧失签证资格。因此，王小波他们的签证经历，真是提心吊胆，紧张万分，

颇有点二次上“高考考场”的感觉。王小波和刘晓阳都是高大的北京汉子，去签证之前，却偷偷地先侦察了一下地形。其时，使馆外面围着很多人，都是办签证的，也都在看风向，据他们介绍经验，要看签证官员，如果是“黑脸包公”，就躲着点；如果是“笑面菩萨”，就抓紧签。

第二天上午，王小波和刘晓阳鼓足了勇气，一起去使馆排队，眼看就要轮到了，突然想到被拒签的恐怖，两人都做起了谦谦君子，互相谦让起来。最后，王小波发狠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出去打了头阵。当时，他们两人的英语都不行，只在头天晚上结结巴巴地背了几个可能用上的句子。不料，小波把材料递过去，申请去美国东部的匹兹堡大学学习，对方看了看他毕业的院校，连一句英语也没问，就随手批了。刘晓阳跟着申请去明尼苏达大学，也顺利签了C刘晓阳回忆说：“当时王小波手里只拿了一份IAP-66表,自然得到的是J-1公派签证。我手里除了IAP-66表以外，还有一份1-20表。我把两张表同时递进去。签证官让我选一个。我便选了1-20表，拿了F-I自费留学签证。我们两人都不是陪读的J-2或者F-2签证，而是各自直接的留学。”一般而言，J-1签证是访问学者申请公派留学所需办理的，需要一定学术准备和英语知识，以保证申请人在接收的教育机构能顺利完成整个学习过程，所以，口语不好的王小波自然万分紧张。办好签证.王小波和刘晓阳乂商量去买飞机票和置办服装。由于身材高大，最后他们只好到利生体育用品商店去买了运动服，充当出国行头。1984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北京首都机场，王小波乘坐的开往纽约的中国民航客机起飞了。飞机刚起飞，忽然天空打了一个炸雷,让送他的家人和刘晓阳提心吊胆了一整天。但王小波并没有听到那一声惊雷，因为当时飞机已经飞出云层很远了。当两人都安全到达美国后，他们发现街边的书店摆满了奥威尔的《1984》。1984年真的来了，寓言和现实的距离再次模糊了，

2

美国的留学经历，对王小波来说，至关重要。正是在美国的文化氛围内，王小波拓宽了文化视野，产生了强烈的“反观自身”的愿望他开始反思自己的成长道路与中国的革命文化氛围，并决心拿起笔来认真写作。

出国留学,看似风光，但其中的酸甜苦辣,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在不同文化的夹缝之中，既能开阔眼界，也能受到“夹板气”。外国人对于中国人的优越感.比之于国人的落后闭塞，在外国生活的良好文化氛围，比之于国内生活的伦理化，都能让国人产生剧烈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的震荡。有的人留学归来.成了铁杆“亲西方派”，有的人则变成民族主义者，而冷静容智、能窥破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各自的优劣的留学生则为数不多。所幸，王小波并没有走前两种极端，这成为他将来创作的重要价值基础

王小波刚去美国，新鲜劲还没过，就受到了一系列挫折和打击。对1980年代出国的中国人来说，物质上的冲击感都很大。王小平就说：“出国前，研究生文凭的我月工资不到100元，相当于美国人干2小时的工钱。对于我们那个时代的人来说，贫穷是若干深重苦难中的一种。只是在国内，大家都穷，不觉得有什么。但到了美国，当你发现连一个叫花子都比你过得好时，那种心理上的不平衡是巨大的。”经济问题和另两个重大问题——语言的学习和资助的申请——成为王小波切实的困扰。

在匹兹堡大学，王小波先跟着学了好一阵子英语，但口语还是跟不上，情绪自然压抑，“上课出神.连最简单的英语也听不懂，什么也不想干”。资助申请的不顺利也使他体验到一种挫败感°1985年初，王小波通

过了GRE考试，成绩中等，但去兀兹堡大学询问，却被一个美国教师挖苦了半天，说他们这个系本来资金就少，教师的岗位都难保证，更没法照顾中国学生。王小波在I月30日写给刘晓阳的信中愤愤地说：“不三不四的话说了有半个多小时，气得我脸发紫，有心回他几句，英文全气忘了。这几天看见老美就不舒服，觉得这伙人全不是好人。中国人我也看不上眼，只觉得想留下来的全都是贱骨头。真想负一口气回国去，可是就这么回去没法交代王小波还想去学数学，但对重视口语的托福考试，却很打怵。后来，王小波的大哥王小平在王小波到美国一年后，获得美国图兰大学的奖学金来美国学统计学。王小波于是想跟哥哥在图兰大学念统计学科。但图兰大学虽然名气大，却属于私立学校，学费昂贵，每年约两万美金，所以必须申请奖学金。而且，在图兰大学，只有英语专业才好找工作，也才能偿还得起凑来的学费。王小波既出不起学费，也不是英语专业出身，而英语太差，又很难申请到奖学金，最后，也只好作罢。

接下来，王小波一面跟着李银河在匹兹堡大学选课拿学分，一面积极向美国各高校提出奖学金申请。可惜，大部分都如石沉大海，有回音的“三个不成，一个同意入学，没有财政资助”（1985年3月29日致刘晓阳信）。当时.王小波和李银河的经济情况也不容乐观。李银河一个月的奖学金大约四百美元，每月扣除二十美元的健康保险，还剩三百八十美元，要维持两个人的生活，其拮据程度可想而知。而且，李银河的学习也非常紧张刻苦，据李银河回忆，有一次，学习太累了，她因低血糖引发眩晕，竟晕倒在教室门口，被好心的美国人送到了医务室。为凑学费，没有办法，王小波只好咬着牙去餐馆打工。当时王小波正在上一个人类学的课程，打工也就相当于为写论文“体验生活”了。回国后，王小波在1993年4、5期的《四川文学》上，曾介绍过自己在美国打工的经历。他先在一个外号叫“周扒皮”的老板手下打工，干活很辛苦，还常被

克扣责骂，王小波后来实在忍不住，和老板吵了一通后离开了。后来，又换了一家信佛的老板，才算好过了一点。文章中，王小波写了很多美国华人的悲剧，特别是一个姓李的三厨，潦倒一生，被人欺骗，一无所有。文中，王小波对《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描述的美国梦也多有讽刺：“假如你想到美国发财，首先最好是女人而不是男人，其次一定要去曼哈顿.千万别去别的地方°”（《域外杂谈•中国餐馆》旄1985年3月29日给刘晓阳的信中，王小波忧郁地写道:“今天打了一天工，挣了二十块钱，累得不善。去的时候心情颇不佳，因为没干过waiter,只好刷碗。干的时候心情更不佳，真他娘的累。拿钱的时候心情不错，回来一想又闷闷不乐。像这么干，一个星期干六天也挣不出学费来”信的最后，王小波乂说：“累得屁滚尿流。今天老婆通过了资格考试，气焰万丈。从泪水桶边归来.益发不乐也。”

由此可见，王小波虽才兼文理，但学语言实在不擅长。王小波的母亲在鲁迅博物馆举办的王小波逝世八周年纪念活动中，曾认真地说：“小波的智力在我的五个孩子中，只是算中等。”她的评价比较客观°当然，文学需要“别才”，并不仅是智力。古今中外的文学大师，并非每人都是高智商天才。因此，也可推测王小波在不去读博士问题上，也许并不像李银河后来所说的，是因为怕读了博士学位，就必须搞专业，妨碍了文学发挥，而是以当时王小波的外语和专业情况而言，申请博士学位的难度非常大。王小波虽然本科读商品学，但一是对本专业不感兴趣，二是英语基础不牢固。放弃博上学位，对王小波而言，是不得已之举。而且，1985年后，国内大学开始涨工资，仅就职务工资而言，“工程师130,高工200”。他甚至颇为极端地说：“非混个人模狗样不可，就是苦死也抓挠个Ph.D.,至不济也搞个MS,不成就跳太平洋自杀。”（1985年2月27日致刘晓阳信）可见，至少留学之初，王小波是抱定读博士的念头的，且颇为强烈'这时的王小波，还没有当职业小说家的念头，

3

1985年下半年，转机终于到来了，王小波遇到了“伯乐”——台湾来的著名学者许倬云。虽然觉得文科课程无味之极，但用王小平的话说，“出来了总不能什么都不学”，王小波最终去了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并通过妻子结识了许倬云教授。李银河当时在匹兹堡大学读博士学位，她的导师是杨庆堃，来自台湾的许倬云教授在历史学系执教，但还有一个社会学系合聘的职务。因此，他也列名在李银河的学位导师小组之中。据许倬云教授回忆，一天，李银河找到他，简单介绍了王小波的情况，希望许倬云能给予指点。许倬云是著名的西周史和汉代农业的研究专家，曾师从胡适与傅斯年。不屈服于权威，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一直是许倬云的“师承规矩”。许倬云天生腿有残疾，但天性坚韧不屈，聪慧好学，先后在台湾大学、杜克大学、匹兹堡大学等多所大学执教.不仅是台湾历史学界耆宿.且被称为“台湾改革开放的幕后推手”.在台湾文化界有非常大的影响」可以说，许倬云的教导，开阔了王小波的眼界，坚定了他从事文学事业的信心。而许倬云的推荐，也是王小波的作品，能在台湾获奖的重要因素：王小波第一次在《联合报》得奖的作品《黄金时代》就是由许倬云推荐的。许倬云说：“我与《联合报》比较熟，知道每年他们都有征求小说大奖，平常都是由小说家推荐，我看了小波的《黄金时代》后就对他们说，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觉得这个小说不错，我以读者身份推荐行不行？他们说行，就把小说拿过去了。后来，果然得了大奖,”许倬云对王小波作品的评价是：“很真情，不虚伪。用他的笔写出了一代人想说却说不出的想法.反映了他这一•代人共同的经历。即使批评，也是厚道的，不尖酸刻薄，不是谩骂，而是带着怜悯和同情写他所处的时代。”

许倬云曾回忆他和王小波的交往：“我在办公室见到了他。样子懒懒的.英文不是很好，但是人很诚实。谈话很随意，不那么一本正经。他内心很无助.不知该怎么办。匹大的东亚语言文学系其功能主要是训练洋孩子学华语，文学部分相当单薄，对于小波来说，这里实在没有值得他修习的课程。”据许倬云的回忆，那时匹兹堡大学的东亚语言文学系的中文课程，就是一群美国娃娃在课堂上大声读中文“你好吗？”、“火车站在哪里？",王小波这样一条中国成年大汉“杵在那里”，也还真是难堪。好在匹大有项“独立学习”的功课，还有一项“个别指导学习”的课程，等于学生与老师之间一对一地谈话，得到许倬云的同意后，王小波就挂在他名下注册上课。每周三的下午，两人会有一个约两小时的讨论，但两小时只是就事先约定而言，实际上并不固定，兴之所至，常常一谈就是一个下午，有时有事情，就下次再补上。许倬云对王小波很有感情:“我跟王小波是缘分，我还是很想念他。他是个有血性的人，诚实、热情而且相当聪明，每个星期三我跟他谈一个下午，东拉西扯，什么都谈，反正他提问题我就回答，我不是给他答案，是教他怎么思考。”[1]他们的交往称得上是君子之交。许倬云说:

1许倬云口述、李怀宇撰写,《许倬云谈话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98页。

“我知道他们经济上很紧张，偶尔听他提起打过工，但是他从来不抱怨。在美国，生活细节属于个人隐私，他不说，我不会问。他不提出要求，我也不会主动去帮忙。所以，我们的交流主要是精神层面的。”有的时候，两人聊起各自的经历，常说着说着就生气地拍起了桌子。王小波对插队时农民的悲惨生活、官僚的可鄙嘴脸一直耿耿于怀。许倬云很喜欢王小波讲他自己大陆的经历。那时大陆留学生在美国的并不多，许倬云本就是一个关心社会和政治的学者，王小波的经历，特别是上山下乡当知青的经历，及“文革”体验，对许倬云来说，是了解大陆情况的重要来源。他也非常欣赏王小波顽童般的“惫懒气质”：站着歪歪倒倒.坐在那里，他的脚就跷在桌子上，而许倬云先生也“童心大动”，于是也把脚跷在桌子上，两人相顾而笑。

正是这样的讨论，给了王小波很大启发。许倬云虽研究方向是古代史和社会史，但个人兴趣广泛，读书也很杂。他师从傅斯年等学者，一直将学术研究当作科学对待。他常引用傅斯年的名言：“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许倬云治史，严守学术规矩，但在严谨之上，更有开阔的视野和思维的创新,这一点尤为难得。其实，学术研究有“真学问”和“假学问”之分别，“真学问”讲究言传身教的学术精神、学术方法，而不太在意学术教育的形式；“假学问”则注重所谓“学问的样子”，讲的是学术派性和师门规矩，看重的是学问体系权威的延续而不是发展创新。有的学者，教了一辈子学生，自己搞了一辈子研究，也还只是狭隘的“假学问”。可以说，许倬云传给王小波的，就是一种学术精神及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思维方式。他对待科学与学术的观点，对王小波有很深教益。杂文《生命科学与骗术》中，王小波曾转述许倬云的观点：“身为一个中国人，由于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很难理解科学是什么。我在匹兹堡大学的老师许倬云教授曾说，中国人先把科学当作洪水猛兽，后把它当作呼风唤雨的巫术，直到现在，多数学习科学的人还把它看成宗教来顶礼膜拜，而他自己终于体会到，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C”王小波在国内对气功、生命科学的批判，对科学精神的弘扬，可以说是传承自许倬云的教诲，

同时，许倬云对王小波的文学创作也有很大助力。王小波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喜欢读杂书，乱读书，大学乂读了理工科.对许多文科知识并没有系统掌握，文学创作也只是自己摸索的“野路子”.没有老师指点。在许倬云的指导下，王小波阅读了1930年代及抗日时期的文学作品，并理清了从南北朝志怪小说、唐代佛教故事，到宋明说唱话本之间的演变关系，引发了对历史小说创作的兴趣许倬云说:“我也讲他的文字，认为精炼不够，有些松散，这是国内很多年轻作者都存在的问题。主要原因是大多数人没有老国学的底子。我甚至给他改文章，他也很同意我的看

法。”许倬云让王小波“炼字炼句”，一开始王小波“并不服气”，但等看到许先生改的文章后，才心悦诚服。'正是在许倬右鼓励下，王小波开始系统阅读中国古代典籍——尽管，他对《论语》等权威儒家典籍基本持批判态度。也正是这时候，王小波的文学功底逐渐加厚，并增强了从事文学创作事业的信心。这时候.他一方面继续修改《黄金时代》，一方面也开始构思创作《唐人秘传故事》。应该说，许倬云的眼光非常准，王小波最好的小说如《黄金时代》精练无比，但后期《万寿寺》、《黑铁时代》等小说，语言散漫拖沓，一直是重要缺陷。

许倬云不仅在学问和创作方面对王小波多有培养,而且在思想上.

1《许倬云谈话录》,100页。

对王小波的自由主义思路的发展，也有很多影响。他们的课上讨论是散漫的，不仅有学术的，也有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也谈自由主义和民族国家前途。许倬云说，那时候王小波对很多事情并不清楚。譬如自由主义、人权、解放与放任之间的差别在哪里？资本主义要不要衰败？共产主义跟社会主义的区别在哪里？师徒两人每次总要激烈讨论。对大陆来的学生而言，自小接受的是一整套意识形态教育，只有如王小波这样思维叛逆的年轻人，又在大学读非文科专业，才能很快接受许倬云的思想。许倬云担任台湾大学历史系主任时，曾在《文星》上发表了大量争取人权和自由的言论.受到特务的监视.并被当时国民党当局冠名为“歧异分子”，受到排挤和打击。正因如此，1970年，许倬云才离开台湾，远赴美国。许倬云曾谈到知识分子应理性对待“民族主义”：他说他到五十岁的时候，才把爱国主义摆在一边。他认为这一点跟抗战被日本人打出来的爱国思想是具有不同质地的。而直接的原因是他理解到很多罪恶都是以国家之名进行的。这与王小波后来在国内对《中国可以说不》等民族主义书籍的批判，有明显的血脉相承关系。

4

四年的美国留学生涯，不仅让王小波在学识和创作上有了很大进步，更让他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现代文明体制及其精神内核有了深入理解：自从确定许倬云做导师，确立了人生方向，王小波的精神开始愉快起来.1986年，他获得文科硕士学位，嗣后，又继续在美国学习计算机.算是可以维持生活了他常去匹大图书馆，看到了很多国内看不到的书，包括他父亲的书他还看了很多电影。电影院贵，他主要是租录像带回家看。王小波受美国电影影响很大。用王小平的话说.王小波的文章，有种跳动的节奏感，很像美国电影:

有些人一直认为王小波是拿美国来贬低中国人，贬低中国民族精神其实，王小波是深得“现代文明三昧”的，他并不是拿美国来贬低中国，而是追慕一种“健全的理性”。他不是民族主义愤青，但更不是拿着国外时髦理论唬人的“洋务派”。他看到的是美国的精神根底.比如，他对美国人的理性务实、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精神非常佩服，而这些东西，则属于罗素所说的现代精神常识的范畴。在《域外杂谈•农场》中，他记录了一个叫沃尔夫的美国老太太。她管理着一片农场，自己修理农具。他感慨地说:“大家本本分分谋着一种生计，有人成功，有人不成功。不成功的人就想再换--种本分生计，没有去炒股票，或者编个什么故事惊世骇俗。”王小波对华人在美国受欺负的事，也有自己的看法。王小波在匹兹堡大学读书时，有很多黑人专门抢劫中国人;1985年1月30日，他给刘晓阳的信中，就提到了大约二十人被黑人抢了:他甚至半开玩笑地说，他要和班上的泰国人学习泰拳，等学好了，和黑人一决雌雄。根据后来了解的情况，黑人之所以专门抢劫中国人，除了欺负少数种族，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人的懦弱。中国人缺乏维护个人权益的勇气。因此.在一篇专

门谈美国盗贼的文章中，王小波说，人在世界上有两大义务，一是做一个好人，无愧于人生一世.二是“不能惯别人的臭毛病”。

在美国，除了艰苦的学习生活外，不断的出游，也扩大了王小波的眼界。用刘晓阳的话说，“我感觉他们两口子，把钱都花在了旅游和伙食上了”。虽然是穷学生，但是，王小波和李银河，还是想方设法地攒钱，利用各种方式.游遍了美国大陆美国游和欧洲游不一样，可以随时随地搭帐篷。旅店自然是住不起，但在美国的很多旅游胜地.都有专门的帐篷营地.提供车位、水果、电源，甚至能洗澡、做饭，只要很少的几美元，就能把生活安排得舒舒服服。于是，王小波和李银河专门等暑假的时候出行，天气也不冷，只要找好地图，按图索骥，再带好了衣服和做饭的用具，就能一切如意了。没钱的时候，甚至在路边的树林里，捡起几块木柴，都能生火做饭。在美国的旅游，让王小波和李银河开阔了眼界，也见识了形形色色的美国人。一次，他们遇到所谓的“左派”，蹲在地上卖毛泽东、格瓦拉的书，王小波凑上前去搭讪，那个美国人先笑着问，你怕不怕美国中情局。还有一次，王小波几个人在曼哈顿游玩，天晚了却找不到便宜的住处，只能按照朋友的指点，去一个左派人士家中求助。这位左派人士，还保留着1970年代露天集会、反战运动时的嬉皮士风采，油光水滑的牛仔裤，一头长发，留着大胡子。左派朋友很高兴王小波他们的到访，和他们聊起了托洛茨基、浩然和格瓦拉。王小波不禁想起知青时的理想主义岁月。只不过，革命时期已经过去了，正如美国的反战运动也已烟消云散，留给人们的只有无尽思索。

1986年8月，王小波和李银河买了欧洲的火车通票，踏上了欧洲之旅。这次欧洲旅行，让他们兴奋不已，这也是他们的爱情浪漫之旅。他们住在便宜的学生公寓和青年旅馆，为了省钱，王小波和李银河在布鲁塞尔，还在免费的面包上涂了厚厚的黄油，导致跑肚拉稀。在阴冷的北欧，王小波还被冻出了气管炎。

王小波对欧洲的描述也很有意思：英国是古板乂整齐，但穷得很，法国人贪大求洋，讲排场。奥地利和德国，没有不守规矩的人.荷兰漂亮干净，比利时又破又烂。（1986年9月7日致刘晓阳信）在荷兰，看到美丽的风力农场，王小波想到了山东插队时农民痛苦的生活，进而反思我们的文化有一种“歌颂痛苦、美化苦难”的虚伪道德主义倾向。无论成为苦难的农民，还是狡猾地脱离农民地位、进而通过歌颂苦难获得名利，其实都不是现代社会尊重人性和人权的做法。

除了欧洲之旅.王小波还有两次和兄弟们一起出游的美好经历。1985年王小平来美之后，1987年，王晨光也来到了美国。三兄弟在美国唯一一次相聚，源于王晨光在肯塔基韋到硕士学位后，要到纽瓦克的新泽西大学读博士。王小平带着小女儿从新奥尔良开车接上王晨光去匹兹堡与小波会合，打算从那里去波士顿等地游玩。这是王小平第一次见到小波的住所，情况并不好：“类似于一个小中国城，很多中国学生合租.然后分摊房租-那幢2层小楼，6到7个房间住的都是中国人，合用一个厨房，卫生条件也不好。小波和银河两人住一间十几平方米大的房间，地上放一个床垫，有两个音响，放着古典音乐。美国的东西不对口味，他们最爱吃的是比萨，贵的吃不起，只能吃当地最便宜的那种，大约5美元一个。”走的时候，小波把一个音响送给了小平。在王小平记忆中，王小波夫妇曾买过一辆很旧的白色大车，有六到八个缸（在美国，买大车比买小车便宜,可能也就一千多美元）。夫妻俩都是在美国学会开车的，但都不灵光。王小平到美国不久，王小波开车接他去佛罗里达，半路上车坏了，漏油.修了修接着用。后来这辆大车，从高速路上下来走侧道时，又撞到杆子上熄了火，他们扔在那里就走了。从那以后，王小波夫妇再出门只能乘坐“灰狗”。美国有一种A1公司，在黄页上可以查到，专门给人送车，可以开车去某一地点，再从该地方开另一辆车回来，只用交汽油费就行，也不用担心碰撞，撞坏了车，就算公司的。王

小波和李银河多次出游，都靠着这种方式，开到了烂泥地里也能勇往直前。他还专门写信给刘晓阳，告诉他这个旅游的“诀窍”。

第二次出游的时候，王小平和王小波夫妇先到了新奥尔良。他们之所以来这里，王小平说，“密西西比河的入海口在这里，小波小时候反复读过马克•吐温的作品，而他作品中有很多是关于密西西比河的，小波要先看看这条河，当时开车到了河边，他站在码头上静静地看了很久”。从新奥尔良出来，三人到了佛罗里达、索尔索塔、丹佛，一直往南，“主题是探险.假装自己是汤姆•索亚，想去沼泽地公园旁边的树林探险，没走几步，发现树上毛茸茸的其实是挤满了大蚊子，吓得跑出来了。”一直到基韦斯特（Keywest）,那里珊瑚礁多.一直插到墨西哥湾，走到最顶头，很多人在那里等着看落日。当时岛上有很多度假村.很漂亮的别墅空着，大门敞开，他们进去看.感叹“那么好的房子没人住”在小说《夜里两点钟》中.王小波提到了一个古怪的美国哲学家“垃圾虫”按王小平的回忆,他们在旅行的时候，的确遇到过这样一个美国人，这也算是美国文科知识分子没落现状的反映按鲍德里亚的观点，美国是一个已实现了的“现代的乌托邦”，在这个巨大的物质化社会中，现代理性精神已深入人心，并似乎正在走向它的反面。在这样的现代发达国家，担负塑造国民现代素质任务的精英化文科教育，就显得有些过剩11无用武之地这个美国人，留着山羊胡子，穿着一件脏T.作服，开着中型卡车，专门靠在基韦斯特岛收垃圾过日子。王小波、王小平和这个美国人谈了一会儿，吃惊地发现，此人还是一个中国文化通.并对中国哲学有良好修养，但穷困潦倒，连出书也没钱。离开后，王小平对哲学在美国的境遇闷闷不乐。虽然他拿到了哲学博士学位，但不想变成“候补垃圾虫”，最后还是又读了计算机硕士学位，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

相比较归国的王小波夫妇，和在美国成功扎根的王小平，王晨光的

遭遇令人扼腕叹息.也可作为很多在美国打拼的中国人没有安全感的辛•酸证明一，王晨光自幼聪明善良，1982年他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留学美国后，学习刻苦，终于在1993年，获新泽西大学有机化学博士学位，并拿到了美国绿卡。后来,他又入密歇根州立大学做博士后，生活一直没有真正稳定下来01998年7月7日夜，王小波去世一年多后.在美国底特律，王晨光回家途中，汽车突然抛锚在了一百九十四号高速公路他下车求助,在路边电话亭打电话，遇到了一个黑人少年敲诈。黑人掏出刀子，晨光本不想激怒劫匪，但迎面突然来了一辆车。雪亮的车灯，打在了黑人脸上。黑人劫匪害怕极了，慌乱地拿着刀子顺势一抹，割穿了晨光的咽喉。王晨光为人仗义，乐于助人.却不料在美国遭此大难，死于非命。为不刺激年迈多病的宋华，一家人都瞒着她，只说是晨光参加了美国一个核工业基地建设，是秘密项目，人家不让回来。每到过年，白发苍苍的宋华，总要凝视窗外爆竹漫天的黑夜，不停念叨着，晨光怎么还不回来呀。此时，慈母的心中似乎对不幸的事情已隐隐有所预感，但她怎么也想不到，晚年连丧两子的巨大悲伤会降临到她的头上。那漫天开放的美丽烟花，是晨光在天堂里献给妈妈的微笑吗？还是小波的喃喃低语？就这样，六年过去了，当宋华最后了解到事情真相，这个经历过战争洗礼、革命风暴的坚强的女性，并没有过多流露出悲恸情绪，但每当两个儿子的祭日来到时，她变得更沉默。当笔者采访宋华女士的时候，年逾九旬的老人，还半是伤感、半是沧桑地说，我命不好，两个儿子都先我而去。

1本章的写作得益于李翊先生的采访及撰写的《王小波的大学与留学生活》一文（载《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14期），特此致谢。

第八章文坛外高手-流星闪耀的光芒

我不知道一个过去年代的广场

从何而始，从何而终。

有的人用一小时穿过广场，

有的用一生——

早晨是孩子，傍晚已是垂暮之人。

  我不知道还要在夕阳中走出多远才能

停下脚步？

——欧阳江河《傍晚穿过广场》

进入90年代之后，知识分子的自我期待已降到了百年来的最低点，历史断裂造成的精神裂变使这一群体猝不及防。

——孟繁华《众神狂欢一一当代中国的文化冲突问题》

1

1988年到1997年，是王小波真正专业意义的“文学创作时间”。短短九年，王小波创作了近百万字的小说、杂文、剧本，用激情燃烧的生命，为1990年代的中国文学留下了特立独行的背影一和传统中国大陆作家不同，王小波从一个留学归来的“海归”，成了中国最早一批脱离公职的“自由撰稿人”。同时，王小波一手写杂文，一手写小说的写作模式，与其自由撰稿人的生存状态具有某种因果联系。媒体作为1990年代公共空间知识分子意志的象征，成了王小波的托身之所，以此为根基，王小波以杂文直接介入社会，以小说间接影响文化，这种“媒体化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在今天早已是很多作家的自然选择，但在当时却为数并不多。其实，早在1930年代，蛰居大上海、以自由撰稿谋生的鲁迅，即曾采取这种生存姿态，它同时也是民国时期很多知识分子的选择。越来越多的人采取这种生存状态，无疑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走向精神独立的重要表现——尽管，“媒体权力”的负面影响也无处不在，但在政治意识形态依然非常强大的中国，它们给想说真话的人提供了一个平台。通过它，王小波展示和提出了自由主义（王小波说，实际上，知识分子活在世上，除自由立场之外，无他种立场可取）、弱势群体、同性恋问题、反体制斗士、独特的文学写作资源、反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等199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最需要”的概念和最希望讨论解决的问题。。

更令人深思的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王小波既是1990年代文化的产物，也是1980年代启蒙文学的接续者。说他是1990年代文化的产物是由于正是在市场经济大潮涌现、传统政治和文学体制处于多元调整状态的前提下，王小波的自由主义表达，才有可能浮现于公共话语空间。

说他是1980年代启蒙文学的继承者，则在于两点：一方面，在1990年代中国大陆作家和知识分子，整体退出公共话语空间，或投身经济大潮，或据守书斋岗位的时候，王小波却以“减蜥”的姿态逆流而上，以犀利的杂文和一系列文学行动干预公共事务：无论北京环境问题，还是科学与特异功能的辩论.无论对新民族主义的口诛笔伐，还是对同性恋的研究，无论新潮影视，还是计算机因特网，王小波都坚持自由知识分子精英态度.对这些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进行深刻独到的剖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公知模式”提供可资借鉴的标本，这种启蒙姿态“接地气”，既有核心价值坚守，又符合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文化现实，因而迅速在广大知识者中引发强烈共鸣。在微博等新公共传媒盛行的新世纪，当我们认真考究那些意见领袖，总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发现王小波的影响：另一方面，王小波的文学创作，尽管受到后现代文化的影响，但无论创作主题、题材，还是艺术风格，都有浓烈的文艺复兴式的个性解放痕迹王小波没有规避意识形态，而是努力将之放置于更巧妙的文学场域中。他用黑色幽默的笔触，表现集权思维下人性的变异与荒诞，张扬的却是个人的尊严、自由、智慧与爱——这些标准，恰是1980年代启蒙文学受意识形态束缚未完成的任务.

“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庸俗。”小说《万寿寺》结尾，王小波伤感地写道。这一时期王小波的目光依然没有离开北京，无论是历史悠久辉煌的“帝都北京”，还是神圣浪漫.却又混乱荒诞的“革命北京”，似乎都还存在，却逐渐远去或变得“古怪异常”，而祛除了话语魔力的北京，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却日渐显现出第三世界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后革命氛围”。它的落后和寒酸，如同它曾经的辉煌；它的粗鄙纷乱.如同它曾经的神圣，都让人们陷入深思.对物质的关注，并没有引起精神的提升，反而是加倍的混乱：

王小波在很多杂文中.直接表达了对北京的关注，他关心北京的环境

问题.对脏乱差提出批评，提出要在“衣食住行”中保障个人的尊严。他关心北京建设，反对拆除历史建筑.他提出“京片子与民族自尊心”的问题，反对北京口语的港台化'他对老北京的历史也感兴趣，“北京城是一座没有了历史的城市……北京城就其本来面目来说，是一座硕大无比的四合院。没有了城墙它就不成个样子。”他专门研究过义和团史料，对庚子事变中白莲教和八国联军的掌故非常熟悉-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在《对待知识的态度》这篇文章中，他还不忘霆字营快枪队在北京城门抵御八国联军的故事。说王小波拿美国人鄙薄中国文化，是没有道理的，对民族文化的批判，并不等同于丧失民族自尊心。

如果说.这些倡议和提法还属于共识的范畴.那么，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开始致力于描述“革命北京”和“后革命北京”的不同形象他的北京文化形象，和老舍笔下“民俗化”的北京文化景观有很大区别，王小波的小说.没有胡同、北京民俗和风景.他更多是从革命意识形态这一方面来考察北京，并从此将目光延伸至历史和未来世界.形成思考整个中国问题的出发点。小说《我的阴阳两界》开篇，王小波就为我们描述了1990年代初“后革命时代”的灰色北京：“再过一百年，人们会这样描述现在的北京城：那是一大片灰雾笼罩下的楼房，冬天里，灰雾好像冻结在天上。每天早上，人们骑着铁条轮子的自行车上班去。将来的北京人，也许对这样的车子嗤之以鼻，也可能对此不胜仰慕.具体怎样進也说不准,将来这样的车子可能都进了博物馆，但也可能还在使用，具体会怎样谁也说不准将来的人也许会这样看我们：他们每天早上在车座上磨屁股，穿过漫天的尘雾，到了一座楼房面前.把那个洋铁皮做的破烂玩意锁起来，然后跑上楼去，扫扫地，打一壶开水，泡一壶茶，然后就坐下来看小报，打哈欠，聊大天，打瞌睡.直到天黑。”这是一幅灰暗无聊的空间景观，它展示了日常空间对革命化神圣空间的破坏与消解革命的神圣恐怖已是明日黄花，而革命褪色后的生活时空.却笼罩在无聊与无趣的世界里。这

样的日常世界，并不具有从物质方面观察的人性解放意义，反而在祛除革命神圣魅力的同时，还原了此时的中国人物质穷困贫乏、精神灰暗虚无的可悲现状。另外，王小波还有《三十而立》中1980年代北京大学教师王二的故事，《似水流年》中的“文革”北京故事，《东宫西宫》中的北京同性恋故事。而《黄金时代》则可以看作一个北京青年的异域精神之旅，在浪漫的非常之地.革命遭到了性爱的颠覆在他很多小说的创作中，历史、现在和未来，都呈现出几条线索杂糅的表述形态,展现了他的历史意识及对它的多维理解。如在《革命时期的爱情》中“文革”末期北京街道工厂的故事和“文革”武斗故事交相辉映;《万寿寺》中，北京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王二的故事与薛嵩的湘西传奇故事交织；《红拂夜奔》中，北京的数学系教师王二和女同事的合居故事，与红拂女的传奇故事扭结在一起。而在《白银时代》、《黑铁时代》、《2015》等关于过去及未来世界的想象中，阴暗压抑的空间景观，充满了福柯式的监狱意象。

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浪潮已势不可当。这种社会转型带来了巨量的、光怪陆离的社会信息。旧的东西还改头换面地存在着，而新的东西却并未确立，新与旧的对抗、交融，以怪异荒诞的杂糅方式共生、并存。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第三次浪潮等思潮，以时髦的理论旋风席卷中国，但没有成为解放思想、理性务实的思想资源.反而成为话语资本的狂欢和进化论般的知识游戏；另一方面，帝国的光荣与梦想，以亡灵复活的姿态，披着“传统”的法袍，再次成为话语空间的显学，中国文化优越论、气功救国论、周易救国论、大中华文化中心论等等古怪口号纷显于世。一切如此熟悉，又如此陌生，中国又仿佛回到了20世纪初不同文化观念激烈交锋的时代，但却已看不清楚历史是在进步抑或倒退:1930年代，鲁迅就曾哀叹：“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

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这许多事物挤在一处，正如我辈约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开饭店一般，即使竭力调和，也只能煮个半熟。”'信仰崩坏、道德失衡、物欲横流、众神猥欢，是迅速被边缘化了的知识分子阶层当时普遍的认识和判断。而王小波认识的差异在于，他并不认为中国人曾有过真正理性的信仰，而道德失衡的重要原因在于理性建设的匮乏与道德主义的过分强大。今天看来，王小波的某些判断，可能还过于乐观与简单，但在1990年代前期破和立激烈交锋的状态下，王小波却提供了一种非主流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认同。

2

1988年到1992年，还是王小波创作的摸索期，1992年辞职至1997年去世，则是王小波真正的喷发期一在美国的时候，对是否回国，王小波和李银河其实都有过疑虑。李银河在文章中说：“这个选择并不容易，我们反复讨论，权衡利弊，以便做出理性的选择，免得后悔。”[2]基于双方对物质生活的要求都不是很髙，李银河的社会学研究和王小波的写作又离不开中国社会，夫妻俩就选择了回国。3这个说法今天看来，也许并不是十分准确。李银河回国也许考虑了很多因素，而在1988年，王小波虽热爱写作，但并没有做一个全职作家的准备。他

1會迅.《随感录（五十四）＞.《角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344页。2李银河，《我们曾经拥有〉，《王小波十年祭》，李银河编著，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79页。3李翊.《王小波的大学与留学生活》.《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14期°

仍想在一个较好的学术环境内发挥理工科才能，他理想的写作状态，应是一种经济宽松、思想独立的状态。

1988年初.王小波和李银河从美国匹兹堡回到北京，积极联系接收单位。从当时两个人的发展来看，李银河曾师从著名学者费孝通.并是海归博士，在学界已有一定影响。而王小波虽出国留学，但所修专业较尴尬.本科学的是商品专业，出国后又学过计算机，也有匹兹堡大学东亚中心的文科硕士学位。他的学识很杂，而高校的专业化分工则要求教师必须是“专家型学者”。美国高校学术教育体制中，硕士学制短，一般为两年，且属过渡性质，在专业化分工严密的美国髙校并不受重视，只有博士学位（Ph.D.）,才是公认的学术研究和教学的精英条件。王小波最终并没有在美国申请读博士学位。回国之后，他在高校任职，因此也没能找到适合的位置。1988年I月，李银河作为引进人才，进入北京大学社

会学所，再次跟随费孝通先生，成为国内首批文科博士后，而王小波本想回人民大学，但没有合适接收院系，就随李银河一起，来到北京大学社会学所下属的中国研究与发展中心。在北京大学，王小波先做助教，后被确认为讲师职称，却极少有课程安排给他，他更多负责的是北大社会学所机房的调试维修，及社会学数据整理收集及统计的工作。王小波沮丧地对朋友说："我现在没去成人大，在北大帮闲，觉得很没劲。干一个月挣黑市价10个$,你想如何能有兴致？"他当时的生活状态是，白天在社会学所修计算机、整理数据."这种讨厌的活儿干不完，也就不能开算"，有了闲暇，就溜达到海淀区租书店，弄一些武侠和"色情"小说打发日子，到了晚上，才开始"乱写些东西"。（1988年12月23日致刘晓阳信）1980年代末，纷乱的政治环境，并没有对王小波造成重大影响。他的兴趣主要还在写作。1989年，王小波在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并完成了《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等小说的写作.但这些小说都无法发表，也很难出版，《人民文学》的编辑朱伟，曾在1989年左右，收到王小波投向该刊物的小说，虽不能推出，但王小波的才华打动了朱伟1995年，朱伟离开《人民文学》，接手《三联生活周刊》，力邀王小波为其杂志专栏撰写文章

《唐人秘传故事》是王小波的第一本小说集"王小波后来坦承"书卖得并不好"。据笔者考察，该书极有可能是一本"伪书"。该书标示由山东文艺出版社于1989年9月出版，印数是四千册（实际并没有印那么多，据王小波同忆.大约印了一千册），责任编辑是鞠川江、罗长虹，封面设计者为孙笑云，山东乳山印刷厂印制.书号是7-5329-0243-9/1-216然而，笔者曾专门去山东文艺出版社查访此书.据出版社的老编辑说.好像在书库中见到过几本样书，但由于出版社几次搬家,已查找不到了。据现任山东文艺出版社总编的张海珊女士查证.在该社自编的《建社以来历年图书编目》中，也并未看到王小波的这本小说笔者又电话采访了1989

年任山东文艺出版社社长和总编的几位前任领导，均对此书没有印象。1980年代末，一个出版社一年出版的小说集并不多。如果该书的确是山东文艺出版社的正规图书，则应有记录。但此书的确曾以“馆配”途径销售过，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均有藏书。据出版社资深管理人员判断，该书应为自筹经费印书，也并非通过出版社正规销售途径及渠道销售的'王小波的相关回忆文章显示，该书为王小波在美国时期所写，寄回国内后，因找不到出版社，在烟台做生意的二姐夫衣秀东就帮忙找了一个书商，在山东文艺出版社自费出版.前后大约花了几千元。1980年代末，山东文艺出版社曾在烟台、淄博等地建立了几个工作室（由于不好管理，这几个工作室几年后撤销），开始接受自费出书。按照规定，凡自费出书，也应在出版社进行严格备案，并上缴三十本以上样书。但当年图书出版管理并不严格，CIP图书出版数据也没有网上查询系统，且工作室的形式本身也易出现问题。因此，《唐人秘传故事》有两种可能性：一是1989年末期，由于政治环境紧张，该书因是自费书，忙乱的情况下有可能漏了登记；二是书商有问题，该书可能为假书号或套用书号。有意思的是，王小波这类奇情异想的游戏历史小说，在当时虽作为“性意味”图书被包装处理，但并不被主流媒体和大众所接受——实际上，该小说既不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涌现的“流行先锋”，如《骚土》、《废都》类的“性叙事”，也不是主流宏大叙事。

王小波对国内高校日趋行政化的管理方式，也感到不适应，加之个性狷介任性，在当时的学校圈并不如意。他曾想去卖计算机，搞软件设计，甚至一度想要下海去办出版社。他在单位也比较独立。比如，王小波和李银河的好友邢小群，就在文章中提到，王小波去开会，领导在上面讲话，大家都死气沉沉地没有反应，而王小波冷不丁冒出那么一两句，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弄得领导很尴尬。王小波还曾在杂文中，对李银河评教授考职称外语的事情，加以善意嘲讽。这段“维修工”式的大学

教师生活，在他的小说《我的阴阳两界》、《万寿寺》等中,均有曲折反映。《我的阴阳两界》中有一个阳痿的“小神经”王二，因为阳痿成了另类，专门在医院地下室，修理各类医疗器械。而《万寿寺》的现实线索中，“我”则是一名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硕士毕业，却极少写论文，评不上职称，专门负责修理疏通研究所的下水道,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坐在粪水四溢的院子里办公。现实中的万寿寺，在人民大学附近，王小波应很熟悉，是学术单位较集中的地方，中国社科院的一些研究机构、中国现代文学馆都曾坐落于此。王小波去世后，第一个大规模、有影响的作品研讨会，也是在万寿寺召开的。李银河从北京大学调入社科院后，也曾在此短暂办公。小说中，王小波讥讽万寿寺是一条老佛爷使用的“历史的脐带”，对此地看来并无好感。

1991年初，李银河从北京大学博士后出站，被评定为副教授职称，随即调入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王小波在5月22日致刘晓阳信中说：“我在北大混得没劲……打算调到人大去"o1991年底，他也经朋友引荐，调入人民大学会计系任讲师°由于家庭出身于此，王小波也是人大毕业的，老班长郑英良也在人大，后来还官至副校长，王小波的整体环境有所改善。

3

在人民大学会计系，王小波被分配在会计电算化教研室，主要负责电算化教程和会计方向的专业英语。人民大学的会计系当时属于工商管理学院，也是人大的老牌学科之一。王小波本科学的是商品学专业，对数理统计并不陌生，加之喜欢数学，来此工作也算对路。但王小波的英语基础并不好，应对专业英语时颇感吃力，需要花大量时间去备课。这个时期的王小波，曾想在会计学专业方面作一些努力，如他曾经和同事合作，为北京煤气工程公司开发管理软件，还曾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王小波在人大和同事们的关系还不错，和他们一起去龙庆峡游玩时，大家对他的评价是：打扑克牌非常投入，郊外的大蚊子杀过来，也浑然不觉。小波对同事和朋友们也很真诚，颇有“水浒”风范.朋友张晓曾托王小波帮助一位蒙冤入狱的朋友，王小波二话不说，又是请吃饭，又是陪找人，还被大雨浇得像个落汤鸡，却还乐呵呵地开玩笑给朋友打气：“公等遇雨，皆以失期，失期当斩……”

此时，人民大学的统计学院，还有一个“王小波”。笔者曾专门采访过统计学院高敏雪教授、办公室张云主任等人，最终确定：“此王小波”非“彼王小波”，因王小波也擅长数学统计，故有此误解。该王小波是1987届人大毕业的统计学专业硕士生，后留在人大统计学院任教，1995年后出国。统计学院的王小波曾在《统计研究》上发表《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数估计与分解》等多篇论文，还作为第一作者，与人民大学统计学院顾岚、高敏雪、王玉平等学者出版过统计学著作《经济周期与预警研究——理论、方法、应用》（冶金工业出版社1994年版）。很多版本的王小波文集，包括网络上的人物介绍（包括人大校友网页）,均

将作家王小波在人民大学任教的地方写成“人民大学统计系”，其实是误解。当然，如果没有文学之路，王小波也许会再努力下去，成为一名会计学教授。然而，当家人和朋友以为一切就此安定的时候，作为年近四十岁的成年人，王小波却做了一个大胆之极的决定一辞职，

也是在1991年，由许倬云推荐，王小波的中篇小说《黄金时代》获得台湾《联合报》中篇小说大奖。这对王小波是极大的鼓励。他在获奖感言《工作•使命•信心》中说：“我从很年轻时就开始写作，到现在已有近二十年。虽然在大陆的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小说，出版过一部小说集，但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从来没有真正满意过。文学虽然有各种流派，各种流派之间乂有很大的区别，但就作品而言，最大的区别却在于，有些作品写得好，有些作品写得不好。写出《黄金时代》之前，我从未觉得自己写得好.而《黄金时代宀篇，自觉写得尚可。”《黄金时代》最初创作于1982年，王小波不无骄傲地说：“这篇小说是我的宠儿丁《黄金时代》也许不是王小波最精致的小说，但却是最有现实震撼力的小说。它以性爱故事颠覆了革命宏大叙事。这篇小说之后，王小波才真正成熟起来，

“性叙事”在新时期文学中，最早出现于张贤亮的“右派小说”。同样涉及“性”，同样是艰苦环境中人性的觉醒.张贤亮和王小波的表述却颇为不同。张贤亮的小说，隐含叙事者和人物之间，总存在不断“合并”与“对立”的运动轨迹，作者有时对人物同情、支持、鼓励.有时却从“理性”的视角，对人物的行为进行否定。如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作者对黄香久，一方面，赞美她的美丽，以及热烈、坦荡的肉欲：“她并不急于穿衣服.却摧下手中的内裤，像是畏凉一样.两臂交叉地将两手搭在两肩上，正面向着我”；然而，另一方面，张贤亮对性道德.却又有超乎寻常的敏感性，在黄香久和骨书记的奸情面前，主人公不是反抗屈辱，也不是宽容待之，而是进行了一大堆神游物外、稀奇古怪的“穿越”，让宋

江、马克思、庄子等历史人物和主人公进行了长篇辩论，只在结束时.才恨恨地说：“这个冲撞了伟大的亡灵的人居然是个共产党员。真是不可思议！”[1]这时.作者乂对黄香久进行了“恶”的处理，以凸显底层女性的无知、粗鄙、短视和褊狭，隐含了叙事者道德和知识的双重优越性。这实际体现出新时期文学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启蒙之间的艰难转换。张贤亮的开创意义在于，他坦率地为中国当代文学引入了“性叙事”——而他的局限性也在于此，

《黄金时代》具有更强的启蒙及颠覆意识。陈清扬所有的罪孽，就在于承认她和一个男人做爱很快乐：个体的自由和尊严.是王小波性叙事的道德基础。《黄金时代》是性爱小说，不是爱情小说，更是

1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新时期争鸣作品选2》.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教育分会编.西北大学出版社1988＜|版.246,343页。

在“新时期文学传统”之外的小说。它超越了后者常见的叙事成规,在这篇小说中，王小波真正树立起了创作的三大原则：有趣、性爱和智慧。评论家张颐武有过如下评述：“王小波对人性的理解，不可思议地脱离了八十年代对’主体’追寻的浪漫的主潮，他揭示了任何理想和超越的尝试都难以跨出人性具体而微的限制，也许这是因为他很早就在美国留学，接触了许多新的对人性更复杂的看法。他写出的是我们受到欲望的拨弄后无能为力的状态，我们虽然有许多文化上超越性的想象，但却无法闪避现实生活的坚硬和脆弱，我们一面受到环境的限制，一面乂受到欲望的吸引，于是难以突破这些东西的具体存在。王小波其实让自己的小说回到了日常生活真实的、不可回避的冲突之中了……这其实真正超越了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的规定性。”[1]

我们之所以说这篇小说在王小波的创作中有特殊意义，还在于王小波创造出了一种“浩荡而阔大”的生命气息。而他在此之后的作品，小说的理念显然大于感性。《黄金时代》透支了王小波所有重要的生命体验，并将之以青春叙事的语调极限化地表达出来，其高潮也就是“青春的终结”。以往的解读中，我们多注重小说的逻辑趣味，但不容忽视的，这

也是一部充满了青春边疆风情的小说：“彩云之南”的刻骨铭心的回忆，荒凉的章风山、水田、白水牛、景颇族的铜炮枪、傣族的蓑衣和筒裙、清平的温泉、酸琶果、剑麻、阿昌族的户撒刀.都让我们新鲜不已。这也是一部“大风力”的小说.小说描述了那些“无处不在”的风，有热风、旱风、冷风，雾气过后的掺杂着雨点的风,它们在红土、彩云和热烈的阳光下，都成为王小波小说弥漫的生命力

1张颐武，《和时代拔河：十年后再思王小波的价值》.《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4月2日。

的象征。比如：“我爬起来看牛，发现它们都卧在远处的河汉里静静地嚼草。那时节万籁无声，田野上刮着白色的风。”“旱季里浩浩荡荡的风刮个不停，整个草房都在晃动。陈清扬坐在椅子上听着风声，回想起以往发生的事情.对一切都起了怀疑。”“我坐在小屋里，听着满山树叶哗哗响，终于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我听见浩浩荡荡的空气大潮从我头顶涌过，正是我灵魂里潮兴之时。正如深山里花开，龙竹笋剥剥地爆去笋壳，直翘翘地向上。”“天边起了一片云，惨白惨白，翻着无数死鱼肚皮，瞪起无数死鱼眼睛。山上有一股风，无声无息地吹下去。天地间充满了悲惨的气氛。”王小波以欲望的合法性对抗革命的合法性，树立的却是生命个体的尊严和自由。

4

1992年，为专事写作，王小波决定辞职。3月，他出版了《王二风流史》（香港繁荣出版社）。8月，出版《黄金年代》（系《黄金时代》之误，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本年，他还与李银河共同出版了同性恋研究专著《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该书首先在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以繁体字形式出版，后来，历经波折，经丁东、邢小群夫妇（邢小群是李银河的同学）介绍，找到了山西书商靳小文（此人后成为山西最大的尔雅、万象书城的老板），靳小文拿到书稿后，觉得很有分量，促成了它的出版。'该书11月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但据丁东回忆，王小波对封面上的两把椅子感到很不满，这已是后话。李银河回国后，致力于中国人的婚恋和性爱专题研究，曾出版《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等书，而《他们的世界》是一部具挑

1谢泳，《我最早发表了王小波的〈寻找无双〉》.见谢泳网易博客。

战意义的社会学著作.正如著名社会学家杨堃在该书序言中所说:“近几十年来，一直没有人能对这个现象下一番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功夫。看到李银河、王小波的新作《他们的世界》，我感到很欣慰.因为它壊补了我国同性恋研究方面的空白

1990年代初.社会风气依然保守，这本书的采访不仅非常艰谁，且出版和成书经过更历经颇多波折李银河和王小波主要是在家中约谈一些当事人.有时也上门采访，或去一些同性恋者聚会场所做实地调查，如名曰“东宫与西宫”的北京市男同性恋经常聚集的两个男厕所有的受访者有顾虑.就需要反复劝说.耐心做工作°对社会学工作来说，田野调查和个案研究非常重要做婚恋调查的时候，李银河曾遇到过很多障碍，但她总能想到很多办法，比如，找当地居委会协助。而男同性恋课题，由于同性

恋行为当时还远未被大众了解，甚至在法律上还有治安处罚条例，更由于李银河身为女性，很多调查不方便，王小波就协助她做了很多工作一次，王小波在朋友带领下，去了一个同性恋聚会的厕所，一走进去，厕所坑位隔断前，就伸出很多脑袋这些人打量了王小波一番.乂退回了坑位，这让王小波有些莫名其妙朋友笑着说，你长得丑.人家都没看上你！

李银河与王小波严肃认真的态度.缺得了不少同性恋者的真心尊重.他们将自己的故事告诉王小波和李银河，并帮助联系圈内人比如，《他们的世界》中，有一个小J,就详细地用口述方式，讲述了自己在十多个省市进行同性恋游历的事情王小波去世的时候，很多同性恋者还去送行。但这项严肃的社会学研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其实，王小波的同性恋研究，和他一贯的文学主题一脉相承，就是通过性关系来透视社会活动中的意识形态，进而为自由、智慧和尊严命名该书的前言中，李银河与王小波以异性恋的身份，将他们的学术立场概括为“实事求是原则、反意识形态中心主义原则和善良原则”，这三大研究原则，其实囊括了科学、人权与人道主义的多种标准，即使今天看来，依然非常有价值和意义。

王小波和李银河的同性恋研究，还引起了电影圈的注意。最先发现王小波在电影方面才华的，是当时著名的“非主流导演”张元。张元曾拍摄过《妈妈》、《儿子》、《北京杂种》等一系列“地下电影”，均因题材敏感和导演风格激进而未获准在大陆上映。张元听说王小波，首先是因为同性恋研究。一个加拿大导演向张元推荐了《他们的世界》，并引荐了李银河。在和李银河聊天的时候，张元透露了想拍一部同性恋电影的想法，李银河就向张元推荐王小波做编剧。张元读了王小波的小说，“吓了一跳，原来自己是和一个大作家在打交道”（也有不同说法：张元开始并不想让王小波来写，可后来的确没有“够份儿”的作家来写同性恋这个敏感题材，张元这才同意了李银河的提议）o1992年12月，

张元正式向王小波发出邀请，为电影《东宫西宫》写剧本。剧本写作过程非常艰苦。而王小波的创作理念与张元之间，也显露出诸多差异。实际上，从1992年12月到1995年8月的两年多的时间，王小波不断修改剧本，付出了大量心血。为写好电影剧本，他先写了一个小说稿，又配合写了舞台剧稿，同时，由于想在先锋题材与国内认可之间取得妥协，最大限度地争取该电影能在国内面世，张元让王小波做了大量修改工作匚然而，这部电影虽在1997年的阿根廷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编剧奖，并入围戛纳电影节.但依然在国内被禁播，王小波在1995年8月8日致友人曲小燕的信中自豪又气恼地说：“改得相当好。其中有些独白，已经直追哈姆雷特不朽之独白，但他还来找我改。诚然，我和威廉•莎士比亚还有一点微不足道的距离,但也不是轻易能赶上的。现在我很烦这件事，和他的关系相当紧张。至于他何时开拍，我也不去打听。”王小波是一个在艺术上精益求精的人，一个小中篇《黄金时代》就修改过几十遍，而因为修改稿子的事情差点和别人翻脸，可见其间有很多文学之外的因素。王小波逝世后，张元曾参加过三次悼念聚会，并在接受丁东采访时，对王小波不乏赞美之辞，声称王小波“不仅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1。但显然，去世之前，作为自由撰稿人，而不是权威“大作家”的王小波，和当时的先锋新锐导演之间，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愉快。王小波和电影导演张元的合作，也可作为1990年代初，自由撰稿人艰难的文字生涯的写照。

然而，1992年并不是王小波暴得大名的时刻。相反，尽管他做了很多事情，结果却并不尽如人意。他在给朋友的信中，焦虑地说：“我这一年混得不好，成绩不能和去年比。在港台出的书卖得都不太好。国内有些东西交了稿，但还没出来。现在情绪最糟糕。”（致刘晓阳，具体月日不详）被王小波寄以厚望的《他们的世界》，销路不畅，虽靳小文很努力，也没卖多少，王小波将原因归结为“没有名气”。9月时，王小波

正式辞去教职，成为自由写作者。可以说，王小波辞去公职写作，是其自由撰稿人立场确立的基本出发点，又是他深思熟虑后的选择。他曾心情复杂地对朋友说：“人大的差事也打算辞去，以便专营此业；成败尚难逆料，心里也磨得慌。总之不复少年豪情。我老师许倬云说，哀乐中年，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罢。（1991年3月22日致刘晓阳信）辞去公职意味着丧失一切体制内福利——稳定收入、医疗保

1丁东、张元，《和王小波相处的日子一元一席谈》，《反思历史不宜迟》，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170页。

障、社会普遍认可等。经历三十多年人生游荡后，王小波终于发现.只有文学才是他魂牵梦绕的所在。李银河已在学界成名，并找到了终生感兴趣的学术信仰，而那个当年被她认为是“天才”的文学青年、智力超群的爱人，现在人近中年，却依然在苦苦探寻。四十岁是男人思想成熟的季节。然而，辞职后的王小波.却对时间生出强大的焦虑感。他甚至到处对人说，人生就是缓慢受锤的过程，人过了四十岁，就不值得活下去。他忧郁地说：“年轻时是自由人，后来成了家庭的囚犯，最后成为待决的死囚。”（1997年2—4月间致刘晓阳电邮）他的《红拂夜奔》、《寻找无双》、《万寿寺》等历史幻想小说中，出现了很多刑场死亡意象，不能不说与焦虑的心境有一定关联:

同样，王小波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我们不能肓目抬高王小波辞职的动机某些文章将王小波塑造成“落魄潦倒的曹雪芹”的形象，是不准确的。即使王小波的小说四处碰壁.精神苦闷，但他绝不是“穷愁孤苦”，这种描述实际上沿袭了传统文化对不得志文人的“想象”。当时稿费低，王小波收入不稳定、有经济压力，但决不至食不果腹。然而经济动机确也是他辞职的重要原因。当时大学教师普遍待遇很低，甚至有“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怪异说法，很多大学教师从高校走出来.投身别的事业“王小波并不耻于谈名利。据相关资料，1992年.大学教师的年平均工资仅有三千零五十四元，低于社会平均工资，在十五个行业中仅排名第

十二位。'王小波对金钱有一种“顺其自然”的大方态度。他曾想搞计算机专业，经过考虑后才放弃。

《黄金时代》在1991年获第13届《联合报》奖，给王小波带来

1陈赞.《20世纪90年代教师工资问题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年1期。

了二十五万新台币的收入'（但《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14期葛维樱、武鹏、陈超的文章《王小波的艰辛的成名》中有这样的表述:“按照《联合报》副刊主编陈晓林的说法，当时文学奖的奖金仅10万新台币……而且台湾联经出版社给得奖者出书也是附加的奖励条件，并非看重其市场价值”；而邢小群在《名作欣赏》2010年第34期上刊发的《〈黄金时代〉和王小波的生前身后》一文指出，二十五万元是王小波两次获《联合报》奖的奖金总额——1995年，王小波的小说《未来世界》再次获《联合报》中篇小说大奖。这两种说法都与王小波的说法有出入，为了弄清此事，笔者于2013年10月初，采访了台湾《联合报》现任副刊主编宇文正女士。采访的结果表明，《王小波的艰辛的成名》及《〈黄金时代〉和王小波的生前身后》两文都有误记之处：陈晓林从未担任过《联合报》副刊的主编，1991年，《联合报》的副刊主编是瘂弦先生，之后是陈义芝、宇文正。其次，有关奖金数额的问题，确切的数字是二十五万新台币），远比他数年的工资高。这可能也是王小波辞职的一个潜在原因匚王小波兴奋地对友人说：“我对微机已无兴趣，因为发现写小说也可赚到钱.”（1991年9月2日致刘晓阳信）在给友人陈少平的信中.他也自嘲地说：“人已过三望四，去日无多，马上着手做事已来不及，岂敢继续袖手高歌，名利亦吾所望者.愿以大脑另一半考虑之

《黄金时代》的获奖颇有一番波折一在宇文正女士的帮助下，笔者查阅了1991年9月17日《联合报涮刊上《清新•讽刺•颠覆一联合报〉第十三届小说奖中短篇小说终审会议纪实》（杨锦郁整理）一文，了解了当时评审的现场情况。

1 1992年：1月11口致刘晓阳信.《王小波全集》9卷,143页。

1991年1月10日，《联合报》刊登了第13届小说奖征文办法。至5

月1日截止收稿时，共收到短篇小说二百七十篇;初评委由孙伟芒、爱亚、张国立、叶姿麟、冯曼伦、黄秀慧担任，选出四十篇；复审评委为作家段彩华、履疆、薛兴国、症弦,进而选出十篇。中篇小说部分，则共收稿五十篇，初审和复审由作家东年、林耀德、袁琼琼、苏伟贞分两段作业，最终决议《黄金时代》、《废五金少年的伟大梦想》、《萍》和《时间作坊》等五篇入围。最终的评议，由齐邦媛（台大荣誉教授）、马各（美国《世界日报》驻台办事处顾问）、郑清文（小说家）、张大春（小说家）、李有成（“中研院”欧美研究所副研究员）担任。

针对五篇入围作品，评委们进行了第一轮的投票，郑清文认为：“《黄金时代》由’交代’和•性爱’两个主题串联起来，写出了共产社会中激烈乂冷漠的男女关系.暴露出社会的畸形和人性的扭曲马各说：“我第一次看《黄金时代》，认为它有若张竞生的《性史》,一个人为什么会无所事事，整天只想着性交一事，但是当我看第二遍时，却发现小说中的讽刺意味极浓，反映出在社会主义生活型态下.连年轻人也没有远大的前途和想法.生活中唯一的乐趣便是建立在性交上面。而且文中对性交一再交代，上级看了才会满意，这也是一种讽刺一”李有成也赞同这一说法，他认为：“小说中上级要主角一再写交代，其实无非想要看黄色小说而已，写得愈露骨，他们看得愈高兴。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个世界性和政治有一种微妙而辩证的关系，性不是问题，政治才是问题。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始终将性紧紧扣住政治问题，从头到尾都很连贯，不离题。小说中的特定时空，我猜是’文革’时代，政治无所不在，它甚至渗透到一个人最隐密的地方，也就是文中所提到的性”

张大春则对《黄金时代》有更多肯定，他认为：“《黄金时代》某部分和米兰•昆德拉的写法相似，用反复的叙述方式，并且在第二次叙述时让读者发现第一次叙述省略的部分，或者修正第一次的叙述。《黄金

时代》的特色在于透过非常自由的叙述，形成世故的结构。除此，它反映出’性’在那个社会中，是青年最重要的活动，也让我们看到交代小说的材料中，有一种后设的概念。所有的人在看这篇小说时，包括文中的领导和现在的评审，都在窥伺主角的性生活。当我们把《黄金时代》看成是一篇有复杂企图的作品时，可以看到小说内文暴露出共产社会中无所不在的权控和监视，领导本身也有性的压抑，所以看到这些交代材料有如在看黄色小说，在文中流露政治的压抑造成性的压抑.性的压抑也引起政治的压抑。另外，这篇小说的范围也可以大到不只是反映一个特定的共产社会，而是在无限地暴露一个人最隐密的事，这种暴露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有若看到真人的生活和世界,而不像在读一篇小说。我觉得《黄金时代》让我感动的一点是，它让我去开看小说的乐趣.而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人。”

齐邦媛则对《黄金时代》有一些异议，没投它的票。她认为，王小波没有直接写出政治对人性的压抑，而是一再重复写性，把“性”曲折地作为颠覆性手段，实在没有必要。然而，她也肯定了王小波的这篇小说受到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影响，“对人类羞耻心的丧失写得很深刻”，对“文革”的讲述也有别于张贤亮式的伤痕暴露。

第一回合讨论结束后，有几位评审认为《黄金时代》和《废五金少年的伟大梦想》难分轩轾，建议由两篇并列中篇小说奖，合得第一名三十万和第二名二十万的奖金，即每人分得二十五万。于是评审决议在第二次投票时决定，每人可圈选自己心目中的第一、第二名，也可赞同两篇并列为中篇小说获奖作品.并以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票选结果。第二次投票，对于《黄金时代》，齐邦媛、马各、张大春、李有成均赞成并列，只有郑清文认为《黄金时代》应为第二名。

最后，综合两次评审结果，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和台湾本土作家李顺兴的《废五金少年的伟大梦想》并列获得中篇小说奖.各得二十五万新台币奖金。

此后，《联合报》从1991年10月14日开始连载《黄金时代》，到11月11日止。1991年10月5日，金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撰文报道

《黄金时代》获奖消息，称王小波为“文坛外高手”。

王小波对书商、电视剧投资商的态度，也不像传统作家那么清高，甚至相当主动。《黄金时代》在国内出版后，王小波接触了很多书商，以扩展书的销路。翻译家孙越在文章中提到约王小波写电视剧本的事：“1996年下半年，北京影视界剧本匮乏，企业有钱，斥巨资找人写本子。大概是当年年底或是1997年初，当时剧本在北京市面价格最高到了每集人民币两万元，连初出茅庐的写手的稿费，每集也有八千元之巨。我认识的一个影视投资商要找人写电视剧本，题材极度无聊，是描写郊区女工为支持城里供应大白菜而忘我劳动的故事，我给王小波打了电话：’你想跟投资商谈谈吗？’王小波同意，但有一个条件：只能用笔名写，并且叮嘱了我好儿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桩买卖没有谈下去o"'1995年春，张卫民也曾将王小波的一些作品推荐给两位成都的书商朋友。朋友看后，答应出版。后来，申请了书号，也做出了三本样书，但纸张粗糙，错字较多，而稿费也很低。王小波和李银河都认为不太妥当。张卫民也觉得不好意思.就帮小波拒绝了继续出版该书的事。但是.从他为该书出版而准备的序文《怀疑三部曲•总序》（他原计划将《红拂夜奔》、《革命时期的爱情》、《寻找无双》编为一

1孙越.《普通人王小波》，《创意＞,1999年3期

个长篇集，出版商拟定的名字为《迷城》，而王小波拟定的名字则为《怀疑三部曲》，后来该序言发表在《出版广角》1997年5期）中.却可窥见王小波其时对于创作和人性的某种认识:在该文中，王小波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人生的三大假设即凡人都热爱智慧，凡人都热爱有趣，凡人都热爱异性。在张卫民手中，笔者找到了仅存的一本样书，封面已经散失，王小波在序言后面署的时间是1995年7月26日，责任编辑为“李定凯”，出版机构为“成都出版社”，字数为三十六万，出版时间为1995年9月,ISBN为7—80575—199—1/1•23,另有**（川）新登字001号”字样。这次“未成功”的出版尝试，反映了王小波生前著作出版的艰

难'

另一方面，由于迟迟不能在国内主流文坛打开局面，王小波对写作能否赚钱，心里也没底，甚至相当悲观他临去世前，还专门学了驾照。据李静介绍，是一个卡车司机驾照。而王小波在给朋友的信中则说，准备去弄一个吉普车，到京郊找片荒山承包下来，就算养老匚当然，王小波是真准备买车包地，还是一时戏言，都已无从得知。

应该看到，虽然王小波发表了一些小说，获过奖.但大家普遍认为，这些还远不足以支撑起他的文学地位，也不足以让他谋生。而他的文学趣味和价值选择，不但有一定政治风险性，且在当时对文坛和大众来说.也非常陌生。王小波辞职时，家人几乎一致反对。母亲宋华首先表达了疑虑，大姐王小芹等亲属也都对此非常担心。王小波的外甥姚勇清楚地记得，1992年9月的一个下午，在大木仓胡同的家中，王小波坐在沙发上，双手捧着脸，向全家人宣布这个决定时的情景：“姥姥担心地说：’如果辞去了公职，将来你如果生病，可怎么办呀？’舅舅则淡然而坚定地说：’如果人总是瞻前顾后，就永远不可能做成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王小芹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她最佩服王小波的地方在于，王小波能在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毅然决然地投入一项非功利的事业。李银河对此表示了支持'作为妻子、爱侣和相知甚深的朋友.同时又是王小波写作才能最初的肯定者，李银河毫不隐讳对王小波写作才华的赞扬。李银河坚信，王小波终会在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功，尽管王小波的作品四处碰壁，但李银河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宣传王小波.她甚至半开玩笑地对王小波说：“好好写，将来诺贝尔文学奖是你的。”

但是，王小波并不是当时唯一辞职的文人比如，韩东在1992年辞去高校教职，专职写作；朱文在1994年辞职.从一个电力系统的助理工程师变成了职业作家；吴晨骏1995年辞去电力工程师的公职，王小波的年龄比他们都大，属于1950年代出生的老三届知青，这一批人中出

了很多作家。王小波在中年奇然脱离体制，投身于文学事业.在很多人看来难以理喻。因为，1990年代已不是文学呼风唤雨的年代了.商业的大潮早已席卷中国。无论在高校，还是投身商海，利用他的才智，王小波本可以轻松获得优渥的生存环境。而王小波的美学趣味、价值选择与韩东、朱文等新生代作家相比，也有很大差异。对边缘性和个性的强调，并没有导致二者殊途同归。王小波从此出发，走向了对1980年代启蒙的深化，以“个性的张扬”强力介入公共话语空间，而韩东、朱文等新生代作家，却在体制边缘走向了更私密化的个人空间，以“个性的退守”完成不断激进的解构，王小波的某些价值选择、美学趣味，在他们看来，恰是“宏大叙事化”的，是“旧文学”方式，应该予以解构。二者很难说谁对谁错，孰高孰低.但从朱文等作家发动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北京文

1王小平，《我的兄弟王小波》.202页。

学》1998年10期），可看到当时文坛少数派和最先锋激进的写作思潮，对王小波的微妙情绪。朱文提的问题是:“你觉得陈寅恪、顾准、海子、王小波等人是我们应该崇拜的新偶像吗？他们的书对你的写作有无影响？”五十几位新生代作家有一半表示，喜欢王小波的书，但他不是偶像,对写作没有影响。另一半则表示，他不可能是偶像，也没有影响，因为不了解。韩东对此表述说：“陈寅恪、顾准、海子、王小波是90年代文化知识界推出的新偶像，在此意义上他们背叛了自身，喂养人的面包成为砸向年轻一代的石头在光怪陆离的写作潮流面前，王小波的写作理想与写作姿态.却似乎已显得有些“落伍”了。

而且，我们必须看到，王小波虽有文学才华，但这么多年来，他始终算不上勤奋的写作者，就连李银河也在热恋期的信件中认为小波“太懒了”。那么，是什么促使一个思想成熟的中年人，在四十岁奋然而起，选择了一种“壁立千仞、孤绝叛逆”的生活呢？细细忖度之，除了对文学的热爱，对经济自由的向往，恐怕还有对衰老的恐惧，及因时间流逝所感

生出的对“创造”的急迫需要。他不想再“受锤”，他似乎本能地感觉到时间已不多，需要对这个无趣、无聊、无爱的世界，这个让他狂怒、让他绝望，乂让他留恋的世界，进行一次决绝的反击，一次“有尊严”的了断。

也是1992年后，王小波进入了一种“职业文人”的生活状态。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总以这样的状态出现在世人面前°这和传统精英作家有很大差距，更像一个“落寞文人”：他越来越沉默，人声喧闹的地方，他总显得孤独，而有时却说得很多.特别在好友面前；抽烟很凶.酒喝得不多，眼睛就发红，还时不时冒出几句尖刻的脏话。在公众场合，他坚持说出并不受人欢迎的观点，坚韧地和别人辩论,而乂不能像在文章中那样，用无畏的泼辣锋利，进行决绝的言语反击,那些伤人的话，总让他感到“巧骂”的痛快，却又有些闷闷不乐。他高大懒散的身形依旧，说话却细声慢气，慢条斯理，嘴角半张。他皮肤粗糙，面色黝黑、有些泛黄，嘴唇黑紫，真诚低调的笑容中，偶尔还带着顽皮，但脸上的皱纹却越来越多。他常不修边幅，在宋华的回忆文章中，曾说王小波经常蓬头垢面就出去见人，她这个当母亲的看了，心里都觉得不好意思。他在夏天通常是汗衫与大桃衩，身上散发着汗臭，只是有采访的时候，才换上一件白衬衣。冬天则是旧大衣或猎装，牛仔辨。头发犹如乱草，却已日渐稀疏。常被人认为是外地来京民工。他手里还常提着破旧的黑色人造革包。去见文化界人士的时候，包里通常放着几本自己的书；而去会见朋友的时候，包里也会有他这个“海归作家”喜欢的食物：用马粪纸包裹着的、一大块油汪汪的猪头肉……

5

王小波辞职后，基本上呆在家中靠写作维生。他和李银河初回国时并没有房子，就住在王小平赴美后留下的一套两居室的旧房子里。该房产属于北京市科委名下，位于现在首都师大南门八里庄北洼路。房子采光不好.门厅摆着洗衣机，家具也很简单。王小波通常在南屋会客，屋里左边有一个书柜，一条旧沙发，写字台上放着两台电脑（有袖珍笔记本，也有台式机）；右手则是一排书柜，还有模样老旧的电视机。写小说之余，王小波一直没有放弃电脑爱好。1991年5月，他还发明了一套汉字输入法，是用调整汉字字模发生器的方法制作成的。简言之，就是利用汉语拼音和汉字“平上去入”的四声法的结合，制作出来的一套汉字输入法。微软的Word汉语软件开发前，王小波的输入法，要比当时的汉化软件先进很多。1990年代初，处理大量汉字，如长篇小说时，当时的软件往往容易出错。王小波曾想找软件商卖掉这款软件，但因输入法不是特别简易，没有成功。当时王小波是少数利用电脑创作的作家，他往往不是交给编辑手写的文稿，而是打印稿或软盘。他还配合着小说的写作开发了一些多媒体效果.比后来网络文学写作对于“超文本”的运用要早很长时间'比如，小说《万寿寺》的开头，王小波引用阿迪莫诺的话说,“我的过去一片朦胧……”当小说文档被打开的时候，不仅配有电子音乐.还用“递归算法”设计出一个混沌图形，被深浅不一的绿色和棕色按数学规律渲染，一点点地呈现在电脑里，非常好玩。王小波的这些创意，让还在清华大学读计算机专业的外甥姚勇大为佩服1997年，王小波自己攒件买了一台486配置的电脑,他得意地对姚勇说，从此进入了奔腾时代.而他把原有的一套286机器给了姚勇，这样外甥只需几百元.就能让电脑升级到486机型王小波和这个外甥非常合得来：大姐王小芹，二姐

王征，大哥王小平，及小弟晨光都先后去了美国.而1997年李银河又去剑桥大学做了访问学者，王小波就经常回家，照看年事已高的母亲。在宋华的住宅楼前，有一座简易的两层楼房，一楼中户的一套一居室的房子，就是王小波住的地方。姚勇学校放假，就回来找舅舅聊天。他特别喜欢舅舅的小说《黄金时代》，曾把该小说以打印稿的形式，让自己的同学互相传阅。很多同学都争着阅读一王小波有篇小说《舅舅情人》，就站在外甥的角度，对自己进行了戏谑调侃而他还写有一篇杂文《我怎样做青年的思想工作》.也是谈的外甥的事情

当时，姚勇在清华大学搞起了摇滚乐队，还参加过很多演出:清华大学的学业很重，姚勇要搞音乐，还要应付考试，很快人就瘦了一大圈，于是就想退学以搞音乐为生，王小波找姚勇深入地长谈了一次。他劝姚勇说.人在生命中的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必须做的事情。这些事情必须做及格，才能有下一步的发展。读书就是非常重要的阶段。上了一个台阶，才能去寻找其他的想法。'姚勇把辞职在家写作的舅舅当作偶像.虽然.现在他并不讳言，当下网络时代的年轻人，可能更多不会再关注王小波。在舅舅的劝说下，他还是坚持读书。1997年，姚勇大学四年级的时候，王小波过世了。姚勇毕业后，先是留在清华大学任程序员。2000年，他下海经商，去了一个他非常喜欢、但当时刚兴起的行业——电脑游戏产业打拼。十几年来，他和朋友合开游戏公司，挣过大钱.也曾负债累累。目前.他作为主要创始人的游戏企业——永航科技公司，开发出了“炫舞团”等一系列流行游戏，收益非常好，正准备上市。姚勇最终和他的舅舅一样，也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

但是，王小波并不了解国内文学圈，正如国内文学圈也并不了解他-王小波曾颇为自傲地说：“我听说国内有个文学圈，但并不知道在哪里，后来也参加过一些活动，但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王小波的小说风格和主题，显然和1990年代公认的文学趣味相距甚远。他的出现，是对文学编辑审美能力的挑战，也是对文学圈对异质性创作的容忍度的考验王小波在生前声称，他曾收到过很多谩骂性的退稿信这些退稿信的原貌和出处.我们如今已不得而知’文学圈话语方式在表面多元化之下，依然存在强大的规定性法则,这种规定性法则，既是对文学的政治性而言，又是对新时期文学本身的游戏规则而

1据2012年12月对姚勇的采访言的。

王小波笔下的知青故事，缺乏通常我们熟悉的豪迈理想主义和悲壮的风格；他笔下的日常生活，也没有我们熟悉的暧昧与琐碎、理直气壮的物质至上，及我们熟悉的王朔式的低身段调侃；他笔下的历史传奇，更像是科学爱好者的无厘头臆想，丝毫没有应有的微言大义；他也写性,写得惊世骇俗，汪洋恣肆，却干净坦白，强大无比，没有狡猾的方框和边缘性的游走。总之，1992年的王小波，对当时的文坛而言，就是一个十足的“怪胎”。

1992年底，发生过一个“谢冕推荐事件”，可以看到当时主流文坛对这个急于闯出名头的“中年作家”的谨慎态度。《浪漫骑士书中，丁东曾提到，1992年，他们夫妇曾试图将王小波推荐给北京大学的谢冕教授。当时，邢小群正投师于谢冕做访问学者，谢冕的课堂每一两周会举行一次中国当代文学的专题讨论，邢小群便将王小波在香港出版的《王二风流史》送给谢冕，谢冕回应说写得不错，但专题讨论却没能安排。为此，丁东说：“十几年前，谢冕先生率先支持朦胧诗，表现了一种卓越

的民间眼光；可惜在王小波的小说上，这种民间的眼光没有能够再次闪亮，他也错过了再一次充当伯乐的机会。”[1]孰料，这篇发表在书中的访谈，引起了谢冕的弟子、香港中文大学的教师张慧敏的不满。于是，在《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3期）上，张慧敏发表了《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王小波死后的追念与活着的作品》一文，对丁东的说法进行反驳。据她的讲述，1992年的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主题是有关文学史的系列讨论，在大选题之外，每一学期有一到两次,安排当代文学现象或热点问题讨论。“这是一门课程，目的是培训学生的思维和敏锐，而不是’伯乐’选马的场地。”1997

1谢泳、丁东，《王小波：一位知识分子和一个时代》，《浪漫骑士》，250页。

年12月，北京大学的批评家周末，终于安排了王小波的专题，但张认为讨论并不成功，且“使得当代文学课程的设计有着不可避免的尴尬和悖论”。而对丁东的论述，张也表示不认可：“笔者不禁背脊骨抽冷气。文坛有许许多多的恩恩怨怨，自古以来便造成了文坛公案的多姿多彩。谢冕先生由于他在当代文学中的名气和地位，常会不小心掉进某种是非中，而先生自己却浑然不知。”张慧敏乂说：“因为得不到鉴赏而心怀积怨，尤其是针对个人，只表达情绪发泄，于事无补。其实王小波的文字没能得到爆冕先生的特别赏荐，究其作品本身亦可寻得理由……王小波作品的价值在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和自由主义的叙述姿态……是作品成功的关键，但同时也是他不同于谢冕先生乃至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文艺批评主流的审美趣味之要点。”

显然，接受这个“怪胎”，对中国文坛秩序而言需要时日。按建国以来形成的文学惯例，要被文坛所接受，王小波应首先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发表一定量作品，然后被权威选刊大量选载.引起权威批评家注意，并有一些评论文字面世。而后，应在官方举办的权威文学培训机构进行培训。通过培训，拓展人脉，进入一定文人圈子，最终以权威文学奖为权威认证，并获得一定的政治身份认可（如作协全委会委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这是传统作家成名之路。1990年代的文学格局，权

威作家大多成名于1980年代，如莫言、张炜、王安忆、韩少功、余华、苏童、贾平凹、张承志等，而1990年代崛起的作家，除柳建伟、刘醒龙等主旋律作家外，迟子建、毕飞宇等影响较大的作家，基本上还是文学体制内部培养的结果，而王朔、卫慧、棉棉、陈染、林白、韩东、朱文等作家虽更多受到市场经济影响，但依然与主流文学体制有重要的内在关联。比如，王朔与日常化写作的关系，卫慧、棉棉与身体写作思潮的关系.林白、陈染与先锋女性写作思潮的关系，韩东、朱文与新生代写作思潮的关系等。甚至1990年代末成名的文学青年韩寒，也与80后文学思潮的定义有关。只有王小波，其文学的定义、传播和研究，从其创作进入文化圈开始.就基本上是依赖于非文学的知识分子与媒体来完成的。这在中国文坛是非常独特的。就此而言，自王小波去世后，国内至今没有一个作家能成功复制王小波式的文学话语操作模式。可以说，王小波属于1990年代伴随市场经济崛起的传媒与公共知识分子共同打造出来的最后的“文化英雄”。

7

1993年，对王小波来说，是精神上“舒展自由”的一年.虽然作品发表依然困难。大陆文学刊物上，他仅发表《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收获》1993年3期），但少了工作的羁绊，王小波的精神表现出轻松自如的“飞翔”状态。也是在1993年，王小波写的杂文随感多了起来，比如，他在《四川文学》1993年1期、3期、4期发表了一系列“域外杂谈”，谈自己在美国的感受。他还在《读书》上发表了杂文《摆脱童稚状态》（6期）。除此之外，王小波的精力主要放在《红拂夜奔》的写作上，追求一种“不受现实逻辑的约束……更为纯粹的文学状态”[1]，而《万寿寺》、《寻找无双》等传奇系列小说也在构思之中。正是在历史自由的狂想中，在李靖、红拂和虬髯客的故事里，他将《唐人秘传故事》中的历史隐喻进行了极致的狂欢化处理,这也使王小波在延续《黄金时代》的文风的同时，开辟了新的创作领域。他不想写太过沉重的东西，相反，他更想在飞扬的想象中找到灵魂的自由。

1黄集伟.《王小波:最初的与最终的》.《浪漫骑士》.223页。

1994年.王小波的杂文《思维的乐趣》，发表于《读书》9期.他的杂文开始为更多人熟悉。这一年他共发表了两篇小说，长中篇《革命时期的爱情》发表在《花城》（3期），《我的阴阳两界》发表在《青年作家》（3期）。特别是《革命时期的爱情》，让很多人开始关注他。1994年7月，王小波的小说集《黄金时代》历经艰难后，也终于在华夏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出版，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责任编辑赵洁平.赵

洁平的父亲，是被誉为“知青之父”的原国家农垦局局长、全国知青办公室副主任赵凡1978年，云南建设兵团的知青们，为了回城，展开了绝食、卧轨等激烈举动.震惊了全国。当时，正是赵凡仗义执言、体察民意,才最终促成了1979年至1981年期间的知青大返城的高潮赵洁平本人也当过知青，对那段历史，自然有亲身体验,

1994年初.赵洁平收到了李银河推荐的《王二风流史》，还有《革命时期的爱情》、《寻找无双》等书稿，赵洁平的丈夫和李银河是社科院的同事，当时，赵洁平正向社科院推销自己责编的一本社科类图书、哲学家波普尔的名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李银河则借机希望赵洁平能看看王小波的小说。当时，赵洁平是华夏出版社社科编辑室主任，主要是做社科类图书，不负责小说，可碍于面子，还是拿来看了。她读完后，觉得这些作品很有趣，思想性强，具有“奇特的创造力”，但感觉出版难度较大。接F来整整一个星期，她都沉浸在小说的氛围中。在一种责任感的驱使下.她决定出版这些作品中的一部分。嗣后，她主动跑到王小波家中，告诉他们：“我已经准备出这些作品了。”之前，它们已在中国戏剧出版社等北京的四五家出版机构游荡了很长时间。仗义直爽、有责任感的赵洁平在和王小波、李银河的交往中，逐渐和他们成了好友。赵洁平后来发现.小波的姐姐王小芹和她是初中同学。

然而，真正做起来，难度却不是一般地大。王小波的小说，既有开放张扬的性描写，又有对革命叙事的颠覆性解构，这在1990年代中期，非常具异质性。赵洁平先询问了新闻出版署，后又请了很多专家给这本书做鉴定，以保证这本书没有政治问题。同时，赵洁平为给书增加卖点，还印了很多“冠冕堂皇”的话，诸如“一个知青的反思”之类。'1990年代初，正是知青文学的第二次“小阳春”，电视剧《年轮》等不断热播，知青纪实文学也很多。赵洁平希望通过“知青文学”的概念掩护，更好地促进书的销售和接受。赵洁平和王小波一起设计封面，想

用达利的油画.但没能如愿。后来，出版社领导却让她做了一个“天安门放红光”式的封面。但赵洁平一直拖着没敢给领导看全文。然而，即使这样，该书依然不能顺利出版，虽通过了一审、二审，但社长那里始终没顺利通过，这时候.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副主编林建初，给了赵洁平非常大的支持。最后，赵洁平还是利用社长出差不在的机会，最终把这本书出版了。为此.赵洁平和林建初都承受了一定压力。有人说，赵洁平和王小芹是同学好友，所以才帮王小波。有的人则对此冷嘲热讽。但赵洁平坚持己见，书出版后，她甚至大病了一场。

1994年9月28日上午9点30分，华夏出版社二楼会议室，《黄金时代》研讨会召开，参加者不多，大约二十人。参加会议的主要是一些文学编辑，如《人民文学》的朱伟，《文艺报》的蒋原伦，《北京文学》的兴安，《东方》的朱正琳，也不乏非常新锐的批评家，如白焯、陈晓明等。白烽和陈晓明给予王小波的评价和定位，是准确的。白煙

1《王小波生前只是个“沉默的大多数”》，《台州日报》，2011年4月15日。

兴奋地说:“王小波的小说一出来，就把别的写性的小说给’毙’了。”而陈晓明认为，王小波的小说，揭示了中国文学变动的一个方向他敏锐地将之归于“个人化写作”的崛起，指出其力图在个人记忆和历史记忆之间寻找契合。他将这种直接进入个人体验、拷问存在的小说命名为“直接存在主义”。

批评家们对《黄金时代》的研究，尽管还只是直观印象式的，但总体评价并不低。当然.这次座谈会，也是主流文坛和王小波的一次直面相遇，可以看出，1990年代初流行的学术话语对小波的作品，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误读。比如，与会的一些专家认为，王小波的小说是“新体验小说”和“新感觉小说”在叙事方式和思想内涵上的体现。这种试图将王小波放置于现有文学思潮的做法，实际上偏离了王小波创作的原旨。对

王小波在会上的表现，也有很多说法。有的说,王小波听到大家的评价，脸上没有表情。也有的说，王小波的姿态非常低，他希望与同行们交流。他在研讨会的最后发言中，强调自己的小说是“黑色幽默”。

然而，这本小说的出版，对王小波的意义不言而喻。尽管小说一开始卖得并不好，但王小波的收益还是比较可观，据赵洁平回忆，“我和王小波签了一个破例的合约，前6000本一次买下，稿费按照千字30块钱，卖1万册他分3%版税，2万册4%,3万册5%,当时算出版界最优惠的条件了，虽然稿费只有9000多块。”'可以说，在1994年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这笔钱不算少。这也是他第一次在大陆文坛公开亮相。研讨会后，赵洁平又和王小波一起，熬了几个通宵，设计宣传展板。然而，后来林建初制止了宣传，原因大概是因为该书

I陽绯樱、武鹏、陈超，《王小波骐辛的成名》，《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14期。

受到了内部批评：不能参加订货会，不能在新华书店公开发行，这逼着王小波和赵洁平.一起在“二渠道”想办法。他们用自行车带上两捆书.到各书摊、图书批发市场去推销。王小波总是先送别人几本，后面要的时候再给钱。到了周末，李银河、王小芹，还有王小芹的丈夫姚锐戈.都帮着王小波去推销书一开始，推销效果不好.非常艰难，但过了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二渠道小书商们，都主动来王小波那里要书.也有越来越多的读者熟悉了王小波。1994年11月2日的＜中华读书报》，还专门刊登了王小波、李银河、卢跃刚、李大同、邢小群等组织的、有关《黄金时代》的对话。对话开篇，即耐人寻味地写道：“书的封面一片火红，有如天安门广场初升的旭日，在这片火红中，喷涌出四个黑色的大字：黄金时代。大多数人甚至不会在这个封面上多停留一秒钟，卖书的和读书的，都搞不清这本书是干什么的。有人读后评价此书是划时代的，同时也是干干净净的。”[2]

8

[995年至1996年，是王小波退职后最“热闹”的两年;1995年，王小波的小说《未来世界》，再次获得《联合报》中篇小说奖.而他也在传统期刊发表了三篇小说.其中.《南瓜豆腐》发表在《人民文学》（1995年3期）。而王小波的杂文，也为他職得了巨大声名，各地稿约不断原《人民文学》编辑朱伟，接手《三联生活周刊》后，邀请余华、刘震云、王朔、王小波等给其撰稿.王小波主要负责“晚生闲谈”的小栏目.发表了很多非常有影响的杂文作品。1995年，王小波的杂文以“井喷”的状态出现，其影响甚至超过了他的小说这一年.
他在《读书》上发表了广为人知的杂文《花刺子模信使问题11996年，在《三联生活周刊》上，他发表了《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等许多有影响的杂文，乂在《东方》、《中华读书报》、《博览群书》、《戏剧影视报》等数十家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杂文随感，他似乎忘却了“沉默”，对社会文化、文学、历史、哲学、海外留学、知青、国计民生等诸多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批评。1996年4月，王小波开始为《南方周末》写专栏。“我跟他臭味相投，都是自由主义的理念，而且他的文笔很幽默，所以选了他当时的编辑鄢烈山说。具体约稿事宜由何保胜负责。很多人告诉何保胜王小波很木讷，但熟悉之后，他发现王小波很愿意说话，两人有时在电话里一说就是一个小时。这些杂文扩大了王小波的文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他的小说创作。文学创作之余，王小波还常和一些学者做学术方面的探讨，比如，他对髙王凌“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为存活经济”的观点的分析：

王小波的杂文，相当一部分谈的是他的知青经历。这也是他的杂文中.生活气息最浓、最幽默生动、深入浅出的部分。这些杂文还有一个显

著特点，就是把小说的情节生动性与对细节的描绘引入创作，通过一个个关键性场景、故事、人物，来表达他的自由主义思想’这是一种“小说化杂文”。正是这种独特的文体，使得王小波的杂文非常吸引人（其实，与此相对，王小波的小说，特别是历史小说.则存在类似鲁迅《故事新编》的“杂文化历史小说”的特征，利用杂文的修辞手段，如夸张、反讽、造型、对比、逻辑推理等，介入小说的故事、人物和主题，形成具批判性、解构性的历史小说模式）。例如，王小波最有名的杂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就从一头猪类似寓言的神奇故事，引出有关人的自由的问题,幽默中饱含苦涩，既有轻灵的想象气质，乂有现实沉重的思考。其他诸如《肚子里的战争》、《思想和害臊》、《体验生活》等，都能从细节入手，在出人意料之处洞见社会荒谬。王小波的另一部分杂文，以国外生活经验为主。例如“域外杂谈”系列、《在美国左派家做客》、《外国电影里的幽默》等，细致介绍了欧美世态百相，特别是欧美日常生活自由、放松的一面，给当时的国人打开了一扇窗户。

他对电影的批评也很有意思。例如，王小波曾写过两部戏仿之作《樱桃红》和《最灿烂的阳光》，对国产电影《红樱桃》和《阳光灿烂的日子》进行讽刺。在《樱桃红》中，楚楚和德国纳粹医生的关系，由一个“压迫与爱国主义”的主题变成了令人哭笑不得的“S/M”（虐恋）主题；而《最灿烂的阳光》则认为《阳光灿烂的日子》中表现的“青春’文革’叙事”非常虚假，而真实的马小军如果下乡插队的话，也会非常悲惨。王小波对身边的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也提出了看法，例如，《卡拉OK和驴鸣镇》、《个人尊严》、《君子的尊严》、《居住环境与尊严》、《饮食卫生与尊严》，其实都涉及转型期社会公德的重建问题。在革命时期，社会公德是由革命道德规范衍生出来的强制性公共秩序，而当革命秩序松动之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崛起，传统文化中的自私、苟且的成分，即进一步发酵，集体性道德缺失，个人私德却不能确立，

这典型表现在人对公共环境的破坏和对公共秩序的冷漠。

而对当代文坛，王小波也不断发言，他先后针对张抗抗、林白、陈染、王朔、贾平凹等人的创作，或多或少地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从这些言论中，也可看到王小波的文学思路和当时主流文坛的差异。他不喜欢张抗抗的《赤彤丹朱》，直率地说：“坦白地说，如果不是编辑先生力邀，我不会写这篇评论。这主要是因为此书的书名，还有洋溢在书中强烈的使命感和优越感。这些成分不属于文学，更不属于文化的范畴，”他甚至尖刻地说：“我们国家的文学传统，有一半来自传统文化，另一半来自前苏联，总是以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自居，想着提升和改造别人的灵魂，炫耀和卖弄自己的灵魂。”该文章发表于1996年1月31日的《中华读书报》。当时革命怀旧热方兴未艾。张抗抗的小说，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用新的写法和观点，来诠释父辈的革命历史C几年后，随着《激情燃烧的岁月》的热播，这种对革命历史的“新编”，更是蔚然成风，然而，王小波却从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更人性化的改写中，看到了革命权力对人性戕害的某种延续性。而在《王朔的作品》中，王小波表达了对王朔有距离的欣赏。王小波对王朔的京味痞子气有天然亲近感，他在给艾晓明的信中说.王朔骂张承志媚俗，骂得有道理，所谓媚俗，就是不忘要做青春偶像、群众领袖。当然，王朔也没有找到人文精神，不过比别人更接近正确。而对林白、陈染等文坛较激进的作者，王小波很支持，但也毫不客气地指出其问题。在《艺术与关怀弱势群体》中，王小波认为，好的艺术，不是去关怀弱势群体，而是应冒犯强势群体，借此来替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中大胆的性爱描写辩护。而在《用一生来学习艺术》等文章中，王小波则公开了自己的文学观和艺术观，他有趣地将科学与艺术等量齐观，认为科学和艺术一样，都是追求完美、使人幸福。在《我对小说的看法》中，王小波提出了现代小说具经典性的标准：极端精美、拥有极大信息量。王小波认为，最能代表现代小说成就

的应是中篇小说。

同时，王小波发表了很多谈“知识分子问题”的杂文。实际上，他试图在1993年之后“人文精神大讨论”时知识分子精神大动荡的背景下，在知识分子向官方、市场、书斋分化的过程中，利用媒体的支持，重塑具启蒙意义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这和史铁生、张承志在1990年代为传统文学爱好者找到精神资源有相似的功能性作用。而王小波则更多针对非传统的文学爱好者。比如，70后、80后大学生,非文科知识分子等。这些文章主要冇《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知识分子的不幸》、《花剌子模信使问题》、《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理想国与哲人王》等。在这些文章中，王小波提出了一系列自由主义风格知识分子的行为准则.例如：做知识的精英，而不要做道德的精英；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知识分子最大的罪恶就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在一系列命题式写作中.王小波将对专制的警惕和对信仰的怀疑推向了极致.彻底拒绝信仰的强制性作用但王小波的问题在于，他对“信念”的所有否定性假设，都有一个体制的压制状态做背景，如果失去了这个前提,王小波立论的合法性就会发生动摇，因为王小波相信“人活在世上，自会形成信念”，而自由坚守的底线设置不是制度性的，而是具有不辩而明的“自发性二这不仅有违其提倡“多元性”的初衷，也过分强调知识分子的智力优越感、而没有了任何的担当和进取心，过分保守的价值观念，同样有可能激发“人性的逆转”——强调知识分子功能的时候，王小波的立论.同样有削弱文科知识分子对社会介入性的潜在危险。

从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王小波对中国文化热与民族主义的问题.也非常关注。针对中国文化热的文章主要有《我看文化热》、《“行货感”与文化相对主义》、《文化之争》等，专门谈国学的则有《我看国学》、《智慧与国学》，而《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百姓•洋人•官》，则针对“中国可以说不”等1990年代中期的民族主义热潮提

出了尖锐批评。王小波的这些杂文，犀利地指出了1990年代风行的国学热和文化热的关键问题.即将文化问题等同于道德和伦理问题.而将国学等同于儒学一而在那些仿佛“爱国”的民族主义风潮背后，同样隐现着传统中国实现现代转型时的“弱者心态”：不承认科学和理智的普世性价值：1996年8月.王小波在接受意大利的独立导演安德烈访问时.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安德烈问，有一种说法认为，东方和西方的思维方式不一样，你怎么看？王小波说这种看法相当无聊，其实是掩盖着一些不体面的事情，因为人都是一样的。王小波的这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其实是继承了启蒙传统的.但与1980年代传统相比，乂有差异王小波反复指出的是.在对民族主义和国学、传统文化的刻意强调中，在西方理论的误读中，我们很难将传统进行积极的现代转化.而是藉由它形成了对抗性的狭隘民族心态。

引人瞩目的.还有王小波对“气功”的批评。基于理性基础之上，王小波对“气功”的否定.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在王小波看来，中国在1990年代的大背景下，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气功潮，根本原因并不是信仰的缺失，而是理性的缺失。红色革命信仰退潮后，主流政治并没有给民众以现代社会的基础伦理的熏陶和培育，即理性建设的训练和制度设计。1995年7月12日，王小波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上的杂文《迷信与邪门书》，就不点名地对柯石路的观点进行了批判：“知识分子应该自尊、敬业我们是一些堂堂君子，从事着高尚的事业-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看自己和自己的事业，小说家也不该例外。现在市面上有些书，使我怀疑某人是这么想的：我就是个卑鄙小人，从事着龌龊的事业,”他还戏谑地对“脑门上贴钢锄”的特异功能魔术大加讽刺《中华读书报》的记者祝晓风曾撰文谈及那次选题策划的内幕：“柯云路刚出版了一套三本的《柯云路生命科学文化》。这于是成为领导的目标。需要反方，就是向柯老师开炮的。光有司马南还不行.还得找个学者色彩的。就王小波，因为正好

他刚写了《迷信与邪门书》，里面虽没有点柯老师的名字，但谁一看都知道骂的是柯。王小波又没单位，辞锋锐利，不怕得罪人。采访他最合适。我采访时，就明确问，王先生，您文章中说，’有一类书纯属垃圾’，’各种邪门书的作者应该比人渣好些，但凭良心说，我真不知道好在哪里’，这些话指的是不是柯云路和他写的那些书？小波先生说当然是了。问，我能在报道里把您的这个意思明确写出来吗？他说，无所谓，可以，1995年8月2日，这篇报道登了出来，有一个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标题：《新闻中的新闻》.副标题当然是’关于“柯云路生命科学文化”丛书的采访'

其后，王小波又发表了多篇批评气功和特异功能的文章，如《生命科学与骗术》。王小波对所谓的“生命科学”嗤之以鼻，他认为科学就是要实事求是，而不是似是而非，他甚至偏激地说：“我们现在见到的是一种远说不上合理的信仰在公然强奸科学个弱智、邪恶、半人半兽的家伙，想要奸污智慧女神。”王小波的反特异功能的激烈言论，也招致了很多反对意见，他和司马南等当时风头正健的社会人士都有过一些文字和言论上的冲突。凤凰卫视1996年专门做节目，讨论特异功能的问题，邀请了柯云路、王小波、祝晓风和北京青年报的女记者作现场辩论。祝晓风的回忆文章中写到了那次辩论现场的一些逸事：

> 下午一点半左右录节目。大家都提前到了。柯云路的夫人也来了。柯老师一身西装，领带皮鞋，外面还罩了一件很正式的西式风衣。柯老师是真显年轻，比他的实际年龄看上去至少小十岁。王小波稍晚到，到了就被拉去化妆，就是在

I祝晓风，《湛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　个编辑十年后对王小波的回忆》.《中华读书报》.2007年4月4日。

脸上涂抹点膏状物.头发上喷点液体，把人变得难看一点，如此而已。他嘴上抹唇膏的样子，现在仍如在眼前。因为这个时间，大家都没吃饭，于是录制前，节目组给大家提供了十分简单的盒饭，很一般，可以说很不好吃——别以为香港的电视人就不是中国人，都一样。那天看王小波的嘴唇，就发现很紫，而且有些发黑。我心里有些惊恐。——后来看王小波的同学写回忆他的文章里，也说到早在80年代，他的嘴唇就发紫。可那次不仅是发紫，而是黑紫黑紫的。他们二位搭了话，都说到是知青。气氛还算友好。一会儿，大家都坐到了位置上。灯光照得人热腾腾的，难受。我挨着王小波，对面七八米是柯老师那一营。在等着的时候，很无聊，又烤得难受。王小波忽然用手挡着嘴，扭过头在我耳边笑着说了-句话，令人绝倒："看来那些拍黄片的也不容易。"他说完，也为这句话得意地笑了。这是一场结果不问可知的交锋。柯云路还是讲他那一套。王小波也是有备而来，带了一些文字材料。他叙述清晰，论证有力，语气也很坚定。歪理邪说碰见了现代科学理性，形势完全一边倒。[1]

后来，柯云路也曾专门给王小波写信，解释特异功能的问题，但依然不能说服王小波。1996年10月140,王小波给柯云路写了一封信,算是给《中华读书报》上的"特异功能之争"做一个了断。他说,对特异功能的追捧，即使是出于真诚，也是"否定理性的权威，反对

1祝晓风，《泌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　个编辑十年后对王小波的回忆》，《中华读书报》，2007年4月4日。

知识的延续性”。他坚持认为，相信科学是相信牢靠的一方面，而相信奇迹是相信不牢靠的一方面。全体人类的生存，都是靠科学技术的保障。在信的结尾，王小波还是忍不住讽刺说:“中国人里知道柯云路、知道《新星》的人多；知道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人少。我认为这是一件绝顶悲惨之事。”

9

其实，1992年后，王小波开始有了自己的文人圈子。除了邢小群、丁东、艾晓明等学者，还有张元这样的电影导演。他接触的主要是各地报刊、出版社、电视台、电台的记者和编辑，其中很多人成了他的好朋友，例如，华夏出版社的赵洁平、花城出版社的钟洁玲、《三联生活周刊》的朱伟、《北京文学》的李静等。还有就是一些文学青年朋友，如镂克、张卫民、张晓舟、郑单衣、沙湄等。他还参加了一些文学活动，如《北京文学》举办的青年作家研讨会，但更多是一些和媒体相关的文化活动，如《戏剧电影报》的系列影评、中央电视台的“三味书屋”栏目、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孤岛访谈录”、凤凰卫视上与柯云路的对战等。他也开始进入文学圈的社交活动，比如，参加一些酒会，或结交一些文人和批评家。

根据李银河回忆，王小波和王朔有过一些交往，两人还见过一次面：“王朔有一段时间经营文化公司，想给小波出书，好像还有一个合同。小波见了他印象不错，说这个人很好。小波这个人就是这样，’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1杨澜.《生死两茫茫一访李银河》，《我问故我在一杨澜访谈录》，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296页

王小波与刘心武也有过一些交往。作为“文革”后改革开放初成K起来的知名作家，刘心武却颇为推崇王小波的文字。但对于刘心武的赏识，王小波的反应也是不以为意，更没有刻意逢迎王小波去世后，刘心

武在悼念文章《寄往仙界》中写道：“我……不揣冒昧地呼了他。很快便回电了，声音颇粗.懒懒地问：’谁呼我呢？’我报上了家门，那边只’啊’了一声，淡淡的；我便把在书店立读《黄金时代》的感受告诉了他.问他手头还有没有这本书.说想得到一本细细品味，他说：“书没有了……”以刘心武在文学界的地位，王小波的反应还真是“波澜不惊”。

1996年暮春，刘心武因为偶然在书店发现了《黄金时代》，就打电话邀请王小波吃饭、聊天。他们在刘家楼下的一家名叫“三星”的小餐厅里.边喝酒边聊天，渐渐从不太熟悉,到相谈甚欢，以至于一直聊到10点多、饭店打律才离去。后来，刘心武又几次邀王小波吃饭，并将北京大学的教授张颐武、作家邱华栋等圈内朋友介绍给了王小波。刘心武甚至一度想把《中国可以说不》的出版者张小波介绍给王小波，来个“小波撞小波”，激情大碰撞。刘心武并不认为张小波是一个民族主义者，而只是认为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民间的民族情绪‘此事虽然后来作罢，但王小波明确表示不喜欢《中国可以说不》：“说'不’，这不好。一说’不’，就把门关了，把路堵了，把桥拆了。”其实，在王小波的多篇杂文中，对该书也多有讽刺。以至于至今，“说不派”的很多主力成员，还对王小波有一些文字上的抨击。

刘心武在王小波刚去世时写的哀悼短文《寄往仙界》，是比较早地给予王小波较高评价的文字，而2009年4月刘心武发表在《文汇报》的另一篇回忆王小波的文章《倾情回忆王小波》，更是对王小波推崇有加。

刘心武对王小波的这种不断“追认”，有一种非常微妙的文学史意义。一方面.刘心武属于新时期文学的标志性人物，他的文学创作，可以看作新时期文学价值选择的一•种筛选机制；另一方面，1980年代末期，随着马建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所造成的风波，刘心

武从《人民文学》主编的位置上离开，虽然仍在创作小说，但基本上淡出1990年代的文坛，转向了红学研究和散文创作一可以说，1997年及其后的刘心武，又是一个游离于文坛体制和话语核心的“过气人物”。在《倾情回忆王小波》中，他对王小波的评价是：

> 我无法评论，只觉得心灵受到冲击。那文字的语感，或者说叙述方式，真太好了，似乎漫不经心，其实深具功力。人性，人性，人性，这是我一直寄望于文学，也是自己写作中一再注意要去探究、揭藻的，没想到这位王小波在似乎并未刻意用力的情况下，“毫无心肝”地把书写得如此令人“毛骨悚然

刘心武对王小波的推崇，是否可以理解为王小波与新时期文学发朝期的初衷和目标，有很深的血缘关系，而与1990年代文坛的规则很疏离呢？这值得我们思考，

评论家张颐武也曾撰文回忆与王小波的交往：“九十年代，有一次《戏剧电影报》的活动，我们坐在邻座，当时他和我聊天的内容是关于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一次刘心武先生请客，我们邻座，聊的也是这一类的话题关于当时许多人视为怪异的同性恋的隐秘活动，关于社会的种种出轨的行为，他都能心平气和地、悠然地思考和观察。但同时，他又偶有尖锐的嘲讽和磊落的不平。他始终带着一•种超然的，却并不超脱的微笑看着大家°我始终难以忘怀这微笑。这微笑里有一种对人们的幼稚的超然观察.好像我们的天真和笨拙是与生俱来，无法摆脱的，所以他能够笑着看我们。另一方面，他也能够悟到自己其实是这幼稚和平常的人生中的一员，我们的笨拙和天真其实他也难于摆脱-所以这里有一点嘲笑让他和我们分开的同时，又有一点真诚让我们和他相连。”'

在和青年朋友的交往中，王小波更能表现出其率性活泼的性格有一

段时间，几乎每隔几天，王小波都要和张卫民、镂克等青年文友，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附近的川乐园小饭馆，或在王小波家附近的白云城饭店吃饭。镂克与王小波相识，始于艾晓明的介绍。当时，艾晓明还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做老师，镂克则在学院的一本刊物《中国青年研究》做编辑。有一次，艾晓明向镂克推荐王小波在香港出版的《王二风流史》，镂克被深深地吸引了，便邀请王小波来一聚，也请王小波写一些小文章在他编辑的刊物上发表。后来，镂克乂把王小波推荐给了青年政治学院的教师张卫民。张卫民也喜欢王小波的小说，一来二去，几个人便都成了好友。从1994年到1997年王小波去世前，他们之间的聚会颇为频繁，基本上每个月都要见面。镂克还给王小波引荐了他的朋友老彪，以及老彪的妻子李疆等人。大家都很佩服王小波的幽默比如，他曾笑着说自己：“我远看不像个好人，近看还是个好人。”王小波还说过：“我这个人的特点，就是巧骂。”这些好玩的语言，总让大家“过耳不忘”。一开始接触王小波，大家却都感觉他很木讷、羞涩。他松松垮垮的，甚至有几分邋遢.在不熟悉的人面前，话不太多，甚至可以说吝啬。但如果是在聚会上，有酒助兴（尽

1张颐武，《和时代拔河：十年后再思王小波的价值》.《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4月2日。

管王小波的酒量并不大）.大家熟悉起来了，意气相投，他却变得妙语连珠起来。王小波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宽容，也有着满腹牢骚.经常对时局问题发表一些尖锐的看法，也有黑色幽默式的搞怪。但如果认真地探讨文学问题，他却收了一脸的惫懒相，认真发言，认真答复。镂克还是一个诗人.有一次，他拿了自己的一组诗《悲观者》'，请王小波指正。王小波工工整整地给他回了一封信，表明看法。这封信，一直被镂克珍藏着：信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便笺上.用的也是社会学所的信封，

只是此信没有注明日期。从邮戳上看，是1997年1月31日发出的，距王小波逝世仅有两个多月，信的内容如下：

> ……你好，诗稿收到，转寄文能。诗很好，尤其翻山越海去面对真实，诗意隆隆不绝。单从文字上考虑，诗句似凝练些更有力——做画也有留白之道。诗意沉痛，诗句就以在巅峰之处嘎（戛）然而止最好；以我之见，说得太干净了些。我母亲病了，在家伺候老太太。焦头烂额。有时间细谈。
>
> 小波敬上

而据笔者对张卫民的采访，张卫民第一次见到王小波时，王小波正提着一兜子《黄金时代》，一脸落寞，想去清华大学推销。王小波的烟瘾更大了，多是北京人喜欢的金桥烟，也抽美国的骆驼烟。一天要一或两包。在油腻肮脏的小酒馆，吃着实惠的川菜，他们酒到杯干，旁若无人.落拓无羁，言辞锋利他们时不时爆发出大笑，或说

1诗写于1996年.2004—2013年曾做过修订.并载于闩己在新浪网的博客“LOUKE的博客”上。

出外人难以理解的连珠妙语，令所有食客侧目。他们的言谈有时深奥高远，有时却粗鄙可爱，他们的举止滑稽生动，有时也郁郁寡欢。王小波和朋友们的话题很多，有时是政治，但大多数情况下是文学。例如，对诺贝尔文学奖.王小波声称，也许发对了两个人，一个是德国的伯尔，另一个是英国的罗素。他本能地对俄罗斯文学抱有警惕，特别是托尔斯泰式的道德训诫和忏悔1996年冬天，张卫民说要写小说,王小波很激动.还郑重其事地鼓励他。这样的聚会，让我们想起《水浒传》中晁天王庄园

上的众豪杰，也让我们想起威廉•冈特在《美的历险》中对波西米亚风格的法国文人的描述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们，就这样在巴黎的下等小酒馆喝酒，他们头戴尖顶帽,身穿在意大利强盗中流行的长袍，心中积郁着对“正人君子”们的鄙视。他们“只有一条法律，一个道德，一种信仰，那就是艺术……”

1997年3月12日晚，那是张卫民最后一次和王小波吃饭，还是在川乐园。那天晚上的氛围非常凝重，王小波和朋友们一反常态地谈论起了诗歌，他不无忧郁地说.悲情诗人也许才是最可爱的。王小波逝世很多年后，当时在场的几个朋友都还觉得，这是一句谶语.小波就是“悲情诗人”。或者说，这就是他给这个世界留下的最后的自我形象定位，

但是，他外表憨厚木讷，内里却大胆锐利、毫不妥协的性格，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也给他找了不少麻烦，有一次，王小波参加某杂志的策划活动，领导出来讲话，云山雾罩，官腔十足，大家都很烦，但没人出来“触霉头”。好一阵子后，领导讲完了，让每个被邀请的专家介绍自己的学历，轮到王小波了，他却面无表情地站了起来说.我在匹兹堡上过学，有一个老师是印第安人，脸上总画满油彩，他的意思是领导装腔作势，让这位领导很生气。乂据笔者对翻译家孙越的采访，1996年春，孙越曾介绍王小波去中央六台电影频道，做牛振华承包的一档节目，也遇到了尴尬情景。这档节目要求王小波与著名导演何平一起，对“国产电影的优劣”进行唇枪舌剑的对阵交锋：“现场一喊开拍，王小波就特认真地谈起在美国看电影的故事，他说.他在美国看了上千部片子，最认可的只有伍迪•艾伦的作品。说到中国电影的，他几乎嗤之以鼻，他对中国电影的评论特别不屑。于是，他就和那位电影导演真的顶起牛来：王小波眼睛也不看他，自说自话好莱坞，就跟在一个什么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似的，后来，他还提了好几个问题把别人噎得够呛，最后都插不上嘴了，干脆不说话了，弄得全场特尴尬,节目也无法正常拍摄了。电

视台的导演赶紧把我叫到后台，问我那人是谁，我说王小波，他说，没听说过。导演跟我说，下次换个有名的人来，这类无名鼠辈就是爱故弄玄虚地出风头！我很真诚地对导演说，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有名啊，他冲我喊道：’名人不这么说话！'就悻悻而去。”事后很久，被王小波噎过的导演何平还满处打听：“那天跟我对阵的人是谁呀？”孙越还提到：“我还介绍王小波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过一档文化访谈节目'，他风格依旧，妙语连珠。然而.主持人也不买账，事后埋怨我说，你介绍的王小波在我们节目里讲话’阴阳怪气’。”[2]

10

1992年，王小波辞职之后，当代文坛是如何对待他的？以下，我以时间为顺序，将王小波一生在期刊上发表的小说进行排序：

1这里作者记忆有误.应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孤岛访谈录”节目。
2孙越，《普通人王小波》,《创意 > .1999年2期。

1. 《地久天长》，《丑小鸭》1982年7期
2. 《夜行记》,《四川文学》1991年5期
3. 《立新街甲一号与昆仑奴》，《收获》，1993年3期
4. 《我的阴阳两界》.《青年作家》1994年3期
5. 《革命时期的爱情》，《花城》，1994年3期
6. 《南瓜豆腐》，《人民文学》，1995年3期
7. 《未来世界》，《花城》1995年3期
8. 《寻找无双》，《黄河》1995年5期
9. 《黄金时代》，《人之初》1995年1、2、3、4、5、6、10、11期
10. 《2015》，《花城》1996年1期
11. 《夜里两点钟》，《北京文学》，1997年1期
12. 《茫茫黑夜漫游》，《三联生活周刊》，1997年3期
13. 《红拂夜奔》，《小说界》，1997年2期
14. 《白银时代》，《花城》1997年2期
15. 《万寿寺》，《北京文学》,1997年7期
16. 《未来世界里的日记》，《花城》，1997年5期。
17. 《绿毛水怪》，《花城》1998年1期
18. 《舅舅情人》，《广州文艺》，1998年1期
19. 《马但丁》，《北京文学》1998年6期

我们发现，1992年到1997年，虽然王小波辞职在家写小说，但是，他在传统期刊上发表的小说总量并不大，且全部是中短篇。他最著名的中篇小说《黄金时代》竟只能发表在软性杂志《人之初》上。《人之初》杂志，1990年代初期创办，是和《知音》一样销量曾创百万的流行杂志，其文章以爱情、性爱、生育等题材为主。主编吕海沐曾是一

个诗人，文学的眼光很好，他敏感地意识到了《黄金时代》的启蒙价值。而李银河乂经常给《人之初》写稿，在她的介绍下，吕海沐迅速决定连载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吕海沐对王小波的印象是“像一个锅炉工的模样，头上戴着一个遮阳帽”‘。当时，给《人之初》写稿的知名作家很多，如刘心武、肖复兴、舒婷等。这本通俗刊物，没有文学体制化的僵化，反而容易看到王小波小说的价值可以说，当时很多《人之初》的青年读者，是把《黄金时代》当作性启蒙读物来阅读的然而，与性启蒙相联系的价值启蒙也不难被人捕捉。《黄金时代》中自然蓬勃的欲望、健康清明的主体价值感，与理性自主的人生观，都使得王小波的这篇小说紧扣住了时代的脉搏从这个角度而言，说《黄金时代》是1990年代的宠儿，一点也不为过。吕海沐在编者按中所写的活可佐证这一点：“他笔下的性同以往文学中的性有很大不同。它既不同于劳伦斯把性写成美，并且是一种具有颠覆性的美;也不同于《金瓶梅》把性写成丑，以警世劝善为其或真或假的目的；他笔下的性就如同生命之本身，健康、干净，既蓬勃又恬淡。这样来写性的书并不多见.因此值得一看。当此世界学界、女界及文学圈内对艺术与色情之间的界线争论不清之时，王小波的小说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是纯文学作品写性的一个大胆尝试，”2

除此之外，他的长篇小说《寻找无双》、《万寿寺》、《红拂夜奔》均是经压缩后，作为中篇小说发表出来的'对此，笔者曾采访过时任《北京文学》编辑，也是王小波小说主要推介者的李静在公开期刊上发表长篇小说，是一个当代作家被认可的重要方式，然而，直到王小波去世，他也未发表一部长篇小说。同时，作为认可度的另一个指

1吕海沐，《〈人之初〉创刊趣闻》.《传媒》.2001年6期2《黄金时代.编者按》.《人之

初》,1995年1期。

标，报刊转载率，在他生前也为零。他的文学作品在大陆也未获过任何文学奖项。王小波并不是没朝这个方向努力，但结果并不理想。其实,直到王小波临去世之前，他可能一直希望获得文学同行的认可——虽然，从本心上来说，他可能并不情愿如此。但这种“获得认可”的努力，在他生前和身后文学圈并没形成共识。王小波在《北京文学X1997年1期）发表《夜里两点钟》时的情况，可透露出1997年初，他在当时文坛窘境的某些讯息。该小说发表于《北京文学》“短篇小说拉力赛”栏目。按惯例，该栏目邀请的都是成名作家，但编辑李静力邀王小波写稿小说发表后，李静去财务领稿费，却发现其他作家的稿费都是六百元，只有王小波的是三百元，原因是“王小波不是名家”。为此，李静还和财务发生了争执。，

然而，我们也并不能说文坛对王小波是完全压制的态度，因为并不是只有王小波的作品才难以发表。在功利化、圈子化的文坛，很多优秀作家的作品，同样很难发表。这些刊物多对异质性作品和未成名作家抱有疑虑。而王小波真正进入文坛，只有不到五年，1990年代的文学格局，对王小波的认识和承认也需要一个自然的过程。王小波也不是作协会员。有说法是，王小波曾申请加入北京市作协，但因作品数3：不够而遭到拒绝”该说法并没得到证实。2然而，当时很多编辑对王小波也非常赏识.如《花城》的文能.《人民文学》的朱伟，《北

1据2012年11月对李静的采访.

2有关王小波曾申诂加入北京市作协、因稿件发表購不够被拒绝的书，笔者曾多方求证匚北京市作协创联部有关人上声称，因时间太久远，已没有印象-李静则肯定K此事，并说丁东也知道。《人物》杂志的记者谷力也曾提到此事。笔者向谷力求证,得知该说法来自李银河。而李银河在杨澜的电视访谈中.则说王小波不愿加入作协.理山是“连F朔都不入.我怎么能入？”参见《我问故我在——杨澜访谈录》（296页）以及赵勇《王小波与当代文学的关系》.《当代文坛》，2012年4期。

京文学》的李静.《小说界》的魏心宏，《黄河》的周心湖、谢泳，《四川文学》的杨泥.《收获》的叶开等，王小波重要的作品，都是这些有胆识的圈内人士，经过艰苦努力推荐给公众的。

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王小波生前.除了零星报刊报道，学院派批评家和知名评论家的批评较少只有中山大学的艾晓明、学者丁东等的少量评论文字面世，发表的量就更少了，这和他去世后的批评研究状况形成了极大反差。王小波去世后，王蒙、刘心武、林白、戴锦华、陈晓明、张颐武、阎晶明、敬文东、陶东风、崔卫平、白煙、孟繁华、葛红兵、摩罗等一大批文学界知名作家、评论家和学者，对之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至2013年，共公开发表论文数百篇，博士学位论文三篇，硕士学位论文数I•篇，出版研究资料两卷，学术研究专著两部。这个研究数量，对当代作家而言，完全可跻身一流作家行列。而在作家经典化的另一个重要环节——文学史写作方面，王小波的分量也有重大变化。当代权威的文学史著作.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2010）.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2006）,都对王小波评价很高。有的文学史还有专门论述，如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2009）0

11

1995年10月22日下午，教育部知青子弟举行联谊会。聚会地点在大木仓胡同里的逸仙堂，这是一个颇具纪念意义的地方。1969年3月，他们就是在这里听了鼓动报告，激荡的青春热血，催促他们远赴云南，而1969年5月15日,就是他们人生第一次出门远行的纪念日。如今，很多年过去了，岁月无情，革命已成了遥远的回忆，飘散在云南的热风瘴雾之中，而当年的北京热血知青，也只剩下了皱纹、凸起的肚腩和衰老的面容。一双双激动的眼睛寻找着.一双双颤抖的手紧握着，场面热烈感人不一会儿，不知是谁起了一个头儿，大家开始唱那个年代的革命歌曲会堂里有一个桌子，每个人都跳上去，说一句最想说的话，人一个接一个上去……轮到了王小波。那天，王小波中午已经喝了一点酒，眼睛还是红红的。他一口喝干一大杯啤酒，站了上去，大声喊了一句：“你们还好吗？”说完，跳下来，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人是脆弱的，在记忆的美丽光环下，哪怕是最不堪的经历，时过境迁.也能为之赋予感人的意义。肯定了回忆.就是肯定了自己。在那些革命歌曲中，人们其实是在寻找情感的共鸣。从这个角度上讲，王小波是理性的，又是残忍的，他永远活在当下，他拒绝以同忆的名义赋予丑陋的历史以任何遮菴布，哪怕是否定自己。他永远是那个心存怀疑的“坏孩子气

然而，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王小波否定的是大历史的荒谬.但却不能忘掉那与己相关的生命记忆中的点点滴滴。王小波走出会堂，赵宁也跟了出来俩人聊了好一会儿。赵宁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那是他最后一次见王小波。他们聊起了知青岁月，聊起了文学，也聊起了小时候那些零零碎碎的小事。王小波突然认真地说：“上初中的时候，我把教数学的邱老师气得不轻，现在想想，真是混蛋，听说她还健在，有空咱们一起去

看看她老人家。”赵宁愣了一下.看到小波真诚的眼睛，就点头应允了。赵宁建议小波将《黄金时代》改编成剧本，小波表示感兴趣，但不及深谈.他们又被热情的朋友们拉回会堂。这次分别后，赵宁再见王小波，已是在八宝山的纪念堂了。王小波的作品对赵宁影响很大。作为一个传媒圈的资深人士，赵宁决定将王小波的作品搬上银幕。在他多方奔走下，《黄金时代》一度非常有希望拍成电影。1999年时，赵宁先找了几个留学国外的青年编剧把《黄金时代》

改成剧本，一次就付了四万元订金，但剧本总也写不好。后来，赵宁就自己上阵，改了一个剧本。当时，山东的三建集团决定投资八百万拍摄这部电影，请李银河授权的仪式都已准备好了。而且，赵宁还为该剧本联系了国内大牌导演张艺谋.张艺谋看过本子后，也表示喜欢。他说：“只要电影局能审过，我就和小波合作一次。”但是，很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该电影一直未获拍摄许可。，

他在黑暗之中。夜晚属于王小波。只有在夜的宁静里.王小波才在独自一人面对虚无的时候，找到一种心灵的自由状态。无人真正走进王小波最后时刻的心灵。他的妻子远在英国，除了必要的应酬.他一人整日窝在斗室，与退稿做斗争，与寂寞失眠做斗争，与日益衰退的身体做斗争.与创造力和灵感的枯竭做斗争他的嘴唇更紫了，经常带有病的疲倦他孤独，虽然因此更加锐利,他笑着对朋友说:“我的一生都在抑郁中度过。”他常常在夜里无眠,在最黑暗的两点钟,一个人茫然四顾，抽烟，听音乐，调试计算机,甚至在门口游荡，有一次，电脑死机，为了找一个系统恢复软件，他大半夜游荡在胡贝的家门口，自嘲说“就像失恋的男人一样”。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儿个月，他连续写了两篇有关夜晚的小说:《茫茫黑夜漫游》与《夜里两点钟》。这两篇小说，结构松散随意，主题苍白呆板，故事性和创意性不强.文笔较枯涩：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王小波总是在强调半夜两点钟《夜里两点钟》的开篇，他写道：“夜里两点钟是最坏的时辰，这时候你乂困又冷。”在《茫茫黑夜漫游》的开篇，也有类似的话:“现在是夜里两点钟，是一天最黑暗的时刻。”夜里两点钟，是否也是作家王小波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茫茫黑夜漫游》写了两个假“S/M”

1据2012年11月3日对赵宁的采访.为了体验生活，弄假成真的故事。而《夜里两点钟》则写了主人公王二和朋友小宋有关美国和中国的体验的对谈，小说透露出浓浓的悲观情绪。在1997年1月3日的《光明日报》，王小波还写了一篇《写给新一年》的杂文。文章中，王小波固执地回忆了超声

波、打鸡血、甩手疗法、工农兵学哲学等一系列中国古怪荒诞的事情：时间的流逝、历史的发展，并没有给王小波带来进步的快乐。无论是神奇的大气功师，还是后现代和第三次浪潮等时髦事物，王小波都无法与时俱进地接受，他总是能从这些不同的把戏中看到相似的逻辑，而他所拥有的只是对荒诞重演的愤怒与无能为力的绝望："但愿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能远离一切古怪的事，大家都能做个健全的人。"

而他最后的遗作《黑铁时代》与《大学四年级》、《黑铁公寓》等，似乎都在昭示着王小波的一种精神极度焦虑及死亡的气息。暴力的终结是死亡,而美的极致与反抗的极致也是死亡。那些曾经在《黄金时代》中舒展自由的生命气息消退了，那些云南的红土、烈日和无休止的热风、大胆的性爱，都失去了神话般神奇的力量。在王小波笔下，只剩下了一种意象，那就是福柯式的"监狱"。胆怯的房客、凶恶的管理员、手铐、脚镣、沉闷黑暗的房顶、舒适却无法逃脱的铁牢笼，共同成就了王小波最后的类似"铁屋子"一般的空间隐喻。而在那些黑铁公寓的"知识者监狱"内.空间和时间不再具有反抗性，留下的只有逆来顺受的绝望与反讽的自我毁灭。知识者拥有知识，就拥有了原罪，必须被束缚和制约，一直到死："所有上过大学的人，都必须住在有营业执照的公寓里。据说公寓里特别好，别人想住都住不进去。假如你生在我们的时代，对这些想必已经耳熟能详，但你也可能生在后世，所以我要说给你知道——假如有样东西人人都说好.那他必定不好这是他最后的绝望，却仍心有不甘："我隐隐地感觉现在学坏已经晚了。"

但是，他的"野心"依旧，甚至更强烈。1997年4月10日北京时间7点11分，王小波发出了人生最后一封邮件，也完成了人生最后一次文字的激情表达：

晓阳你好：

我正在出一本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说：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

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是不是太狂了？

小波敬上,

“一刀两断”的豪情壮志未酬，“自由派”的宣言之声未绝，十几个小时后，王小波就猝死于屋内，去时电脑还闪烁着，显示着工作状态，无人知晓王小波弥留时刻的状况，只不过后来在法医鉴定之后.人们才发现，他曾经强烈地挣扎过，在墙上留下很多痛苦的牙印。黑暗，他衰弱的心脏已浸泡在了黑暗的侵蚀里，无力再进行强壮的搏动。在他最后沉入黑暗的夜海之际，他在想些什么？他还想说出什么？是最后的求救？是对死亡的恐惧？还是如释重负的叹息？或者，只是蔓延在无边的春夜虚空里的沉默？

1刘晓阳,《地久天长》，《浪漫骑士》.422页.

第九章震后余波-神话的诞生与反思

智慈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在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

——王小波《智慈与国学》

王小波的去世，从某种意义上说，既是结束，又是开始。对生命而言，这是结束,但对于王小波作品的“接受”，又是一个全新开始。正是从1997年4月11日这个时间节点开始，王小波才真正成为全国范围内的著名作家，并在持续升温的宣传、研究、争议中成为一个经典意义的当代作家。1996年秋，花城出版社与王小波签约出版“时代三部曲”时（稿费千字五十元），还认为这套书的销售前景堪忧。没想到，王小波死后.花城版的“时代三部曲”到2002年为止最少销售了十五万套（五十八元一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王小波文集》，四卷本，1999年版印行一万五千套，其中精装两千套。2002年“文集”改为“王小波作品系列”，每册单独定价，各印了一万册。'而近些年来，上海三联书店、重庆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等，也纷纷出版“王小波全集”，都有较高印数

伴随着作品的大量出版，是持续不断涌现的、丰富的海量个人资料而作家生活的经典化.是作家经典化的必由之路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现代作家都有过这样的接受过程对当代作家而言，有的资料丰富，但未形成广泛关注；有的名气很大，但由于本人还在持续创作，而作家也不愿暴露隐私，个人资料也难完备收集整理。王小波去世后的十几年间，在李银河、胡贝、艾晓明、丁东等亲属、朋友的推动，在《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等媒体的不断努力下，关于他的各类资料不断面世。就这一点而言，王小波的经典化程度，甚至超过了大多数中国当代作家。在王小波身后的纷乱言说中，在有关王小波的“象征符号”在如此繁复的层面上被接受的过程中，对于“文化资本”的求索和炒作、信仰和争夺、传承和利用，极为复杂地编织在一起.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场域”对“知识精英”的一种新的“想象图景”。

1

李银河在王小波的经典化过程中.功不可没——尽管，有人并不认可她持续不断的“话题式炒作”的方式。1997年4月后，在李银河的推动下，海内外一百多家媒体报道了“王小波之死”。经过紧张准备，原本一直在花城出版社被推迟的“时代三部曲”，也得以顺利出版。5月13日，中国现代文学馆也召开了王小波作品学术研讨会，

1夏辰.《王小波出版史:生前的冷落与死后的哀荣》,《南方周末》.2002年4月11日

引发了王小波作品的第一波“热销”。“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拥有诗意的世界。”王小波的名言被人广为传颂。

1997年5月13日上午9时，万寿寺，中国现代文学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之一，迎来了王小波的第一次高规格学术研讨会。舒乙先生时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很多知名学者和专家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文学馆原有的会议记录和录音已遗失，仅在美国的评论家李陀先生处还有一份.但笔者至今没有得到。据当时与会人员回忆，参加会议的主要有三方面人员：一是王小波的亲属和好友，如王小波的姐姐王小芹，妻子李银河，好友胡贝、赵宁、张卫民、李大卫等;二是学者和作家，如李陀、戴锦华、陈晓明、丁东、李洱、朱文等；三是出版界、文学期刊、报界、影视界的文化人士，如李静、张元、王童、朱伟、赵洁平、钟洁玲等。由于王小波刚去世不久，会议弥漫着悲伤的氛围，而对中国文坛的不满，似乎也成了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话题，发言的人很多，但也比较乱：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国内官方的文学机构，并没有人出席会议，只有官方文化界的某领导，不请自来，参加了研讨会。他介绍说，王小波曾在年轻的时候，去过他家里请

教文学问题，也算是半个学生，听说有活动，便来此纪念王小波。然而，由于官方人士的加入.让这场会议的讨论变得更加微妙＝会议上的争论也很激烈.例如，有的学者认为，王小波的作品受到了卡夫卡的影响，但一贯惊世骇俗的批评家李陀对此显然不认可，他甚至故作惊讶地问周边的人，卡夫卡是谁？引得大家一阵哄笑。李大卫则谈论了王小波小说的文体问题，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赞许。而来自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张卫民，表现得则比较“激进”。他粗暴地打断了那位文化界领导的发言，猛地站起来，很“王小波式”地喊了一句：“王小波，牛x!"引来满堂喝彩。这时，这位神情激动的青年学者，又回头指着会议室墙上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文学大师的画像说：“我觉得，王小波和这些人都没什么关系！”'他言下之意是,王小波活着的时候，没得到主流文学界的承认。

此次研讨会，只是开启了“王小波热”的序幕.而艾晓明、李银河策划的《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一书，又掀起了新的高潮、该书出版于1997年7月.也就是说，从4月到7月，短短的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李银河与艾晓明等人整理并出版了三十五万字的有关王小波的相当详细的资料该书分为六个部分:第一辑“写作人生”，选取了王小波最重要的一些谈艺术和人生理想的文章；第二辑“顽童时代”，则分别采访了王小波的母亲宋华、兄长王小平、好友胡贝，并收录了宋华、李克林、王小芹、王晨光、姚勇等亲属的回忆文章，主要对王小波的青少年时期进行了追忆；第三辑“诗人之爱”.则节选了王小波和李银河之间的部分情书；第四辑“工作肖像”，通过黄集伟、丁东、田松等相关人士的回忆和与王小波的对话，还原王小波在写作中的状态；第五辑“阅读王小波”.则由艾晓明、丁东等学者作家，对王小波的作品，进行细致的解读，并收入王小波作品暨小说集《黄金时代》研讨会纪要；第六辑“记忆之河”，由刘心武、李静、张卫民、刘晓阳等朋友写的回忆文章组成。可以说，该书从

各个方面，对王小波的创作和生活进行了细致介绍，并通过李银河对王小波的“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的定义，为此后王小波的宣传策划进行了基本的学术定位和市场定位。《浪漫骑士》一书的成功，实际开启了持续十几年的“王小波热”的媒体狂欢的

1据对张卫民、胡贝、李洱等的采访,阀门。该书虽是仓促集成，并有市场运作痕迹，但不可否认，该书引发了广泛影响，既是广大读者接受王小波的敲门砖，也是当代作家中不可多得的文学史资料汇集。1998年，《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一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将王小波的讨论再次推向高潮。这本书中收录了王蒙、汪丁丁、秦晖、朱正琳、崔卫平等作家和学者的评论和对话文章.对王小波其人其作，特别是其自由主义思想进行了评述。王蒙延续其一贯思路，将王小波和王朔放在一起，看重王小波反对左倾集权的解构意义，而各类学人，则主要讨论王小波的自由主义价值：这本书基本上可以说是“借助王小波”来言说中国自由主义思潮，虽对于王小波的文学艺术价值缺乏深入探讨，但进一步扩大了王小波的影响——书中给予王小波的自由思想以很高的评价，王小波已俨然是继顾准之后，中国自由主义的另一个偶像。

2004年5月，李银河又出版了《爱你就像爱生命》（朝华出版社出版），展示了王小波致她的部分情书及她回忆两人爱情的文章。但此举引发了一些王小波喜爱者的质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唯有鲁迅出版过情书集《两地书》'o批评家李美皆更是著文《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对李银河予以尖锐讽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王小波，是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是李银河的王小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王小波，是市场经济时代的王小波，是商业化的王小波……情书集把王小波由神话变成了童话.所以连带着让人对王小波都有点起腻了。通过情书集，李银河正在打造一个爱情童话，童话的女主角就是李银河本人。”

1此书初版时严格来说并不能叫“两地书”.因为里面并未收入李银河致王小波的书信。但此书在收入多种《王小波全集》及2011年由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年由译林出版社再版时收入了部分李银河致王小波的书信。

文章最后，李美皆不无遗憾地说：“真正的文学应该是不事喧哗的，我们需要安静下来，以沉淀的眼光来看待王小波，这才是对待文学的真正态度

2005年4月11日，以展览形式展开的王小波逝世八周年纪念活动在鲁迅博物馆的举行，似乎成了某种标志性的暗示。这次展览也是国内举办的首位中国当代作家个人生平展。二百多人参加了开幕式，时任鲁迅博物馆馆长的孙郁先生，在开幕式中，对王小波进行了高度的评价：“文学要有趣味，这是王小波的观点。他是用智慧写作的人,他向汉语极限挑战，为汉语写作提供了新可能李银河为展览提供了七十四面图文展板，大约五百张照片，展示了王小波生活不同阶段的面貌。展览还展出了王小波的手稿、书信、录音、录像和生前用过的电脑等个人物品。北京电影学院的崔卫平教授，还在鲁迅博物馆举行了“王小波小说中的爱情”的讲座。这次展览对王小波在大众中的普及，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月，李银河、郑宏霞合编的《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王小波画传》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它通过详细的个人生活资料收集，对王小波从出生到死亡的各个时期的照片、各类证书、资料、手稿的展示，对王小波的生平进行了比较全面、细致的回顾，并附光盘一张.收录王小波的各类采访。但该书虽图片资料丰富，文章却有多篇为旧作。

2007年，适逢王小波去世十周年祭，李银河再次策划了一系列活动和话题，引发了王小波纪念的狂潮。2007年4月11日至17日的“重走小波路”自助游活动，别具新意，但也引发了一些争议。自助游的目的地是王小波插队过的云南陇川，“去看看王二和陈清扬一

1李美皆，《李银河时代的王小波》，《文学自由谈》,2005年3期。

起蹬过的小河，还有他们两人避难的章风山”。-（活动）将采用AA制的

形式，活动时间是4月11日至17Ho随后还在5月13日即王小波生日当天进行’纪念小波十年诗文朗诵会’。4月11日活动将在人民大学进行启动仪式.4月13日’发起人团’将踏上从昆明到陇川的行程，途经大理、苍山、洱海，跨过怒江、澜沧江，到达陇川的弄巴农场.可以参观王小波插队的地方（旧房子、花园、花田、小河）等。”此次活动最后参加的有几十人，在云南弄巴农场，李银河和追随者，采访到了当年农场的老队长和诸多当事人，弄清了很多王小波在云南生活的细节。

这一年，还出了一个“王小波裸体雕像”事件。为纪念王小波逝世十周年，广东美院雕塑系学生郑敏创作了一个王小波裸体纪念像并在网上作了展示，此举在王小波的书迷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郑敏还在自己的博客上放了一些创作过程中拍摄的照片以及与王小波遗孀李银河的通信。2006年10月，郑敏联系上了李银河.去信征询创作意见，信中说：“雕塑的创作意图是为了表现小波的敏感、率性、倔强的骑士气质和他追求自由的精神,雕像的姿势构图就是从这出发的……”从李银河的回信来看，她承认雕像“挺像的”听到郑敏想以此雕像参加“上海国际雕塑年展”的消息.有不少网友表示支持，但反对者声音也比较激烈：“我从未听说过有哪一个严肃作家以裸体的形象示人。”“我不想看见他的裸像立于街头。”，同时，王小波的母亲、姐姐和哥哥也都表示无法接受，而李银河最终也给主办方写信，表示不同意公开展示,并最终致使该作品从“上海国际雕塑年展”中撤展。然而，她的博客里说：“在我的心目中，他除了是一个亲人之外，还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在我的心目中并不比巴尔扎克和雨果差，既然这两位能塑裸像.小波也没什么不可以。”'究竟是创作者的思维过于前卫，还是中国人的思想过于保守？在对王小波形象的接受与改写之中，到底又出现了怎样的话语冲突？黄泥巴的“裸体小波”，也许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它却在刺激着我们的思考，

2009年，王小波作品的其他艺术形式改编，也有了重大进展，继《东宫西宫》后，王小波的另一部代表作《黄金时代》也被改编搬上话剧舞台。3月18日，该剧导演及编剧夏波，主演史可、赵奎娥、孙刚、

董路、哈斯巳根、林京来等在京出席了新闻发布会。4月10日至19日，于解放军歌剧院公演。该剧将人偶剧的方法引入话剧，小说原著中的动物和植物全部由真人出演，力争将娱乐性、思想性和学术性三结合，是王小波作品改编中的一次大胆尝试。

2012年年初，王小波的兄长王小平出版了《我的兄弟王小波》一书。该书不仅披露了很多有关王小波家族的第一手史料，而且语言流畅、生动、幽默，不仅为我们认识早年的王小波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也有利于我们回到历史现场，去认识王小波文学思路的成因和不一样的道路但可惜的是，由于偏重兄弟情谊的角度，该书对王小波青年以后的人生道路描述较少。

王小波去世后，李银河似乎在“学术激进”之路上越走越远她被人称为“性学大师”。她常有惊世骇俗之言行，冲击着中国人的性爱观念和生活价值，既赢得了喝彩，也遭到过非议：2005年6月，她表示支持都市白领“闪婚”;8月，她主张卖淫非罪化。2006年3月，她发起提案主张同性婚姻合法化；7月，她认为一夜情应更名为“多

1郑天虹，《王小波裸体雕塑展之争折射中国艺术审美尴尬处境》.新华网，2007年3月28日。

边恋”。2010年3月，她建议取消聚众淫乱罪；4月，她为“南京教授换妻案”辩解.提出“自愿、隐私、成人”三原则

从1997年到2013年.世界已变得太多，中国已变得太多：不仅那些“革命北京”的辉煌与道德激情已是遥远之事，且“后革命北京”意义上的“第三世界气味”.似乎也正像“有趣”一样被我们超越：那些广场上的红色金光不见了.那寒磅简陋、粗鄙忙碌的1990年代的欲望都市也不见了，“性的问题”似乎也正变得不是问题进入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后.中国的

GDP总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在经历百亿大贷款、北京办奥运、高铁动车时代、微博舆论化等大事件后，“盛世北京”似乎已巍巍出现在了中国的中心和世界的中心，成为中华崛起、执政党成功的某种符号表征。与之相匹配的，是诸如“鸟巢”之类的一系列宏伟壮丽的盛世空间景观.它预示着一个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美妙新世界”的诞生。与王小波死亡的时代不同，但我们也面临着很多问题：高房价、贫富分化、艾滋病、小三、污染、腐败、突发暴力、自杀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王小波与李银河希望通过“性问题”作为突破口，追求社会理性进步的目标，似乎没有实现，性问题“阴差阳错”地正在成为这个混乱古怪的世界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同时又是政治高度整合化的时代，所有不同的主张、声音，所有舆论与真相，都在大众媒体超级发达的技术前提下，被整合入政治正确性的隐含法则李银河对性问题的持续关注.在促进社会不断开放的同时.乂成为这个娱乐化媒体时代的牺牲品，而王小波的作品，似乎已不能解释今天的世界——王小波最后的作品，似乎也在预示这样时代的来临，不过，他用了更隐喻化和晦涩的寓言方式。也许真.相就是，王小波的文学局限性，正随着时代变迁日益显现，而王小波时代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且在以变异的方式不断恶化，如果王小波活在今日，他该如何看待这个世界？

2

媒体在王小波的经典化过程中，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它们不仅激活了王小波的文学和思想价值的讨论.而且积累了大量关于王小波生平活动的丰富史料。

对王小波“自由意义”的言说，《三联生活周刊》无疑具代表意义。2002年，王小波逝世五周年纪念日，《三联生活周刊》第15期以“王小波和自由分子们”为总标题，登载了八篇文章，而以“自由”命名的，就有《一个自由分子》、《炳增时代的自由分子》、《自由一代的阴阳两界》、《一个自由主义分子的成长史》，分别从学者、自由撰稿人、网络知识青年等多重受众角度和文化身份方面.详细阐释了王小波的自由主义的来源、内涵、意义和影响。《一个自由分子》中，论述者从自由撰稿人的角度定位和评价王小波的自由品质：“作为独立的、自由职业的知识分子，他避免与既有制度发生关系，即便他对这个世界有所妥协。”而在《自由一代的阴阳两界》、《嫡增时代的自由分子》、《一个自由主义分子的成长史》中，宋光辉、刘品良、张华、贾布、连岳、李红旗五个人，作为王小波自由主义的继承者出现了。在这些继承者的言辞中，不乏叛逆色彩和大胆言辞：“只要足够胆大，足够’没心没肺’，作为对传统体制故意反叛的’特立独行’完全可以转向张扬与任性的’随心所欲'。”（《自由一代的阴阳两界》）“连岳极喜欢自己目前的状态.他几乎感觉是自由的：’所谓的自由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要挟你了。这是我认为的自由。'”（《嫡增时代的自由分子》）

然而，这期策划中，不仅有《三联生活周刊》对“自由主义作家王小波”的命名，更有“加冕”所引发的学者和媒体间的“不和谐”杂音。《王小波作为知识分子》作为该策划的最后一篇，由四个人的评述组成。除

朱正琳（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的策划人）外，陈嘉映、邓正来、盛洪都是知名学者。对一浪高过一浪的王小波热，他们的声音是冷静的.甚至泼冷水：“不应该把王小波往思想的高度引”（邓正来）；王小波的杂文在常识层面上谈得很好，在更深的问题层面上就没有讨论（陈嘉映）；“他表达的很多思想内容其实是已成套路的，并无创意”（盛洪）o这与1998年国林风书店策划的《不再沉默——人文学者论王小波》中的学者姿态有所差异。后者中，朱正琳、许纪霖、汪丁丁、秦晖等都给了王小波高调评价：“我们很唯想象在中国文化的内部，会有王小波这样的人出现……王小波，成为一个对评论家智慧挑战的阐释对象……一个罗素的信徒、热爱理性和思考的自由主义者、独立不羁的民间撰稿人——作为思想家的王小波，留给后人的.就是这样的形象”（许纪霖《他思故他在》）；“所以，’蹈海’是可以'唤醒民众’的”（汪丁丁《王小波的说与思》）；“无论如何，在反乌托邦文学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这两个方向上，小波仍然走在文坛诸公的前头，他作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代表人物应当载入史册”（秦晖《流水前波唤后波》）。

《南方周末》作为中国权威报刊，也对王小波的经典化功不可没。可以说，每逢王小波祭日，《南方周末》一般都有纪念文章，或者大型专版01997年5月9日，王小波去世不满一个月，《南方周末》就发出专刊.刊载何保胜的《宛如一曲美丽的歌》，坚信“小波这朵灿烂的樱花，将以其独立意志抒写自由精神的作品，永远盛开在读者心中”。同时刊出的还有颜峻的《死得其所的人》，作者宣称“王小波是死得其所的人”，“这个美好事物的追求者在追求中获取幸福，即使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被平庸、愚蠢、病态、专制的事物所伤害”，并将王小波的死同海子、骆一禾、胡宽、路遥、邹志安等人的死相比较。2001年.《南方周末》上还刊发了王小波的外甥姚勇的怀念文章《四年以后的怀念》和朱健国的（王小波哀荣的底蕴》。2002年,《南方周末》设立《王小波逝

世五年祭》专题，刊出《依旧沉默：“文坛中人”对王小波的一般看法》（李静）、《从暧昧到狂欢——小波流传史》（黄集伟）、《作为专栏作家的王小波》（夏辰）、《予人慧命者：一块思想的多米诺骨牌》（连岳）、《王小波逻辑上的死胡同》（李方）、《十问王小波追随者》（拉家渡）、《王小波出版史：生前的冷落与死后的哀荣》（夏辰）等一组文章,专题以“沉默与狂欢”为标题.并在编者按中写道：“我们留意到这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是’文学青年们’基于王小波文体的纸上猝欢，一方面是文学批评界持续的谨慎沉默，我们甚至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对王小波的文体与文学成就进行适当的评价，我们惟有忠实记录这一现象，并期待有心人对王小波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2007年4月，《南方周末》刊发了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的文章《艺术的内丹——纪念我的弟弟王小波逝世10周年》：

其实，还有很多报卩1也参与了王小波形象的塑造.具有着或大或小的影响:，2001年，新浪网“新浪文教”版块开辟了“瞬间的灿烂与永恒的浪漫——纪念王小波去世四周年”专题.发表了新浪网友怀念王小波的帖子。《华夏时报》2002年4月15日第15版刊登了两篇纪念王小波的文章。一篇为雷格的《纪念文本专家王小波》，核心观点是“我虽对王小波’自由思想家’的称号心存疑义，却独重其小说创作的文学价值.尊他为继往开来的一代’文体大师'”。文中说，“王小波一出（一殁）.一种可称为’王小波体’的文风迅速普及”。另一篇文章是稻壳的《我这样纪念王小波》。作者着重分析了应如何理解“真正的高手在文坛之外”的说法，质疑“一些人就在文坛之外和高手之间划上了等号，把对文坛的体制与陈规的批评，变成了否定文学的借口”的做法。同时，作者认为时下流行的“小波体”不足取，是“一种极大的无趣”。

《中华读书报》于2003年1月22日，刊出鲁大智的文章《网络上的王小波：与时尚同流或继续特立独行》，介绍《网络王小波》一书。该

书较全面地搜集了2002年前的几年间网友对王小波的看法，作者认为："喜欢王小波的人，可以在这本书上找到喜欢的理由；不喜欢王小波的人可以在这本书上明白自己不喜欢他的原因；中立者如我，更尽可以抱着看热闹的态度看完此书：一个作家如此地被人们阅读、关注、讨论，应该说是十分罕见的。"

2003年11月7日的《中国图书商报》刊出了《重整王小波》的讨论文章王干认为王小波作品的两大积极意义在于"融会了'有趣味'和'有思想'方面"与"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他用"混沌"一词形容王小波的文字——"他的小说把人的生活状态和社会的状态完整地融合，是生活状态最本真的表现"。止庵认为王小波是一个有才情、有思想的作家，二者相辅相成张颐武强调王小波是新文学制度的批判者，"对当代文学而言，王小波的贡献在于他所具有的一种批判精神，一种对很多事物都时刻保持的尖锐冷静的批判"。

2006年4月19日，《中国青年报》刊出申东旭的《王小波离去这九年：从黄金时代到青铜时代》。该文分为"1997年后的那两年,莫名喧嚣——王小波的黄金时代\-2002年前的网络，由喜爱而模仿——王小波的白银时代"、"从2003年到今天，逐渐被淡忘——王小波的青铜时代"三部分.梳理了王小波逝世九年间社会对其态度的变化当月的《北京娱乐信报》也刊发了对李银河的专访《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和《如果小波不死可能会开博客》，以及对另三位文化人的专访，标题分别为：《孙郁：可惜他活得太短了》、《黄集伟：他成了一个文化符号》、《欢乐宋：欣赏他独立的人格》。孙郁给予了王小波很高的评价："实际上，他已填补了鲁迅世界的一种空白。我们传统文化里，没有罗素和拉伯雷的结合体，王小波完成了这一点。"

2007年，王小波逝世十周年，报纸上的纪念文字陡然增多。较早的一篇是4月2日刊于《21世纪经济报道》上的张颐武的《和时代拔

河：十年后再思王小波的价值》。作者旨在“讨论王小波和三十年来中国的价值观与社会转变历史之间的关联，通过这样的探究凸显王小波的价值，也凸显这个时代和王小波之间的对话关系”。他认为王小波是“80年代文学的另类”。《东方早报》刊出石剑峰的文章《王小波逝世十周年祭》，并对李银河、黄集伟、王小波小说英文译者张洪凌等进行了专访。《东方今报》的《王小波去世10周年祭上路，是走狗就该比他走得更远》披露郑州的王小波粉丝策划了“关于王小波的一切”的活动，该报还举办了“请对王小波说”征文。《都市快报》刊发了“’王小波逝世10周年’特别评论”《10年后我们不再沉默》（汪震宇）。

其他报纸，如《河南商报》策划了专题《王小波去世10周年祭天上的王二天上的黄金时代》。《中华读书报》也刊载了编辑祝晓风的回忆文章《湮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 个编辑十年后对王小波的

回忆》，“以此纪念一位特立独行的作者和一段为理想而奋斗的编辑岁月”。文中记载了王小波生前最后一份稿约以及作者同王小波几次会面的情况。《南方日报》4月8日刊出郭珊的《假如王小波活到今天》。作者以《“王小波研究”十年渐成“显学”，“王小波作品”逝后被尊“绝唱”》的副题概括了王小波身后的情况。同期还刊出《王小波为什么“火”到今天》，采访了李银河、林贤治、许知远、钟洁玲、郑敏等亲属、学界、出版界、读者代表。许知远认为“王小波之所以那么火.不是因为王小波太好了，而是因为别人太糟糕了，我想这与知识界在这十年来毫无作为，不受人尊敬有关系吧”。

2012年4月.王小波十五周年祭到来之际.《北京日报》登载了黄平的文章《王小波：戏谑美学，一代绝唱》-《东方早报》刊载了杨早的《自由撰稿人王小波》和潘采夫的《离开王小波的这些年》。杨文讨论了“自由撰稿人”身份在塑造王小波“文化英雄”形象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对王小波•自由职业’的赞美，对应着知识界对于’体制’的历史疑虑

与现实反抗”；同时也分析了王小波的创作在思想和文体上对“自由撰稿人”这一职业的影响潘文回忆了自己对王小波的接受史以及王小波对自己的影响，评价王小波“以小说和杂文两条路，同时在两个领域达到了同行的最高水准，而旦这两块乂互相帮忙，评论写得像小说一样好看，小说写得和评论一样有情怀”。

3

如果要谈王小波去世后的接受史，不能不谈“王小波门下走狗”。“王小波门下走狗”原为西祠胡同的一个论坛，创始人名字叫欢乐宋论坛创立后，迅速吸引了大量王小波的粉丝，其中甚至有一些专职作家，影响力也很快扩大，成为国内知名论坛，气氛火爆:紧接着.欢乐宋推出了“王小波门下走狗”系列图书，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刚开始有出书的想法.主要是觉得论坛里面的人都写得不错.但是没有名气.出书的可能性不大，而且乂都是喜欢王小波的人，所以就想把这些作品组织起来.来一次集体亮相.书出来以后反响不错，所以就坚持下来了”该策划曾掀起轩然大波.誉之者称其为王小波精神的继承者，毁之者则对之笔伐口诛，认为其玷污了王小波精神，透露出

圈子化的旧文人心态：如笔名为红佛青铜的作者直言讽刺道：

> 这群人有一个特别的称呼："王小波门下走狗"。他们名为狗，实为猪。还有一群声称是猪的人，却一不小心做成了狗，有时还乱咬人，让主人很没面子。王小波说，我讨厌灌输,他们偏要灌输。王小波引用罗素的话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之源，他们偏说要永远跟我走。王小波要从坟墓里跳出来骂一声直娘贼，老子不是权威，他们竟然说，你不是谁是？没有你，我们怎么吓唬人？

自2002年至2007年，该系列图书共出版了五本，即《王小波门下走狗》、《一群特立独行的狗》、《王小波门下走狗第三波》、《王小波门下走狗第四波》、《王小波门下走狗第五季》，在文化圈产生了一定影响。该套书的策划出版，其实揭示出了很多当代青年接受王小波的

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网络时代对王小波的狂欢化戏仿

据笔者对欢乐宋的采访，他最初萌生创办论坛的想法，是在“西桐胡同”网站上，经常和一群王小波迷们交流的结果，对“走狗”这个说法容易引发的争议，“他们有过估计，但并不计较”。由于钦佩王小波的幽默、理性和文学想象力，欢乐宋在书商的帮助下，策划了第一本“王小波门下走狗”，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得到了李银河的支持。接着又推出了其他几本.但据欢乐宋说，这几本书的销昼并不是特别好，每本大约在一万五千册左右.而主要的撰稿者，多来自7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文化人，包括一部分80后作家。李银河在第一木书的序言中声称：“总之，看到有一群人如此喜欢王小波.既在我的意料之中，乂令我感到欣慰。我早就知道，小波并没有死，他仍然活在一些同周闹的人群相比生命力最旺盛、最有创造力、最富于幽默感的人们心中'而对于“门下走狗”的称呼，胡筋则在《为了告别的纪念》中说：“一直以来.总有些朋友，特别是年纪稍长的存有异议对此，我的理解是.自称’走狗’是向自己内心崇敬的人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我们愿意是他精神的追随者，但这并不表示要成为一个盲目的崇拜者、模仿者……与其我们继续以一种最虔诚的方式实施着对他的背叛，不如我们以’背叛’的方式来表达对小波最大的崇敬所以，在纪念之后，我们选择告别,告别小波，离他远远的，让我们在各自的作品中拥有自己独立的品格……”2这些作品，大都写了一些年轻人的生活经历及感受，特别是对消費时代和网络时代的感受.主人公和王小波类似.都是一些有旺盛生命力、但不为人重视的小人物，他们生活在单调的机关（《玷污》），或待业在家写作（《作家刘二》），或为考研拼搏（《范小进考研》），或是一些被游戏化的历史人物（《欢乐宋定伯》、《杨家将》、《孔子丑寅卯》）。他们的生活中有好莱坞和港台电影，有网络，但同样有无处不在的青春压抑，特别是有关性的狂想。

二三十岁青年人和王小波在小说主题、意象和趣味上的重合.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语境延续性的暗喻

但是，这些青年作家不仅缺乏反映现实的能力，且缺乏穿透现实的理性思维能力。那些语言快感的模仿，极少能超越表象、深刻洞察现实生活的逻辑。比如，《王小波门下走狗》中，笔者比较喜欢犀骨

1李银河.《王小波门下走狗•序言》.该书由宋广辉、淮南*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2年版.
2《王小波门下走狗》.325-326页。

指环的《玷污》，他以一个小县城职员绝望的生活，写出了当下中国的文化现实："我"是一个无钱无势的小公务员，没有房子，也没有钱娶老婆.就买了一个性爱娃娃"史黛芬妮"，谁料，"我"的朋友大顺非要"强奸"这个娃娃，于是，引发了一起人命血案……该小说既有现实生活的隐喻抽象.乂能从荒诞的黑色幽默入手，写出人性的困境，选题非常好，文笔也不错，但可惜缺乏进一步的深入反思。欢乐宋认为，徐浩峰与陆源，是这个书系里最好的作者，特别是徐浩峰的《"者名"演员郭国林》。但数年过后，1973年出生的徐浩峰已从"愤怒青年"变成了新生代武侠小说家，进而开始研究道家文化，其武侠小说《道士下山》、《大日坛城》等被冠以硬派武侠复兴之作。而毕业于人民大学的经济学硕士陆源，就职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具王小波风格的长篇小说《祖先的爱情》（作家出版社）。该小说机智幽默，风趣自然，对意识形态的解构之处,颇得王小波之味，但依然在文坛声名不显。如果认真考察这几本书，我们会发现，与其说这些作者的作品是王小波写作的延续，不如说它们是对王小波作品的"戏仿"。这些"走狗青年们"表现的情感及其书写方式，与王小波之间，既有内在联系，乂有很大区别。他们的语言狂欢更放松随意，但也缺乏深意；他们的故事更"荒诞无聊"，但也软弱无力。其实他们欠缺的，恰是王小波的建构精神，而不仅是解构气质，是毫不妥协的内在力量与理性思辨的强大精神。据欢乐宋所言，他已过了推崇王小波的年龄，相对于王小波张扬自由的风格，他更认同复古保守一些的观点。'时光流逝.人的思想和气质都会发生变化，文学喜好自然也会变化，但一时"走狗极盛"，一时又"风流云散"，不能不让我们叹息世事无常、人生若梦了。

1据2013年3月20日对欢乐宋的采访

4

其实，王小波身前与身后，对他的质疑声音一直没间断。王小波刚去世不久的1997年7月，杂文家方舟子就撰文《人之既死，其名也盛》，对王小波进行批评：

> 硬着头皮读完，发现王小波颇有点以青年导师自居的意思，或者竟是要当中国文化的导师的，跟他所深恶痛绝的军代表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不过军代表要灌输的是毛泽东思想，王导师所指引的却是：中国文化乃是低能弱智的文化，只有西方文化才是充满智慧的。把中国文化视为他阿姨家的傻大姐，如此恶毒的比喻，说“哀其不幸”也许还说得过去，“怒其不争"却是扯不上的，对于弱智白痴你还能指望能有什么争？最多是可怜、可鄙而已。一种批判的用心的爱与憎的分野即在于此，王小波辈与鲁迅的差别也在于此。

方舟子还对“王小波回国”加以讽刺：“滑稽的是.王小波是被封为爱国志士的，证据是他在美国拿了文学硕士后回国当作家了。王小波自称回国是因为不习惯国外的生活，恐怕更近于事实。文学毕业生在美国的饭碗如何如果（原文如此——编者注）大家都清楚，何况一个人既然自视为傻大姐的传人，那么与其在西方聪明人当中当傻子，实在不如回去在傻子当中当导师来得过瘾。”余杰的《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批判什么？——从昆德拉和哈维尔谈起》（《北京文学》1999年第1期），认为小波的小说太过“冷”，理性太强.缺乏情感。王晓华的文章《王小波的另一面》（《粤海风X1999年9、10期合刊）则认为，王小波以“知识”划分等级，一方面主张参差百态乃是幸福本源，另一方面.则用理性文化取代

非理性的文化，“他所信奉的自由主义暗藏着一种独断论”,“由于经验主义对常识和利害的强调，而无法实现人类的一些超越性价值”（语出李静对该文的概括）。应该说.这些说法并不是全无道理，但“矫枉难免过正”，对于王小波来说，如无二元对立式的主体批判，面对强大的传统，必然无法做到振聋发聩，理性主义自然也有问题.而中国的问题则不在于现代理性太多，而是太少。

对很多更年轻的新锐作家而言，王小波是一个应“被超越”的标志性人物。比如，新锐作家蒋一谈认为：“王小波的文学缺乏善，缺乏发自内心的悲悯”“王小波的文学同样缺乏美。王小波的写作方式是单调的，他乐于重复自己……”“王小波的文字遗留下什么写作遗风？戏谑、阴郁、残暴、血腥、玩世不恭……”'蒋一谈以《鲁迅的胡子》等精美的短篇小说著称，他的小说温婉精致，但乂入世极深，他与王小波这样擅长中长篇，却在细节上经营不够的作家，自然不是同路人，而王小波式的狂欢戏谑与他的风格也截然不同：而与王小波同样、以“惊世骇俗的性趣味”和“智性写作”闻名的作家冯唐，在肯定王小波的同时，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他的缺点。冯唐写于2002年的杂文《王小波到底有多伟大》（收入《如何成为一个怪物》，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首先承认“小波的好处显而易见”，并列举出“有趣味”、“说真话”和“纯粹个人主义的边缘态度”三条，说读到王小波的作品，“就像阿基米德一样跳出了浴缸”；随后又指出，“王小波

1蒋一谈，《遗憾的中国时间》，《人物》，2012年4期。

的不足显而易见”，理由则是“文字寒靡”、“结构臃肿”、“流于趣味”和“（思想）缺少分量”。他最后总结说:“总之，小波的出现是个奇迹，他在文学史上完全可以备一品，但是还谈不上伟大。”而80后作家李傻傻，作为曾经的王小波的推崇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忘了看王小波作品的最初感受了，也很难提起再看的兴致。年轻时候被他吸引、

蛊惑，年轻时他用有趣吸引你写作，用智力蛊惑你蔑视，估计过两年会忘掉他。”李傻傻曾经表示，王小波是其文学写作上的引路人之一，他的长篇小说《红x》能看出王小波的痕迹°

而1990年代初，由于王小波对民族主义风潮的批评，特别是对《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批评，早就和一批具“爱国热血”的文人结下了“梁子”，即使在他去世后，“王小波否定传统、不爱国”的说法，依然很有市场。如网上流传着一篇文章《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王小波：一种装蒜的自由主义》，指责王小波是一个被仇恨淹没的人，而恨的根源在于一个字——“穷”；该文还说王小波是一个被海外生活扭曲了心灵的亲美派，而王小波式的自由主义，有作秀的嫌疑。其实，随着《王小波全集》的出版.王小波和朋友的大量书信隐私被公开，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复杂的王小波。可以说，“文学形象”的王小波和“生活中”的王小波有距离，是很正常的事:王小波是优秀的作家，也是普通人。但如果因此说王小波是“假自由主义”则过分刻薄——至少，去世之前，得到“山呼海啸般呼应”之前的王小波，不管内心有什么牢骚，不管有怎样的委屈和压力.他还是默默地坚持了内心最原初的信念。试问今天的成名作家，又有几人能做到这一点？

还有一些否定王小波的文章，则学理全无，近乎漫骂.令人心生反感。在《中国不高兴》一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中，王小东以《王小波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虚伪、最丑陋的神话之一》为题指责王小波。他认为：“小波对中国的一些批评是有道理的。可惜不知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他硬是把这种批评和对欧美的赞扬结合起来了，产生了很糟糕的效应.这一点被许多人利用。”“有一点很清楚——他在美国被人欺负惨了，却不知道愤而进取，回国来只会破口大骂中国人.并且给中国人描绘一个虚假的欧美，这是骗子行为，这一点被我看到了，我很鄙视他。”“无论他的小说和散文写得如何，我就是认为他是一个臭鸡蛋，因为他的臭味我闻到了。而且他的臭味把我熏得吃不下去.所以，我对于他

的臭味也提不出太多意见来，我只能发别人辨析他臭味的文章。”但是他也坦陈“王小波写的东西我读过的只有他的几封书信，还有一两篇骂中国人的文章”。[1]

对一个作家保留意见，这很正常，不能因为喜欢一个作家，就盲信有关他的一切——正如同也不能因为不喜欢，就否定他的一切。但是，无论喜欢还是讨厌，王小波在我们的社会，正在变成一个“神话”被超越.在他身上.负载了太多复杂的社会信息，也负载了太多怨恨、愤怒、喜爱、沉静与悲伤。然而，与王小波在公共空间不断被抽象成为符号相反.对更年轻的90后青年、对新世纪青年而言，在这个充斥网络信息的喧嚣时代，深刻的东西，似乎都在被简化为更具快感的表达与更炫目、直接的娱乐。可以肯定的是，“革命北京”辉煌不再，而新世纪的北京，却在以民族崛起的新盛世景观，昭示着特殊文化经验的生成。不管是否承认，“黄金时代”的故事已经过去了，那些庄严宏大的东西依然改头换面地存在着，而那些激动人心的爱情、蓬勃无忌的欲望，都已在“似水流年”中化为无尽的怀念。在喧嚣的尘世,我们还能为中国写下未来的寓言吗？2015年快来了，“白银时代”和

1《中国不高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254-255页。

“黑铁时代”的“古怪狂想”是否真的会成为现实？

2012年，六十岁的社会学家李银河退休了。也许，王小波死后，她一系列的努力，都试图在证明自己的怀念。既然阴阳两隔，不得相见，就不如怀念吧,同样深沉感人的怀念，还有王小波白发苍苍、年逾九旬的母亲，还有他的其他亲属.他的朋友，一批又一批成长的读者……

李银河曾认为自己和王小波都是坚强的，可以超越世俗的羁绊，在

生命的燃烧中找到无限的意义。他们不相信海枯石烂的誓言，不相信永远不变的承诺因此，他们最终也没有留给世界一个可资纪念的孩子。如今，李银河收养的男孩壮壮，正在健康地成长着，并给予步入晚年的她以莫大安慰。可是，那个“顽皮的北京坏孩子”已走远了，那个“厚嘴唇的巨人”已走远了，去了一个千古哲人都无法看透的神秘国度，永远不会回来！

附录王小波年谱

1952年

5月139.出生于北京成方街，是家中的第四个孩子，上有大姐王小芹、二姐王征、大哥王小平。王小波在兄弟中行二。

父亲王方名.四川渠县人，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政治教育专员；母亲宋华，山东牟平人，就职于教育部计划司。

同年，王方名因家乡土地纠葛，被教育部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发配至人民大学附属工农兵速成中学任教。故王小波取名“小波”，意思为顺利渡过劫烧：，

1955年三岁

全家搬至铁狮子胡同一号中国人民大学家属院内。王方名被调至人大逻辑学教研室工作

1956年四岁

小弟王晨光出生。

4月11日,王方名、周谷城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洽谈逻辑问题。

1957年五岁

全家搬至人民大学林园楼

1958年六岁

大跃进运动开始.经历了大炼钢铁的荒诞：

1959年七岁

全家搬至教育部宿舍、大木仓胡同北一号家属院内。

1960年八岁

入人大幼儿园。

同年秋季，转入人大附小。

1962年十岁

转至附属于二龙路中学的大木仓小学.认识艾建平。

1965年十三岁

升入二龙路中学，并结识终生挚友胡贝等人。

1966年十四岁

上初一。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参加教育部红卫兵组织，并亲眼目睹教育部副部长柳湜跳楼身亡。这些生活经历成为《革命时期的爱情》和《似水流年》等小说的背景。

1969年十七岁

5月15日，离开北京，前去云南德宏州弄巴农场景罕十四队插队。一同去的同学好友有赵红旗、赵和平、艾建平、那佳等数人。

1970年十八岁

离开云南，回到北京。期间，试图在母亲宋华下放的安徽干校安置落户，未成功；后又试图在四川渠县插队，亦未成功。嗣后至入山东再次插队前，一直闲居家中，并业余学习英语。

1973年二十一岁

春季，来到山东牟平水道镇青虎山村插队落户。不久，任水道联中代课教师，讲授物理和数学。《绿毛水怪》、《我在荒岛等待黎明》、《我这一辈子》等小说即以此为背景。

1974年二十二岁

年初.姥姥宋氏去世。姥姥曾照顾小波多年，和他有很深的感情:

年底，病退回京，于西城区电子元件厂做工人，业余自修曾短暂谈过一次恋爱，未成功。开始创作小说•《马但丁》、《绿毛水怪冷。《马

但丁》以牟平知青生活为背景.为王小波现在所知最早的作品:而《绿毛水怪》等作品，均反映了王小波早期的情感体验。

1978年二十六岁

9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经济系，学习商品学专业。之前，曾投考中央戏剧学院，未录取。

1980年二十八岁

与李银河结婚，李银河时为光明日报社编辑

1981年二十九岁

发表评论《我喜欢这个向“限度”挑战的强者》（后改名为《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于《读书》第I期，署名“晓波”。

1982年三十岁

大学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一分校教书。《三十而立》等小说以此为写作背景。开始写作《黄金时代》。

同年，发表处女作《地久天长》于《丑小鸭》第7期•一

1983年三十一岁

妻李银河赴美国匹兹堡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

1984年三十二岁

8月中旬，赴美国。后就读于匹兹堡大学东亚系，师从著名西周史专家许倬云教授.并在许指点下，细读传统经典与中国古代小说。

在美留学期间，与妻子李银河一起游历了美国多地。

1985年三十三岁

9月3日，父亲王方名去世。

1986年三十四岁

获文科硕士学位。开始写作以唐传奇为蓝本的仿古小说（又称唐人小说）并继续修改《黄金时代》。其间得到老师许倬云的指点。暑假.与妻子李银河游历了欧洲多地:

1988年三十六岁

年初，与李银河一起回国。先后任北京大学社会学所助教、讲师，负责数据统计和计算机维护。李银河先在北京大学社会学所，跟随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做博士后，后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1989年三十七岁

9月，第一本小说集《唐人秘传故事》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1年三十九岁

3月，调人民大学任会计系讲师，讲授电算化课程与专业英语。

人大教书期间，曾与同事合作，为北京煤气工程公司开发管理软件，获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又曾自行设计开发新汉字编辑软件并试图销售.因不易操作作罢'

同年，小说《黄金时代》获第13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奖金二十五万新台币。小说嗣后在《联合报》副刊连载，并在台湾地区出版发行。

10月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4版报道了《黄金时代》获奖的消息，

1992年四十岁

1月，与李银河合著图书妇也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

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

3月，小说集《王二风流史》由香港繁荣出版社出版。

8月，《黄金年代》（系《黄金时代》之误）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9月，正式辞去教职，做自由撰稿人。

11月，《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大陆版由山西人

民出版社出版'

12月，应导演张元之约.开始写作同性恋题材电影剧本《东宫•西宫》。

1993年四十一岁

完成《红拂夜奔》、《寻找无双》和《革命时期的爱情》的写作，并将三部作品合编成“怀疑三部曲”.后试图在成都出版社出版，未果。

同年，父亲的逻辑学著作《逻辑探索——王方名学术论文选》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同年.应《四川文学》之邀，撰写杂文《域外杂谈》系列。杂文《摆脱童稚状态》发表于《读书》第6期，

1994年四十二岁

春季，写作完成《未来世界里的日记》，因不满这部作品中奥威尔的影子，又写了一部《未来世界》，后者在不久后使王小波二次获得《联合报》文学奖。

7月，小说集《黄金时代》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9月，《黄金时代》研讨会在华夏出版社举行，参加者有文学评论家、编辑、记者等二十余人。

同年.中篇小说《革命时期的爱情》发表于《花城》第3期；中篇小说《我的阴阳两界》发表于《青年作家》第3期。

同年，受《东方》杂志之邀在该杂志开设“社会伦理漫谈”栏目，撰写杂文《中国知识分子该不该放弃中古遗风？》等.所谈者大多为知识分子的处境。另发表杂文《走进现代空间》（《山西青年》第I期）、《思维的乐趣》（《读书》第9期）、《关于中国男同性恋问题的初步研究》（与李银河合作，《中国青年研究》第1期）等。

1995年四十三岁

5月，小说《未来世界》获第16届《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

7月，《未来世界》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7月120,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杂文《迷信与邪门书》，掀起了与柯云路有关“科学与特异功能”的论战，王小波为此写作并发表了一系列杂文。

同年,《未来世界》发表于《花城》第3期;短篇小说《南瓜豆腐》发表于《人民文学》第3期。

同年，发表杂文《花刺子模信使问题》（《读书》第3期）、《智慧与国学*《读书》第11期）、《我是哪一种女权主义者*《健康世界》第12期）、《我看国学》（《中国青年研究》第2期）、《我对国产片的看法》（《演艺圈》第10期）等C

同年，编定第一本杂文随笔集《思维的乐趣》。

1996年四十四岁

年初，中篇小说《2015》发表于《花城》第1期。

夏季.在凤凰卫视专门讨论特异功能问题的一期节目上，与柯云路展开了激烈的现场辩论。同期，将之前写过的小说《红线盗盒》重写，叙事繁复，取名《万寿寺》，这是他篇幅最长，也是“迄今为止被小说编辑们认为不可超越的一部小说”'。他在书中写道：“一个人只

1邓炜茵.《〈万寿寺〉——特立独行的叙爭特色》.《安徽文学（卜一半•月）X2009年10期

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

秋季，完成《白银时代》的写作，遂将其“时代三部曲”编定。冬季，与花城出版社就“三部曲”出版事宜签约。《白银时代》与王小波的另两部小说《未来世界》、《2015》构成了其“反乌托邦未来叙事系列”，同时，他的新长篇《黑铁时代》开始写作

11月，杂文随笔集《思维的乐趣》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

同年，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开设专栏,'晚生闲谈”，发表杂文《关于“媚雅”》等。

同年，在《南方周末》上发表杂文《有关“伟大一族”》等，又在《博览群书》、《演艺圈》、《华人文化世界》、《戏剧电影报》、《中华读书报》、《辽宁青年》《中国青年》、《中国青年研究》、《东方》等刊物上发表杂文随感二十余篇。

1997年四十五岁

短篇小说《夜里两点钟》发表于《北京文学》第1期;短篇小说《茫茫黑夜漫游》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第3期；中篇小说《白银时代》发表于《花城》第2期:又在《光明日报》、《金秋科苑》、《南方周末》等报刊发表《写给新的一年（1997年）》等杂文随笔十余篇。

4月11日夜，因心脏病突发，逝世于北京顺义。

身后事

1997 年

4月中旬，妻子李银河发表悼文《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悼小波》。同月，与张元合著电影剧本《东宫•西宫》在阿根廷国际电影节上获最佳编剧奖。嗣后，电影《东宫•西宫》入围戛纳电影节。

4月26日，王小波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举行。

5月，“时代三部曲”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首发式于5月13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同月，杂文随笔集《我的精神家园》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10月，《沉默的大多数一一王小波杂文随笔全编》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同月，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繁体字本。同月，由艾晓

明、李银河合编的纪念文集《浪漫骑士——记忆王小波》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998 年

2月，《地久天长——王小波小说剧本集》、《黑铁时代——王小波早期作品及未竟稿集》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1999 年

2月，小说集《黄金时代》（上、下）、《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上、中、下）由台湾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4月，《王小波文存》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2001 年

小说集《黄金时代（中国小说50强：1978年—2000年•王小波卷）》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2 年

1月，《王小波作品系列》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6月，由欢乐宋等王小波的崇拜者模仿其风格创作的作品合集《王小波门下走狗》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此后数年，他们接着出版了四本类似书籍。

12月，葛涛编选的《网络王小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同年，小说集《怀疑三部曲》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2004 年

王小波与李银河书信集《爱你就像爱生命》由朝华出版社及台北华漾出版社分别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出版

2005 年

1月，纪录片《寻找黄金时代——纪念王小波逝世8周年》由中国科学文化音像出版社出版。

4月，鲁迅博物馆举办王小波生平展览。同月，李银河与郑宏霞合编的《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王小波画传》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2006 年

7月，《王小波全集》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同年，《王小波全集》（彩绘插图本）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王小波作品系列》（最新典藏捕图本）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7 年

4月，李银河与一群王小波的崇拜者，发起“重走小波路”活动。同月，王小波作品的首个英文译本 *WanginLoveandBondage:ThreeNovellasbyWangXiaobo*（《王二的爱欲枷锁》）由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它由美籍华人作家张洪凌和美国诗人杰森•索摩（JasonSommer）历时五年合作翻译完成，包括《2015》、《黄金时代》、《东宫•西宫》三部作品。

5月，李银河编著的《王小波十年祭》由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

同年，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小波全集》被李银河以未经许可出版为由告上法庭，索赔四十八万元。后经法院调解，该套书更名为《王小波作品选集》发行。

2008 年

1月.《王小波全集》）（珍藏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同月.《王小波散文》（插图珍藏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2009 年

4月14日，由夏波导演的话剧《黄金时代》在解放军歌剧院首演.史可、孙刚、赵至娥、董路等主演，获得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9月，《王小波全集》分别由重庆出版社和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2 年

1月，《王小波全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

5月，王小平著《我的兄弟王小波》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2013 年

11月，王征著《时光中的事——关于王小波和亲友们的那些事儿》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后记

“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

多年以前，恰逢青春年少，我在王小波的小说《三十而立》中读到这句诗，感觉有些不以为然：它既不“美”，也不“深刻”，仿佛是小孩子

的顽皮恶作剧。但是，多年以后，在这个黄叶飘飞的秋天，当我尝试为小说家王小波写一本传记，我才弄明白，这是一首“生命反讽”之诗。这句诗的前半句，平静舒缓，而后半句则近乎戏谑，颠覆了前半句的优雅。生命的优雅.起乎人的尊严，生命的狂欢，则起乎人的反抗，而过分的优雅，则有可能成为矫情，而过分的狂欢，则可能成为无节制的虚无。只有优雅地走在“寂静的天上”，体验着“阴茎倒挂”的荒诞，才能体验王小波借助“力比多”所表现的无处不在的文化焦虑和异端的反抗之心，而只有如此.才真正能表达出王小波作为小说家，对中国现实的深刻洞见：一切“坚固”的其实并未“烟消云散”，而是以“传统”的弥散样态，继续存活在种种生存细节中。它们有的成为精神的避风港.有的却是我们内心的敌人只有承认了这个现实，才是真正的“罪孽”。其实，这正是王小波作品的一贯风格.他能将极优雅的生命体验和极狂欢化的解构意象，悖论式地统一在充

满激情的表述中匸

我是一个出生于1970年代后半段的普通作者。对王小波那个时代的很多“大故事”：“文革”武斗、上山下乡等，我没有体验。王小波是在那些“大故事”尴尬地失败、新的“大故事”却又不断衍生出的时代，奋起攻击“大意思”的少数人——糊涂人大多懵懂不觉，聪明人则“假装”不知道，假装“大意思”还继续“膘肥体壮”地活着，既而绕开风险.进行“不冒险”的安全写作一、没有人做那惹人烦的、“掀开皇帝新装”的小男孩。然而，正是当年读了王小波，才让年少的我猛醒，明白了我的处境：智慧、自由，这些美好的东西，我似乎都没有真正拥有。相反，装傻、装温顺、装暴戾、虚伪、软弱、反智、褊狭、渴望奴役与被奴役，这些有害的东西，却一直停留在我的身上，也停留在中国青年身上——有时候.我们还叫它们“美德”,正如21世纪第一个十年已过去，我们还在继续推崇那些只不过表现得更“精致感人”的伦理戏和苦情戏一样。

1997年，我进入山东的一家国营肉联厂做工人那年秋天的某个黄昏，我拖着疲惫的身体，离开分割深加工车间.来到宿舍，披着那件充满血腥味道的工装，斜靠在夕阳斜照的宿舍窗台上，开始翻看王小波的作品。当我看到他在杂文《思维的乐趣》中所写的——“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上,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时，我被感动了我的宿舍是一间“磨砺心志”的好去处，冬天冷得像坟墓，夏天则成为老鼠、蟑螂和蝙蝠的乐园。在这样的环境里，我的阅读心情常常变得非常古怪。可怜微薄、却永远不能按时发放的工资，红色意识形态和欲望的野蛮杂交，知识分子可怜又可鄙的生存状态，都深深地刺激着我思考时代的特征，思考着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精神命运一其实,我第一次阅读王小波，是在一间昏暗的小书店。当时我发现的是王小波的《白银时代》。但当我拿到这本书后.却看不下去.因为它对我的阅读经验来说非常陌生：精神贵族式的知识分子思维，自然主义的华丽铺陈，逻辑证伪式的理性趣味，惊世骇俗乂干净坦然的性描写，这完全和我的阅读经验不同。只有在半年后，当我被现实的礁石击碎，才真正把王小波的小说和杂文，拿出来反复阅读了很多遍我发现,原来我那些惜惜懂懂的想法.其实并不完全是“牢骚”，我们在朱错基改革时代所遭遇的精神困境，其实在王小波那里早就有了答案

可以说，王小波对青年人的启蒙作用毋庸置疑。正是王小波，让我们在压抑的现实面前,找到了内心的力量。青年作家黄孝阳，在《王小波十周年祭》中，也充满深情地说过：“我感谢王小波。他最大程度地启发了一个县城文学青年在一个封闭环境里的写作可能。在那个时候，我所阅读到的经典基本上是贴着现实主义标签的皇皇巨著，它们是那样冗长乏味.与懒婆娘的裹脚布一样.根本无法带来阅读的快感，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从感官刺激开始，如同一枚粗大的钉子，缓缓地，但是不可抗拒地敲进我的内脏。”在网络博客空间内，我偶然发现一个普通的80后大学生——“室内滂沱”写于2012年的一篇祭奠王小波的文章:“王小波，请安息于你深爱着的土地中这片广阔、深邃、古老、悲伤的土地，埋葬了这么多沉默的人。你也安息在这土地中了，因此我们有机会从这土地中站起来。”评价甚高.或有不恰当之处，却道出了当代青年对王小波的追思。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时代在变迁，但是其间充满悖论、荒诞百出的文化逻辑，却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甚至还在不断地恶化然而，也正是

这些70后、80后更年轻的人们的生存状态，让我们更能理解处在历史缝隙中的王小波,更能从边缘化的角度，理解王小波式的美学选择

王小波的意义何在？也许，他是一名先行者，他为当代中国文学找出了一种新的可能。王小波多次提到“减爛”的说法。“炳”是一个热力学术语，后来也被引用到社会科学领域.它是描述体系混乱状态的函数，当能量做功后，就会转化成无效能量.例如污染。炳的增值，表明着无效能量的积累.在社会学中.“炳增”被用来表示人类社会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社会生存状态及社会价值观的混乱程度将不断增加。而王小波提倡的，恰恰是一种逆向而取的“减墙”——既针对堕入无限虚无和欲望化的文学消费，也针对以道德试图重新为文学立法的虚妄。中国文化的转型仍在继续，而混乱依然不见减少，从这种意义上讲，倡导“减炳”的王小波不应被忘记。可以说，王小波对1980年代的新启蒙，既有一种纠偏，又有一种继承，正如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所说:“王小波的创作的确具有多种’元素’，具备可以为大众传媒持续感兴趣，并按照流行文化方式运作的东西°但王小波的价值，正在于他的想象、文体、语言的那种抗拒流行模式的原创性。这种带有’先锋’意味的创造，既’背向’现存文化体制与观念，也’背向’’大众’和’流行文化’（即便是八九十年代的’文化热’、“人文精神论争热”也在内）。'''

王小波的生平轨迹，和大多数1950年代作家看起来很相似：童年经历革命狂欢，少年时代上山下乡，青年时代刻苦求学，中年成为知识分子，却遭遇了市场经济大潮但是，他的人生在接近中年的时候，突然有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辞职写作，选择做一个精神自由的贵族：由此，他的人生，在中年时代，就以一种“加速度”的情况燃

1洪了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442页

烧起来了，并最终在绽放中凋落王小波的文学之路.和中国绝大多数作家区别都很大，这种区别在于，他对文学体制和文化体制，是一种游离在外的态度这种游离，不仅为他提供了新视角、价值和态度.也让他成了所有不如意的反体制者的精神向往之地。1990年代除了所谓多元混乱、众神狂欢，还是一个压抑之下的生机勃发的年代。这正是王小波兴起的接受美学心理。欲望的合法性，在市场经济中取得胜利，并在文化中为个人化提供了“偷换概念”式的快感。然而，在中国转型的大路上，种种狂飙突进的学说和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却都有一个强制性的意识形态框架——野马奔腾，却始终在“锅盖”之内。在王小波出现之前的1990年代文坛，是灰色小人物和自恋女性占据主流的年代，也是新主旋律的高歌年代，很多中国作家都在所谓众神穽欢中失去了方向.从文学干预政治的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自我的精神放逐

但是，王小波的价值选择和文学趣味.却是如此不同。在国家现代化与道德主义合体的岁月，他却一直在增长对庄严伟大事物的怀疑；在中国文学大跃进用短短二十年走过西方几百年思潮的岁月，王小波却固执地进行着无人问津、甚至遭人反感的文学试验；当中国文学遭遇市场大潮冲击时，王小波却在市场中看到了自由狂欢的契机，试图树立新的美学规范和文学理想一这是一条寂寞的反蠣之路.目标是要在布满荆棘的荒野上，走一条前人未走的文学小路，赌注却是生命。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高声大笑：“死亡，你有什么可怕？有本事你就在我的身上施加两次！”王小波以非正常的死亡，诠释了自由的意义：活到灿烂之极，美丽之极，绝不向衰老低头，绝不向平庸生活低头。王小波的文字，就像是文学的一条暗河，当其蛰伏之时.不可谓不弱小，然而，恰逢其时，喷涌而出时，就立刻显现出卓尔不群、特立独行的姿态。对于它，虽毁誉参半、众说纷纭，但它那种挑战权威、颠覆正统的气息，让那些看似悲天悯人的道德学究原形毕露；在它的那些有着自由主义的理想气息、超越流俗的文艺复兴式人物和大胆的嘲讽与叛逆背后，则是自由阔大的生命意志与独树一帜的美学风范，

王小波已离开我们十几年了。一个有可能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巨匠的作家.就这样过早离开了，只留给我们荆棘小路上孤独的身影。无论是追

求个性的网络愤青、大学校园内的莘莘学子，还是广义的当代文化人、态度严谨的学院派学者，都无法回避王小波给当代文化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这个死后成名的作家，在短短的时间内，经历了从话语圈边缘到焦点的转变，并不断在各种利益驱动下，橡皮泥般被塑造成一个个流动而华丽的符号能指。很难形容2007年10月某个下午，当我在网上看到王小波裸体塑像时的感想一当“一堆黄泥”以“手捂裆部”的姿态蹲坐在台上，我怀疑这个形象就是王小波＝至少.他不是我心中的王小波那么，王小波是谁？人民大学逻辑学教授王方名的儿子？社会学家李银河的丈夫？留美归来的大学讲师？落魄的自由撰稿人？智慧的顽童？准色情作家？保守的自由主义学者？堕落年代坚持理想的“小鲁迅”？反对“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的不合时宜的文人？这个酷似“粗壮民工”的作家，这个不修边幅、羞涩沉稳、眼神慵懒却不时透出几分倔强的“巨人”（他身材颇髙大），到底带给了中国文学什么？王小波像一团“迷雾”，吸引着我们，却拒绝所有简单的阐释，他在中国出走红色教堂、飞奔欲望前景的现代化旅程上，不过是窗外一棵高大而古怪的树木.孤独地站立在一片灌木丛中。他的高大与突兀，会让身为旅客的我们“大吃一惊”，成为躁动旅途上的谈资，却烧以让我们真正理解真相——也许，这可看作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王小波接受史的寓言吧。

可以说，当下文坛对王小波的理解依然很隔阂：平心而论，王小波的文字表达在中国当代文坛.不能算最好的，却是最独特的c我们看到了他的小说的拉杂、冗长.结构和语言过于西化.及后期小说的模式化等问题，但谁都不能否认，王小波对中国现实和文化的理解.真诚而深刻说王小波深刻,是说他洞穿了中国现实话语迷雾重重背后的把戏，在悖论性体验之上，拥有了高蹈不羁的气魄和超越性的眼光。由此，王小波的《红拂夜奔》等历史杂文小说，才与鲁迅的“故事新编”系列小说，有了精神的沟通，说他真诚，则既指他拥有精英知识分子的科学理性和说真话、

讲常识的勇气，乂指他对底层和草根的尊重。中国很多作家，一旦成名，就与现实生疏起来。在一面是史诗满天飞，一面却是出轨偷情泛滥的中国当代小说界.很难有小说让我们感动.让我们震撼——更遑论改变对自我和世界的看法.中国作家更缺乏“直截了当”书写现实的勇气，因此便会被视为“粗鄙”。我们擅长云山雾罩，曲折回环.却不能面对一些基本事实，例如，性。王小波所写的性，恰是反色情的，因为那些文字“直截了当”地说出了内心很多隐秘却真实的体验、由此，那些“革命时代的爱情”，“爱情”才第一次光明正大地超越了“革命”价值判断.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另一种“革命＋恋爱”。

在《我的精神家园》中，王小波谈到过自己的文学之路他说：“用宁静的童心来看，这条路是这样的：它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他又自嘲地说:“我们应该像商人一样，严守诚实原则,反对不正当的竞争。让我的想法和作品成为嚣嚣尘世上的正宗，这个念头我没有，也不敢有”文章发表不到两年，王小波就带着幽默的笑声，去天堂中继续讲他那些有趣的故事了王小波一生都在警惕那些自以为是的“宏大思维”，他怀疑权威.不仅怀疑政治权威，更警惕自己也成为“抱着黑色的皮包，秃头大肚子，厚眼镜,在各类学术会议上说着老奸巨猾的俏皮话”的文化权威.也许，这样的一本传记，也违背了王小波的本意.因为这正是将王小波经典化的过程。被经典化了，就要成为戴着“小光环”的塑像，成为被阐释的“美丽风景”——这也会无可奈何地走向“无趣”。

为写作本书，作者查阅并参考了大量资料.特别是王小平的《我的兄弟王小波》，艾晓明、李银河合编的《浪漫骑士》，李银河编辑的《王小波全集》等.许多i己者的采访和对于王小波生平的挖掘也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诸多便利，在此对这些资料的作者和编者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我要感谢所有给本书提供了大量采访支持的朋友们，无论是王小

波先生的亲属、好友，还是烟台市牟平区文联、水道镇政府、胶东书院网站的朋友，以及相关文化界人士，没有他们鲜活的历史现场口述，没有他们的鼎力相助，我无法完成此书的写作。在此.我还要感谢我的恩师、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吴义勤教授的教诲和指点，感谢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魏建教授对此书提供的支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梁鸿教授、杨庆祥副教授、杨晓帆博上，天津师范大学张莉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黄平副教授等好友为此书提供的帮助感谢三联书店的领导和本书的责任编辑罗少强先生，他们的支持，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也要特别感谢此书的特约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陈建宾先生，他不仅利用业余时间耗费了大星心血编辑此书，而且为我的采访、查阅资料提供了诸多方便和帮助他的认真和至诚，令我非常感动。

秋天，弥漫着一种特殊的尘埃，像昆虫一样繁衍，然后破裂，释放出晨雾、露珠和凉。天空游动着成群的阳光，枯萎的落叶，坠落于青黑的泥土，化为碎碎点点金黄的玉:多么平静！这也许就是秋天的勇气。让我们在这个秋天纪念王小波吧，纪念这个羞涩低调、平静如水、内心却有着大神震怒般力址的作家吧让我用诗人茨维塔耶蝦致一百年以后的你》中的诗句，作为这本小书的终结：

我还感到悲哀的是.直到今天黄昏——

我久久地追随西沉的太阳的踪迹，——

经历了整整的一百年啊，

我才最终迎来了你！

诗人等了一百年才最终迎来了尊严与辉煌，但愿我们能够尽快地理解王小波的一生，理解他的追求和艺术成就.也愿我们永远年轻.永远充满智慧和爱，永远热泪盈眶！

（特别鸣谢山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为此书提供的资金支持）

作者

2013年10月

描述

[←1]

1 王晨光.《童年时的小波哥哥 >,《浪漫骑上》，126页。

[←2]

".作群.《黄金时代的革命、爱情与荒诞——美F〈哉金时代〉的对话》。